

廿一世紀文庫

運

明報出版社

本書提供大量第一手資料，可以說是第一部最為全面最為深入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著作。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上）

王若水 遺著



毛澤東的新畫像

毛澤東，孤獨的老人

毛澤東身邊的女同志

毛澤東的權術

毛澤東與斯大林

毛澤東與彭德懷

新發現的毛澤東

—— 僕人眼中的偉人（上）

近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主宰着中國的命運，回首當年神州大地風起雲湧，巨浪滔天，特別是在他的晚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毛澤東逝世後，他的影響猶在，迄今仍未有一部對毛澤東及他的思想作全面解讀的作品，誠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空白。本書作者王若水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理論家，曾任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長期從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本書是他傾大半生心血的遺作，書中對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性格、他的心態、他的權謀作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其中蘊含大量從未聞問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可以說是第一部最為全面最為深入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著作。自出機杼，論點精確，可讀性極高。

CE01

HK\$ 69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廿一世紀文庫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上）

王若水 遺著

明報出版社

廿一世紀文庫

主編

潘耀明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

(上册)

王若水 遺著

馮媛 編

責任編輯

陳佩森

封面設計

易水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〇二年七月初版

ISBN : 962-973-697-7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TEL : 2595 3215 FAX : 2898 2646

<http://books.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承印

「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從《2000年文庫》到《廿一世紀文庫》

潘耀明 明報出版社／《明報月刊》總編輯

在世紀之交，我們編了一套《2000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讀》。中國當代文學五彩繽紛，十分豐富。這套文庫從選擇到解讀，每個程序都有難點，最後我們邀請海內外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專家和作家擔任叢書顧問，聽取他們的意見，才確定了精讀的對象和負責解讀的文學批評者，終於使這項工程開始建設起來。從二〇〇一年夏季起，分期陸續出版，共出版了二十位作家的自選集或選集，其中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高行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套文庫的代表性。

這套《文庫》從籌備到出版經歷了二年時間。在商業社會裏，編輯這套《文庫》，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銷量實在有限，毫無商業價值可言。《文庫》的編輯出版，時值《明報》成立四十周年，所以我們特別設計四百套「作家簽名編號珍藏本」，銷了三百多套，大致可以彌補散本的虧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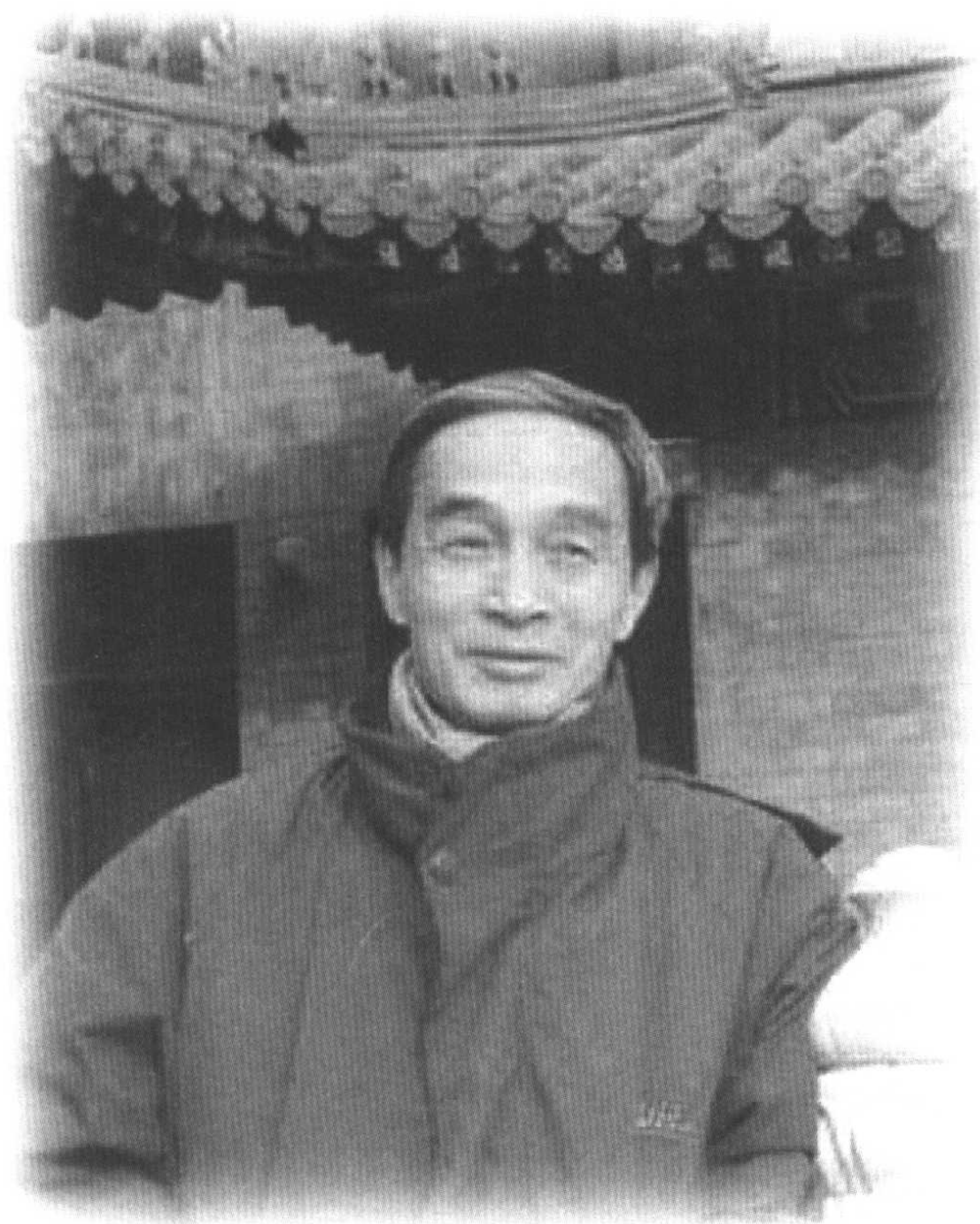
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激烈動盪的世紀，也是中國現代學術、文化開始形成並逐步發展成熟的世紀。而剛剛開始的二十一世紀又是中國向現代社會全面轉型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在新世紀中將真正結束以農業為中心的「鄉村時代」，進入以產業與貿易為中心的「城市時代」，也將結束以革命為動力的社會形態，進入以財富為中心的社會形態。在此大變動之際，中國如何走出自己的路？這是關係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未來的極為重大的課題。

在尋找中國道路的思考中，上一個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並形成一批傑出的帶有經典性的創作、學術與思想成果，在新世紀開始時，又有許多學者、思想家與作家面對全球化的潮流作出新的思索。然而，由於這些學術、思想成果屬於高層次的精英文化，它雖有高度的文化價值，卻不一定有市場效益。香港及週邊地區的經濟皆陷入低谷，香港圖書市場一蹶不振。在此情形下，作為一位出版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理想與市場矛盾的掙扎苦鬥中。但理想像一道陽光，仍然在我們的腦海閃爍。沒有陽光的生命，肯定黯然失色，所以雨果說：「夢想就是創造，希望就是呼喚，製造幻想就是向現實挑戰。」我們抱着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編輯新的一套文庫——《廿一世紀文庫》，不敢言向現實挑戰，只是略盡綿力，朝着遙遠的理想境界進發，並散發出一抹幽微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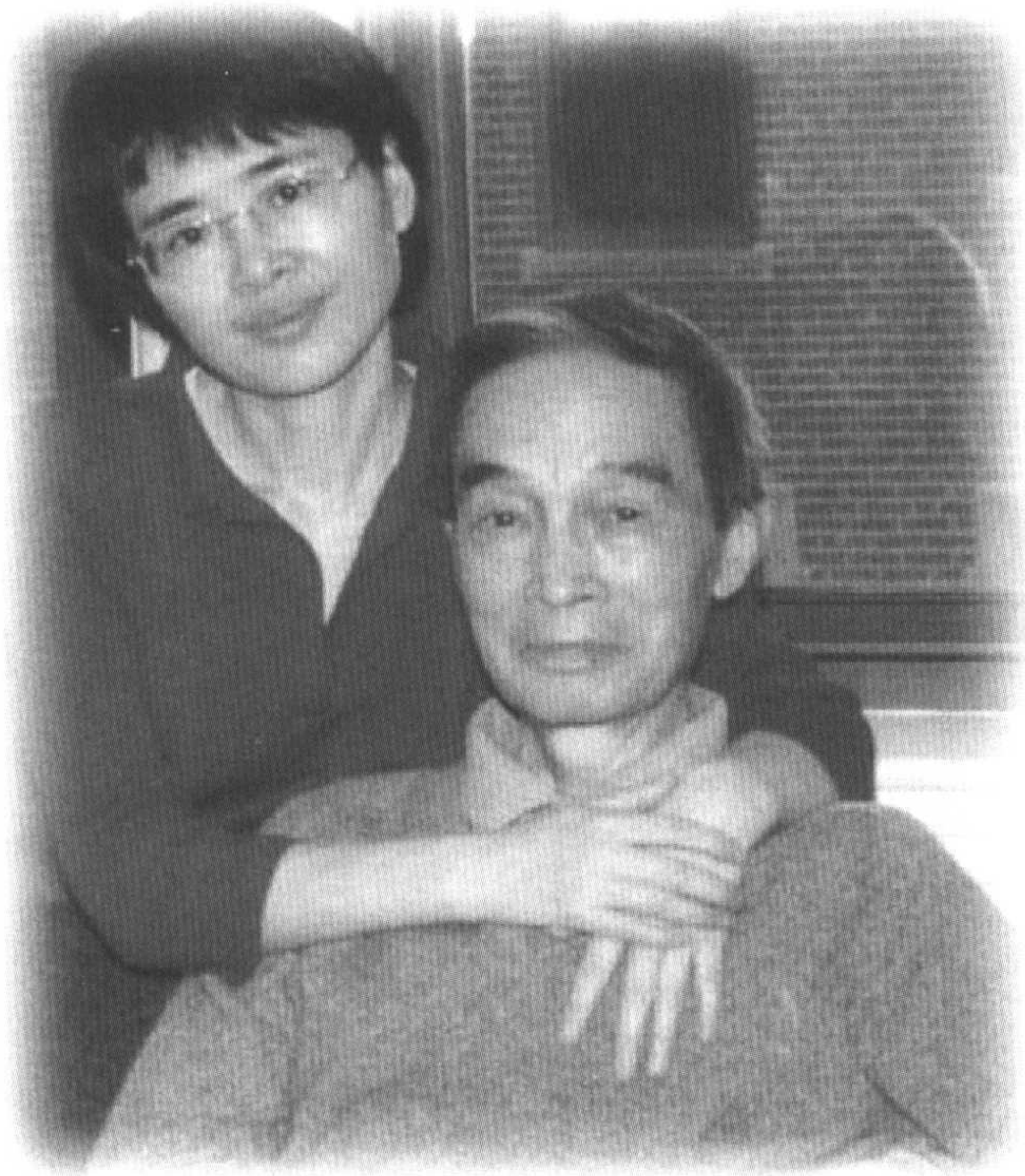
《廿一世紀文庫》與《2000年文庫》不同，後者選擇的是文學作品，前者選擇的則是

人文科學精品為主，未免曲高和寡。在冷酷的商品社會，我們只好步步為營，不求完整，只希望能夠出一本就是一本。這是我們一個不屈的志向。隨着日子的消逝，時間的漏斗篩下相信不僅是一份理想的衝動，而是一顆飽滿的果實，所謂「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陶淵明）。這是我們編輯這套文庫的心聲。

二〇〇二年六月廿八日



王嘉水



王若水、馮媛夫婦攝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王若水簡歷

王若水，一九二六年生於上海，二〇〇二年在美國波士頓去世。一九四六年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〇年任職《人民日報》理論組編輯，一九七七年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主管評論、理論和文藝；曾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二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三年）。學術方面，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哲學研究》編委、全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理事、《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編委、遼寧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三年先後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邀請，赴美作訪問學者，一九九四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作訪問學者。一九九八年任瑞典隆德大學東亞及南亞研究中心訪問教授。

著作有《桌子的哲學》（一九六三年）、《在哲學戰線上》（一九八〇年）、《為人道主義辯護》（一九八六年）、《智慧的痛苦》（一九八九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一九九七年）等。

目錄

總序：「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從《2000年文庫》到《廿一世紀文庫》

潘耀明

前言 毛澤東的新畫像——僕人眼中的偉人

從回憶錄開始的「毛澤東熱」

新發現的毛澤東

毛澤東的一個側面

孤獨的老人

沒有私人情誼的同志關係

門檻

逞強好勝

身邊的女同志

閒談中的流露

二 四 六 八 二 一 五 九 一 一 二 四

周恩來逝世

二七

不走回頭路，不幹後悔事

二九

第一部 毛澤東的權術

第一章 延安整風（上）：毛澤東最高權威的確立

三四

整風之前

三五

毛澤東討好斯大林

四三

整風運動的準備和開始

五五

清算王明

六六

第二章 延安整風（下）：審幹運動

七五

毛澤東為何發動審幹

七六

王實味的悲劇

八一

「搶救運動」

九一

整風運動：總結階段（一九四五年春—一九四五年夏）

一〇〇

中共「七大」

一〇八

第三章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肅反——文革做法的歷史淵源

對A B團的整肅

一二〇

富田事變

一二五

王明搬來蘇共做法 毛澤東執行左傾路線

一三〇

利用肅反進行大規模迫害的始作俑者

一三九

第四章 一九四五年：在美蘇兩個大國之間

中共聯美拉蔣抗日

一五一

斯大林：寧要軟弱的國民黨政府，不要不聽話的共產黨

一六二

一個2 + 2的政治遊戲

一六六

第五章 斯大林和毛澤東

劉少奇訪蘇

一七六

毛澤東訪蘇

一八八

第六章 怎樣總結蘇共教訓？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一九六

毛澤東的反應

二一八

二一九

二二九

二三三

第七章 一九五七年：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到反右派

知識分子問題

二五四

毛澤東總結蘇聯經驗

二五八

從整風到反右

二六八

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再評價

二七七

第八章 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冒進的由來

二八八

從南寧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反「反冒進」

二九七

必須崇拜班長

三一〇

大躍進的契機：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三一二

又多又快又好，總路線的確立

三二一

從十年到兩年——鋼鐵超英

三二八

人民公社

三三四

第九章 廬山會議與彭德懷

尋找海瑞

三四一

第二部 毛澤東與文革浩劫

「海瑞上疏」

三四九

轉折

三五三

第十章 文革的準備（上）：個人崇拜的發展

三七〇

毛澤東的心病

三七〇

七千人大會

三七四

階級鬥爭

三八四

接班人的造神運動

三八六

第十一章 文革的準備（下）：鬥爭哲學和批修

三九一

兩樁哲學公案的背景

三九三

轉折點：用「一分為二」反對「合二而一」

四〇三

綜合：「一個吃一個？」

四一二

對「否定的否定」的否定

四一七

黑格爾的三段式

四二一

兩段式還是三段式？

四二七

從「兩條戰線的鬥爭」到只反右不反「左」

四三四

毛澤東爲什麼需要「鬥爭哲學」

四四五

第十二章 文革的發動：打倒劉少奇

四五〇

精心的策劃，巧妙的部署

四五〇

造反狂瀾

四五五

劉少奇的完結

四六三

「二月逆流」

四七〇

「文革」初期的毛周關係及「七·二〇」事件

四七八

中共「九大」

四八三

第十三章 文革的失敗：林彪的覆滅和毛澤東的遺言

四八七

明批林孔暗批周

四九〇

從再批鄧到天安門事件

四九七

結語：毛澤東現象的基礎

五〇二

制度與人

五〇二

淺談「毛澤東」現象的基礎

五〇六

第二部 歷史的見證

偶像的幻滅——我在《人民日報》的一些經歷

開國前後

批判胡適

《人民日報》挨批

風雲突變的「反右派鬥爭」

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哲學分歧

桌子的哲學

「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

「文革」初期

批左批右之爭

上書惹禍

毛、周之間

千秋功罪，何時任人評說？

五一〇

五一〇

五一六

五二三

五三五

五四四

五四七

五五二

五五八

五六六

五七一

五八八

五九九

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

六〇六

周恩來大力糾「左」

六〇六

爭奪《人民日報》的陣地

六一〇

批「左」還是批右？

六一二

一塊版引起的風波

六一五

我的一封信

六一九

周恩來的講話

六二三

江青放炮

六二八

張、姚的表演

六三一

一顆新星升起

六三八

毛澤東講漢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

六四一

評毛的一段曲折

六四七

起草決議產生分歧

六四七

不能丟掉毛澤東這面旗幟

六四八

附錄

- 附錄一：一九二一年
六五六
- 附錄二：民主·引論
六六八
- 附錄三：王實味文字獄剖析
六七三
- 三篇文章的背景
六七四
- 《政治家·藝術家》
六七九
- 《野百合花》
六八〇
- 《三八節有感》
六八四
- 中央研究院整風動員大會的風波
六八七
- 王實味代表什麼思潮
六九一
- 立場問題
六九七
- 觀點和方法問題：所謂「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
七〇二
- 背景分析
七〇六
- 「四三」決定
七一一

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

七一四

丁玲的過關

七二三

從思想問題到政治問題再到敵我問題

七二八

作者歷年來寫作和發表的有關文章

七三九

王若水的「美麗境界」

馮媛
七四一

編後記

七四八

前言

毛澤東的新畫像

——僕人眼中的偉人

西方有一句諺語：「僕人眼中無英雄。」英雄東征西討，叱咤風雲，可回到家中，照樣要飲食起居，有七情六欲，和普通人一樣，這些只有伺候他們的僕人看得最清楚，因此，在僕人眼中，英雄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毛澤東這個英雄和一般的英雄不同，他在僕人眼中仍然是英雄。近年中國大陸興起的「毛澤東熱」，和毛澤東的僕人有密切關係。

從回憶錄開始的「毛澤東熱」

一九八七年美國的施拉姆教授（S. Schram）的《毛澤東》一書的中譯本出版，第一次就印了二十八萬冊，一年後第三次印刷，總數達五十五萬冊，這是這股「毛澤東熱」的第一個迹象。一個外國人寫的毛澤東的傳記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這無疑是對國內作家和出版家的刺激。

一九八九年，大陸一下推出了二十多種有關毛澤東的書，總銷數在百萬以上。這正式宣告了「毛澤東熱」的開始。

這些書大部分是回憶錄，其中的主要幾本出自部隊作家權延赤，他大量採訪了毛澤東的身邊人——貼身衛士、警衛、護士、保健醫生、秘書。這些書的銷量都很大：《紅牆內外》首版十五萬冊，到一九九一年北京第八次印刷時，累計印數已達四十三萬冊。《領袖

淚》我看到兩個版本，求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第一版，當年七月第三次印刷時，累計印數達二十六萬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版本在一九九一年第七次印刷時，總數達四十二萬五千冊。這兩個版本加起來的印數是六十八萬冊。《走向神壇的毛澤東》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沒有說明印數。一個月後，這家公司又出版了《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此書兩個月後就第三次印刷，累計印數十七萬。兩書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前者署名為「李銀橋著，權延赤執筆」，後者署名為「權延赤著」。聽說為此還鬧了一點著作權糾紛。從出版情況來看，這些書顯然是十分搶手的。此外，一九八九年首版在十萬冊以上的還有《毛澤東的孩子們》、《毛澤東軼事》、《毛澤東逸聞錄》等等。

這股「毛澤東熱」迅速從出版界波及到影視界，一九九一年中共建黨七十周年時，出現了一大批以毛澤東為主角的電影和電視劇，而錄音帶《紅太陽》則以它幾百萬盒的銷量震撼了文化界！

一個政治領袖越是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越是被人敬若神明，人們就越是不敢客觀地、具體地敘述他的生活，因為這可能被視為褻瀆。過去，在所有描繪毛的作品中，毛澤東的形象必須符合「偉大領袖」的理念，要成為真理和無產階級美德的化身。毛主席太偉大了，作家描繪他時手中的筆都會發抖。他們要為他精心設計每一句話，每一個細節，因為這都是政治問題。他們對畫出來的形象要小心翼翼地描了又描，唯恐「有損」。於是，

最後創造出來的毛澤東就成了一個木偶：一切都合格，只是他不是活人。

五十年代初李伯釗的歌劇《長征》中有一個場面：在長征路上出現的毛澤東（於是之飾）竟然頭髮梳得油亮，一身整整齊齊的新軍服，甚至褲子上還看得見筆直的褲褶！

這個毛澤東沒有唱，只念了一句台詞：「同志們好！」把手一揮——他不能有更多的表演了。

新發現的毛澤東

只是在毛澤東逝世了十多年後，他似乎才確鑿地成了歷史人物。寫他的生活瑣事也不再是忌諱了；何況，毛生前也表達過這樣的意願。於是這些回憶錄陸續問世。

這些作品給人們描繪了一幅毛澤東的新畫像。

由於對「兩個凡是」和文革的批判，毛早已失去了眩目的光環，人們不再把他當神來崇拜。中共中央在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有缺點也有失誤，同時強調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這只是給人一種政治概念。毛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但他還住在中南海，高高的圍牆把他和老百姓隔開了。只是現在從回憶錄中人們才第一次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富有人情味，富有性格魅力的毛澤東。這好像是一個新發現。這就是僕人眼中的毛澤東。他不是神，他有缺點，然而這是可以原諒的缺點，也許正

因為有這些缺點他才顯得離我們很近，這不妨礙他仍是一個英雄，一個偉人。

內衛張木奇在結束他的回憶時說：「這就是生活中的毛澤東。想起未見和初見他之時，我那種『視若神靈』的神秘感和種種猜測想像，已經恍若隔世。然而，神秘的色彩一旦消失，我更覺出毛澤東的偉大，也更覺得他可親可敬。」

人們從這些回憶錄裏得知，毛澤東生活樸素，作風廉潔，公私分明，律己很嚴。他的飲食簡單，一般來說，有辣椒就行；他不吃補品，偶爾想補補腦子，也不過是一碗紅燒肉。他的襪子和睡衣都有補丁。他習慣睡硬板床，使用蕎麥皮枕頭。他不用牙膏而用牙粉，也不用香皂。他很勤奮，常常因工作而廢寢忘食。他博覽群籍，是個讀書迷。他不允許對子女和親友特殊照顧。

然而毛絕非不近人情。相反，他通情達理，富於風趣，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他曾為遭災的農民傷心落淚，也曾為送走瘟神的百姓而欣然賦詩。他曾經手拉手地和衛士邊散步邊聊天。衛士對他可以無話不談，甚至沒大沒小，耍貧嘴。全國人民都尊他為「毛主席」，可他的貼身衛士居然敢稱他為「老頭」！他督促衛士學文化，關心他們的家庭，有時還自己掏錢接濟生活困難的衛士。他還有一副助人為樂、成人之美的熱心腸，替衛士出主意找對象，甚至幫助衛士修改情書！

對照一下現在許多領導幹部官氣十足，揮霍浪費，以權謀私，甚至貪污受賄，人們怎

麼不覺得毛澤東可親可敬呢？

甚至毛的弱點也喚起了人們的同情。過去他和江青的婚姻大大損害了他的聲譽。以後人們知道江青當初並不壞，是後來變壞的；毛和江青長期不和，毛對他的最後一次婚姻感到後悔和苦惱。偉大的毛澤東，也有他的隱憂，需要人們理解啊。

毛澤東的一個側面

毛澤東意識到身邊人可能寫他的軼事。他做好了這樣的準備，甚至鼓勵他們寫。他曾對他的貼身衛士說：「我和我的親人見面不多，只有你們和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我的情況你們最了解。」「我活着的時候你們不要寫我，我死了你們可以寫，寫出我的真實。」

我相信這些身邊人回憶的毛澤東的日常生活的事情是屬實的。但這並不排斥有「為尊者諱」的地方。《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比《走向神壇的毛澤東》多了三萬字的內容，顯然這一部分是口述者李銀橋不願意發表，而執筆者權延赤捨不得割愛的材料，諸如毛澤東在看戲時掉下褲子之類的趣聞。李銀橋在一九九一年把他那本書重新整理，改名為《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他在序言中說：「在本書修訂過程中，胡喬木、王任重、鄧力群、逢先知等同志給予親切的關懷和具體指導。」可能他們糾正了一些年代一類的錯誤，不過在

涉及毛的形象上，可以看出是加了工的。這反而使這本書的價值打折扣。

當然，身邊人對許多事情是保密的。內衛張木奇說：「比如你值班，聽到祈年堂裏政治局開會內容及毛澤東的談話，不許對我說也不許告訴其他任何人。輪到我值班，聽到毛澤東與外賓談話或批評表揚其他中央領導人，同樣也不能傳給你或其他任何人。」這在當時完全可以理解，問題是相隔幾十年，這些完全成了歷史，也不能「解密」嗎？張木奇接着說：「這些我們當時能做到，至今也沒有一個人亂說過一句。所有關於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事，進入我們的耳目便如埋入了黃土地，再不會出土，直至我們自己也化爲灰土。」

這樣的紀律當然不僅僅適用於警衛戰士，那麼，許多重要材料就必然被「埋入黃土」了。

即使這些回憶錄沒有隱諱，那也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毛澤東，是僕人眼中的毛澤東，不是毛澤東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毛澤東的主要方面。毛澤東在政治舞台上的雄才大略，老謀深算，在這裏是看不到的。僕人眼中可以有英雄，但英雄仍然不是僕人可以完全了解的。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曾經對「僕人眼中無英雄」這句諺語作過深刻的評論，他說：「這並不是因爲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爲僕人只是僕人。」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偉大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才能理解英雄的偉大。僕人替英雄

脫下長靴，伺候英雄就寢，知道英雄愛喝香檳酒，等等，他們只能從這些日常生活瑣事中觀察和評論英雄，所以無法認識英雄。

我還想套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僕人眼中也無奸雄。這不是因為奸雄不是奸雄，而是因為僕人只是僕人。「大奸若忠」，奸雄在朝廷中操縱權柄，縱橫捭闔，勾心鬥角，殘害忠良；回到家中卻完全可以是個規規矩矩的丈夫和教子有方的父親。毛澤東把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無數知識分子加以摧殘，把他的許多出生入死的戰友打倒，對這一切，他什麼時候表示過絲毫的懺悔？那麼，他在僕人面前表現出來的那一點人情味，又算什麼呢？

但是這些回憶錄仍是有價值的。「見微知著」，「由小見大」，我們也可以從毛澤東日常生活的一些瑣事中，認識他的性格特徵，發現一些意味深長的信息，窺見其內心世界。

孤獨的老人

看了這些回憶錄，得到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毛澤東的孤獨感。

貼身衛士李連成在給毛澤東按摩完後，毛澤東拉住他的手，喃喃地說：「陪我一會兒。」李連成覺得，「按摩本身有時候並不是必須，他需要的是身邊有人。……只要身邊

有人他就感到踏實，他就可以安靜。」

在公衆眼中，毛澤東充滿了大丈夫氣概。他是一位出生入死的革命家；是身經百戰，抵抗過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國民黨八百萬大軍的軍事統帥；是改變了中國面貌的政治強人。然而他卻像小孩子那樣脆弱，需要人陪伴，他對衛士說的話簡直像央求。沒有人在他身邊他就覺得不踏實，覺得無所依托，難以安寧。可以看出，在他內心深處，有一種隱秘的、連他自己也說不清的恐懼感。

保健醫生徐濤說，毛澤東很難過普通人的生活。「他不能隨便行動，不能隨心所欲地走到人群中，這是毛澤東最痛苦的事。工作之餘他最怕孤獨，希望身邊的工作人員表現得隨便些，可以開玩笑、起哄、罵娘，造成一種真正的社會生活的氣氛。如果大家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他簡直無法忍受。我理解，衛士們也理解。毛澤東是人，他需要過人的生活。」

這句話很耐琢磨。毛澤東需要過「人的生活」，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他過的不是人的生活嗎？

身邊人只是覺得他太寂寞，無法接近群眾。「他是人民的領袖，全國人民都喊他萬歲。可是他沒有隨便見人的自由，處處要受到安全的限制。」「他只是個人，他面對的是組織決定。有時，他一句話就能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但同時，他說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飯

館吃頓飯的自由。他在紅牆內講話地球也會顫動，但是他要隨便走出紅牆一步也不能。」

這真像囚禁在紫禁城裏的末代皇帝了。這可以怪從蘇聯搬過來安全體制。但僅僅是這一點嗎？如果讓毛每天生活在群眾中，從早到晚受到群眾的包圍、歡呼，他也是受不了的。毛對貼身衛士說過：我需要一些這種很隨便的生活，越隨便越好，總是把我當主席我受不了。然而群眾總是把他當主席的。可見，毛並不只是需要接近群眾。儘管毛欣賞個人崇拜，可這樣生活他要隨時注意自己的形象，處處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實在精神太緊張了，太累了。毛只能在和身邊少數服務人員一起時，解除這種森嚴的等級關係。這些身邊人和毛沒有利害衝突，沒有權力之爭。他們大多文化水平低，單純天真，對毛具有不容置疑的忠誠。本來，毛完全可以挑選一些文化水平稍高的，可是他寧要小學程度的，這不是沒有考慮的。文化越低的人越容易盲目崇拜。毛不用對他們有什麼防範，完全可以在他們面前放鬆一下，從主席的角色回到普通人的身份。

所以，李銀橋這樣說：「就我十幾年的觀察而言，毛澤東還是在與我們這些『身邊人』單獨相處時，最能表現出是普通人。」徐濤所說的「過人的生活」，其實就是過普通人的生活。

毛澤東不是普通人，他是領袖；不，他是神。作為神，他必須高踞雲端，遠離人間烟

火，不能輕易和凡人接觸。他必須在老百姓心目中保持一種神秘感；太容易見到了，就不稀罕了。費爾巴哈說，神是人的異化；所以，毛澤東是異化的人。

恩格斯曾在《費爾巴哈論》中感慨地說過：「在我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以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社會裏，同他人交往時實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恩格斯沒有想到，在共產黨內部，在革命同志之間，這種表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也受到嚴重的破壞，以至於一個共產黨的領袖也產生了一種「異化感」，只能在少數幾個身邊的人中去尋找這種感情的溝通。

但是，如果以為毛澤東在僕人面前表現出的就是他的真正的自我，就一點掩飾都沒有，那就和那些僕人一樣天真了。

這些身邊人也無法真正消除毛澤東的寂寞。張玉鳳描寫了毛澤東怎樣度過了他的最後一個除夕之夜：

「一九七六年的春節，無論是氣溫還是現實都讓人感到不寒而慄。那個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處外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齊的路燈閃着微弱的亮光。這裏除了悲涼的風聲，再也聽不到別的什麼。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麼寂寞、冷清。

「毛主席這裏沒有客人，也沒有自己家的親人，只有身邊幾個工作人員陪伴着他，度

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春節。……

「飯後，我們把他攙扶下床，送到客廳。他坐下後頭靠在沙發上休息，靜靜地坐在那裏。入夜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的鞭炮聲，他看着眼前日日夜夜陪伴着他的幾個工作人員。

……他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鞭炮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放了一會兒。此刻的毛主席聽着這爆竹聲，在他那瘦弱、鬆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們心裏都明白主席的這一絲笑容，是在寬慰我們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員。」（鄭宜、賈梅編《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毛澤東生活實錄》，江蘇文藝出版社，南京，一九〇頁）

一個全國人民都對他唱「我們日日夜夜想念你」的偉大領袖，竟是這樣孤獨，當普通老百姓在喜氣洋洋的節日中享受天倫之樂時，他卻只能靠放幾掛鞭炮來驅散那夜晚的清冷，給寂寞的庭院添幾分生氣。

他的確是太孤獨了。

沒有私人情誼的同志關係

人們會問：毛澤東不是有那麼多親密戰友嗎？他和他們天天相處，也應該算是他的身邊人，他爲什麼還會感到寂寞？誰造成毛澤東的孤獨？他的戰友都到哪裏去了？

毛本來有一大批革命戰友。在「文革」中毛把他的繼承人劉少奇和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追隨者打倒了。

一個文工團員通過陪毛跳舞感到「文革」給中南海帶來的巨大變化。這之前，中南海春藕齋的舞會是很熱鬧的，黨的領導人都來參加。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舞會的氣氛已經全變了，冷清而沉悶。劉少奇和王光美不來了；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來了；春藕齋裏只剩下毛澤東，而他也很少來，即使來也顯得心事重重，鬱鬱寡歡。

毛怎樣和黨內同志相處？他有自己的的一套原則。「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力只可以用於法，用於法則有效；力不可以用於私人之交誼，用於私人之交誼則無效。豈唯無效，反動隨之矣。」毛把這兩方面分得很清楚。在私人交誼之外，他崇尚「力」與「法」。這後一方面，是身邊服務人員不大能看得到的。

不過他們也有所感覺。

李銀橋說：「毛澤東似乎有意約束自己，不要同某一個或幾個重要的黨政軍領導人發展超過同志和戰友關係的私人情誼。同志關係就是同志關係，盡量避免在同志關係上夾雜過於濃厚的私人感情。」「毛澤東和黨內同志除工作關係外，基本無來往。」

李銀橋在這裏用「同志」和「戰友」這兩個詞來表明非情誼的關係，並不符合中國大陸以前的用語習慣。大陸常用「同志情誼」這個詞來表明一種高尚的友愛關係。也許這個

詞用得太多，對隨便什麼不認識的人都可以叫「同志」，就不表達什麼親密關係了。但「戰友」之間無論如何應當是有情誼的。而且，毛和許多高級領導人的關係不是一般的同志和戰友關係；他們是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同生死共患難的。爲什麼沒有情誼呢？

這些人和毛可以是共事關係，上下級關係，這種關係都屬於行政關係的範疇，不是恩格斯說的純粹人與人的關係。說得坦白一些，他們在毛的眼中都不過是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有。

毛澤東只承認過一個人是他的親密戰友，這個人就是林彪。他讓林彪作了新的繼承人。毛澤東的地位太高了，親密戰友這個稱號不是可以隨便封給誰的，連周恩來也沒有這個資格。所以，林彪一出事，毛澤東就沒有「親密戰友」了。毛澤東逝世時，人們從報紙上看到的這位偉大領袖的許多照片都是他一個人，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形影相吊了。

毛澤東對身邊服務人員持平等態度，對親朋、黨外人士也保持中國傳統的禮貌和好客。可是對待黨內同志，他的舉止是有嚴格分寸的，這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級關係。毛澤東有一種威嚴叫人生畏，「許多同志甚至是相當高級的領導幹部，見到毛澤東之後都是嚴肅、恭敬，甚至表現出緊張、拘謹，不能暢所欲言。」

毛不是多次鼓勵別人大膽講話嗎？說是這麼說，其實他並不覺得別人在他面前不能暢所欲言是一種遺憾。還是讓大家怕他好。只是對那些身邊的小伙子、小姑娘們，他倒真正

喜歡他們在自己面前無拘束地說說笑笑。

黨政軍的高級領導人來向他請示匯報工作，他是坐在沙發上不起身的，只是作個手勢讓他們坐。「毛澤東與親密戰友相交是很隨便，不拘禮節的。比如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這些同志還有林彪進來，他躺在床上辦公會繼續躺着辦公，招呼一聲即可。」然而這種隨便並不限於對「親密戰友」，也不表示親密。筆者就見到過一回，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見他。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我隨同鄧拓等幾個《人民日報》編委到毛的寓所。毛在臥房裏接見我們，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我們每人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和毛的不拘禮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並不是一次無拘無束的會見。那一次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鄧拓，這本來是一件很嚴肅的事，不是和我們聊閒天。我們都很緊張。劉邦見酈食其時，坐在床上，讓兩個女子伺候洗腳。毛澤東也有劉邦之風。

門檻

身邊人觀察到一個關於門檻的細節，很有意思。據說，對較長時間沒有見到的老同志，毛澤東要送別握手，但是絕不邁出門檻。甚至對兄弟黨領袖也是如此。有次胡志明來了，衛士通報後，毛澤東即起身，走到門口就停下來，不再多邁一步——多邁一步，就出門檻了。毛等胡邁進門，才伸臂握手。同樣，談話結束後，毛送客到門口便停下來，握手

告別。

並沒有什麼禮儀準則爲領袖見客做這樣的規定，這個門檻是毛澤東自己設定的界限。別人跨進這個門檻，表示是別人來就他；自己跨出這個門檻，意味着他去就別人。這就不一樣，毛澤東不能顯示出他要見別人更甚於客人要見他。門檻成了一個符號。也許門檻兩邊的地是一樣的平，但是門檻內外卻有尊卑之別。

一般說來，毛澤東給人的印象是豁達大度，落拓不羈，但他怎麼會如此計較門檻這種細節呢？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矛盾。毛澤東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十分敏感，不拘禮節是表明他這樣的人可以享受這樣的特權，拘泥於門檻這樣的細節是表明他處處要顯示他的比人尊貴。

在毛和他的同事之間，上下級關係壓倒了同志關係，「力」與「法」壓倒了私人情誼。

周恩來在幾十年間一直是毛澤東的左膀右臂。他可以說是毛的大管家；不僅是國家大事，就是毛的衣食住行，周也要關心照料。毛澤東的住處是周恩來選擇的，毛澤東吃的飯菜，周恩來要時時關心過問。戰爭年代，毛要走的路周恩來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建國以後，毛接見外賓時坐的沙發周恩來要先試坐一下。周恩來對毛澤東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可是毛對周呢？儘管身邊人也說幾句毛澤東對周很信任很關心之類的抽象的話，但也

露出一些蛛絲馬迹。李銀橋說：「我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沒聽他對周說過一句超出同志關係的私人感情的話。」

李銀橋這句話說得很有分寸，但已經足以使一些天真的讀者震驚了。一些電影和文章不是宣傳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革命情誼」嗎？如果連在毛身邊服務了十五年的衛士長都沒有聽到毛對周說過一句帶私人感情的話，這種情誼在哪裏？關於毛對周的情誼的具體例子，人們只知道毛給周送過一對沙發。其他還有什麼呢？

和周恩來談不上私人交情，那麼，在毛澤東周圍的高級幹部中，還能找出他的私人朋友嗎？

據李銀橋的觀察，認為只有兩個人說得上和毛澤東有私交，一個彭德懷，一個陳毅。可是這兩個人都沒有好下場。

這裏只說彭德懷。李銀橋說：「彭德懷與毛澤東相交，帶了濃厚的朋友味道。說話舉止真誠、隨便、粗豪。敢笑敢吵敢罵。轉戰陝北時，全黨早已叫慣了『毛主席』，唯獨彭德懷偶爾還要直呼一聲『老毛』。他大概是黨內改口最晚的一位。他與毛澤東談話時常常手勢翻飛，聲震屋宇，打機關槍一樣。」內衛田玉雲說：「黨政軍負責人中，彭德懷是唯一一位敢跟毛澤東耍性子的人。」

跟毛澤東耍性子，這可不簡單。衛士長曾多次目睹毛嚴厲地訓斥黨政軍的高級負責幹

部：「元帥將領們看到毛澤東發脾氣，立正站着不動的多；黨政領導幹部遇上毛澤東發脾氣，低頭不安、作檢查的多。」有沒有人敢不同意毛的批評、與他爭辯呢？我只知道「文革」前劉少奇和毛爭吵過（他的結局是大家知道的），另外大概只有彭德懷了。衛士們目睹了廬山會議有一次散會後的一幕：毛澤東走出會場，和彭德懷打了個照面，毛主動說：「彭總，我們談談心吧。」彭一甩手，大聲說：「有什麼好談的？沒什麼好談的！」

那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總結發言，說到「軍隊不跟我走的話，我可以重新到鄉下去組織游擊隊，重新建軍」。這句話不僅份量很重，而且太離譜，難怪彭德懷受不了。

中共高級幹部都知道彭德懷的性格特徵，一是性情耿直，二是脾氣暴躁，所以他們稱彭德懷是「張飛」。過去彭德懷也同毛澤東吵過，這並不是第一次。然而這時的毛澤東，已非昔日的「老毛」了，如果彭德懷以為他和毛澤東有多年的老交情就可以繼續頂撞毛，那他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彭德懷的上書害得毛澤東失眠。有一次吃了三次安眠藥還未能入睡。他在想什麼？我們只知道，毛澤東突然對伺候在身邊的田玉雲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麼名字嗎？」小田茫然地搖搖頭，毛澤東下面一段話便使他大吃一驚：

「彭德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到中華。」

這句話是暗藏殺機的。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毛澤東怎能不對彭德懷耿耿於懷！

李銀橋以爲毛澤東和彭德懷的私人交情很深，大概彭德懷也自以爲是這樣。但是，毛澤東不管這一點。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概括他和彭德懷長達三十一年關係是「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第二二一頁）所以毛澤東給彭德懷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老帳新帳一起算，還莫須有地說彭德懷組織了一個「軍事俱樂部」，「陰謀篡黨」。衛士們不無同情地怪彭德懷不該賭氣，「他一賭氣，事情變大了。」但是毛澤東並非不知道彭德懷的脾氣；他給彭德懷加上那麼大的罪名，彭德懷的反應可想而知。毛澤東並不是把這件事當做彭德懷的一時賭氣來看的。作爲一個領袖他的「豁達大度」到哪裏去了呢？毛澤東把彭德懷看作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對彭德懷實行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最後令彭德懷死在「文革」中。這還是僕人眼中那個聽說老鄉吃不飽就掉淚的毛澤東嗎？

逞強好勝

「毛澤東最大的性格特徵是什麼？」權延赤這樣問李銀橋。

「挑戰。迎接挑戰。」李銀橋回答。

他解釋說：「就我所見，他從不認輸，從來不會在任何屈辱的環境下低頭。於任何事

情，不獲全勝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在我看來，更確切的說法是「征服」。

下面兩件關於游泳的事，就能看出毛澤東的逞強好勝。

一九五四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那天海上颳七級大風，波浪滔天。毛澤東要下海游泳，大家紛紛「勸駕」，保健醫生也陳述了三條不能游泳的理由，最後一條是說李維漢游泳絆了一跤摔斷了腿。這第三條理由反而對毛澤東起了「激將」的作用，毛澤東更來勁了：「李維漢摔斷了腿，我就要摔斷腿嗎？你這麼說，我今天是非游不可！」

七八名衛士和警衛不得不護衛着毛澤東衝向大海。那真是一場與大風大浪的搏鬥。所有的人，包括毛澤東，都被大浪拋起又拍倒，反覆幾次，保衛人員精疲力竭了。毛澤東嚴肅地說：「你們不行了嗎？你們不願跟我走，你們可以回去。我可以另組織人馬另組織隊伍跟他鬥！」

這是毛喜歡說的話。他是以打仗的心情來對付海浪的。類似的話，他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說過，在「文革」初期時也說過。李銀橋回憶說：「那天游泳回來，毛澤東比當年打下沙家店還要顯得高興。」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游長江，遭到一大群人的反對。最後還是毛勝利了，他得意地說：「羅部長（羅瑞卿）不叫我游，我偏要游。」保健醫生徐濤覺得，他說這句話時，神情就

像一個逞強好勝終於如願以償的孩子。

挑戰和接受挑戰，這是一個領袖人物的性格。沒有這種性格，毛澤東就不可能把共產黨人和軍隊團結起來，排除萬難，取得最後的勝利。外國人說毛澤東生性好鬥，這大概不錯。青年毛澤東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老年毛澤東也還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

革命者當然要鬥爭，要有堅強的鬥爭意志。然而毛澤東這種好鬥的性格中夾雜着任性的成分。衛士說：「毛澤東在作出挑戰和接受挑戰時，不談懷疑，只談堅信。他的頑強和他的任性一樣驚人。當他由於任性而出現錯誤時，由於他的自信和頑強，仍然能說服和團結一大批人形成一種向上的力量，一種無法戰勝的力量。」

我想，這也是毛澤東能夠發動「文革」的原因之一。毛澤東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那種「卡里斯馬」（charisma）型的領袖人物，具有非凡的個人魅力，能夠吸引千千萬萬的崇拜者為他的號召而獻身。早期毛澤東的確是代表人民的，他為共產黨制定的綱領和路線集中了廣大群眾的願望，因此才能得到他們的衷心擁護。晚期的毛澤東被神化了，無論他發出什麼荒唐的號召，也會有成千上萬的人來響應。

身邊的女同志

李銀橋走後，毛的身邊人換了。侍衛左右的再也不是那些魁梧強壯、充滿陽剛之氣的貼身警衛，而是漂亮的女性。

張玉鳳是一九七〇年夏調到中南海的，後來任毛的生活和機要秘書。

孟錦雲早年是空政文工團的舞蹈演員，在一次中南海伴舞時為毛所認識。「文革」中她受到迫害，後來托另一個文工團員帶信給毛，得以重返中南海，毛把她留在身邊當護士。這是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事。

《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的作者用這樣的語言來描寫毛澤東再次看到孟錦雲時的心情：

「他還記得，那次舞會上，他與另一個文工團員跳舞，跳着跳着一下子發現孟錦雲坐在那裏看着他。他們的目光相遇了。他發現小孟，他的小同鄉的目光是那樣明亮，那樣靈活，那樣純情，那樣閃着異樣的光彩，那樣灼熱而且飄忽。他發現，她那白細的面容上，泛着淡淡的紅光。他忽然覺得，小孟是他的女兒，是他的朋友，是他的知己。這個瞬間的情景，永遠地留在了他的記憶裏……」（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天地圖書，一九九一年，香港，四六一—四七頁）

這當然是作者的想像。但書中也記載了毛澤東對孟錦雲說的話：「你在我身邊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兒，也是我的朋友。」毛還稱帶孟錦雲去見他的那位女文工團員是「紅娘」、「鵲雀」。

毛對小孟說：「在我這裏工作，是吃飯不要錢，穿衣不要錢，住房不要錢，看書管夠。你的衣服可以在這裏做，我出錢。」

孟錦雲剛來時，毛身邊有一個護士小李。李玲師也是六十年代去中南海跳舞和毛認識的。她是舞蹈學員，當時才十三歲。後來改行學麻醉，在四川一個醫療隊幹了幾年。「文革」中，別人帶她來看毛，毛說：「你長大了，又成了醫生。我現在是個病人，你就留在我這裏工作吧。」就這樣，小李成了毛身邊的醫護人員。開始，毛很滿意小李，但後來漸漸不喜歡她了。小李就調離中南海了。

毛對孟錦雲的一舉一動都看得順眼，也肯聽她的勸說。毛當時患嚴重的白內障，很多人勸他做手術，他都拒絕了，但在小孟的勸說下，他卻同意了。

張玉鳳和孟錦雲輪流值班陪伴毛澤東，每四小時換一次班。她倆都可以代毛圈閱文件。毛稱呼張玉鳳是「張姐」，孟錦雲是「孟夫子」。

毛有幾名保健醫生，三名廚師；還有工作人員專門為毛管圖書、管帳。毛的房間外的工作人員，不能隨便進入毛的房間，只有張和孟兩人能隨便出入。其他任何人，包括政治局常委和毛的家人，都必須經過她們向毛通報得到同意後才能進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最後一個生日。毛的女兒李敏、李訥來看父親了。但據孟錦雲的敘述，最使毛高興的是他從前的護士長吳旭君和護士俞雅菊、李玲師的到來。

她們三個加上張玉鳳、孟錦雲，給毛澤東磕頭拜壽後，陪毛澤東吃飯，有說有笑，吃得很開心（不知爲什麼沒有包括李敏和李訥）。那天江青也來了，但毛沒有理她，她沒趣地走了。

閒談中的流露

小孟在毛身邊的日子裏，看到毛常讀的書有：《二十四史》、《魯迅全集》、《考古學報》、《自然辯證法》、《笑林廣記》、《容齋隨筆》、《全唐詩》、《智囊》……這裏面沒有一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上面列的《自然辯證法》，多半是毛喜歡看的那份雜誌，而不是恩格斯的那本著作。另外，毛似乎也很少讀西方的著作，儘管他一直在學英文。他讀的書的確很多，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可是，作爲一個政治領袖，他的知識結構是有問題的。

毛總把《資治通鑒》放在床頭。他曾經告訴孟錦雲，他把這部書讀了十七遍。這是無法置信的。

大概跟年輕女人說話，毛更加隨便，流露的真情也多一些。一次，毛和孟錦雲談《資治通鑒》。小孟提出武則天的問題。毛認爲武則天不簡單，了不起，還給小孟講武則天的故事：

一位大臣看到武則天動不動就殺人，就向她諫議，說這樣殺人，誰都不敢當官了。武則天聽後就叫那位大臣晚上來。大臣嚇得要命，不知會遭遇什麼。武則天叫人在殿台上點一把火。許多飛蛾看見火就紛紛撲來，結果死在火中。可是還是不斷有飛蛾撲來。武則天笑着對大臣說：「這叫飛蛾撲火，自取滅亡，本性難移吧！」

講完這個故事，毛評論說：看來，只要高官厚祿，要當官的人會源源不斷，哪裏會殺得盡呢？

在掌握最高權力後的幾十年期間，毛清除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僚，看來他確實不擔心沒有人接替。

毛對《紅樓夢》也讀過好幾遍，他對王熙鳳評價很高。說王熙鳳處理尤二姐事件「有理、有利、有節」；還說王熙鳳善使兩把殺人不見血的飛刀，把個賈瑞弄得死而無怨、死而無悔。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個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電影故事是：某員外小姐失足跌進後花園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氣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告示，誰能搭救，就將小姐許配為妻。兩個青年同時應徵，商量好合作，一個下井，另一個在上面接應；救上來後，由小姐選擇一個結婚。下井的青年把氣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內，井上的青年拉繩，把小姐救上來了。井上的青年當即用一塊大石頭把井口蓋上，抱着

小姐去見員外，聲稱小姐是自己一個人救上來的，於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誰知小姐上來時把一隻繡鞋落在井裏了，一日做夢，夢見天上飄落下她那隻失落的繡鞋。以後果然是井下那位青年死裏逃生，以拾到的繡鞋作為搭救小姐的證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個邪惡的青年則被趕走。

陪毛澤東看這部電影的有張玉鳳、孟錦雲、李玲師。毛看完後問她們：你們說說看，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

幾個女青年異口同聲地說，那個陷害別人、欺騙小姐的井下青年太壞了。然而毛澤東的看法確是驚世駭俗的，他覺得井上那個青年更好些。

「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兒。他太蠢了，還是井上的青年聰明噢。」

張玉鳳反對說，他太奸猾了，不老實。毛爭辯說：「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這是魯迅先生的見解，我很同意。」

小孟說：「那他也不應該爲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別人呀！」

毛堅持說：「就有一個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嗎？看來，他是太愛這個小姐了。這叫愛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

那些虔誠學習過「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的人讀到這裏一定會感到震驚：毛澤東

曾諄諄教導別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做老實人；可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原來是這樣！

周恩來逝世

毛曾對賀子珍說：「我這個人平時不愛流淚，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流過淚……」

毛對身邊的服務員確實有感情。延安時代，他為一個勤務員張思德寫過悼念文章，即著名的《為人民服務》；跟他十五年的李銀橋離開時，毛確實依依不捨。可以看出，毛對身邊服務員的感情超過與他幾十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的感情。

毛為戰友的死而掉淚，我們得知的有兩個例子：一是陳毅，一是周恩來。

據孟錦雲的敘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前的十幾個小時內，周的病危報告便不斷地送到毛這裏來。周的生命只能用小時來計算了。毛只是靜靜地看着這一份又一份的報告。逝世的消息傳來時，毛躺在床上看一本《魯迅全集》（換了別人，此時未必有心情看這種書吧）。毛看得很專心，根本沒有留意到小孟在擦淚水。這大約是上午十時的事（周逝世的時間是上午九時五十七分）。到中午，毛吃飯，然後休息了兩個小時，到三點多鐘，政治局派人送來了周逝世的訃告清樣。小孟才把這個消息告訴毛。顯然，至少在這五個多鐘頭內，毛根本沒有問起周的病情，否則小孟不會拖那麼久才告訴毛。小孟念訃告

時泣不成聲。毛呢，慢慢地閉上眼睛，眉頭緊鎖，不一會兒，閉着的眼睛裏滾出了淚珠，一直留到了臉頰，始終沒說一句話。

不過，張玉鳳在《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中的敘述有些不同：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十點，毛主席幾乎一夜未合眼，此刻他正卧床，側身聽着文件。負責主席身邊工作的張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趕到游泳池毛主席臥室，將周總理逝世的噩耗報告了毛主席。」

「主席聽後許久一言未發，只是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對於周總理的逝世，主席顯然早已料到了。……長期的傷感，使他的眼淚枯竭了。此時，他已無法向這位患難與共的同志、戰友表露他內心的痛苦和悲傷。」

「中央考慮到主席病重，便沒有安排毛主席參加周總理逝世後有關的一切活動。」毛是不是問過追悼會的事呢？他是不是對自己不能去參加表示過遺憾呢？如果有這樣的表示，那時一定會報道的；現在根本沒有，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毛沒有這樣的表示。如果毛確實為周的逝世感到悲哀，按照常情，毛應當表示要參加追悼會，而政治局成員，包括汪東興在內，則加以勸阻，然後毛才不得不放棄這個打算。可是，政治局是知道毛的心理的，這就是他們敢於不通知毛的理由。而且，即使毛不能參加追悼會，他也可以用別的方式表達他的感情，例如他可以寫幾行字（半年多以後他還為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

心」)；即使他連字都不能寫了，他還可以說幾句話，表示對周的哀悼，或對周做公開評價。然而，這樣的話也沒有。

在審閱中央關於追悼會的規格、參加的負責人人數和悼詞的報告時，張玉鳳脫口而出地問他：「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毛痛苦而又吃力地說：「我也走不動了。」毛澤東只是在送審的悼詞（這個悼詞沒有說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上畫了一個圈，連張玉鳳也說：「這個圈表達了毛主席對總理的深厚情誼。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確實太弱了，太弱了……這一筆怎麼能表達得了對於自己風雨同舟幾十年的戰友的離別之情呢？」

對周的死，毛只是沉默。周恩來逝世的悼詞，毛是認真審閱過的。據汪東興說，毛修改了三次。這是夠用心了。可正是這個悼詞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因為它既沒有說周恩來是毛的親密戰友，也沒有說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不走回頭路，不幹後悔事

儘管毛澤東多次說到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他自己卻是不肯認錯的。他認定要作的事，是不會回頭的。「毛澤東說定了的事，輕易不允許別人再反對。」「大凡毛澤東講出的話，輕易再不肯改口。」（權延赤《紅牆內外》，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

京，第一〇七、一一四頁）

列車員姚淑賢講了一件小事：毛澤東夾醬豆腐，沒有夾碎，「半塊醬豆腐滴溜郎當全被帶起來。毛澤東稍一猶豫，把那半塊醬豆腐全塞進了嘴巴。我叫起來：『哎呀，多鹹呀！』毛澤東笑着說：『它跟我搗蛋，以為我不敢吃了它！』我說：『快吐了吧。』毛澤東放下筷子，嚼着醬豆腐說：『我才不吐呢。我這個人哪，不喜歡走回頭路，不願幹後悔事。』」（同上書，一五〇頁）

毛澤東的這種好鬥意識甚至貫徹到吃飯這樣的小事中，這是他把那半塊醬豆腐當成了敵人，它在挑戰：「我這麼鹹，你敢吃嗎？」所以毛澤東偏要吃，不管多麼鹹也不吐，吐就是輸了，就是後悔了。

田玉雲也說到過一件小事：毛澤東在野外散步，看到前面有個石崗，崗上有棵樹，就朝着這個目標走去。本來有條小路通向石崗，毛澤東沒有沿這條路走，他趟着青草碎石，走了一條不是路的路，結果越走越不好走，出現了帶刺的灌木叢和沒膝的蒿草，還有溝塹。一些工作人員走的是另一條小路，貼身衛士和警衛尾隨着毛走。另一條路的人快到崗頂了，向毛澤東這邊的人打招呼：「主席，那邊有路，走那邊的路吧。」毛澤東搖搖頭：「我這個人哪，從來不肯走回頭路。」接着問身後的人：「你們跟誰走？」

在這種場合，毛澤東想的不是走哪條路方便這樣簡單的問題，而似乎是要不要堅持革

命道路的大問題，是政治路線的大問題。別人走的那條方便的路大概是機會主義的，而他走的哪條崎嶇難行的路是馬克思主義的。

不肯認錯和回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觀上認為自己沒有錯；另一種是明知自己錯了，卻不肯承認。不幸的是，這兩種情況都在毛澤東身上發生過。

在「文革」後期，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雖然意識到，「文革」是搞糟了，但是他不願意承認。因此他才要打擊他認為可能會糾正「文革」錯誤的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審訊「四人幫」之後，胡耀邦講過這樣一件事：毛澤東曾對毛遠新談到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當時毛澤東說，我是不下「罪己詔」的。還說，要硬着頭皮頂住。……

封建時代的皇帝都可以向人民認錯，但毛澤東不能！

在生命的最後歲月，毛澤東把自己禁錮在中南海的住所裏，周恩來病倒了，代替周恩來的鄧小平難得見到毛澤東；鄧小平被打倒了，代替鄧小平的華國鋒也難得見到毛澤東。江青等人就更不消說了，毛澤東把自己埋在古紙堆裏，吟詩誦賦，身邊只有秘書和護士陪伴他。他既不願承認錯誤，又無力收拾局面，只好採取逃避的辦法。這就難怪他越來越孤獨。他究竟怎麼想的？他認為他還會贏嗎？他會想到見到馬克思時怎麼交代嗎？

不論多麼偉大的人物，歷史的判決是無情的。

（寫於一九九三年，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前夕）

第一部

毛澤東的權術

第一章

延安整風（上）：

毛澤東最高權威的確立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繼遵義會議之後的又一重大事件。只是經過延安整風，毛才使黨擺脫了來自莫斯科的束縛，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鋪平了道路。

中共的黨史上，都把延安整風說成是解決黨內分歧的典範。毛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他的「人民內部矛盾」學說時，曾把他的這種思想追溯到延安整風，說那時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實際上當時毛並沒有明文提出這樣的公式，只是提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用以代替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毛說：由於採用了這個方法，「經過幾年之後，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

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六九頁）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對這次整風作百分之百的肯定，就是抹殺了事情的另一面。

整風之前

遵義會議只是糾正了「左」的軍事路線。毛之所以東山再起，主要是靠他在軍事領導上的傑出表現。遵義會議並沒有觸及黨的政治路線。這原因是簡單的：軍事路線可以要李德、博古負責；政治路線可是由莫斯科決定的。

從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到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長達七年的時間裏，依據時局環境及政治發展所能提供的空間，為改變中共發展的道路，取代王明等留蘇派而確立其對黨的絕對領導，進行了持續而細緻的準備。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是通過王明及其教條主義小宗派來控制中共的。在遵義會議上，這個宗派的統治結束了。當時王明遠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和中共失去了聯繫，對中共中央發生了權力轉移的事一無所知。

據毛澤東自己說：

「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同意

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我們在第三國際會成爲不合法的了。還是要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實際上並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王力《現場歷史》，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一九九三年，一二六頁）

然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會承認毛澤東的地位嗎？這不能不是毛澤東感到不安的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陳雲、曾三一行從莫斯科到延安。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爬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寶座，同年十月就離開中國去蘇聯，一呆就是六年。這個時期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又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書記。這時他已不再是那個跟在米夫屁股後面的翻譯，而是一個革命的大人物了。

在王明回國以前的八月十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開會，專門討論了中國抗戰形勢和中共任務。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會上說：中國共產黨面臨政策和策略上的大轉彎，而黨內的情況很特殊，中國紅軍是一支農民軍隊，黨內工人的比例也很小。他擔心中共能否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任務。他說：需要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氣的人去幫助中共中央。（《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現在這個肩負着幫助中共中央重任的共產國際的寵兒回來了。

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等到機場迎接。毛澤東發表了以飲水思源爲題的歡迎詞，說：

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蔣拳峰《在毛主席周圍》，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合肥，二九八頁）

經過王明的提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到十四日召開。王明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以欽差大臣的姿態，傳達和解釋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共和國民黨全力合作。在談到領導權問題時，王明說：

「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如西班牙現在實際上已是無產階級領導，但沒有喊無產階級領導。現在歐洲資產階級也看馬列主義，資產階級知道無產階級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因此我們不能說是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這個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提法，顯然是針對毛澤東的。但王明自己也提過。

王明傳達的新方針，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政治局委員的一致擁護。周恩來且不指名批評毛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周恩來年譜》八一八

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北京，三九三頁）這個會上增補了王明、陳雲、康生爲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還決定準備在一九三八年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二八年召開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後，在中共黨內實際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到三月一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的意見由於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又一次佔了上風。中共出現了兩個並行的中心，即由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康生、陳雲等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漢長江局爲中心的，由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組成的事實上的第二政治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毛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利用抗戰機會全力發展中共武裝，八路軍不與日軍正面對抗而以游擊戰爲主要作戰方式，將中共主要作戰力量用於開闢敵後中共根據地等一系列主張，遭到了中央核心層冷遇，周恩來且帶頭對毛的主張表示異議。（參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九八）三八六頁；張國燾《我的回憶》；《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上冊）這是自遵義會議後，毛遭到的第一次嚴重挫折。此次事件不僅標誌着毛的政治權威尚未完全確立，更預示已和毛合作三年之久的周可能同即將回國的王明重新會合，從而動搖毛已在中共政治核心建立的優勢。此事對毛的另一衝擊是，由在黨和軍隊內享有崇高威望，且在軍內擁有較深的幹部基礎的周恩來等提出的「運動游擊

戰」方針受到軍方領導人的一致擁護。毛面臨與軍方疏離的現實危機。（《周恩來年譜》，三七三、三七四、三七五、三七七頁；《彭德懷自述》，二二三頁）令毛尤其不安的是，華北八路軍領導人彭德懷竟主動向武漢長江局請示匯報工作，而遠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員，新四軍的政委——毛的政治老對手項英更是一切聽命於武漢長江局，毛幾乎喪失了對新四軍的影響力。（高華《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一九三七年末至一九三八年夏，是遵義會議毛出山後政治上最失意的時期，他自己說鬼都不上門，此話可能言過其實，但政治影響相對減弱卻是事實。此時王明、周恩來正轟轟烈烈、頻頻曝光於國內和黨的政治舞台上，而毛卻在不動聲色，潛心觀察，以待時機。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際毛的活動：

（一）用一切方法，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儘管毛控制與莫斯科的通訊，但王明回來後，毛原已獲得的解釋上的自主權，頓時相形見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數同事，如大旱之望雲霓，視王明傳達之斯大林指示為甘霖，而把毛澤東的肺腑之言撇在一邊。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任弼時被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自王明回國後中共執行新方針的工作。當這個轉折性的提綱獲得共產國際的通過後，毛在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中就已獲得初步的勝利。而當王稼祥與季米特洛夫會面並獲得季氏支持毛的口信，則不啻是毛的巨大勝利。

了。這個口信對一九三八年的中共影響之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簡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對毛的政治地位的承認書。

（二）積極引導軍方領導人，促使軍方改變戰略方針。一九三七年洛川會議後，毛不斷急電彭德懷等，指示盡量避免與日方正面衝突，而將主要力量用於開闢根據地和群眾工作。（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一九九〇年）但當八路軍依運動游擊戰的方針配合國民黨軍取得平型關的勝利後，毛亦表示嘉許。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撤退殆盡，無友軍可配合，八路軍事實上採納了毛的戰略方針。當八路軍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從不到三萬發展到三十萬後，軍隊將領業已信服毛。

（三）加緊聯絡黨的高級幹部。毛小心謹慎地發展與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的關係。一九三八年底，毛將劉少奇調回延安，劉成爲毛在政治局中最親密的盟友，劉所領導的原北方局從此成爲毛向長江局鬥爭的根據地。（參見《王首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北京，二一二——二一三頁）毛還加緊拉攏張聞天，不僅使張聞天同意自己對國民黨的方針，而且加速了與王明的進一步分裂。對於和自己素無交往，且長期和王明共事的康生，毛先讓他坐了一個時期的冷板凳，在證實康生對自己的忠誠後，與他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毛聯合了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與以王明、周恩來爲首的長

江局就向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賀電一事，展開了電報戰。雖一時難分勝負，卻在此次交鋒中，鞏固了與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的團結，打破了王明一度擁有的政治局的完全支持。

（四）推遲召開七大。六大後，由於環境險惡，七大遲遲未能召開。國共合作後，中共成爲合法政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並成立了由毛澤東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七大準備委員會」。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會議重申近期召開七大的決定，張聞天且代表中央就此事起草了《告全黨同志書》。然而，毛不願意在形勢對己不利的情况下召開七大，張聞天的《告全黨同志書》被束之高閣未發出。

到整風前，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爲：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周恩來、任弼時、博古、朱德、康生、陳雲、項英、彭德懷；

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王稼祥、鄧發、何凱豐；

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博古、周恩來、陳雲、康生。

在這個領導集團中，可以與毛抗衡的只有王明、博古、張聞天、朱德、周恩來這幾個人。頭一個當然是王明，他有共產國際的背景，當時中共黨內對共產國際的迷信還沒有清除，加以王明善於演說，在延安頗迷惑了一些年輕學生。所以，王明是毛澤東要對付的第

一個對手。不過王明確有很多錯誤和弱點，容易抓住。王明已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就提出黨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嚴重錯誤的看法。王明重複了他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即曾表示過的觀點，以與國內的同事博古、張聞天劃清關係。眼下形勢變化，王明且不時向毛示好，且將毛從「中國革命的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升格為「偉大的理論家」。（王明《學習毛澤東》，延安《新中華報》，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日）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名義上是黨內「負總責」的，可他實際上已不太管事。他真正佩服毛的領袖才能，處處聽從毛的意見，重大方針都讓毛做決定。然而，他畢竟是留蘇的，他可以否定李德、博古的軍事路線，但否定過去的政治路線，卻是他不能接受的。毛很清楚，中共領導曾頑強堅持對原政治路線評價的人，並不是王明，而是與自己合作的張聞天。只有張聞天一人還在頑強抵抗毛為修正歷史結論所做的努力，對毛的試探氣球作出強烈反應。可是，留蘇派已四分五裂，勢單力孤的張聞天一人何能抵抗？後來張聞天主動要求到農村做調查研究，於一九四二年初離開了延安。朱德為人寬厚，沒有野心。博古因為在反圍剿的軍事上失敗，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威信盡失。周恩來倒不大好對付。雖然周也像朱德和張聞天一樣沒有野心和尊重毛的領導，然而周有傑出的才能和巨大的聲望，為毛所忌。毛的策略，就是以王明為主要對象，同時儘可能把周恩來牽涉進去。毛設法把劉少奇提上來，用以壓倒周恩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駐共產國際臨時代表王稼祥回國。在他動身之前，季米特洛夫請他帶話說：應該告訴全黨，必須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和成長起來的領袖。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緊密團結的空氣。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戰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王稼祥說，這是季米特洛夫的臨別贈言。（《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二三頁）王稼祥先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傳達了這個話，隨後又在十月份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再次傳達。他說：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國際希望中國黨的問題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同上書，一三八、一四一頁）

季米特洛夫的這些話，幫助毛澤東確立和鞏固了自己的領袖地位，遏制了王明的野心，對六中全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確認和批准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

毛澤東討好斯大林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一周後的九月一日，德國向波蘭發動進攻。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斯大林簽訂德蘇條約，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決議，而這些決議本來是在聯共領導下作出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季米特洛夫在會上作報告，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的任務。會議作出的決議指出法西斯是世界戰爭的禍根，號召全世界人民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來打倒法西斯。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戰爭危險問題的決議》，其中批評了那種要同德國進行和平談判的說法，說：爲了維護和平，必須對希特勒政府的侵略行徑加以阻止和制裁，而不要私下裏和它勾搭搭，爲虎作倀，從而縱虎爲患。（《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北京，四七四頁）此外，它還批評了一種不介入戰爭的中立論點，警告說：法西斯侵略者所發動的戰爭不可能是局部戰爭，它必定會發展成爲一場世界性的大屠殺。中立的立場是對侵略者的姑息和縱容。而堅持中立立場的國家也絕不能擺脫戰爭危險。（同上書，四七四頁）

所有這些話，現在都成了對斯大林的諷刺。

斯大林不僅在蘇聯停止了反法西斯的宣傳，而且向各國共產黨發出指示，要求停止反對德國法西斯的鬥爭，把矛頭轉向英法帝國主義。世界輿論認爲蘇聯同德國簽訂條約是幫

了德國的忙，各國共產黨也感到不知所措。

只有毛澤東的反應與眾不同，他無保留地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贊成蘇聯的立場，不反對德國法西斯而反對英法。

毛澤東在九月一日對《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說蘇德互不侵犯協定除了打破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外，在東方，還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在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基礎。（《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一九九一年，五八〇頁）

斯大林同德國簽訂條約，完全是從蘇聯本國的利益出發的，是違反共產主義者所應有的國際主義精神的，而毛澤東反而大加讚揚，硬把這件事說成是對世界人民解放事業的援助。

師哲回憶說，蘇德條約簽訂時，他正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雜誌的出版工作。最新一期已經印好，正在裝釘，內容都是反對德國法西斯的。簽約的消息突如其來，許多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同志都感到不能理解。這時毛澤東九月一日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發表了，大家震動很大。看來，毛澤東的這番話在國際共產黨人中也是驚世駭俗之論，他們的思想轉變沒有這樣快。（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一三一—一三四頁）毛的這個講話對德蘇條約表示百分之百的贊同，還說是對中國的

援助，這確實是不同尋常的。

早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就要求各國共產黨人絕對地、毫不動搖地捍衛蘇聯。他說：誰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國家。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四六頁）

可是這一次，蘇德條約使共產國際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斯大林的指示也是對法共和英共的嚴重打擊，因為要使它們停止反對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的矛頭轉向英國和法國，這完全不能使兩國的共產黨員和群眾接受。它們即使想為蘇聯辯護，也覺得很難。

毛澤東的講話是對斯大林的難得的支持。顯然毛想以此來換得斯大林對他的支持。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演講，後來以《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為題發表，還曾收入《六大以來》。一九八〇年這本書再版時，把這篇文章刪去了。可見當時的中央也認為這篇文章不妥。

九月二十六日，毛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談話。

毛說的共產黨領導權的問題，斯諾也覺得困惑。斯諾問：共產黨自稱領導着中國的工農，可是中國的工業無產階級的百分之八十是住在日本佔領區，共產黨怎樣對他們實行領

導呢？毛答：「在陝甘寧邊區，在八路軍管轄下的游擊區，我們不僅有政治上的領導權，還有組織上的領導權。在旁的地方，共產黨的領導比較間接，但只要農民和工人是按共產黨的主要方針組織起來的地方，他們實際上是在我們的領導下。」（斯諾《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一四四頁）

對此，斯諾含蓄地評論說：按照這種邏輯，顯然共產黨人認為參加抗日戰爭的所有軍隊都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因為抗日是共產黨在革命現階段的中心要求。（同上書，一四五頁）

斯諾說到，德蘇條約後，重慶有人擔心接着會有一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有一陣蘇聯確實勸日本簽訂這樣一個條約。斯諾問毛，你認為可能嗎？

毛答：如果這樣一個條約會妨礙蘇聯支援中國，就不會簽訂；如果不會，就可以簽訂。

歷史嘲笑了毛。兩年多以後，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同日本訂立了中立條約。要說這不妨礙蘇聯援助中國，那是不可能的。

毛當時還說：今天反蘇運動的中心已經不再是德國。它在於以英國為首的各民主國家。在張伯倫的領導下，各所謂民主國家的政府正在組織廣大的戰線，企圖把意大利和日本也拉進去。它們企圖借此先打敗德國，然後進攻蘇聯。

毛還說：蘇聯不會參加歐洲的戰爭，因為雙方都是帝國主義，雙方都是沒有正義的強盜。

斯諾問，毛的意思是不是法西斯主義和英法等民主國家沒有區別。毛的回答的意思是沒有區別，而且英國似乎更壞。張伯倫正在組織世界戰線，用以包圍蘇聯、抗日的中國以及德國。他的目的是結束中國的戰爭，推翻希特勒，孤立蘇聯，以便日後組織反蘇的運動。

斯諾有些不服，說：張伯倫先生的胃口恐怕沒有那麼大吧？難道你認為，張伯倫在打德國的同時，他的真正目的是在於滅亡俄國？在我看來，張伯倫現在對付希特勒就夠忙的了，還能準備對俄國打一場更大的仗？如果可能的話，他想爭取俄國的友誼，以便打敗希特勒，這樣做對他來說不是更合乎邏輯嗎？即使他確實有在將來搞斯大林的打算。……

斯諾又說到，蘇聯同納粹德國達成協議，佔領了波蘭，這使蘇聯看起來好像和極權主義的軸心國家進行合作來瓜分弱小國家。肯定有這麼多人會這樣認為。不論怎樣，新的蘇聯政策意味着所謂民主國家（包括蘇聯）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垮台。……

毛：隨着歐洲戰爭的爆發，世界政治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德國放棄了它的反蘇和反共產國際（原話如此！——斯諾的注）的政策。另一方面，所謂的民主國家開始利用戰爭來結束民主制度。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成了反蘇、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運動的中

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運動的敵人。現在英國成了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張伯倫是世界的頭號公敵。納粹德國的反蘇和反共產國際政策放棄以後，以前在法西斯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劃分就失去了意義，不再是一種政治衡量的尺度了。

當毛澤東談到蘇聯的幫助時，斯諾插話說：既然德國也是帝國主義，和英法沒有什麼不同，爲什麼蘇聯竟向德國提供大量小麥、石油和其他戰爭物資，從而參與了德國帝國主義的冒險行動。順便也問一下，蘇聯爲什麼繼續向日本出租庫頁島的油田，或者給日本以捕魚權。後者價值很大，因爲它使日本能輸出大量的魚，從而取得外國信貸，用以購買軍火來打中國。

毛說，蘇聯向日本出售石油的條件，他不清楚。無論如何，蘇聯沒有向德國或日本提供任何軍火。

斯諾緊逼問：在現代戰爭中，向參戰者提供坦克、飛機，跟爲坦克、飛機提供燃料，這中間有什麼大的區別？爲什麼說美國賣給日本戰爭原料就是參加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而蘇聯賣給德日同樣的原料，卻不是參加德國帝國主義在歐洲的戰爭和日本在亞洲的戰爭呢？

這個問題顯然使毛覺得不好回答。毛笑了一下，承認說戰爭原料買賣和戰爭工具買賣之間的區別不大。

毛在這次談話中爲蘇聯進攻波蘭進行了長篇大論的辯護，但是未能說服斯諾。斯諾最後向毛說，他認爲蘇聯的這種政策必然會加強希特勒的地位，以致反過來威脅蘇聯。蘇聯的這種做法還會削弱英、法、美的共產黨，使工人階級隊伍陷入混亂。另一方面，反動和保守的勢力將得到加強。蘇德條約可能會促使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變爲對蘇聯進攻的戰爭。

毛澤東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說：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囊中之物。（這次談話全文見《毛澤東一九三九年同斯諾的談話》）

這裏可以補充說一下的是，在一九三九年，當日本佔領了海南島後，美國政府廢除了同日本的貿易協定，但美國商人不顧這一點，繼續把原料賣給日本。至於英國，首相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不但遭到人民的反對，也遭到統治階層的反對，最後張伯倫只好下台。張伯倫的政策要批評，斯大林的政策就不要批評？

把毛澤東的觀點同共產國際的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共產國際的要正確得多。一九三八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前述的《決議》中說，西方與東方的戰爭販子竭盡一切可能支持對方的侵略計劃，威逼世界各國捲入殘酷的、毀滅性的戰爭。當前要集中力量打擊法西斯侵略者，揭露任何抹殺法西斯國家與非法西斯國家之間的區別的企圖，要把侵略的一方與遭受侵略者進攻的一方區別開來。這個決議指出，法國、美國目前對維護和平事業

表示關注，把所有國家都說成是侵略者，那是完全錯誤的。《決議》要求對法西斯國家在財政、經濟上堅決實行制裁（完全拒絕貸款、停止貿易和提供原料）。

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斯大林和毛澤東都錯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又寫了一篇《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說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這種和平政策就是以蘇聯的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聯繫着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九三頁）

有些人說，蘇聯將得利於爆發世界大戰，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繼續；這次大戰的爆發，就是由蘇聯不同英法訂立互助條約而同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所促成的。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正確的。（同上書，五九三頁）「英、美、法各國政府，並無誠意制止大戰的爆發；相反，它們是促成了大戰的爆發。因為它們拒絕同蘇聯妥協，拒絕同蘇聯訂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礎上的互助條約，這就證明它們只願意戰爭，不願意和平，誰也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拒絕了蘇聯，就是拒絕了和平。……英美法的計劃是：推動德國進攻蘇聯，它們自己坐山觀虎鬥，讓蘇、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後，它們出來收拾時局。這種陰謀，被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擊破了。」（同上書，五九四頁）

毛在談到蘇聯積極援助正義的、謀解放的鬥爭時舉例說到蘇聯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戰爭。其實這不過是兩個帝國主義（其中一個是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對外蒙的爭奪而已。

關於蘇聯進兵波蘭問題，毛斥責波蘭政府說，二十年來，波蘭政府一貫地反對蘇聯，在英法蘇談判中，堅決地拒絕蘇聯軍隊的援助。所以不能同情這樣的政府。（同上書，五九七頁）英法的所謂援助波蘭不過是同德國爭奪對波蘭的統治權，同樣是不能同情的，是應當反對的。至於蘇聯打進波蘭東部，那就不同了，是爲了收復蘇聯過去失去的領土，也是對波蘭東部少數民族的解放。還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之後的整個形勢，大大地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加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投降派。」（同上書，五九九頁）

同德國爭奪對波蘭的統治權的，主要是蘇聯。一九三九年德軍入侵波蘭時，蘇軍也進入波蘭東部，雙方以納雷夫河、布格河、桑河爲界。後來世界才知道，原來蘇德條約附有秘密條款，在波蘭劃分勢力範圍。在歷史上，波蘭是個苦難國家，受盡鄰國的欺侮，特別是受到帝俄的侵略。俄國從波蘭獲得了烏克蘭東部；沙皇還曾兼任波蘭國王，對波蘭實行俄羅斯化政策；沙皇彼得一世曾是波蘭的保護人。德國是和俄國爭奪波蘭的對手。在十八世紀末，波蘭三次被瓜分，這三次參與瓜分的都有俄國和普魯士。波蘭滅亡了一百二十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之後才獲得獨立。蘇德秘密劃分在波蘭的勢力範圍，表明斯大林繼承了帝俄的不光彩的遺產；所謂和平解放，不過說得好聽罷了。波蘭政府誠然對蘇不友好，但這有歷史的原因，而且也不能成爲蘇聯進兵的理由。

不僅如此，德蘇條約的秘密條款還規定：屬於波羅的海國家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地區，如發生領土和政治變更時，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就自動構成德國、蘇聯勢力範圍的疆界。後來蘇聯還侵略芬蘭，以致被國聯開除，這段歷史毛就閉口不說了。

六十年代中國同蘇聯分裂後，毛澤東批評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這是對的；不過蘇聯早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是社會帝國主義了，而毛澤東當時是為蘇聯喝彩的。

毛澤東說西方國家想把納粹德國這股禍水東引；但蘇聯何嘗不是想把這股禍水西引？無論東引還是西引，都是錯誤的；應當聯合起來制止侵略，像後來蘇聯和英美所做的那樣。英法和德國雖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但英法的民主制度究竟不同於德國的法西斯制度，而且實行侵略的是德國和他的盟國意大利，不加區別是不對的。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結束語中正確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和公開的法西斯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是不同的。現在法西斯正在侵犯資產階級民主，力圖代之以最野蠻的壓迫勞動人民的制度，因此，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人民面臨的問題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作出選擇，而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之間作出選擇。許多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權利（如罷工權、組織工會權以及出版和結社的自由權等等）是無產階級流了鮮血換來的，他們為維護這種權利而鬥爭是可以理解的。（《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

二，北京，四三一——四三二頁）

毛澤東本人在一九三七年寫的《矛盾論》中也提到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三二〇頁），現在他把這一點拋掉了。他說：「現在爆發的戰爭，無論在英法方面，或德國方面，都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九五頁）

晚年毛在談到斯大林時說：我曾寫過一些歌頌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慶祝他六十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詞，第三篇是《真理報》要我寫的。我向來不願祝賀人家，也不願人家祝賀我。……這不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而是對蘇聯黨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拋開了個人感情，把他當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那篇文章還比較有生氣，其他兩篇文章不是出於內心意願，而是出於需要。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矛盾的，感情上不願寫，但理智上不這樣不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二五九頁）

爲了得到斯大林的好感，他不惜做出一些違心之論。但毛還間接承認了在延安時寫的那篇文章是出於內心意願。應該說同時也是出於需要，毛需要得到斯大林對他的地位的承認。毛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斯大林的六十誕辰前夕發表的，題爲《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其中稱現在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受難者，只有斯

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五七頁）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難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算了嗎？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都不算數了嗎？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斯大林給了中共多少援助呢？靠一個人的援助去解脫人類的災難，這個話合乎馬克思主義嗎？

整風運動的準備和開始

現在，毛澤東有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支持，又籠絡了留蘇派的後台斯大林。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當着王明等的面，毛澤東發起新一輪的攻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剝奪王明的最後資本，即「言必稱希臘」——其實是「言必稱蘇聯」）。毛通過改變詞語，為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掃清道路。

從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可以說是整風運動的準備階段；從這以後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是整風運動的開始階段。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黨的歷史，特別是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歷史進行了大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這三年期間，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個期間，領導全黨高級幹部進行了同樣的討論。

一九四一年八、九月，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央決定編輯名爲《六大以來》的黨的歷史文獻集，由毛審核。在此之前，王明在延安重印了他的《爲中共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爲自己造輿論。毛編這本書是針對王明的書的，同時也是爲七大作準備，是供高級幹部學習和研究黨史的主要材料。這個辦法很成功，該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胡喬木說：「對於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的政治路線，要不是編輯《六大以來》時找到其錯誤的大量證據，就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會議和開展黨的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史的活動，也就不可能在黨內，即使在高級幹部中取得一致意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一八七頁）後來，又編輯了《六大以前》和《兩條戰線》，後者供更廣泛的幹部閱讀。

毛這時已決定提拔劉少奇到中央第二號人物的位置。在編輯《六大以來》的過程中，有一篇劉少奇的檢討文章，是關於他在白區所犯的右傾錯誤的，毛就不收。（同上書，一七八頁）

在經過了充分準備後，一九四一年九月開始，先在中央領導層中開展整風。從九月十日到十月二十二日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五次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毛作了主題報告後，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李維漢、任弼時紛紛檢討。張聞天還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任弼時檢討了在蘇區

時把毛主席的思想當做「狹隘經驗主義」來反對的錯誤。王稼祥提出，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卻容易成爲狹隘經驗主義者。任弼時提出，從黨的二十年來的歷史看，作爲主觀主義的思想統治，其中有些是經驗的主觀主義。張聞天提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常常結合而互相爲用，經驗主義者常做教條主義者的俘虜，教條主義者無經驗主義者不能統治全黨。此外，陳雲提出劉少奇在白區的路線是正確的，應該提高劉少奇將來的地位。任弼時說毛主席和劉少奇能根據實際情況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康生檢討過去與劉少奇有分歧，現在承認劉是對的；如果當時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王明沒有做自我批評，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但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問題，由於涉及到共產國際，意見沒有達成一致。

如果拋開王明不算，那麼，會議形成了抬劉貶周的形勢。

十月三日，毛澤東電告劉少奇，中央決定少奇同志返回延安，準備參加七大。毛要提升劉少奇，用他來壓倒周恩來。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澤東連續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篇演說。這兩篇演說標誌整風運動的正式開始。

一九四二年底劉少奇回到延安，一九四三年張聞天從農村調查歸來。王明還想把這兩個重要人物爭取到他那一邊，向他們宣傳中央路線錯誤的觀點，並要他們主持公道，然而

沒有用。

這是七大前的較量。中央政治局決定按照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方式，繼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的路線問題。

這次開會的時間長，參加的人也多。整風與黨史學習穿插進行，斷斷續續開到年底，實際上直到六屆七中全會才完全結束檢查。

在七月十三日的會議上，毛點名批判了王明，說他在抗戰初期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對國民黨要團結不要鬥爭，做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應聲蟲，是假馬列主義。說機會主義如不改正錯誤，有走向敵人的危險。

胡喬木評論說，這些批評對蔣介石和王明都是對的。「但是由於對抗戰初期跟着王明犯錯誤的一些領導人的情況沒有強調做具體的歷史分析，因而有的批評也失之偏頗。這種狀況影響了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抗日時期路線問題的氛圍。」

其實，說王明是「遷就主義」是可以的，但說是「投降主義」就不是什麼「偏頗」，而是根本不對。

因為，在當時提出共產黨的「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是愚蠢的，既做不到，又不利於統一戰線。在軍事上，共產黨可以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但不能領導國民黨的軍隊，而國民黨的軍隊是抗日的主力。在政治上，共產黨並不掌握全國性的政權。共產黨只能以它的方

針和政策，以它的宣言和行動去影響國民黨和全國人民，而這種影響力也是有限的，把這種影響說成是「政治領導」，未免誇大。當時共產黨的力量遠不如國民黨，毛澤東的威信遠不如蔣介石，這是事實。毛澤東在報告裏承認國民黨是統一戰線的主幹，再三提到「擁護蔣委員長」和引用蔣介石的話，就是這種事實的反映。

王明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口號，認為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因而不能提這樣的問題。他又說領導問題要以力量為基礎，沒有力量空喊領導是不行的。說在統一戰線中不能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王明評傳》，三〇七頁）應該說這還是有道理的。

不過，對於王明和周恩來在長江局的工作，毛澤東並沒有採取分析的態度。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了「不要否定一切」時，也只是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的中央，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是和我們一致的。他並沒有進一步肯定那些犯錯誤的同志的積極的貢獻的一面，特別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貢獻。

博古、林伯渠、葉劍英、朱德相繼發言，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批評王明的錯誤。

善於揣摩毛澤東意圖的康生出來表演了。他放了一炮，對會議的情況表示不滿意，說這樣的討論不解決問題，應該研究一下會議如何開法。王明不僅是幾篇文章的問題，而是

長江局、東南局的領導路線，並影響到華北，這就要求長江局的同志（長江局就是中共駐武漢的代表團，其書記是王明，副書記是周恩來）有更多的揭發。康生批評博古講話抽象，不揭發事實，自我批評精神也不夠。康生還不顧事實地批評王明負責的《新華日報》完全成了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言論。康生用批評王明的方法吹噓自己，說：在共產國際時，王明說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實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雖然跟他走，但組織上不願與他同流合污。回國後，有組織上的陰謀，我是知道的，他想抓軍隊。我與王明的關係，如他得勢十年也說不清的。他派了人來偵察我。抗戰以來，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沒執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真是一個幸福。但假如將來換一個環境，遇到一個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這可是要常想到的問題。

康生的這種發言方法，一副左得可愛的面孔，好像只有自己最關心會議的結果，對王明的批評誇大其詞，把自己打扮成受王明排擠的模樣，既打擊了王明，又美化了自己。他的這種語言，和幾十年後「文革」流行的語言一模一樣。康生本來是緊跟王明的，這時搖身一變，成了批判王明的積極分子。可是，毛澤東欣賞這一套，他需要這樣的打手。康生的這個發言對後來的會議進程發生了較大的影響，這正是毛所希望的。

毛的發言着重講「兩個宗派」問題。他說，黨從四中全會後就有兩個大宗派，一是教條宗派，一是經驗宗派。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會後是博古。這個宗派相

當有計劃地派出幹部到各蘇區的中央局去改組。我說的「欽差大臣滿天飛」，就是指此而言。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到一九三八年六中全會，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成黨內危機。教條宗派穿了馬列主義外衣，利用「國際」的名義來嚇人，與經驗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結合在一起，危害最大。

毛說的「教條主義宗派」當然是指王明、博古、張聞天；「經驗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指誰呢？敘述這件事的胡喬木沒有說，但很明顯的是周恩來。胡喬木還說，「毛主席關於『兩個宗派』的發言，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這些過激之詞是什麼，胡喬木也沒有說，只說，「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這個發言實際上為一九四三年九月會議的整風定下了基調。這以後，犯錯誤的同志都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其他同志也按照這個思路展開批評。」

毛選擇了一個有利的時機。這次開會時，正值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國共關係緊張之時，因此，反映到這次會上，涉及的人更多一些，會議的空氣也緊張一些。這種空氣是不利於平心靜氣的討論的。

十月六日，政治局開擴大會議。毛回顧錯誤路線發展的歷史，說：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至遵義會議受到打擊。現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時代為基礎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只有少奇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是擁護王明、博古

路線的（毛所說的現有的五個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除了劉少奇和毛自己，就是周恩來、任弼時、李立三了）。要改造中央，就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審查幹部也會很困難。另一年九月的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審查幹部也會很困難。另一年九月的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審查幹部也會很困難。另一關鍵是上月的會議與現在的學習。毛再次強調，鬥爭的性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錯誤路線以米夫、王明、博古為首。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

爲此，毛選擇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發出的九個文件來加以評論，寫了九篇文章。這些文章沒有發表，當時也只是給很少幾個人看過。這是毛爭取多數的一個手段。這些文章中，毛除了批判王明、博古和周恩來以外，正面表揚的人物就是劉少奇。胡喬木說：「『九篇文章』是嚴格保密的，一直到最後都是如此。」又說：「有同志提出，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曾經肯定四中全會，後來改變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七四頁）

他（毛）在會後寫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處援引少奇同志的觀點，讚賞少奇同志領導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批判以王明爲代表的中央對少奇同志的責難。主席在「第八評」中說，劉少奇同志是我黨在國民黨區域工作中「正確的領袖人物」，是唯物辯證的革命觀的代表；「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爲之證明，整個『左』

傾機會主義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爲之證明了。」在我所接觸到的主席在延安時期的講話和文章中，對中央領導同志作這樣高的評價是很少的。這足見主席對少奇同志是多麼倚重。（同上書，二七四頁）

毛對劉的評價雖然沒有發表，卻反映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其中讚揚劉少奇是「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個「模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北京，九七七、九八〇頁）

但毛的九篇文章卻沒有發表，這是爲什麼？如果僅僅是讚揚劉少奇的內容，這沒有什麼不好公開的。沒有發表的原因，據胡喬木說，「這裏涉及到對個人的評價，又與文章的形式過於尖銳有關。毛主席長期躊躇。」（《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五一頁）「如果在整風場合，或者在政治局會議上，他也不會這樣講。這裏是他自己寫，自己看，把話說得再凶，反正也沒有人聽見。」（同上書）胡還說：「九篇文章」的確寫得很尖銳。它不僅點了幾位政治局委員的名，而且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編輯《六大以來》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泄，刺人的過頭話不少。後來雖幾經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語氣仍然顯得咄咄逼人、鋒芒畢露。這與一九四二年初開始的普遍整風運動中他所提倡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很不協調。（同上

書，二一四頁）

但毛對這些文章是念念不忘的。根據胡喬木的敘述，毛在建國後至少把這些文章拿出來看了三次，其中有兩次印發。一次是在五、六十年代，毛重新修改後給幾個同志看了一下。（注意：陸定一在一九五六年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宣布，黨中央不擬編黨史，只準備編輯黨史文件集。）第二次是在「文革」中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毛又找出這幾篇文章看了一遍，刪去其中稱讚劉少奇的話，原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最後一次是在毛逝世前的一個月，即一九七六年八月，毛還讓人給他讀一遍。可見毛對這幾篇文章之重視。（同上書，五〇頁，二一四—二一五頁）

胡喬木說的「涉及對個人的評價」，這是誰呢？如果是王明，毛沒有什麼好躊躇的；那麼就只能是指周恩來了。周就屬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說到的在一九三一年開六屆四中全會時對於以王明為代表的「左」的教條主義者「實行妥協和支持」的「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九六五頁）

毛兩次印發這些文章的時間也值得注意。在本書下面還將敘述，毛在五十年代末曾想把周恩來從總理職位上撤下來。一九七四年正是「批林批孔」的時候。毛在臨死前還把這批文章拿出來，他究竟想做什麼？

如果我們了解毛和周的矛盾和複雜關係，這個謎就不難解開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整風運動期間，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未參加）。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接着中央書記處開會。根據劉少奇的意見，書記處設一個主席。毛澤東被選為主席。會議還決定劉少奇參加中央軍委，並為軍委副主席之一。此外會議還決定設立兩個委員會：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前者由毛澤東任書記，後者有劉少奇任書記。這樣，劉的地位顯著上升，與毛分別主管一個方面的工作。

這樣，毛澤東任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主席，並兼任中央黨校校長。《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書記處「會議不固定，得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此決定還決定將現有的工、婦、青合併，成立中央民運工作委員會，設書記（鄧發）和副書記（蔡暢）各一人。還對各個地區的黨、政、軍領導作了重新劃分，這樣，王明就繼一九四一年九月延安女子大學撤銷而自動失去校長職務之後，又被解除了書記處書記、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只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統戰部部長，而統戰部又被劃在這次會議新成立的劉少奇任書記的組織委員會管理之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長春，三五—頁）

這意味着「國際派」的徹底失敗。

清算王明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就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這樣，王明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後台，只剩下斯大林。他卻還繼續宣傳他對國民黨的觀點。現在是清算王明的機會了。

後來毛談到這件事說：

共產國際解散後我們比較自由些。這以前，我們已經開始批評機會主義，開展整風運動，批評王明路線。整風實際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但是關於斯大林和第三國際我們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提。過去不提的原因有二：既然中國人聽了他們的話，那麼中國人自己就該負責。誰叫我們去聽他們的話呢？誰叫我們去犯「左」傾、右傾錯誤的呢？有兩種中國人：一種是教條主義者，他們就聽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種中國人就不聽那一套，並且批評教條主義者。二、我們和蘇聯的關係中不願意引起不愉快。第三國際沒有檢討這些錯誤，蘇聯也沒有提到這些錯誤，我們提出批評就會同他們鬧翻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二五四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中這樣說：

不能認為王明在抗戰初期的表現都是錯誤的，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王明最先從共產國際得到新的精神，提出不少正確的意見，在促進國共合作和開展抗日宣傳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的錯誤對黨的實際工作造成了危害。對於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更應該採取分析態度。長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但在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影響下，也存在缺點和錯誤。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五二三頁）

其實，抗戰初期，毛澤東對共產國際關於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是完全接受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作了《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階段》（《論新階段》）的報告。《論新階段》中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觀點。

下面是毛有關抗日戰爭的領導問題的話：

去年七月廬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全中國就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
的統一領導之下，發出了神聖的正義的炮聲，全中國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
結，形成了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論新階段》，三頁）

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合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
位。（同上書，二八頁）

引文中「蔣委員長」前的空格為原文所有，是當時流行的在文字中對蔣表示敬意的方式。從這些話看，很明顯地是以蔣介石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袖。

新環境中，敵人的方針，必然集中於反蔣反共，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府，企圖推翻蔣委員長，推翻國民政府，破壞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針對敵人的這種方針，全民族的第二任務（引者按：第一任務是抗戰到底）在於號召全國，全體一致誠心誠意地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合作，擁護全國團結，反對敵人所施任何不利於蔣委員長，國民政府，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的行為，反對任何漢奸政府統治中國。（同上書，三六頁）

下面說到為此目的就要調節國共兩黨的關係，包括「反對利用困難與政府為難之行為」，「務使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響」。（同上書）

毛在這個報告裏多次提到「在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四次引用了蔣的話。毛還說到要在組織上發展國共兩黨，並以國民黨為主：

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又以國民黨為主幹，我們承認這個事實。因此，我們是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並號召全國一致擁護。

在數量上，我以為國民黨應發展至五百萬以上，共產黨及其他黨派應發展至

百萬以上。（同上書，四六頁）

毛在報告中還專門談到「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並批評了懷疑的觀點：

然而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對於國民黨存在着一種不正確的觀察，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前途是懷疑的。他們對於國民黨懷疑的問題，就是能否繼續抗戰，能否繼續進步，與能否成為抗日建國的民族聯盟的問題，而這三個問題是互相結合不可分離的。我們的意見怎樣呢？我們認為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根據各種主客觀條件，它是能夠繼續抗戰，繼續進步，與成為抗日建國的民族聯盟的。（同上書，二九頁）

儘管在國民黨內還有一些守舊分子，障礙着國民黨進步的速度與程度，

然而我們堅決相信，這種守舊分子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沒有佔優勢也難於佔優勢的，他們是逆流，但並非主流。在蔣委員長長的領導，國民黨大多數人的努力與全國人民的贊助之下，這種守舊傾向是能夠克服的。（同上書，三一頁）

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覆：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同上書，五頁）

在建國以後編輯的《毛澤東選集》中，沒有收進《論新階段》的全文，而只節選了其中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一部分。編者在《題解》中說：「毛澤東同志

在報告中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一個問題，便是爲的使全黨同志明確地知道並認真地負起我們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其實，這一部分沒有一個字提到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問題。相反，整個報告是強調擁護蔣介石的領導。《毛澤東選集》沒有發表這個報告的其他部分，顯然是感到尷尬。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還專門談到了「我們的領導責任」，而在這裏閉口不提這一點，甚至比王明更積極主張加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這顯然是一種轉變，是一種服從共產國際的表示，是爲了顯示對斯大林的忠誠以及擴大中共的政治影響。

而上面這些，都是當初爲取代王明等留蘇派的長長過程中的一個步驟。現在，毛澤東不僅要清算王明，而且「此次整風是全黨的，包括各部門各級幹部在內……所謂各級，就是不不但有下級，而且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毛澤東關於整風問題致聶榮臻（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

一九四三年十月間，整風運動已進入高級幹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階段。彭德懷從太行前線調回延安，參加了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的整風學習運動。當時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檢查軍事方面的問題，特別是「百團大戰」的是非得失。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七大

上，彭德懷作了專題發言，其中也檢討了「百團大戰」的是非得失。師哲聽了後覺得受到很大啓發。「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像他那樣的負責幹部對自己的缺點錯誤所做的那樣嚴格的自我批評。」兩天後，毛問他對彭德懷發言的感想。師哲說好。毛不等他說完，就不高興地說：「他承認錯誤的態度十分勉強！也難說他是心悅誠服的。」看到師哲沒有什麼表示，毛又補了兩句：「此人剛愎自用，目空一切。」

七大後，中央軍委召開座談會，繼續批評彭德懷。（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二六九—二七〇頁）

延安的這一切，被一個局外人觀察到了，他就是塔斯社記者弗拉基米洛夫（他在共產國際撤銷前也是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在康生對他作了一次談話後，這個蘇聯人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反對共產國際的運動是以開除王明出黨為前提的。聽康生的口氣，我感到王明有被開除的危險，而且實際上這是毛的一伙人策劃的。」（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六七頁）

弗拉基米洛夫認為延安整風實際上是反對共產國際和反對受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人的，他一直根據這個觀點向莫斯科做報告。另外，王明也悄悄通過弗拉基米洛夫發給季米特洛夫一份電報，要求這位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告訴中共領導，他是遵循國際的路線的，是執行國際的決議的，這是他的任務和職責。他認為，毛的新路線違反了反法西斯鬥爭的利

益，因而實質上是一條分裂的路線。（同上書，一六八頁）

這一着收到了效果。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致函毛澤東，對延安整風中批評王明和周恩來提出不同意見，並表示了對康生的懷疑。信的主要部分如下：

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後，它過去的領導人誰也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出於個人友誼我不能不對您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令我擔憂。您知道，從一九三五年起，我一直密切地而且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國事務。根據我了解的一切，我認為，縮小同外國佔領者的鬥爭規模的方針，以及明顯地偏離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傾向，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民族戰爭期間，這樣的方針有使黨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會有害地造成內戰的加劇，而從內戰中獲得好處的只是佔領者和他們在國民黨中的代理人。我認為，現在進行的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他們是由於執行共產國際倡導的民族戰線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們因此而把黨引向分裂。像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不應該開除出黨，而應該保留他們，並為了黨的事業充分地使用他們。我還擔心一部分黨的幹部存在的對蘇聯的不健康情緒。我也覺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懷疑。那些像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團結黨的各種正確措施，康生及其機構是通過那些不正常的形式

來實現的，這些形式只能煽動相互間的懷疑，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強烈不滿，幫助敵人瓦解黨。早在今年八月，我們就從重慶得到完全可靠的消息，說國民黨人決定派遣奸細去延安，目的是離間您同王明及其他黨的活動家的關係，製造對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學習過的人的敵對情緒。國民黨人的這個陰險打算，我及時提醒過您。國民黨人的意圖就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以便通過這種方式輕易地摧毀它。我認為，康生的活動無疑是幫助了這些奸細。請原諒我同志式的直率。但是，只是由於我深深地尊敬您，堅定地相信您作為一個公認的黨的領袖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有利的，我才這樣直率地講話。（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一九八六年出版。轉引自《理論內參》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又見《黨史信息報》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央成立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的總學習委員會時，毛澤東擔任總學委主任，康生被任命為總學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委學委主任，成了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的最直接助手。延安整風運動結束後，康生沒有得到提升。七大後，康生的實際權力反到大大縮小，除了政治局委員外，他的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的職務被解除了。

毛澤東想開除王明，這有些出人意外。因為中共一直宣傳說，延安整風是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榜樣，是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原則的。然而對「無可救藥」的人怎麼

辦？我不懷疑毛有過這樣的打算。他後來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是照顧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反應，於是就落得表示高姿態了。至於有開除周恩來的企圖，這是更加令人震驚的事。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話有什麼根據。

在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進行了半年，對一些重大的歷史問題和理論原則問題基本取得一致意見以後，毛覺得可以把整風運動擴大到普通黨員和幹部了。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

第二章

延安整風（下）：審幹運動

整風運動的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提倡實事求是，可是恰恰在整風運動的審幹階段，大搞「逼供信」，主觀主義大氾濫，實事求是的精神被拋到九霄雲外。

反對主觀主義的重點是反對左的教條主義。可是又把《聯共黨史》樹為經典，號召學習斯大林的錯誤的所謂「黨內鬥爭」的經驗，繼續搞組織上的左的路線。毛澤東反對了王明的教條主義，卻樹立了自己的教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包治百病的萬應靈丹。

整風運動聲稱反對宗派主義，正確處理本地幹部和外來幹部的關係，可是恰恰在這個運動中把從白區來的知識分子當作異己分子加以歧視，用「工農兵」來壓他們，誣蔑他們要投降日本或者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極大地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感情。

整風運動揚言反對了王明的黨八股，反對「言必稱希臘」，可是代之而起的是毛式黨

八股，「言必稱毛澤東」。毛澤東的話成了金科玉律。建國後的文章引證連篇，文革時期的背語錄，都源於延安整風。

整風運動提倡「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判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還說，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是從延安整風時期就開始實行的；恰相反，正是從延安整風開始了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法對待滿腔熱情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把他們當作敵人。

毛澤東為何發動審幹

延河邊上有一座嘉嶺山，山上有一座出名的寶塔，因此這個山又叫寶塔山。寶塔始建於唐代，明代重修。它是九層磚塔，八面八角；登到塔頂，可以鳥瞰延安全景。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遷移到這裏後，這座寶塔成了延安的象徵，也是革命的象徵。在抗日戰爭時期，它在許多知識分子心目中，像是光明的燈塔。

抗日的怒潮在全中國洶湧澎湃，知識分子紛紛尋找獻身救國的道路。他們一要抗日，二要民主。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使他們失望，共產黨的堅持抗日和爭取民主的立場吸引了他們，於是他們決定投奔共產黨。

客觀環境也起了變化。七七事變後，由於國共合作，國民黨暫時停止了對共產黨員的

迫害，共產黨可以公開活動了。中共中央抓住這個機會，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這個決定是毛起草的，其中說：「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個決定承認，在土地革命時期，黨所屬的許多地方許多軍隊有「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但強調「今後決不應重複」。〔《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二〇頁〕這樣，大批知識分子加入了共產黨，其中很多人從國民黨統治區擁入延安。到一九四二年初，全國有黨員九十萬，新幹部、新黨員佔百分之九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二〇五頁〕小小的延安的街道上出現了許多陌生的、城裏人的面孔。他們懷着革命的虔誠和抗日的熱情，像朝聖一樣來到了被稱爲「革命聖地」的延安。

一九三八年五到八月，四個月中，經武漢、西安等地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各界人士就達二千二百八十八人。當時延安每天接待幾十人到一百多人。〔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三九頁〕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抗大有一萬人，陝北工學有三千人，青訓班有二千人，加上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黨校，共約兩萬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九九頁〕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並不是沒有阻力的。毛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就指出了「許多

軍隊中的幹部，……還存在着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許多我們辦的學校，還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學生。許多地方黨部，還不願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毛提出：「對於一部分反對知識分子參加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主力部隊中的某些幹部，則應該切實地說服他們，……」（《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一八、六一九頁）

但在延安擁入了如此多的知識分子後，可以感到，知識分子需要共產黨更甚於共產黨需要他們。黨完全可以放心，不必發愁知識分子不來，即使邊區的物質條件差，即使對知識分子不尊重，也沒有關係。

在土地革命時期成長起來的幹部，大部分來自農村，大部分加入了軍隊。這些人對知識分子有一種排斥心理。這種心理和毛是共同的。青年時期的毛在湖南本來也可算是一個小有名氣的風雲人物，但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那一年去北京時卻發現他在這個文化名城中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知識分子而已。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每月工資八塊大洋。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

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斯諾《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北京，一二七頁）

毛參加了勤工儉學活動，幫助一些人去了歐洲，可是自己留了下來。在留過洋的人面前，毛只能算一個「土包子」了。特別是從蘇聯回來的王明一派的人排擠他，嘲笑他是「狹隘經驗主義」，更是對毛的刺激。毛到延安後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也是發憤。但毛從此有了一種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心理，這種心理有時會緩和一些，但遇到刺激，就馬上顯露出來。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講演。在這裏，他把王明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狠狠地發泄了的不滿。他說，學生學習書本知識是並不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相反，大師傅做飯倒要困難些：

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鹽多了要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麼，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

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的事呀！

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了。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餵狗。教條嗎，既不能肥田，又不能餵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

上面這些話，在建國後編輯的《毛澤東選集》中刪去了。但還保留了一些十分尖銳的話，如說主觀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胡喬木說：「毛主席講話用語之辛辣，諷刺之深刻，情緒之激動，都是許多同志在此以前從未感受過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九二頁）含蓄地表達他也覺得過份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澤東連續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篇演說。這標誌整風運動的正式開始。

在《整頓黨的作風》裏，毛繼續批評有些知識分子說：「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一五頁）毛在攻擊別人時，總要否定對方的最強的方面，現在這些話就是要剝奪知識分

子驕傲的資本。（其實「比較地最無知識」這個話是欠通的；到底是「比較地無知識」還是「最無知識」呢？）

毛還提出了他的處理犯錯誤同志的兩條著名原則：「懲前毖後」和「治病救人」。這可以說是毛後來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雛形。但這兩條原則在實踐中起了多大作用，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

王實味的悲劇

儘管毛批評了王明路線，可還是要繼承斯大林。就在一九四一年最早提出整風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一面批評別人的教條主義，一面又在宣揚教條主義。他提出在職幹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材料。他讚揚這本書「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〇三頁）

王明所執行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是被拋棄了，可是斯大林在清黨中實行的一套左的組織路線並沒有被否定。上面這本被毛澤東作為經典來推薦的著作中，有很大篇幅是

講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反對派鬥爭的。該書「結束語」被列為整風學習的文件之一，其中第四條說：「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爲了達到勝利，首先就必須把工人階級中間，工人階級的領導司令部中間，工人階級先頭堡壘中間所有的投降主義者、逃兵、工賊和叛徒清除出去。」（《聯共黨史》，四三九頁）並引證斯大林所說：「黨是靠清除自身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同上書，四四〇頁）一部蘇共黨史，除了講列寧，就是講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暗藏的敵人」做鬥爭並消滅他們的歷史。

毛是欣賞這個的。「文革」不就是照這條教導做的嗎？當然，不能說不要清除機會主義分子和叛徒之類，但是否要慎重呢？大規模的清黨或肅反是否必要呢？要不要反對誣害呢？要不要警惕以肅反爲名打擊異己呢？這裏面有些什麼血的教訓呢？這些「結束語」都一字不提了。

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的《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中，毛批評了用「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同志」。毛的確沒有用這種手段來對付王明，可能以此顯示他的大度，但也是因爲王明的背後是斯大林，毛不能不照顧。但毛說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敵人卻是「完全必要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聯共黨史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的，因爲那

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毒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三五頁，楷體字為引者所改用）

延安整風運動是反對左的路線，但這個運動不久就轉入了「審幹運動」，實質是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其中貫穿了一套十分左的做法。

毛澤東為何發動審幹？

聽信了康生的讒言？毛澤東決不是那種讓別人牽着鼻子走的人。他是暴君而不是昏君。馬基雅維里：壞事讓別人去做。曹操：借刀殺人。奸臣也要揣摩皇帝的喜好去迎合。本來，毛反覆說：「這一次整頓三風鬥爭，他的性質是什麼樣的呢？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可見，整風運動就其最初目的而言，毛澤東既不是針對已經躺倒的王明去的，也不是針對一般黨員群眾來的，他的基本目標是那些手中有權的領導幹部。

三月，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批評了延安一些幹部對下級漠不關心，缺乏同志之愛，官僚主義，等級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以及延安的「歌嘯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三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召開整風動員大會。王實味是這個院的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他激烈批評了李維漢的講話。接着，中央研究院的牆報《矢與的》創刊，王實味獨發兩

篇，指名批評院領導羅邁（李維漢）。來看牆報的人川流不息，王實味一時成爲明星。

《輕騎隊》、《矢與的》，以及由此引發的《解放日報》第四版（丁玲主持）上一些尖銳批評老幹部棄舊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級制度等問題的雜文，諸如王實味的文章，矛頭所向，大都是衝着各級領導和老幹部去的。這多少符合毛澤東的初衷，卻不免在一些領導人當中，包括一些軍隊領導人當中造成嚴重的反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四九一頁）

這事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在一天夜裏提着馬燈來看牆報。一般人以爲這表示了毛對牆報的支持，而實際上毛當時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同上書，四八三頁）

三月三十一日，毛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說：「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諷的辦法。」又說，丁玲同王實味不一樣，丁玲的文章有建議，雖說也有批評。王實味是托派。（戴晴《梁漱溟 王實味 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南京，七三頁）

平心而論，王實味對延安社會現象的批評是有些過火的。比起國統區來，延安是一個相當平等的社會，共產黨當時也是很廉潔刻苦的。不合理的現象是有的，但不是那麼嚴重；跳跳舞有何不可？王實味的文章後來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利用，編印了小冊子，加以攻擊。然而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王實味在《政治家·藝術家》中已經很好地回答了這個

問題：

「有人以爲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對外』，如揭露自己的弱點，便予敵人以攻擊的間隙——這是短視的見解。我們的陣營今天已經壯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點，但它還不夠堅強鞏固；正確地使用自我批評，這是使它堅強鞏固的必要手段。至於那些反共特務機關中的民族蠱賊，即令我們實際上沒有任何弱點，他們也會造謠誣蔑；他們倒更希望我們諱疾忌醫，使黑暗更加擴大。」（溫濟澤等著《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一七四頁）

其實，這個問題在《解放日報》的社論《褲子與教條》（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胡喬木撰寫，經毛澤東修改）也已經談到了：

「……有些好心的同志說，褲子是要脫，但是只能秘密地脫，在群眾面前脫不但有傷大雅，而且敵人和反共分子還會在旁邊拍手。但是群眾難道不是共產黨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監督者和審查者嗎？……自然，敵人的宣傳機關如同盟社和各種漢奸報紙之流，一定會借此製造更多的謠言。但是他們是以造謠爲生的，他們說是黑，群眾就知道一定是白，所以他們的斷章取義是毫不足懼的。」

既然歡迎大家批評，就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評都那麼正確或恰當，過份和不及的情況都是正常的。如果批評得過頭了就要追究，那麼又怎能要求「嚴正的、徹底的、尖銳的」批

評呢？爲什麼只追究過火的批評，不追究不及的批評呢？對王實味批評中不恰當的地方，應當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對那些批評得對的地方，則應該引起警覺。

四月三日，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簡稱《四三決定》），要求各機關各學校對於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報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文件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爲自己的武器。爲此目的，各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

又說：

討論與批評的態度，應該是嚴正的、徹底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坦白的、實事求是的、與人爲善的態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誣蔑謾罵、捕風捉影、誇其談，都是不正確的。在討論中，應時常把握毛澤東同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警語，對於犯錯誤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進步，即使是在進步中尚不免有錯誤，也應鼓勵他，幫助他。（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整風文獻》訂正本，解放社編，一九四九年）

此外，還談到可以出牆報。

四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學習組講話時說，「文藝界有一個方向問題。」（同上書，七四頁）

四月七日，中宣部批評了中央研究院整風的偏向。王實味死不認錯。當時擔任宣傳幹事的溫濟澤苦口婆心地勸說；王實味哭了，答應認錯，但他說他確實是出於好心。康生批評溫濟澤是溫情主義，說王實味不是思想問題，他是托派分子，還是藍衣社特務。

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否則就是站在敵人的立場了。又說：「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七五頁）

這個話說得很重，卻是完全錯誤的。

當時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是什麼呢？按照毛澤東的分析，他們構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他們中間，許多人已經是漢奸，許多人已經是親日派，許多人是準備作親日派，許多人在動搖中，……」。「一般地說來，他們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是為期不遠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九六頁）

毛有什麼理由認為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是要投降日本，因而依了這些人，就要亡黨亡

國呢？毛在講話中批評了一些知識分子的言論，那些言論即使是錯的，也提不到這樣的政治高度。我想毛最忌諱的是當時丁玲、王實味等人的言論，儘管他沒有明說。丁、王不過是對延安的不正之風提了一點意見，實行他們的民主權利，而且完全是善意的，這跟投降日本有什麼關係呢！如果說他們要改造黨，在某種意義上也不錯，他們是希望黨變得更民主一些，這不會導致亡黨。

毛把接受知識分子的意見同投降日本聯繫起來，這充分表現了他對知識分子的敵意。六月初，中央研究院開始批判王實味。會上同志紛紛對王實味提出質問。人們揭發他說過「蘇聯對於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蘇聯清黨時，斯大林同志不知道造了多少罪惡」，「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等。王在會上仍然堅持說：「我認為蘇聯清黨時，有好些人是可以從敵人爭取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八四頁）

這話又激起全場義憤，認為是對斯大林的誣蔑。

王實味說共產國際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這個話理應得到毛的同情，但這個話是不能公開說的。至於說斯大林在清黨中的錯誤，這正好是毛要繼承的。王實味敢於發表那樣的意見，表現了他的獨立思考精神和勇氣。

六月，《解放日報》陸續發表文章批判王實味，其中以毛的秘書張如心的調子最為嚴

厲。周揚發表了總結性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

六月十九日，延安《解放日報》登出一條報道，說延安文藝界開會，作家們「一致認為托派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

到十月，搞出了一個「反黨五人集團」，王實味變成了這個集團的頭目；他還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中央研究院黨委做出了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

就在七大期間，毛談到王實味還說：

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四二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出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這些話表明毛仍然把王實味看做是同共產黨做鬥爭的對手。

毛還說：「那時分歧達到這樣的程度：有一個王實味在延安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願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風時出了牆報，那牆報受到歡迎，橋兒溝、南門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牆報，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他們說邊區沒有韓荊州。……他們找不到韓荊州在哪裏，其實到處都有韓荊州，那就是工農兵。……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立場上

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因為那時大廚房沒有什麼東西吃，其實小廚房東西也不多。」（《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四二—一四三頁）

王實味並沒有批評工農兵；他只是對延安的等級制度不滿意，可是這就被毛說成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王實味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當時他被稱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他言辭激烈，常與人吵架，但他對黨是忠心耿耿的，只是好提意見，直來直去。他就是毛後來在「文革」中鼓勵的那種「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只不過他不是按照毛的指揮去「刺」，觸惱了毛罷了。

那麼毛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到哪裏去了呢？他不是說過嗎：「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這一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二八頁）這個處理原則，為什麼不能執行呢？

問題就在於這個原則是有條件的：你必須「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這裏事先肯定了你是錯的。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錯，要為自己辯護，那就是「不可救藥」了，那麼治

病救人的原則對你就不適用了。而且，如果把你看成是敵人，那你就更不能為自己申辯了，只有坦白交代，爭取寬大。總之，這裏是沒有人權保障的。

如果一個同志有品質上的問題，嚴重的如貪污腐化，輕的如官僚主義，這主要是查清事實的問題。事實弄清了，就沒有什麼好辯護的了。在這裏，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有同樣的價值標準。但政治觀點上的問題，如王實味對斯大林的肅反有不同意見，就不同了。在這裏，應該是有保留不同意見的權利的。然而按照毛的處理方法，這是不允許的。這樣就必然要發生錯誤處理的事。毛的原則有根本的缺陷，因為它是「有罪推定」，而凡是被認為有罪的人就失去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幾十年間，毛並沒有總結經驗，加以完善，而是按照同樣的邏輯發展下來，成為他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學說，因此也就注定了不會妨礙毛的迫害方針。

王實味的三條罪名，直到一九九一年二月才全部平反，那已是他被定罪後近半個世紀，也是他犧牲後四五年的事了。

「搶救運動」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用逼供的辦法讓一個年僅十九歲的投奔革命的青年張克勤承認自己是「特務」，還交代出十幾個同伙。因為張克勤原是甘肅地下黨員，於是康生就說

甘肅地下黨是「紅旗黨」（外紅內白）。

同年十二月，康生以總學委副主任的身份作《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聳人聽聞地聲稱延安「特務如麻」。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說，整風既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也要整反革命。過去我們招軍、招生、招黨，招了很多人，難於識別。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部和中央黨校都發現了許多特務。現在我們要學會識別特務與賢才。在延安，年內要完成審查幹部、清洗壞人的工作。（《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康生親自圈定名單，指令抓人，一夜就逮捕了二百六十多人。兩天後，黨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提出除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外，還要「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說，整風運動既是糾正幹部思想的最好辦法，也是發現內奸和肅清內奸的最好辦法。要用一年時間（從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來完成這項工作。從此，整風運動進入了審幹階段。這一階段延續到一九四三年底。

四月中旬，各部門的審幹工作全面展開。

五月，張克勤到各處做典型報告，痛哭流涕地「坦白」自己如何受國民黨派遣。各單位都照此辦理，千方百計找典型。

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間，華中局和軍部召開會議，布置開展搶救運動。黃克誠提出建議，華中不要搞搶救運動。但這是中央布置下來的，不能不執行。過了一個時期，華中局召開會議。黃克誠回憶說：會議期間，他同第七師政治委員曾希聖住在一起。曾心情鬱悶。黃克誠一再詢問，曾才說他的愛人可能是個特務。黃問，你自己相信不相信？曾說，人證供詞都有，不相信有什麼辦法。據說是在第二師政治部工作的一個女幹部供出的。她與曾的愛人是在上海的同學。黃覺得這件事不大靠得住，就通過第二師政治委員譚震林把那個女幹部找來單獨談話。她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繪聲繪色。黃一聽就覺得不可信，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慮，對她說，要向組織講真話，否則，既對革命事業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這時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以前講的全是假話。黃克誠問她為什麼要說假話。她說，開始時講真話，人家不相信，大會小會鬥爭，逼供，被整得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瞎說一氣，問什麼就交代什麼，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樣一來，反而受到表揚和優待。

黃克誠告訴了譚震林，對他說，這種搶救法真是害死人。譚說，他們第二師每個團都搞出了數以百計的特務。黃說：「哎呀！你一個團裏有那麼多特務，部隊駐地離敵人又那麼近，你又在審查他們，部隊還不亂了套，都跑光了？」譚說，一個人也沒有跑。黃克誠說：「老兄，你快回去給人家平反吧。」（《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北京，一七八—一七九頁）

七月十五日，康生作《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宣稱經過三個月的搶救工作，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警告還沒有坦白的人趕快下決心坦白悔過。於是氣氛更形緊張，各部門紛紛行動，掀起一個高潮。

《解放日報》和新華社，起初沒有搞出什麼「特務」，受到康生嚴厲批評。後來採用逼供信的辦法，在兩個單位的一百幾十人中，被逼承認是「特務」的佔百分之七十左右。

（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七七六頁）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餘人，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四百八十多人成了「特務」，只有二十個人是好人。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共有三四百人，被「搶救」的達百餘人。（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五一—四頁）假坦白的受到鼓勵和優待，沒有坦白的受到強大壓力。那些挖出「特務」不多的機關領導受到批評，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當時的《解放日報》報道，一個十四歲女孩「坦白」了她參加了「復興社」；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坦白」他受特務指使，擔任了「石頭隊」的負責人，用石頭為武器去殺人。在延安，僅半個月就挖出特嫌分子一千四百人。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在審幹中還採用了恐嚇和刑訊的辦法。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十九歲女青年，被無

端懷疑爲「日本特務」。審訊時，三天三夜不讓她睡覺，還威嚇說要放兩條大蛇到她窩洞裏。關中分區一個縣採用過二十四種肉刑，包括壓杠子、打耳光、舉空甩地等。有的地方還搞假槍斃。許多人承受不起那種強大的精神壓力和肉體折磨而自殺，僅延安一地自殺而死的就達五六十人。

七月一日，毛提出：防奸工作有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

一九四三年八月，康生在一個訓練班上講話。他得意洋洋地傳授經驗說：

我們領導上的方針是，強調「四三決定」的民主，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共產黨是半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那時反革命的兩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

……所以你們看一看，這個暴露階段，暴露到什麼程度！（戴晴《梁漱溟 王實味 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南京，一九八九年，九六頁）

這一套做法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又搬了出來。這個策略是康生的發明而得到毛的批准呢，還是毛的創造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駐在延安的共產國際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描寫當時的氣氛說：「延安的形勢令人沮

喪。最近的事態發展，使人們不敢與朋友往來，避免在公事以外進行接觸，彼此之間互不信任。人們露出緊張和恐懼的神情。人們都無意維護真理和保護被誣陷的同志，也無意聽取對這個或那個問題的解釋。人人都為保命而鬥爭。不用說，好多壞蛋倒玩弄『忠於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六五頁）「人們不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講話和文章。」（同上書，一六六頁）在這種氣氛中，個人崇拜萌芽了。

中央派出負責幹部到各根據地，推廣延安審幹經驗。舒同奉命到山東，推廣延安中央黨校經驗，遇到了羅榮桓的抵制。羅榮桓明確提出，發揚民主、檢查領導的目的，是改進領導，而不是暴露特務，挖出敵人。

按照延安的經驗，要抓大的特務。而且發揚民主、檢查領導、暴露敵人還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要暴露提意見的人，就是所謂放毒的人，要審查他；不僅如此，還要查那些被檢查的人，看他是不是敵人。凡是坐過牢、辦過出獄手續的人，都在審查之列。（王力《現場歷史》，一二四頁）

據說羅榮桓向毛提了意見。

這種做法後來繼續不下去了。八月十五日，中央發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批評了「逼、供、信」的做法，明確指出：審幹不稱為肅反，闡明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的方針。這個決定發得遲了一些，而且對糾正錯誤是不徹底的（第一句話就是「特務之多，原不足怪」）但多少是吸收了過去錯殺人的教訓。

搶救運動的剎車，應當歸功於周恩來。據溫濟澤回憶，從七月康生做報告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他所在的《解放日報》的副刊部由於主任艾思奇和他沒有搞逼供信，受到了打擊。他正以為要持續受到圍攻時，沒有再開會了。「過了幾天，學委的一位同志找我談話，對我說，周副主席從重慶回來了，他認為延安不可能有那麼多特務，這是搶救運動搞出的偏差。」（溫濟澤《征鴻片羽集》，四二六—四二七頁）據說，周恩來看到延安的審幹情況大為震驚。「他非常了解大後方和大後方黨組織的情況，認為國民黨特務機關不能派這麼多特務到延安。他親自為一些受冤屈的同志寫了證明，並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了意見。中央決定立即停止『搶救運動』，對搞錯的同志立即進行甄別平反。」（同上書，七七七頁）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聽取康生的報告。會議認為，對於搶救運動以來的反特鬥爭，可從兩方面看。

好的方面是：

- （一）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務分子；
- （二）發現與培養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幹部；

- （三）打破了官僚主義，提高了工作效能；
- （四）暴露了許多人的錯誤（如貪污、腐化等）；
- （五）深入地進行了階級教育等。

陰暗方面是：

- （一）誇大了特務組織，甚至弄成特務如麻；
- （二）某些部門或某些地方，產生了群眾恐慌的現象；
- （三）有些部門被特務分子利用，進行破壞；
- （四）相當普遍地發生了懷疑新知識分子的現象；
- （五）忽略了統一戰線，許多幹部對統一戰線的觀念下降。

會議決定，審幹轉入甄別階段。這個階段從一九四四年底開始，到一九四五年春結束。

這次會議雖然把成績和缺點各列了五條，但重點還是在成績方面，而這些所謂的成績是很難成立的。當時所謂真正清查出來的特務分子，後來經過甄別，絕大部分都被平反。肅反的方法本身是錯誤的，是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那麼這種做法培養出來的幹部是什麼樣的幹部呢？怎麼能真正克服官僚主義呢？又給群眾什麼樣的教育呢？

在這次會上，任弼時為知識分子講了一些話。他批評了一種「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識分

子是特務分子」的說法。他說：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餘人（其中初中以上的約佔百分之七十，初中以下的佔百分之三十）。截至一九四三年，國民黨中的學生黨員約三萬人。國民黨絕不會把三萬學生都送到延安來當特務。何況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多數是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來的，那時是抗戰初期，戰爭混亂，國民黨不可能有計劃地派大批特務來延安。

任弼時的這個論據很有說服力。他說關於國民黨中學生黨員的數字是周恩來告訴他的，看來他們兩人議論過這個問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許多是經過長江局介紹的。長江局在一九三七年底成立後，動員了大批青年參加抗日鬥爭，並向延安輸送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對這一批人的懷疑無疑令周恩來不安。毛發動審幹，重點是在國民黨區域來的知識分子，這有沒有暗中針對周恩來的意思呢？

從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四年初，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的「特務」多達一萬五千多人，有的單位清理出的「特務」多達一半以上，如總人數為三百九十人的西北公學清出了二百零八人。

三十多年以後，一位軍統人員回憶派遣特務打入陝甘寧邊區的情況說：軍統確實是想打入共產黨內部來進行破壞，但「費盡心機，終不得逞」。作者敘述了幾次派遣特務的情況，都以失敗告終。「我在西安三年之中，從來沒有放鬆過這麼一個妄想：無論如何必須

在陝甘寧邊區範圍內，建立潛伏特務組織。我覺得從正面派特務打進邊區的可能性極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販做工具，試圖打入邊區的辦法，……試搞了幾次，都因為根本無法進到邊區去，而邊區的商人更是堅定的跟着共產黨走，不可能上特務的圈套，累試都失敗了。」（張巖佛《抗戰前後軍統特務在西北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四輯，一〇四頁）

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的二把手唐縱在《唐縱日記》中記述（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李銳《關於防『左』的感想和意見》，見《炎黃春秋》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

整風運動：總結階段（一九四五年春——一九四五年夏）

一九四四年四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上做報告，說「一年的反奸鬥爭，我們收到了偉大的成績」。但有的地方因「經驗不足」，也產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但這些缺點和錯誤，是在進步中產生的，是在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出現的過火行爲。

一九四四年五月，毛到中央黨校做報告，說：在整風審幹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點氣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經進行了甄別。現在摘下帽子，賠個不是。我舉起手，向大家敬個禮。一九四五年二月，毛又在中央黨校大會上說：這兩年運動有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

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

儘管毛明確地說，他應該負責，因為是他在發號施令，可是一些黨史書籍仍然只說康生的責任，而強調毛提出的肅反中的正確路線和他如何反對「逼、供、信」；似乎毛是沒有錯誤的，問題只在康生沒有照毛的指示辦。同時一些文章還強調毛如何賠禮道歉。

胡喬木說：「毛主席這樣誠懇地承擔責任的態度非常感人。許多受過冤屈的同志最初氣很大，經過毛主席這樣多次地賠禮道歉，不僅氣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對運動中的事大家不再計較了，同志間的團結增強了，心情重新舒暢了。」

然而，實際情況並不像胡喬木說的那樣簡單。

甄別工作到「七大」前基本結束，不過還有不少尾巴。王實味就沒有平反，並在後來行軍途中被處決。毛澤東後來說，王實味的被殺中央不知道。但被殺的不止王實味一個，例如還有一個很好的革命青年藺義。

當時有一個動腦筋獨立思考的人，這就是在「民委」工作的蔣南翔。

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寫了一篇萬言書，表示不同意中央的結論。他在信中提出了不少一針見血的意見。他痛心指出：「這是一個根本失敗了的工作，絕對（我敢於說是絕對！）不能自欺欺人地說是成績多於缺點。」他說：「當時提出的任務是要在十天半個月的短時間內解決問題，在這種短促突擊之下的鬥爭方式和工作態度，客觀上也就不可能不

魯莽、不草率。如不氣勢洶洶地威逼鎮壓，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搶救高潮中顯得落後，而且會被認為是反特鬥爭消極怠工，是對特務沒有『義憤』，是大有問題……」

蔣南翔批評了這種說法：搶救運動是成功的，我們獲得了很寶貴的經驗，這種經驗是有歷史意義甚至是有世界意義的。蔣說，從一個運動獲得經驗是一件事，而這個運動是否成功，是另一件事。我們可以說從大革命和立三路線獲得了寶貴的經驗，但不能不說這兩者是失敗了。他還批評了搶救運動中的「群眾路線」，說「這不是正確的啓發了群眾的警覺性，而只是無限制地發揚了群眾的盲目性」。反奸鬥爭是複雜的，要有專門知識的人員才能掌握。一般群眾固然也能起作用，但若給與的任務超過了他們所能勝任的程度，那就反而會把事情弄壞：

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承認：那種叫囂鼓噪的空氣，那種如醉如狂的情緒，那種毛手毛腳頭髮鬍子一把抓的鬥爭方式，實在無法使我們能夠清醒和客觀地進行考查和識別內奸的工作。所謂依靠群眾的力量，事實上是成了依靠群眾的喉嚨，依靠群眾的拳頭，依靠群眾聲勢洶洶的態度，依靠群眾來做打氣加油的拉拉隊！所有這些，和收集真實材料、判斷客觀情況，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

這裏蔣實際上批評了毛澤東所提倡的「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肅反方法。信中還批評

了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

「一二·九」運動和抗戰以後，大批知識分子湧進了黨內；屈指計算，已將十載。在這將近十年的時期中，他們在黨內到底搞了些什麼名堂，起了些什麼作用，這筆歷史的賬，是容易考查清楚的。

蔣提到一九三九年《中央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這個決定是毛澤東起草的，其中批評了恐懼和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說許多學校不敢大量招收青年學生，許多黨部不願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說這個決定的精神至今未被全黨接受；在這次搶救運動中，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搶救運動中大多數新知識分子被懷疑。「我們竟不相信馬列主義比三民主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許多知識分子已在黨內受了好幾年教育，作了好幾年工作，我們仍還相信他們堅決擁護三民主義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沒有接觸過其他別的思想學說的工農同志，才是保險和可靠的同志。」以隴東為例，那裏因為國民黨於一九三五年起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就把這一年以後到邊區的知識分子全部當做有問題的！

其實，難道信三民主義就是大逆不道嗎？就要當敵人看待嗎？中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發表的宣言中，還聲明「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呢！（《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四九頁）

蔣繼續說，負責審查知識分子的大多是工農幹部，這些工農幹部的社會經歷和生活道路和知識分子是很不相同的，他們不了解知識分子，因此在他們眼中，知識分子的歷史有許多不能解釋。加上有些工農幹部對知識分子有一種宗派主義情緒，於是知識分子就更被認為有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被審查者差不多沒有發言權。「並不是絕對不讓他們說，而是說了也根本聽不進。」

蔣南翔說的這種情況，看來是毛澤東的故意安排。毛要發泄他對知識分子的怒氣，就用工農來壓知識分子。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整風初期，王震對中央研究院的牆報十分不滿意，毛澤東就要他擔任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王震再三表示幹不了。毛說：「就是要你擔負這個工作，要你這個文化不高的人同文化人打交道。」（戴晴《梁漱溟 王實味 儲安平》，七八頁）這和「文革」期間毛派「工宣隊」進駐和領導學校和機關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

蔣南翔把這種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稱之為教條主義思想方法的反映，因為教條上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動搖的階層。蔣在這裏又一次含蓄地批評了毛澤東，因為毛在一九三九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就是這樣說的。

蔣南翔的信說，他願鄭重地向黨反映：這次運動在知識分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濃厚的陰影。雖然經過甄別工作，但他們精神上的創傷至今沒有完全平復，有很多人流露出灰暗

的心情，甚至消沉失望。

蔣南翔最後痛心地说，他認為搶救運動雖有成績，但實際是「得不償失」的。無論是過去的歷次肅反運動還是這次的搶救運動，我們都應得到這樣的教訓：「在我們的統治下，我們真正受到特務破壞的損害恐怕倒是比較少，受到肅反運動的損害恐怕倒反要大得多。」蔣南翔建議今後廢止這種「普遍肅反」的方式。他希望中央能夠根據各方面的特別是下層的實際情況，正式對搶救運動做出詳細的全面的總結，接受此次從痛苦中得來的經驗教訓。（蔣南翔的信見文聿《中國「左」禍》第五章，朝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我所以用這樣多的篇幅引用這封信，是因為我覺得它說得十分中肯，十分透徹。對於一些共產黨常用的辯護，也作了有力的批駁。這封信表明，當時並不是不能認識到問題所在的，並不是不可能徹底糾正的。然而這封信指出的問題，並沒有受到重視。為什麼蔣南翔能看到的問題，毛澤東就看不到呢？為什麼他對這封信不予重視呢？我們可以說毛澤東對搶救運動中出現的錯誤沒有蔣南翔那樣痛心疾首，因而也沒有想得那樣多；我們也可以說毛澤東作為搶救運動的領導人，對運動中出現的錯誤負有責任，因而在承認錯誤方面不願意做得那麼徹底。開「七大」的日子臨近了，毛需要的是宣揚自己的正確：他如何克服了黨內的教條主義，如何糾正了左傾路線，如何否定了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中共如何由於有了他的領導而從此走向光明。至於他自己的失敗紀錄就迴避了。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他還在一次講話中以肯定的口氣說：「我們又在去年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審查幹部和反對特務的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四三—九四四頁）

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爲是毛澤東內心中覺得這種錯誤的做法可以爲他利用。他雖然必須公開地譴責這種方法，以表示這種方法和他沒有關係，但他並不願意斷然地永遠地加以拋棄。因此，信中批評過的許多做法，後來甚至變本加厲，一直發展到「文革」。

我們拿延安整風和審幹的一些做法和建國後的多次政治運動做比較，就會發現驚人的相似。這裏有一個行爲模式：

（一）開始階段，是中央表示要整風，要反對左的教條主義，要改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或作風上的某些缺點，號召大家大膽提批評意見，充分發揚民主。

（二）大家紛紛展開批評，其中有些不中聽的意見觸惱了領導人，但不急於反駁，一面觀察形勢，讓對方充分暴露，一面尋找機會，準備反擊。

（三）突然來一個急轉彎，聲稱整風受到了干擾，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進攻，或者是敵人利用這個機會來破壞，是非問題變成了敵我問題，反教條主義變成了反自由主義或修正主義，糾左變爲反右，要抓右派或潛伏的敵人。

就這樣，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轉入了審幹，一九五七年的整風轉爲反右派，一九五

九年廬山會議由糾左轉爲批右傾。一九六二年初有「七千人大會」，號召發揚民主，開展批評；當時似乎沒有什麼，但我們把這次大會和四年以後的「文革」聯繫起來看，許多事情就明白了。在「文革」期間的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風轉爲批孔；一九七六年對「四人幫」的批評轉爲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在鄧小平時代，還有從一九七六年底的思想解放運動變爲一九七九年春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一九八三年十月的整黨變爲「清污」，以及一九八九年的改革開放變爲「六四」的鎮壓。

此外，要王震這樣的老粗來領導知識分子，這和一九五七年毛說的「外行領導內行」，「文革」中的讓工宣隊領導學校，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是一樣的。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做法是：一定要受批評者認錯。本來，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事。有些事需要做出決定，我們也只能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或下級服從上級，這個服從是行動上的服從，並不意味着改變自己的看法。這個少數或下級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的。真理不一定在多數人手裏，也不一定在上級手裏，有時少數或下級可能是對的。因此，少數人或下級保留自己的意見就很重要，他們還可以在將來有發言的機會，重申自己的意見。也許經過實踐的檢驗證明他們是對的，這樣少數人的意見就可以變爲多數人的意見，下級的意見就可以變爲上級的意見。一定要受批評者認錯，就是不許被批評者保留自己的意見，

就是取消了他們將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而且，思想是不能用強迫的辦法改變的。那種施加壓力迫使人們做檢討的辦法並不能使人心悅誠服。

中共「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的歷史經驗，主要是從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期間的經驗，着重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錯誤。雖然王明的後台是斯大林，但《決議》不但沒有批評斯大林，還引證了他的正確的話，表示了對他的權威的尊重。《決議》高度讚揚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指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北京，九七一頁）「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的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同上書，九五八頁）其次，也高度評價了劉少奇，說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決議》在批判教條主義之後也批判了經驗主義，說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經驗主義是「同它合作並成爲它的助手」的。（同上書，九八九頁）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

會，是在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於王明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的，這個會議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其兩項綱領就是反對所謂黨內的主要「右」傾危險和向全國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同上書，九六五—九六七頁）有一些人滿足於局部經驗，輕視理論，「並醉心於狹隘的無原則的所謂實際主義和無頭腦無前途的事務主義，卻坐在指揮台上，盲目地稱英雄，擺老資格，不肯傾聽同志們的批評和發展自我批評，這樣，他們就成為經驗主義者了。」（同上書，九八九頁）

雖然因為經驗主義者的經驗是局部的、狹隘的，他們中的多數對於全面性的問題往往缺乏獨立的明確的完整的意見，因此，他們在和教條主義者相結合時，一般地是作為後者的附庸而出現；但是黨的歷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後，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同上書，九九〇頁）

《決議》最後說到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但是它又補充說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其中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殘餘還是存在着，尤其是對於經驗主義還缺乏足夠的批判」，所以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繼續克服錯誤思想的鬥爭過程」。（同上書，九九七—九九八頁）

57.09.00

「七大通過了新黨章，這個黨章的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傑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

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是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在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廣。這是特別值得感謝的。

當着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着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後退。

最後這個命題後來被無數次重複，似乎成了中國革命的一條定理。

七大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開始。

但是在七大上，毛反覆告誡要謹慎謙虛。他自己也確實是比較謹慎謙虛的。他兩次講到了一九四一年邊區的一件事：那年天上打雷，打死了一個縣長。有人說，爲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毛澤東聽見後就做了調查，發現原因在於老百姓負擔太重。那一年邊區要徵收二十萬擔公糧，還要運輸公鹽六萬馱，群眾怨聲載道。毛說：「爲什麼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二一一頁）毛說他在弄清原因之後，就研究了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減輕了群眾的負擔。毛說：「要經常存一個心，就是總怕對不起地方，如果我們出了錯誤，就允許地方同志批評我們，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說雷公爲什麼不打死我，我不怪說這個話的人，而怪我們自己徵收了二十萬擔公糧，因此我們是有責任的。」（同上書，二一三頁）

然而毛澤東對王實味卻沒有這種寬容的態度，儘管他也承認王實味的批評是由於物資貧乏。他說，爲什麼出了《野百合花》呢？「就是因爲我們缺少吃的東西，營養不夠打瞌睡，缺少維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資本。」（同上書，二一三頁）「我說我們要答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要從物資上來答覆，用發展經濟、豐衣足食來答覆他。」（同上書，二一三頁）王實味當然被認爲是托派，不過在決定整他的時候，並不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是

因為他寫了《野百合花》。王實味得到的答覆並不是物資上的，而是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折磨。

那些犯過路線錯誤的高級領導人也比知識分子的王實味幸運。毛動員大家選舉犯過錯誤的同志進中央委員會。他說：「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並且決心改正錯誤，我們還可以選他。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黨在原則上是不含糊的，與資產階級不同，我們必須有『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錯誤』的這樣一條原則，在這個原則下去選他。」（同上書，一六四頁）之所以要這樣做，一個原因是錯誤是人人都難以避免的，他毛澤東也有錯誤。毛說：「過去中央委員會裏頭，有的人錯誤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錯誤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聲明一下，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沒有犯過錯誤的人有沒有呢？我說就沒有。」「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同上書，一六四頁）「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政治各方面，或在黨務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許多錯誤。這些東西都沒有寫上去，不寫並不是否定它。」（同上書，一四頁）對於「萬歲」的口號，毛沒有斷然禁止，只是詼諧的說，「人家喊萬歲，我說我五十二歲。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有什麼萬歲，但總是引出一個任務來，即還要前進，要再長大一點。」（同上書，一四頁）他還露了一句：「人世間的事總是不完全的。兒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孫子比兒子完全一些，後來居上。」（同上書，一五頁）

毛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恐怕想的是斯大林。後來，在他發動大躍進的時候，這個主題不斷重複出現在他的講話中。

在給七大作結論的時候，毛澤東在「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中講了幾個問題。他講到「幹部關係問題」時列舉了老幹部與新幹部，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問題，但是他沒有單獨談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他還專門談了「整風、審幹、鋤奸問題」，現在把這一部分全文照錄如下：

這次整風、審幹、鋤奸工作是有成績的。有沒有缺點錯誤？有。我是黨校校長，整風在黨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績相當大，但也有缺點與錯誤；第二部搞得比較好，進步了。以後整風要照第二部的辦法，照這種進步的辦法去辦。

審幹中搞錯了許多人，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裏很難過，我們也很難過。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我們是與天下人共歡樂的。對搞錯的同志，應該向他們賠不是，首先我在這個大會上向他們賠不是。……為什麼搞錯了？應該是少而精，因為特務本來是少少的，方法應該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們搞的卻是多而粗，錯誤就是在這個地方。當着潮流起來的時候，沒有例外地覺得特務相當的多，進入甄別階段以後又覺得很少。還有，被認為是特務的多數不是特務。對這個問題，過去不大了解，審幹以後才知道的。所以關於特務，

從前的估計是「瞎子摸魚」，究竟有多少並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只是極少數。

多年來，我們就搞過這項工作，比如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上，規定有一條叫「廢止肉刑」。從理論上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就主張廢止肉刑，那末我們無產階級共產黨就更應該廢止肉刑，封建主義才採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這個決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就打AB團，我們講不要搞肉刑，結果還是搞了。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殺錯了。後來我們作了總結，重申廢止肉刑，不要輕信口供。因為不廢止肉刑，輕信口供，就要出亂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壞了。

內戰時期，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當然我們不應該從根本上否定反對反革命，反對反革命是應該的。但是，在當着共產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肅反問題上搞錯了很多人，走過這樣一段彎路，包括我自己也在內。抗戰時期，出了湖西肅反的錯誤，在延安又來了這樣一個「搶救運動」。我看，延安犯的這個錯誤非同小可，因為延安是有全國影響的。犯了錯誤，也有好的方面，我現在就講這個好的方面。在肅反問題上前前後後都犯過錯誤，打仗也打過許多敗仗，這樣的政策、那樣的政策，也碰過許多釘子。

凡是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取得了經驗，就會變成好武器。這個犯錯誤的經驗，抓到我們手裏來，同樣也非同小可。中央在這裏，黨校在這裏，七大在這裏開，這個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就勝利了。所以犯了錯誤不可怕，要把錯誤抓到手裏，變作經驗，當作武器。對搞錯了的同志，要向他們賠不是。

現在還有沒有宗派主義呢？我聽見有一個同志說：沒有宗派主義了。這個問題應該如何看？我認為，主觀上不要忙於否認有宗派主義，有沒有宗派主義，要以客觀事實來證明，要在將來工作中來證明，主觀上否認，效果很小，不能解決問題。有人要求在黨章上加一條：「保障黨員的政治生命。」同志們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它反映了在審查幹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們一定要引以為戒，把這一條當作教訓，當作武器，這樣就有用處。

在審幹中間，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九條方針並不是一開始就發明出來的，而是經過幾個月情況的反映，逐漸積累才搞出來的。廢止肉刑，不輕信口供，再加上九條方針，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亂子就出不來了。但是這幾條方針沒有完全貫徹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們還要警戒自由主義的危險，嚴肅性是必要的。在這次審幹中有很大的成績，不說清楚這一條，是不好的。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

基》那本書上說：被推翻了的階級，一定要報復，搞復辟。這件事，將來會要證明的。過去我們沒有經過那種危險，如果注意這一條，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義，危險就可能減少。不然，將來要吃大虧的。我們黨內有兩種情緒：一種是過火的情緒，潮流一來，就是急急忙忙的搞，搞逼、供、信，結果搞錯了；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熟視無睹，這種情緒也是不對的，要克服的。（同上書，二一五—二一七頁）

不管工作搞得怎樣糟，首先總要講成績，唯恐人家忽視，這在毛是一貫的。不但有成績，而且「有很大的成績」。最後落腳點是兩條：既要反對過火，又要反對自由主義。這樣一來，要充分地徹底地批評錯誤的人就不能沒有顧慮了：錯誤講多了，會不會否定了成績？會不會陷入自由主義的錯誤？

毛說到了「宗派主義」，好像是說在這個運動中有歧視知識分子的現象，可是他說得很含糊，正像他在談幹部關係時避免談到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一樣。

毛用「有沒有缺點錯誤？有。」這樣的口氣來提缺點錯誤，似乎這還是一個需要他來回答的問題。那麼這是誰的錯誤呢？毛只說他是黨校校長，沒有說他是整風學習委員會主任，這樣他好像只對黨校的整風運動負責，而黨校有兩個部：一個部「成績相當大」，雖然「也有缺點錯誤」；另一個部「比較好，進步了」，那就是比「成績相當大」的前一

個部的成績還要大。至於這個第二部是不是「也有缺點錯誤」，沒有說，但總之是「進步了」，而且作爲以後整風的榜樣。這樣一來，毛的成績也是主要的了。

所謂湖西肅反的錯誤，指的是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間，在微山湖以西江蘇、山東、河南三省交界地區（蘇魯豫邊區）開展肅清「托派」的鬥爭。許多黨、政、軍幹部被誣爲「托派分子」而受逮捕審查，有的被殺。整個邊區的黨組織一度陷於癱瘓，損失極大。這個錯案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經過中共中央和中央山東分局多次處理，但直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才徹底平反。（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二六七頁注「一三六」）可見，雖然毛都承認搞錯了，但毛在世時這個冤案並沒有得到徹底糾正。爲什麼？原因不難知道，徹底糾正不就意味着否定成績了嗎？

毛並沒有真正接受教訓。一九五七年，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到肅反問題時說：「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線是群眾肅反的路線。採取了群眾路線，工作中當然也會發生毛病，但是毛病會比較少一些，錯誤會比較容易糾正些。群眾在鬥爭中得到了經驗。做得正確，得了做得正確的經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七七頁）

毛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承認中共過去也混淆過兩類矛盾，但是他強調說：「我們的錯誤沒有擴大化，是由於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敵我，錯了就

要平反。」（《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七二頁）照這個說法，只要規定了「分清敵我」，就不會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了，可見分清兩類矛盾的方法是有效的。毛沒有提到他在一九五五年做出決定，把胡風一伙作家打成「反革命集團」的事。胡風是先由毛澤東定為「反革命」，然後由法院判刑的。這不是什麼擴大化，它完全是一樁冤案。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是凌駕在法律之上的。當然，毛澤東更不會提到三十年代中共在蘇區肅反時駭人聽聞的屠殺，包括他自己在贛西南搞肅清A B團運動中冤殺一大批軍隊和地方的革命幹部的嚴重事件，還有四十年代延安審幹期間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這兩個錯誤，毛澤東是承認過的，現在他卻賴帳了。

現在毛是躊躇滿志，等待着戰爭的勝利，進而統治全中國了。他的腦子裏在想什麼呢？女作家丁玲在晚年有一個回憶，雖然是小事，卻說明了大問題：

在延安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住處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裏，他都用毛筆抄寫自己的詩詞，或是他喜歡的別人的詩詞。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反正是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

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個我可不敢！要是賀子珍大姐知道了，她準會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他懷裏正抱着一個男孩。我們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對我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了。這首詞，在反右派鬥爭之前，我還記得它的主題要句子。這麼多年了，我老了，經過那麼多的折騰，現在我是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楊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黃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四三頁）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

（關於本章，參見作者的《整風壓倒啓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總第七十五期，二〇〇一年冬季號，普林斯頓，一一九—一四九頁）

第三章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肅反

——文革做法的歷史淵源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黨內的革命急性病加強了，加上共產國際的影響，產生了第一次「左」傾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羅明納茲提出了「左」的「不斷革命論」，方針是全國總暴動。羅明納茲還制定了一個《政治紀律決議案》，其中批評南昌起義的錯誤包括：軍隊所到之處，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採取屠殺並摧毀其一切政治社會組織完全沒收其武裝的策略，及沿用了「不擾民」的觀念，槍斃了趁機搶劫的貧民。因此，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及其負責人周恩來受到警告處分。同樣，秋收起義受到指責的原因也有一項是：在工農軍所經區域沒有執行屠殺土豪劣紳的策略。加上其他「錯誤」，毛澤東受到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其他秋收起義領導人也受到嚴重處分。

六大雖有一些嚴重錯誤，未能從根本上糾正「左」的錯誤，但基本上還是正確的。「六大以後的兩年，是中國革命從遭受嚴重挫折到走向復興的關鍵時期。在這期間，中共中央的工作實際上主要是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工作雖有某些失誤，但整個說來，是很有成績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二四七頁）

但這時，一九二九年四月，共產國際的寵兒，年方二十五歲的王明回國了；其他一些教條主義者也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間陸續從蘇聯回來。

這是一個充滿危機和矛盾的緊張時期。蘇聯把托洛茨基驅逐出境，粉碎了布哈林「右派投降主義反黨集團」，並從限制富農進而消滅富農。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空前巨大的經濟危機。在國內，蔣介石和軍閥捲入了大混戰。這好像是革命的大好時機來到了，於是，「左」的思潮迅速氾濫。

從一九二九年六月起，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一連串加緊階級鬥爭的指示。*

*一九二九年，共產國際先後四次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信和決議案，「第一封信的內容是反右傾，第二封信的內容是反對聯合富農，第三封信的內容是赤色工會公開，第四封信的內容是反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和第三種力量。這四封信，對立三路線都有影響。第四封信就號召中國搞政治罷工，準備革命，說直接革命形勢快到了。」（《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北京，三〇八頁）這些信中提出的有些「左」的主張，甚至改變了中共六大的正確論斷。

六月七日，《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指示中共要把富農作為反革命對待。七月，《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當前任務提綱》強調右傾是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危險，並把中立富農的政策改為反對富農的政策。這種對暗藏反革命的誇大渲染的估計，同蘇聯的做法如出一轍；而且，把富農看做是最危險的敵人，也明顯地受到斯大林的影響。在二十年代末，聯共在農村的主要打擊對象是富農，到一九二九年底又轉入消滅富農。雖然中共六大有中立富農的政策，但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干擾。當年，中共中央作出《接受國際對於農民問題之指示的決議》，承認過去在富農問題上犯了「錯誤」，要求全黨堅決地「反對富農」。

十月二十六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一封信，提出國民黨「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等人）和它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中派，是一個反革命集團。「必須立即展開一個最堅決的、盡可能有更多群眾參加的運動，以消除『改組派』的一切影響，揭露它們的反革命本質。」（《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北京，八六頁）「黨應當把自己隊伍中的那些隱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主義分子清洗掉。但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心理和傾向，這種心理和傾向會削弱對『改組派』的鬥爭……」（同上書，八八頁）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要求中國黨「清黨」「肅反」的指

示，發出了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嚴厲批評省委對A B團「沒有引起嚴重的注意」，「說明工作的落後」，必須立即行動起來，進行對A B團、改組派、第三黨的鬥爭。

從一九三〇年五月開始，贛西南蘇區開展了一場整肅A B團的運動。

A B團是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右派的地區性反共組織，A B即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這個組織於一九二六年底在南昌成立，一九二七年在中共黨組織領導的「四二暴動」中被摧毀，骨幹分子三十餘人被捕，其他人作鳥獸散，從此解體，壽命僅三個月。因此，這個組織影響並不大。如果說它的名氣變得那麼大，那是共產黨做反宣傳的結果。在整肅A B團的運動開始時，大家都弄不清A B團為何物，但中央既如此重視，當然是勢力很大的。A B團被說成是一個南京有總部，各地有分部，並已打入共產黨內部的龐大的特務組織。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估計，也有一些客觀原因。當時江西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激烈，國民黨江西黨務指導委員會與改組派相互鬥爭，後者攻擊前者為「A B團」，於是共產黨也誤把公開的黨務指導委員會混為秘密的反共組織A B團。另一方面，又把A B團的殘餘分子和A B團組織不加區別。（參看武國有《論肅「A B團」誤區的形成》，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新華文摘》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最初那些所謂的A B團分子，是在反地主富農鬥爭中查出的，於是反地主富農鬥爭就

發展為反A B團的鬥爭。首先倒霉的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農的幹部。進一步就把那些作風不好的、工作消極的、有牢騷怪話的、有不同意見的，全都當做A B團來對待，而且採用嚴刑拷打的方法去逼供。這並不是下級幹部的胡作非為，而是有上層領導的指示的。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A B團也可以打出A B團，而且要多少有多少。不久，中共贛西南特委就發出一份緊急通告，披露了最近破獲A B團的經過，說：有一個叫朱家浩的發行科幹部，「因工作消極，言論行為表現不好，引起許多同志發生懷疑」。同時因有被捕的所謂A B團分子供告，於是把朱家浩抓起來審訊。「在初堅決不肯承認，我們採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根據朱家浩提供的線索，抓了一批，又審訊出一個所謂A B團的龐大網絡。「贛西南的A B團已成立了臨時總部，各路設有辦事處，興國、泰和、永豐、吉安、吉水……各縣都有縣團部的組織，尤其打入了各革命團體裏去，黨團兩特委及西南政府，各赤色郵局，各群眾團體，都發展了他們的組織。」這真是驚心動魄！

贛西南特委在這個通告介紹經驗說：「A 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五七頁）通告不僅把那些「猶疑不決，思想右傾的落後分子」，而且把「在工作上表現很積極，說話表示極『左』傾，態度表示很忠實，誠懇的」人，都當做A B團的「可疑分子」，這簡直荒唐到不能置信！

於是，贛西南蘇區各地就緊急行動起來，不到一個月，就殺了六人，捉了六十七人。
（《蘇區》，一七〇頁）

江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毫無掩飾地說：「所有A 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並沒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證，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還有「所謂軟硬兼施辦法，軟要誠懇，硬要莊嚴。所謂誠懇者，就是用言語編（騙）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方法，通常捆着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中國「左」禍》，五七頁）當然，單是承認自己是A B團是遠遠不夠的，還要供出組織關係。審問對象被逼得無可奈何，只好亂咬一氣。於是又根據這個口供去捕捉新的無辜者。這樣，弄得到處都是A B團，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對A B團的整肅

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紅一軍團攻克吉安。在清查敵人檔案文件時，發現了幾年前A B團的團旗和引章。有人還誤傳發現一張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的父親寫給地主豪紳的收條。此事報告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引起當時是總前委書記的毛澤東的警惕；加上贛西南特委有關A B團的所謂組織網絡的報告，毛澤東感到震動。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寫信給中央，對贛西南黨的情況做出了令人吃驚的判斷：「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

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 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 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三一—九頁）

毛澤東爲什麼會作出這樣的結論？一個背景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三〇年初，贛西南黨組織的領導人和紅一方面軍在土地革命問題上產生了一系列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前者主張以勞動力爲標準，毛則主張以人口爲標準；二是前者主張不忙於建立蘇維埃政權，因爲時機不成熟，而毛認爲這是鬥爭的需要和群眾的要求，草率一點也不要緊。毛把這些正常的分歧看得很嚴重，認爲：「贛西有些地方割據了兩三年才遲遲建立政權，土地亦剛剛分配，是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武國有《論肅「A B團」誤區的形成》，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六期）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新余縣羅坊，主持召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二十六日，會議通過決議，強調必須「改造全部黨的組織和團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有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 B團）留在黨內團內，因爲現在贛西南的黨內團內充滿着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緣故。」「嚴厲地鎮壓A

B團，處決A B團中的一切活動分子。」（文聿《中國「左」禍》，五六頁）於是，一場清查和鎮壓A B團的活動即全面展開。

十一月，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在寧都黃陂被捕（後被殺害）。他曾經帶頭抓過A B團，現在輪到他自己了。誰做出的決定呢？當時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全面領導軍隊和地方工作，像李文林這樣的重要人物，沒有毛澤東的命令是不會抓起來的。可是一般有關黨史書籍都避諱這一點，只有《蘇區》一書做了兩點暗示，說：在聽到紅一軍團的報告後，「總前委即懷疑李文林與A B團有瓜葛，可能是A B團首領」；又說，在羅坊會議上，李文林極力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作戰方針，主張「進攻南昌、九江，會師武漢」的左傾方針，「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注意」。（《蘇區》，一七〇—一七一頁）

與此同時，整肅A B團的運動也在紅一方面軍展開。當時，蔣介石正調集十萬重兵向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情況火急。毛澤東、朱德全力準備迎戰，就將肅反大權下放，抓人由團決定，殺人由師黨委定。越是強敵壓境，越要肅清內奸，這似乎不錯。

肅反的戰果是「輝煌」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紅一方面軍四萬多人中就殺了幾十個團長，打出四千四百多A B團分子。在戰場上，如果國民黨消滅了這麼多紅軍，那就是打了一個大勝仗了。特別是，在這樣短的時間裏犧牲幾十個團長的事，還不曾發生過。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事，共產黨幫助它做到了。

有的老同志回憶當年情況說，黃陂河灘上，屍橫遍地，河水都染紅了。（《蘇區》，一七二頁）這就是「黃陂肅反」。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毛澤東根據被捕的所謂A B團分子的虛假口供，確定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內存在一個A B團總部，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為首要分子，即派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前往富田（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駐地）領導肅反。《贛西南的（綜合）報告》（？）作了這樣駭人聽聞的判斷：「過去江西省行委及以前贛西南特委，充滿了A B團分子，如段良弼是A B團團部部長，叢允中、李白芳、彭坤元、賀可展是A B團委員，東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在立三路線時代的）大部分以至全部負責人都是A B團，縣區委支部都充塞着許多A B團（這些都是有具體事實）。這些分子有十分之九是地主富農出身。」在總前委給省行委的信上說：「黨內地主富農分子現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還是異常嚴重，必須運用敏捷手段立即鎮壓下去。」「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還布置：「二十軍需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

紅二十軍的一些領導人是不滿意毛澤東的。

信的結尾還指示：「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 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起來訊辦。」（《蘇區》，一七四頁）

這真是最簡便的識別敵人的辦法：凡是不抓不殺反革命的，自己必定是反革命；不然，爲什麼不抓不殺？此令一出，誰敢不執行？你不殺人，就要殺你。至於那些所謂的「反革命」是不是真反革命，不抓不殺的人是有意包庇還是有不同看法，這些都是根本不考慮的。毛澤東在對真正的敵人進行階級估量時是能夠實事求是的，在整肅自己隊伍內部的問題時卻常常是左傾的。實際上，上述辦法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一直沿用下去，只是不一定「殺」罷了。例如在「反右派」運動中，一個單位內部如果打不出「右派」，或者打出的右派不夠數，那裏的領導人自己就可能變成「右派」。

那個被派下去的欽差大臣李韶九剛二十六歲，湖南人，行伍出身。他提升得很快，一九二八年時還不過是江西工農革命軍第三師的一個縱隊長，到一九三〇年十月就被調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十一月又成爲肅反委員會主任。他是剛剛提拔，身兼三職，正想有一個表現的機會。這個人過去曾和李文林關係不好。但他善於討好上峰，經常以「湖南老鄉」的身份出沒於毛澤東等總前委領導人帳下，很受青睞。蕭克和黃克誠都認爲這個人品質不好。（《蘇區》，一七七—一七八頁；《黃克誠自述》，八五頁）

李韶九帶了紅十二軍一個連，日夜兼程，於七日下午趕到富田。下車伊始，就驅兵包圍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等八人。當晚李韶九

親自刑訊逼供。

也就是在這一天，蔣介石到了南昌，召開軍事會議，布置用十萬軍隊消滅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方案。……

從七日晚到十一日晚，李韶九等肅反人員發狂似地、連續不斷捕捉、審訊，使用地雷、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五花八門的殘酷刑法（一九三〇年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五天之內，在省委省蘇兩機關內及政治保衛隊共破獲A B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十二月十日，「槍斃省委交通和技術書記十七人」。十一日又「槍決二十四人」，「其中省行委七人」。（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

富田事變

十二月九日，李韶九率領紅十二軍（屬毛澤東領導的紅一軍團）一個排，從富田來到紅二十軍軍部的駐地東固。此行的目的是實行總前委的密令「紅二十軍需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

二十軍一七四團政治委員劉敵，越想越覺得不對頭。他和幾個部下議論，都覺得李韶九這個人卑鄙，爲了救黨、救同志，決定實行「兵諫」。

十二月十二日（這個日子和後來張學良在西安發動兵諫的日子巧合，不過後果卻很不

相同)，劉敵發動所屬部隊把李韶九帶來的一排人繳了械，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等人。當天下午，劉敵和謝漢昌又帶兵衝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機關，釋放了所有被捕的人員近百名。劉敵等還通緝了逃走的李韶九等人。晚上，劉敵、謝漢昌、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在富田召開緊急會議，主張公開提出反對毛澤東的口號，決定去信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做解釋，還決定由二十軍一七二團的團長蕭大鵬出任軍長，代替腐化且積極幫助李韶九整肅A B團的原軍長劉鐵超。

次日，劉敵主持士兵和群眾大會，控訴李韶九的罪行。會上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第三國際」的口號。

接着，紅二十軍開到永陽，宣布成立合法的江西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書記。

叢允中在會上報告李韶九在富田抓人殺人的經過，並分析說，這件事的近因，是毛澤東企圖把江西的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以穩穩地做黨皇帝。遠因則是贛西南二中全會開除了劉士奇的黨籍，劉是毛的走狗，毛對此事懷恨在心。

會議的決議說：「建議總前委集中兵力馬上出擊敵人，消滅敵人；二十軍猛攻吉安；建議中央開除毛的黨籍，撤職查辦；曾三、陳正人、劉鐵超應有處置；派叢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變經過。」

十二月十七日，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聯名發布宣言，嚴厲譴責段良弼、劉敵、李白

芳、謝漢昌等人，稱富田事變爲「A B團取消派公開反革命的總爆發」，「他們企圖以『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來分裂革命勢力。」

十二月二十日，富田事變領導人以省行委名義發出了《致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的信》。其中說：「這一次肅清A B團的內幕，說來是痛心極了，你們要注意，總前委派來李韶九，唯一的目的是用極刑逼供。」「李韶九並且說，這次主張與敵人速打的是A B團，報告了敵情的是A B團，他們並且造出一個理論：『中農反水』，所以結論是中農是A B團，並且肯定贛西南的幹部知識分子多數是中農，所以大家都是A B團。同志們，你們相信嗎？」「據劉敵同志講，李韶九對他講了『這不是A B團問題，是政治問題。』劉敵同志敢於把我們幾十個忠實的同志放出來，我們就是從這裏認識了他的布爾什維克的英勇精神，就是因爲有了這樣的認識，你們真相信劉敵同志的行動是A B團陰謀嗎？那麼黨內的沉冤是無有表白之日了！」「省行委是根據中央正確指示去做的，尤其李文林、段良弼二同志是到過中央的，並且這次是極力主張與敵人速打的，因此就首先誣他們是A B團。叢允中、王懷、李天柱三同志給了前委一個意見，他們也被誣爲A B團！這是何等的毒計。同志們！你們爲什麼到現在還一點都不明白呢？痛心啊，我們真痛心！……」（《蘇區》，一八六一—一八七頁）

富田事變領導人對李韶九說的「政治問題」的理解，就是毛澤東要打擊異己勢力，抓

A B團不過是借口而已。這是蒙冤者的呼喊，是令人同情的。

然而這幫人爲了反對毛澤東，卻不擇手段地搞了一個「假信事件」。

富田事變領導人聲稱發現了毛澤東給古柏（毛澤東秘書）的密信，說，要在審訊A B團中，勒令招出朱、彭、黃等系的紅軍中的A B團主犯，以便捕殺。

據彭德懷在他的《自述》中回憶，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夜半。彭德懷收到這封信，很快就斷定是偽造。「這封假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允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志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北京，一六六頁）

彭德懷馬上起草了一個擁護毛澤東的宣言，並把這個宣言連同假信送給了總前委。彭德懷還召開緊急前委會議討論這件事。

會上，彭首先講話，說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動，偽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圖分裂一、三軍團。他努力爲毛澤東辯護，解釋毛的主張的正確性。「講了這些話以後，到會同志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通過了宣言：反對反革命的富田事變，打倒A B團；擁護總前委，擁護毛政委；一、三軍團團結一致粉碎國民黨進攻。通過這件事，提高了部隊的思想覺悟。」（《彭德懷自述》，一六六一—一六七頁）

當時彭德懷領導的第三軍團中許多人並不是對毛澤東那樣信任的，處理不好，一、三軍團的分裂是有可能的。彭德懷的敘述表明，如果沒有他這番話，紅三軍團的人的憤恨情緒還是對着毛澤東的。

但彭德懷仍然感到焦慮。他認為，這封信「看樣子不只送給我一個人，還可能送給朱德和黃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給了他們，這是一個最大的陰謀，處理稍一不慎，也可能產生一個最大的不幸！」（《彭德懷自述》，一六四頁）彭德懷自己很容易地識破了陰謀，爲什麼他會擔心別人上當呢？儘管朱彭黃已經聯名發表了譴責富田事變的公開信，彭德懷在這裏仍然流露出對其他兩人的某種程度的不放心。

同樣的假信確實給了朱德一份。至於朱的態度，彭只說了一句「他也把假信拿出來了」，沒有說更多的話（《彭德懷自述》，一六七頁）。李井泉的回憶說，朱德一看就不信，「於是，把這封信公開了。」（李井泉《第一次反「圍剿」前後的點滴回憶》，載《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南昌）這樣一件大事，單單是把假信公開，做得似乎不夠。可以看出，朱德的反應不像彭德懷那樣鮮明。

關於黃公略，有的書上記載：「在這個關鍵時刻，黃公略和朱德、彭德懷緊緊站在一起，並親自馳馬到六十里外的東三壩紅二軍團部了解情況，支持彭德懷反對分裂的正確主張。」（《蘇區》，二七〇頁）然而彭德懷在《自述》中說，當他正在會上講假信問題

時，「黃公略同志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鐘就走了。會後我問鄧萍同志，公略來幹嗎？鄧說，他沒說別的，只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彭德懷自述》，一六六頁）

這個話可以解釋為黃公略對彭德懷的贊許，但至少顯得不很熱烈，和朱彭黃的公開信中的強烈態度並不一致。黃公略應該收到同樣的信，因為這封信也是寫給他的。他趕了六十里路到紅二軍團部，顯然和假信事件有關。但有關史料都沒有提到黃公略收到此信的事，是他沒有講出來嗎？在趕到目的地以後，紅三軍團團部正在開會講假信的事。黃公略只是聽了十幾分鐘彭的講話，不等彭講完，他就不辭而別了，這似乎有點不正常。這麼一件大事，黃公略不覺得需要同彭德懷商量一下採取什麼共同行動嗎？看來，當黃公略了解到彭德懷的態度以後，他就失去了和彭德懷詳細討論的興趣了。

這一點彭德懷可能有所感覺，只是他在《自述》中說得比較含蓄。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在寫自述，主要是為自己辯護，不宜多涉及別人的錯誤。

關於這件事，彭德懷的敘述仍然留下一些疑點。《蘇區》一書轉載了這封信，落款是「毛澤東12下支部抄」。這很清楚地說明是抄件。此書說，這封假信是夾在永陽行委《致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的信》中間的。後面還有這樣的說明：「我們費了一夜推敲，雖然原稿尚未找到，我們可以頭顱來保障這個文件的真實，不是捏造。」可見，發信

人已經清楚說明了這不是原信。這封信是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叢允中秘密交給交通員的（《蘇區》，一八八頁）很可能是叢允中用他的毛體字抄的，因此給人一個這就是冒充原信的錯覺。但如果是冒充原信，那麼就只有一封，不可能既交給彭德懷又送給別人。另外，信中落款的阿拉伯數字，不像是年月日，而像是支部代號。當然，這並不否定富田事變領導人製造了假信事件。

在朱彭黃三人中，最堅定地擁護毛的是彭德懷。在一、三軍團於一九三〇年八月會合時，他不但同意成立第一方面軍，而且提議把自己領導的三軍團的五、八軍編為一方面軍建制，便於朱毛統一指揮，而他則在毛澤東為首的一方面軍總前委領導下工作（《彭德懷自述》，一五七頁）。雖然合為一方面軍了，但一、三軍團之間仍有隔閡。紅三軍團的一些人不同意毛澤東的誘敵深入的方針，吵得很厲害。彭德懷努力說服自己的部隊，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的領導。這一次，又是彭德懷請毛澤東到三軍團幹部會議上來講話，維護了一、三軍團的團結。

富田事變領導人爭取朱彭黃的努力沒有成功，於是他們率紅二十軍西渡贛江，脫離總前委的領導，單獨到永新、蓮花一帶和敵人做鬥爭。他們沿途還刷寫「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標語。但是，他們堅持同敵人作戰，沒有一個人投降。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劉敵寫信給中央，報告「富田事變」經過，分析事變原因，

承認「這一行動在組織上是絕對不允許的，尤其是在階級大戰的關頭，發生這一不幸更是痛心」。只是爲了挽救被陷害的同志，毅然決然來了這一着，「這一行動之錯誤，誠懇請中央給敵以嚴重處罰。」

在這同時，段良弼爲代理書記的省行委也到上海向中央面陳意見，包括軍事問題和與毛澤東的分歧。

這個棘手的問題到了中央新派來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那裏。項英是在一九三〇年年底到達的。蘇區中央局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成立，周恩來爲書記；在周到達之前，由項英代理。

項英對富田事變的看法和處理方針有點和毛澤東不相同。

毛澤東力主鎮壓，認爲現在問題已經很嚴重。「在紅軍中設置了大量A 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製好暴動旗，若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富田事變就是「A 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必須堅定地與這種叛逆行爲鬥爭。

項英沒有完全同意毛的意見，而是認爲雙方都有錯誤。在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發出了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表示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採取的鬥爭路線，但只是說這「在客觀上」是與A B團取消派等聯合一致的行動。因此，決定開除劉敵、李白芳、謝漢昌、段良弼等人的黨籍，但沒有更嚴厲的措施，留下了迴旋餘地。此外，決議還批評了同A B團鬥

爭中的脫離群眾和盲動行爲，糾正「亂打亂殺」和「隨便聽人亂供亂咬」的現象。

這個決議是匆忙做出的。三天以後，項英了解了更多的情況，又發出了《糾正各級黨部執行中央局決議的錯誤》的指示，除維持富田事變在客觀上是一種反革命行動的判斷外，強調說：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鬥爭歷史和黨的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的客觀行動的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 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去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領導人純粹是A 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A 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

其實，說富田事變在客觀上是一種反革命行動的判斷也是不很公道的。富田事變的領導人沒有殺過一個共產黨幹部和紅軍，他們發動事變是爲了保護自己，而保護自己也是保護革命力量。殺了大批革命者的是李韶九和他的指使者，爲什麼不說這些人在客觀上是反革命呢？富田事變領導人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當然是錯誤的，但毛澤東的「認我爲敵」的肅反方針不也是錯誤的嗎？只有製造假信這一件事才可以說和反革命的伎倆如出一轍。

項英注意到這場肅反背後的宗派鬥爭。他發出的這個指示說，富田事變是「因爲過去贛西南黨的路線和工作錯誤的結果——黨內一股無原則的小組織派別的鬥爭」演進而成的，「除段良弼等首要五人業已開除黨籍外，其餘附和的人在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 B

團等）、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等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接着，項英指示做工作，把二十軍帶回河東，打算用教育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當時還準備開除李韶九的黨籍。

這是一比較冷靜的態度。對這種觀點，總前委和毛澤東認為「完全是調和路線」。

（《蘇區》，一九四一—一九五頁）

三月，項英把富田事變領導人召到蘇區中央局所在地來開會。雖然劉敵、李白芳、謝漢昌已經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但是他們還是抱着向黨承認錯誤，請黨教育的態度，來到了黃陂。

這是一個轉機。如果事件的有關方面都坐下來，徹底把問題談清楚，在項英的主持下，事情可望妥善解決。

王明搬來蘇共做法 毛澤東執行左傾路線

這個時期，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發生了什麼事呢？

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共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二中全會。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議接受了共產國際七八月間的一系列決議，並且改選了政治局。全會的決議批評了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並退出中央的領導崗位。毛澤東被重新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被選為中央委員。這件事說明中央對紅軍游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

雖然對李立三的錯誤的糾正還不徹底（這也是由於受共產國際的觀點的束縛），但這是一個轉機。但是，會議剛剛結束，共產國際的態度就發生變化。一九三一年一月，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米夫的一手操縱下，會上對瞿秋白、周恩來進行了沒有道理的批評，把王明塞進了政治局。工人出身的向忠發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在李立三路線時期是李立三的傀儡，此後他就成了王明的傀儡。中國共產黨的大權實際上落在一個二十六歲初出茅廬的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手裏。一條更「左」的王明路線代替了李立三的「左」傾路線。

王明知道，黨內許多人對他不服。他採取上靠下壓的辦法，一方面打着「國際」的旗幟嚇唬人，一方面對不滿意他的人進行無情的鬥爭。他兼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首先就對上海開刀。上海各區的區委書記中，凡是不臣服他的，王明就分別予以批評、調動、撤職，甚至停發生活費，同時安插自己的人，從而牢牢地控制了上海的黨組織。王明所用的辦法，就是蘇聯清黨的辦法。王明重點打擊的一個對象是何孟雄。何孟雄是第一個起來堅決反對李立三路線的……王明召開江蘇省委擴大會議，布置對何孟雄的鬥爭，把何孟雄反

對王明小宗派的活動說成是當前的主要危險，說何孟雄是「長期對黨不滿」，「有個人野心」。他禁止江蘇省委的幹部與何孟雄有任何來往，停發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費和工作經費。何孟雄等三十六人被捕後，王明還把何孟雄開除了黨籍。何孟雄等英勇就義後，王明還不放過，說他們的死是「反黨分裂黨」的必然結果，要用這個血的教訓來警告那些支持何孟雄的人。王明還布置寫文章在黨刊發表，說何孟雄等雖然犧牲了，但對他們的錯誤還要嚴肅對待，徹底清算。瞿秋白雖然被撤職並被迫按照王明的口徑做了檢討，王明卻還要算舊帳，說瞿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期間，「壓迫」了王明等人。此外還減發了瞿秋白的生活費，每月只象徵性地發給十六七元（當時上海工人中等工資為每月二三十元）。另一個和瞿秋白同時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過的鄧中夏，也受到王明的無情打擊。

王明根據蘇聯肅反的經驗和共產國際「反右傾」的指示，要求在蘇區內反對「A B團、取消派、改組派」等。在這時中央發下的文件中，有的把改組派、第三黨、「黃色領袖」的都說成是「直接幫助資本進攻與『圍剿』紅軍」的，「是對於革命的最大危險」；有的把改組派、人權派、第三黨、取消派等不加區別的說成是「反動派別」，並批評「對於一切反動派的鬥爭還不夠」。其實，改組派和第三黨的主要矛頭是對着蔣介石的，他們屬於中間力量，不應通通說成是「革命最大的危險」，把它們趕到敵人營壘。王明控制的

中央還把他們的路線提到哲學的高度，提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階級矛盾永遠超過於反革命內部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的增長「不但不能減弱而且只能增加他們與蘇維埃運動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王明評傳》，一七五—一七六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北京，三三一、四一七頁）又說：「右傾在中國革命這個階段上，是最危險的傾向」，對右傾「必須做最殘酷的鬥爭」，「哪怕是極微小的和剛萌芽的傾向，都要給以殘酷無情的鬥爭」。（《王明評傳》，一七八頁）

新的中央根據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報告，做出了決議，支持毛澤東，否定了項英的做法。決議說：富田事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的鬥爭機關A 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

項英爲代表的蘇區中央政治局，是根據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決定成立的。現在四中全會否定了三中全會，王明上台了，三中全會的決定也不能算數了。項英受到了批評，他的錯誤根源被說成是執行「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徹底調和路線」。他被解除了代理書記的職務，由毛澤東接替。

緊接着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開會的富田事變領導人劉敵、謝漢昌、李白芳等全部被捕。劉敵首先被槍決。接着公審謝漢昌、李白芳等人並判處死刑。他們至死不承認是反革命組織，只承認是反毛組織。然而這就夠了。單憑「打倒毛澤東」這個口號，他們

的命運就注定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完。

紅二十軍奉命開到中央蘇區。他們還以為是參加「反圍剿作戰」，哪裏想到毛澤東和中央局已把他們看做是敵人而要加以殲滅。一大批紅二十軍幹部，從軍長蕭大鵬，政委員曾炳春到副排長以上幹部，共七百多人，都被當作A B團關押，先後處死。紅二十軍番號取消，戰士被編入紅七軍。這是發生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事。

這真是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蕭大鵬和曾炳春並未捲入富田事變。蕭大鵬原是二十軍一七二團團長，由於原軍長被扣（後釋放），他繼任了軍長。曾炳春當時則在家中養傷。事變發生（後，曾奉中央之命找二十軍做工作。他在二十軍中頗有威信，指戰員紛紛向這位政委傾訴苦衷。曾勸大家以大局為重，堅持對敵作戰，相信黨會正確處理。曾在被關押了十個多月以後，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被殺，臨刑時還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他很好地完成了中央指派的任務，避免了事態的惡化，不料也逃不脫厄運。然而如果他活下來，也許會比死還痛苦，因為這種結局等於是出賣了自己的部隊。

紅二十軍是一支由贛西南地方武裝組建的部隊。雖然建立時間不長（一九三〇年七月建立），但打仗很英勇頑強，迭立功勳。他們曾經協同紅三軍、紅四軍、紅十二軍進行過

攻克吉安的戰鬥，又曾先後打下安福、吉水、永豐縣城。「紅二十軍在七月組建到十一月底的半年裏，英勇奮戰，馳騁縱橫，使贛西南的廣大紅色區域連成一片，並協助地方黨建立了江西蘇維埃政府以及三十四個縣的紅色政權，開創了橫斷江西半壁河山的呈梅花形的、縱橫七百多公里、人口四百餘萬的贛西南革命根據地。」（《蘇區》，二〇三—二〇四頁）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都是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後來是贛西南暴動的組織者和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開拓者。他們曾給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和一方面軍以很大的幫助和支持，功不可沒。（文聿《中國「左」禍》，六四頁）富田事變後，紅二十軍的隊伍到了永新。他們聽說共產國際已經停止給中共以經濟接濟，決定籌集二百兩金子送中央。他們雖然反對毛澤東，但這時仍然接受朱德毛澤東的指示，和紅七軍等部隊聯合行動，打了一系列勝仗，配合中央的反圍剿，擴大了湘贛蘇區。這期間，雖然指揮員是戴罪之身，全軍也背着沉重的心理負擔，但沒有一個人投降敵人。

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反革命」嗎？

也許紅二十軍想以這種實際行動，來證明他們對革命的忠誠。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用！一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隊伍，就這樣全軍覆滅了！

地方的情況也許更糟。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 B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一千八百九十人。（《蘇區》，二一四頁）

李文林被捕後，一度被項英釋放。大概項英相信他不會亂打亂殺，就派他去做肅反工作。中央三人代表團到達後，他再度被捕，被當着「混入肅反機關陷害共產黨員」的A B團要犯。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被殺。臨刑前也高呼「共產黨萬歲」。

李文林是江西紅二團和東固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毛澤東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把赤色根據地分爲「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方志敏式」和「李文林式」，不過後來在《毛澤東選集》中，「賀龍式」和「李文林式」被刪去了。

黃克誠當時是紅三軍團第三師政治委員。他那個師的宣傳科長何篤才被打成A B團而犧牲。黃克誠對這個人印象很深，覺得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幹部，政治水平相當高。他們兩人接觸很多，彼此無話不談。黃克誠承認他從這個小小的宣傳科長「獲益匪淺」。按照何篤才的資歷和水平，本不應該是這個職位，由於他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的爭論中，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就不受重用。然而他仍然工作認真，且從不掩飾自己的觀點。

他曾對我說，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

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還舉例說，像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於很大的權力。結果，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黃克誠自述》，一

〇〇一—一〇二頁）

黃克誠後來才覺得這番話有道理。他評論說：本來毛澤東在中央根據地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承認他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正確性，但何以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呢？「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志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上書，一〇一頁）

可以補充說，毛澤東在軍事路線上是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立的，但在肅反問題上是執行了左傾路線的，而且得到過王明的支持。

毛澤東的這個錯誤，不能用「缺乏經驗」來原諒，也不能用「主觀輕信」來解釋。如果是缺乏經驗，那麼為什麼如此自信呢？如果是主觀輕信，那麼為什麼在別的問題上毛澤東又那麼客觀謹慎呢？就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在做出肅清A B團決議的羅坊會議期間，毛澤東還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了解農民的家庭情況。一九三一年一月，毛澤東把調查到的材料整理成《興國調查》。他在《整理後記》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

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着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轉引自《毛澤東年譜》上卷，三二二頁）在此之前的三月，毛澤東還在尋烏做社會調查，寫了八萬多字的報告。接着，又寫了《調查工作》一文（即後來發表的《反對本本主義》），其中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反對瞎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〇九頁）這篇文章是反對李立三的盲動主義路線的。誰也不能說毛澤東不懂得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可是毛澤東自己為什麼根據下面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來決定肅反政策呢？為什麼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問題上十分虛心體察情況的毛澤東，單單在肅反問題上採取了「想當然」的態度呢？對A B團的打擊面如此之廣，涉及的幹部如此之多，亂供亂咬的情況是如此之嚴重，只要稍做調查，其中的瞎說就很容易發現的。可是為什麼毛澤東不察呢？毛澤東在農村經濟問題上如此不辭辛苦地做了大量調查工作，為什麼在肅反問題上就不肯花一點時間去獲得一些第一手材料呢？牽涉到幾千革命同志生命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掉以輕心呢？

此外，毛澤東為什麼指示「二十軍需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說需要「找到」線索，就是還沒有線索；既然還沒有線索，怎麼能事先要求「來一個大的破獲」？毛澤東說

過「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一〇頁〉可是在這裏，毛澤東的結論產生於調查之前。

還有那個李韶九。他說的那句「這絕不是簡單的A B團問題，完全是政治問題」，很值得推敲。劉敵產生懷疑是有道理的。從李韶九本人的行動看，他的確是把整肅A B團當做政治問題來對待的：不滿毛澤東就是A B團。可是李韶九這個想法是從哪裏來的？毛澤東如此信任他，委以重任，難道不能說他體會了毛的意圖？

總之，在對待富田事變和紅二十軍的問題上，毛澤東不能逃脫利用肅反來消滅異己的嫌疑。

我們在這裏可以以兩個人的例子看對待整肅A B團的不同於毛澤東的態度：一個是黃克誠，一個是陳毅。

黃克誠對中央蘇區肅反感到懺悔。他在自述中說：

在這次肅反打A B團擴大化的錯誤行動中，我……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遺憾終身的大錯，至今回想起來，尤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細算歷史舊帳，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我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搞肅反整人之類的政治運動時，我就不肯盲從了。〈《黃克

《誠自述》，八六頁）

黃克誠在後來的肅反運動中就採取「頂」的辦法，不肯按肅反委員會提供的名單抓人；頂不住就叫人躲藏。他因此被懷疑為A B團分子而抓起來審查，幸虧彭德懷保了他；但他還是被撤去了第三師政治委員的職務。

另一個企圖抵制肅反的是陳毅。一九三一年二月，陳毅任贛西南特委書記。他到零都調查時，聽說這裏以前把「字寫得好的人就做A B團殺了」，「說話有條理的人也做A B團消滅了」，大為震驚，下令把被關押的所謂A B團分子釋放。這就得罪了李韶九，受到李韶九的威脅。一次，陳毅被召去開會，他預料此行凶多吉少，就囑咐妻子說，如果自己下午六點還沒有回來，她就馬上逃，到老家躲起來。幸好那次沒事，讓陳毅回家了。但陳毅在路上遇到麻煩，晚了兩個小時才到家。一看，他的妻子誤以為他被當做A B團抓走，竟跳井自殺了！

陳毅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到這段歷史說：「在中央蘇區，整我是A B團的團長，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對我說：你是A B團，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寫信報告了毛主席，兩天後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說：我支持你。並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 B團的同志分別輕重加以釋放。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支持我，他們就把我槍斃了。」（《蘇區》，二一三頁）

陳毅回避了毛的嚴重責任，只說毛的好的方面。他當然只能這樣說。毛救了陳毅，但這僅是個別的行動。毛有沒有就這件事批評李韶九呢？他有沒有想到可能還有別的人也在受冤枉呢？他有沒有想到需要檢查一下李韶九的工作呢？或者，如果他是足夠負責的話，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整個肅反方針的問題呢？

毛多次在一個同志面臨危急的情況下拯救他的生命，從此這個被救者就終生對毛感恩戴德，並死心塌地地追隨他。其實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毛所拯救的人不過是他所迫害的人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毛後來也在這種情況下救過許世友。李志綏醫生回憶毛談過這件事：

許世友早先在張國燾手下，長征到陝北後，張國燾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風開始，大家都說許不可靠，把他鬥得要死要活。許急了，要拉隊伍自己去打游擊。康生要將他抓起來槍斃。我說不忙，我找他談談。他們都不贊成，怕許害我。我說不會。許到我這裏，見到我，張開大嘴就哭。我說不要哭，我只問你兩句話，你相信張國燾，還是相信我？你願意走，還是願意留下？許說，我當然相信你，我願意留下。我說，那好，你照舊去帶兵，沒有事了。許世友到現在不是幹得很好嗎？（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一九九四年，台北，六四頁）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毛當時其實是很清醒的，他並不相信許世友有什麼問題。只這幾

句話，毛就成了許世友的「救命恩人」。

另一個給毛理髮的人，也是毛救了他，這個人叫王惠。

王惠（王鬍子）從一九三〇年起就一直給毛理髮。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王當時坦白交代說，他是暗藏下來的特務，要在理髮時，用刀子殺死毛。毛不信，叫找王來。王來了，見到毛就下跪，大哭說，坦白交代，要殺主席。「我說爲什麼不動手呢？他說等國民黨來了再動手，我說到那時還用得着你動手？我讓他講老實話，他說不這樣講，日夜不讓睡覺，實在受不了，只能按他們講的坦白交代，這才讓他睡一覺。王鬍子從此對毛絕無二心。在毛的周圍，許多與毛最親近的人都受過毛的救命之恩。」（同上書，八六頁）

毛這種策略可能是從《資治通鑑》中學來的。他對李志綏說：「唐太宗手下有一個大將，叫尉遲敬德。尉遲敬德歸順的時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說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讓尉遲敬德和他睡在一個帳篷裏，後來尉遲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勞。」（同上書，八六頁）後來，毛在「文革」中多次玩這種把戲，在一些被批鬥者面臨絕境時突然表示他的寬恕和仁慈。

利用肅反進行大規模迫害的始作俑者

中央蘇區的整肅A B團是整個蘇區肅反的第一波，繼之又有一九三一年一月開始的閩西蘇區「社會民主黨」冤案。如果說整肅A B團是把蒼蠅當大象，那麼整肅「社會民主黨」就完全是無中生有。外國有社會民主黨；在中國，這個組織根本就不存在。可是，沒有可以變成有。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紅軍新十二軍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的大會，有人在會上喊出了「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的口號。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本來都是好的，後來出了修正主義。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左派代表，他們是反對修正主義的領導的。紅軍戰士不了解這些情況，喊錯了。這一喊錯不要緊，無數人頭就此落地！在此之前的李立三路線時期，中央曾發過一個宣言，其中說到社會民主黨是反革命。現在反革命喊出口號來了，這還了得！新十二軍第一〇〇團政委林梅丁等十七名幹部被誣為「社會民主黨」分子，判處死刑，臨刑時還高呼「打倒社會民主黨！」可他們至死也不知道這個戴在他們頭上的帽子「社會民主黨」為何物。一些執行過立三路線的，對肅反不積極的，工作上犯過錯誤的，或僅僅是出身不好的，都被當做「社會民主黨」而清洗。僅五月份，閩西蘇區被捕的達一千六七百人，被處決的六七百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杭武縣第五區舉行公審大會，處決了十一人，大多是二十左右的年輕人，最小的年僅十六歲。閩西蘇維埃政府的四十五名執委與候補執委中，半數以上遇害。這次事件延續一年多時間，黨員人數由八千

減到五千，遇難者多達六千三百五十二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澤東聽了閩西肅反的匯報後，指示糾正。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周恩來從上海轉移到蘇區。

這一年的白區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四月，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叛變。顧順章是中央特委的三名委員之一（另外兩人是向忠發、周恩來），中央特科的負責人，知道很多黨的重要機密。他不但供出了中共中央機關的地址，還要向蔣介石面陳消滅共產黨的計劃。這一情況為潛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地下黨員錢壯飛獲悉，迅速報告了中央。緊接着，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大遷移，中央領導人也逃避了。顧順章一家人被殺，埋屍空屋。此事當時報紙作了報道，震動上海。中共官方編纂的黨史都對顧順章全家被殺的事絕口不提。近年海外為此事對周恩來譴責很嚴，有的人說他「心狠手辣」，因為當時周負責處理此事。這件事做得太不人道，譴責是應當的；不過要和蘇區的肅反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只不過蘇區處偏僻之地，消息不為外間所知罷了。

顧順章的家人都是在中央機關工作或從事秘密交通工作，對黨中央的情況比較熟悉。如果跟着顧順章叛變，將給黨中央造成重大損害。在討論如何處理時，康生力主全部殺掉，向忠發不以為然，周恩來則說到顧順章家看看情況再定。周恩來和康生帶着特科人員到顧家。周恩來先單獨告顧妻以叛變事。顧妻是共產黨員，沒有表示對顧不滿，反而表示

將聽從丈夫安排。殺顧妻是周示意的，殺其他家人是康生的指揮。最後還剩下一個七歲的孩子，康生也要殺，為周恩來阻止，派洪揚生送到浦東寄養。（根據一九九三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生死搏殺——周恩來與顧順章》一書。作者吳基民採訪了當年殺死顧順章妻子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揚生，並作了許多調查，以十年之力，寫出此書。）

繼四月顧順章叛變之後，六月，向忠發又在被捕後叛變，形勢惡化。共產國際和王明都強調中共之所以犯錯誤，和組織上的缺乏工人成分有關，因此要大批輸入工人血液。然而事實上這些工人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

王明於十月去莫斯科。周恩來於十二月到達江西中央根據地。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由博古負總責。這件事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表明中共的工作重點從此由城市移往農村了。

周恩來路過閩西途中，耳聞目睹了肅反的慘狀和惡果，甚為駭異，當即寫信向中央報告。十二月底，周恩來到達紅色首都瑞金，就任中央局書記之職。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主持做出了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要求「以自我批評精神，承認對於過去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的領導工作」，並提出給予紀律上的制裁。此後，蘇區中央局還專門做出了關於處罰李韶九的決議。決定給予留黨查看六個月的處分，下放基層工作。（《黃克誠自述》，一〇三頁）閩粵贛臨時省委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對整肅「社

會民主黨」的錯誤進行了檢查。然而並沒有聽說毛澤東承認了什麼錯誤。

一九四一年七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演講，題目是《論黨內鬥爭》。在中共中央內，劉第一次系統地批評了黨內鬥爭的過火偏向。劉少奇批評了開所謂「鬥爭會」的做法，又指出過火偏向還表現在：「有些同志以為黨內鬥爭是鬥爭得愈凶就愈好，問題提得愈嚴重愈好，搜集別人的錯誤愈多愈好，給別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批評與鬥爭的方式和態度愈嚴峻愈粗暴愈好——講話的聲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齒露得愈長……就以爲是愈好，就以爲是『最革命不過』的了。」（《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四頁）

劉少奇不指名地批評王明、李立三等人「用一種對黨員的壓迫手段、打擊政策與懲辦制度來達到或保持黨內的統一」，他們常用開展鬥爭的方法，去開展工作，推動工作，故意去尋找「鬥爭對象」（黨內的同志）作為機會主義的代表來開展鬥爭，犧牲與打擊這一個或這幾個同志，「殺雞給猴看」，以推動其他的幹部黨員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務。（同上書，一九五頁）他們收集和誇大某個同志的個別缺點和錯誤，「在黨內同志中造成對這個同志極不好的印象，激起黨內一切仇恨機會主義的心理，向着這個同志來鬥爭。於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報復心理也發展起來，揭發他一切的錯誤缺點，任意提到原則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實，憑着主觀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謠言，亂加給這個同志

以各種罪狀等等……。這樣做了之後，他們還不允許這個被打擊的同志起來做任何的辯護。如果他們有辯護的話，那麼又說他故意辯護錯誤，承認錯誤不徹底等等，再加以打擊。」「另外有些同志，用對敵人對異己分子鬥爭的方法，來向黨內的同志鬥爭……。一切挑撥離間、陰謀詭計都使用出來。把監視、逮捕、監禁、審判等辦法也運用到黨內鬥爭中來。」（同上書，一九六頁）

劉少奇對左的黨內鬥爭方式作了這樣生動的描寫，顯然是深有所感的。可是到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他所批評的那一套全搬出來了，他卻支持了毛澤東。不知他當時是怎樣想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把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各個方面都說成是完全正確的，而「左」傾路線，不但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也反對了毛澤東的組織路線……「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為貫徹其意旨起見，在黨內把一切因為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採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不問情況如何，一律錯誤地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調和路線』、『兩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做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鬥爭。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成了領導或執行『左』傾路線的同志們提高其威信、實現其要

求和嚇唬黨員幹部的一種經常辦法。」

這是說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是正確的，是和左傾的組織路線對立的。這裏只說毛澤東受左傾路線打擊的一面，關於毛澤東受到王明支持的左的整肅A B團運動的錯誤，就隻字不提了。所以，下面說的錯誤肅反及處理原則，是不包括整肅A B團那一次事件的：

「很多地區，更由於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幹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宣布：對於一切被錯誤路線所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銷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恢復黨籍，並受到同志的紀念。」（《毛澤東選集》，九八六—九八七頁）

毛本人對A B團問題怎麼看？他在《歷史問題決議》之後的幾十年是否有所表示呢？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結論」中說：「內戰時期打A B團有用肉刑者，肉刑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尚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因此，得出兩條：一、廢止肉刑；二、不要輕信口供。」

又說：「內戰時期蘇區爲什麼垮台，路線問題當然是一個原因，但與這個問題也有關係的，就是對於當地人民總是不信任，外來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蘇區垮台了。」（中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二〇八頁）

建國初期，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在北京開會，向毛澤東匯報了蘇區殺A B團的事，說這是一大冤案。據陳正人敘述，毛主席回答：「這是一個問題。那時兩次『左』傾路線佔統治地位，肅反審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輕信口供。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擴大化、簡單化，錯殺了自己人！」陳正人還說：「毛主席同意我們的意見，凡是被錯殺了的同志都要平反昭雪，作為革命烈士。」（《蘇區》，二一七—二一八頁）

這兩次表態，毛澤東似乎是吸收了教訓，但沒有承認自己的責任。第一次毛澤東說是黨當時未成熟，因此犯了錯誤；第二次他說是「左」傾路線犯錯誤：這兩次他都沒有說是他犯錯誤。他提出的兩條教訓是好的，但又是夠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終於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時肅錯了人。」這是毛第一次在這個問題上承認自己有錯誤，這已是事隔二十多年了。

但是這句話《毛澤東選集》上沒有，有的只是毛在同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說的批評「假洋鬼子」的話：「他們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八四頁）這是在說別人，不是說自己。

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作他的著名的報告時，他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追溯到蘇區時代，說自從一九二七年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就是採用這個方法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七〇頁）這裏，他又閉口不提他的肅反的教訓，好像他是一貫正確的。

我在本章開頭說，中共的清黨方式是從蘇聯學來的；我應該補充說，中共有它自己的創造。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共的肅反，雖說是奉共產國際的指示，但那一套大規模處死的做法，卻是屬於中共自己的。斯大林借肅反為名大規模的從肉體上消滅異己，主要在一九三六—三八年，這還在中共蘇區肅反之後。

一個老紅軍陳靖在對蘇區肅反作了大量調查後說：「我查遍了三大蘇區和三大方面軍的『反革命』史料，尤其是張國燾、夏曦和李韶九（一方面軍肅反領導人）所肅殺的那些人，至少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不是『反革命』。」他又說，一般人只知道二、四方面軍肅反中夏曦、張國燾誣殺了很多人，其實一方面軍也不少，主要代表人物為李韶九；尤其是一九三一年前的一段時間同張國燾相比，張真是小巫見大巫。這裏，作者只是沒有點出李韶九背後的那個人罷了。

這位可敬的老紅軍又說：「從三十年代初到長征之初，中國和蘇聯在『肅反』這一行動上，基本是『同步』而行。在做法上，不但是相通的，而且是『互學』的，尤其在那個

『狠』字上——殺人，蘇聯還吸取了中共經驗。」（陳靖《詩言史》，南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所有這些「肅反」都發生在國民黨第二、三次圍剿期間。就根據地的黨和紅軍的領導幹部來說，我們甚至可以提這樣的問題：到底是敵人殺死的多呢？還是死於「自己人」之手的多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到陝甘寧，立即把被王明路線執行者逮捕的蘇區創建者劉志丹、習仲勛從死囚牢裏釋放出來。否則，陝甘寧不會存在，長征的紅軍沒有立足之地。陸定一回憶說：「我問過習仲勛同志，如果中央紅軍不到，你們的命運會怎樣？他回答：如果中央紅軍晚到四天，我們的命就沒有了，而且會被活埋，活埋的坑已經挖好。他說，據他所知，陝甘寧的錯誤肅反，在他被捕以前已經殺了二百多名從白區來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七四六頁）

這幾次肅反中的許多對待嫌疑犯的做法，完全是「有罪推定」的原則，什麼證據都沒有，就先認定某人有罪，當真正的罪犯看待。再加上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根本沒有人權觀念。這些做法在中國的「舊社會」本來就很普遍，又有蘇聯的榜樣，學起來是很容易的。中共並不覺得有廢除這種辦法的必要，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用來對待「敵人」的（且不說是否真的敵人）。毛澤東後來承認，「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

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四七八頁）當然，把黨內的路線鬥爭和肅反混在一起，完全是從蘇聯搬過來的。「根本改造」黨和政府機關，解散黨團組織，罰領導幹部集體掃地，則屬於當時的創造了。所有這些，和「文革」中的做法何其相似乃爾！可見「文革」的一套，在共產黨的傳統中是早有根源的。

（一九九七年一月）

第四章

一九四五年：在美蘇兩個大國之間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震動了中國和世界。

日本進攻東北時，曾揚言要以滿洲為跳板，進攻蘇聯，用這種辦法誘使英美讓步。可是以後的事情發展表明，日本並沒有北進，相反是繼續南下。蘇聯表示同情中國並給予幫助，不參加國際聯盟，但也有妥協。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申明不干涉，嚴守中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向日提出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為日所拒。一九三三年，被迫將中東路以低價出售給日本。蘇的目的是在遠東避免日蘇戰爭。中東鐵路是中俄合辦，俄未得中國同意就這樣做了。

斯大林急需依靠中國的力量來牽制住日本，避免日本入侵蘇聯；但斯大林又覺得，中共的力量太弱小，不能夠承擔這個任務，只有依靠國民黨才行。蘇聯力圖恢復在一九二九

年中斷的中蘇外交關係。蔣介石也感到日本步步緊逼，英美都作壁上觀，而日本的反蘇反共是口號，滅亡中國是行動。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蘇達成復交協議。

在法西斯戰爭威脅日益臨近的情況下，斯大林開始考慮如何避免兩面作戰的局面，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一周後的九月一日，德國向波蘭發動進攻。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本書前面已經談到斯大林此舉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決議（而這些決議本來是在聯共領導下作出的），並使各國共產黨不知所措。但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然而，斯大林打錯算盤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向蘇聯發動進攻，蘇聯措手不及。斯大林原想禍水西引，現在他自食其果了。看來英法也懂得德國戰勝蘇聯並不是對它們自己有利的事：這股禍水是要氾濫全歐洲的。英法和蘇聯聯合起來了。

蘇德戰爭爆發後，毛才把口號改爲贊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次日，美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開始對中國抗戰提供支持，但當時並沒有怎樣注意到中共。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及盛世才錯誤地估計了蘇德戰爭局勢，決定反蘇反共，驅逐蘇聯在新疆的勢力。蔣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夏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發動第三次反共摩擦，引起蘇聯強烈反應。國共摩擦嚴重影響了中國抗戰，影響了盟軍對日作戰計

劃。美國擔心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將影響美國戰後在中國的利益。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美國政府開始調整對華政策，促進國民黨同共產黨合作。（見劉德喜《兩個偉人和兩個大國》，中國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一七九頁）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又同蔣介石商談國共合作問題。羅斯福要求蔣介石設法同中共合作，並且必須在戰爭進行時期，就同延安的共產黨人組織聯合政府。

另一方面，美國還擔心在打敗日本後，國共之間可能爆發內戰，屆時蘇聯可能站在共產黨一方，而西方國家可能被迫站在另一邊進行干預，因此它極力促進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改善關係。但蘇聯是要講價錢的。在一九四三年底的德黑蘭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上，一場背着中國的交易開始了。會上，斯大林表示，蘇聯在遠東沒有一個港口是完全不凍的，暗示對中國大連這個完全不凍港的興趣。關於使大連成爲國際化自由港的主張，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軍長驅直入華南，國民黨百萬軍隊望風而逃。許多美國觀察家都認爲國民黨要垮台。

一九四四年六月，羅斯福首先讓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會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徵詢關於改善中蘇關係和國共關係的意見，然後又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了解蔣介石對此問題的態度。六月十日，哈里曼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會談。他說：羅斯福認爲，蔣介石是唯一

能把中國團結在一起的人。因此，應當鼓勵蔣介石，首先使他想和北方的共產黨和解，使他們團結起來，共同抗日；其次使他在國內放寬政策。對羅斯福的看法，斯大林表示了兩個方面的意見：一方面，表示支持，認為蔣介石是當時情況下的最佳人選，因此必須給予支持。實際上，這是蘇聯政府自中國抗戰以來的一貫政策。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埋怨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戰鬥不力。他說他有一種印象：蔣周圍的許多人都是些無賴，甚至是賣國賊，因為重慶發生的一切，日本人似乎了如指掌。斯大林還埋怨蔣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識形態上與他們爭論不休。他表示這種爭論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愚蠢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冒牌的共產黨。但他又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愛國者，是抗日的。（同上書，二二三三頁）會談後，哈里曼及時將斯大林的意見轉告即將赴華的華萊士。

六月下旬，華萊士抵達重慶，與蔣介石進行了幾次會晤。當華萊士向蔣介石表示，美國希望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解，並轉達了斯大林談話的某些內容，尤其是關於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的觀點時，蔣介石斷然拒絕了上述建議和意見。蔣認為美國不了解共產黨，他們有意散布一種印象，似乎他們並非真正的革命者，只不過是土地民主改革者而已；他們也不依附蘇聯。但所有這一切都是假的，正相反，中國共產黨比俄國共產黨更加是共產黨。然而，蔣介石在拒絕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時，卻要華萊士轉告羅斯福總統，表示

他熱切地希望在美國的調停下，與蘇聯進行會談並達成某種協定。根據這種協定，蘇聯政府將同意不給中共以任何支持。爲實現這一目的，蔣表示，他準備付出代價，比如俄國人在遠東的不凍港問題。如果同俄國人達成了這種協定，他就可以自由地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就範，因爲到那時中國共產黨人將發現他們已喪失了任何外國的支持。（同上書，二二三—二三四頁）

一九四四年六月，蔣介石不得已同意向延安派遣一個美軍觀察組。中共力量的強大，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國民黨的抗戰不力。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以美國的友好，爭取中共的支持與合作，以防止中共倒向蘇聯。羅斯福認爲，妨礙中國統一的最大因素可能是來自蘇聯的干預和共產黨的勝利，所以他力求拉攏這兩方面的力量。他企圖以美國同意蘇聯在滿洲享有特權爲條件，以換取俄國不捲入中國政治的籠統保證；與此同時，中共由於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和看到美國的友好表示，就可能不得不與國民黨妥協。因此，羅斯福決定派美軍觀察組到延安，謀求同中共聯繫與合作。從一九四四年上半年開始，美國雖仍以扶蔣爲主，但逐漸有了聯繫中共的內容。在羅斯福看來，扶蔣與聯共是可以統一的。（同上書，一八二—一八三頁）

中共聯美拉蔣抗日

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以英美記者爲主的中外記者團到延安，這是美國尋求同中共聯繫與合作的前奏。七月二十二日，以包瑞德上校爲首的美軍觀察組到延安。

毛對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中國不能限於只和一個強國或一群強國保持友好關係。中國只依賴蘇聯、斥責英美是錯誤的。近幾年重慶政府只依賴美國，而對蘇聯表示反感猜疑和實際上的不友好，這也是錯誤的。

毛、周、朱都贊成在中國設立一個盟軍司令部，統帥必須是美國人，以保證一切部隊的平等待遇。他們不會爲此感到丟臉。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外交工作指示》，提出的與美英全面合作的方案，十分靈活（比蔣介石還靈活）。（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三一四—三一八頁）

陳納德派人商談情報、通訊和軍事合作。毛指示：可同意。大批美軍人員陸續飛來軍部及各師，我們應表歡迎。一則美我配合偵察敵情，有利現時轟炸與將來配合作戰；二則了解我情可爭取軍火援助，此點可能性很大；三則現時可打破國民黨反宣傳，將來國民黨舉行內戰，新四軍首當其衝，可爭取美方贊助。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兩個偉人和兩個大國》，一九一頁）

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說：從來沒有一個共產黨社會像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四年七月

到一九四五年三月這八個月期間那樣對美國如此開放。毛對謝偉思談到合作的思想基礎，說我們接受一切來自外國的對中國有益的東西，不僅是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還有來自英美法等國的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範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等等。毛還論述了這種合作在政治上的好處。中國能夠而且必須成爲蘇聯和英美爲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這兩個陣營之間的橋樑之一。毛還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完全獨立自主的黨，不受任何外國勢力支配，包括蘇聯和美國在內。毛的不依附蘇聯的表態是爲了打消美國方面在制訂聯共政策時的顧慮。毛又談到經濟基礎，說中國的工業化只有通過自由企業和外資援助才能做到。中國戰後最急需的是發展經濟。中國缺乏獨自發展經濟所必須的資本基礎，中國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進一步壓低來提供所需的資本。所以，美國的資本對中國就特別重要。而且，美國不僅是援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最適當的國家，它也是能夠充分參加中國經濟發展的僅有的國家。這對美國也是有利可圖的。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互關聯和相似的。蘇聯不能在這方面給我們以幫助，因爲蘇聯在戰爭期間損失慘重，戰後會全力忙於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們不能指望得到俄國人的幫助；而且對我們說來，尋求俄國援助只會使局勢更糟，因爲國民黨頑固地堅持反蘇態度。由此，中國與美國合作將更爲有利。而且，美國與中國合作，將主要是與中共合作，因爲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害怕美國

的民主影響，我們將歡迎它。中國的未來是屬於共產黨的，不是屬於國民黨的。美國要與中國合作，必須與中共合作。（同上書，一九二—一九六頁）

美軍觀察組的報告充分肯定了中共的力量，但未能為政策制訂者很好地理解。

雖然美國在一九四四年確立與中共聯繫和合作的政策時，認為中共可能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與蘇聯有別，但又認為，中共在政治上是依附於蘇聯，並受蘇聯控制的（蔣介石力圖告訴他們這一點）。美國看到了共產國際的解散後，蘇聯減弱了這種控制，但它以為這種控制並未消失。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較有生氣的力量，最終可能贏得一場內戰，而讓一個受蘇聯控制的黨在戰後控制中國，這不是美國願意看到的。美國同中共合作，是希望中共最終能放棄共產主義。當時美國從上到下都有一種觀念，認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過是民主主義者或社會改革者，他們所執行的政策只是土地改革、自由貿易等等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相當一部分美國的友好人士建議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同上書，二〇〇頁）

正當中共與美國的聯繫和合作全面展開之際，美國駐中緬印戰區總司令和美國委派擔任國民黨政府參謀長的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日趨尖銳。此矛盾早在一九四二年即開始產生，其根源是蔣介石軍隊抗戰不力。現在，則是由於對中共軍隊的使用問題。史迪威認為，鑒於蔣介石軍隊抗戰不力，特別是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發動豫湘桂戰役以來國民黨軍

隊的潰敗，有必要由他來全權指揮中國的所有部隊，包括共產黨部隊，聯合抗擊日本。史迪威向美國政府報告，並說共產黨可能願意聽我的意見。羅斯福採納這個建議，致電蔣介石，要求授予史迪威以指揮中國軍隊的全權和讓共產黨軍隊參與盟軍對日作戰。此建議為蔣介石拒絕。羅斯福遂派赫爾利來華。九月十九日，羅斯福採納史迪威意見，幾乎以最後通牒方式致電蔣介石，要求接受史迪威建議，說：我們這裏所有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如果再拖延下去，你們和我們為挽救中國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會前功盡棄。（同上書，二〇二頁）九月二十三日，史迪威建議，共產黨軍隊部署在黃河以北，與中央軍脫離接觸；美國只向共產黨軍隊提供五個師的武器裝備。赫爾利滿以為蔣介石會接受，但當他將此建議交給蔣介石時，蔣介石不但一口拒絕，而且正式要求美國政府調回史迪威。蔣介石看準了美國不能拋棄他，他看對了。一九四四年，史迪威應召回國。美國對中共政策開始變化。

中共繼續執行聯美抗日政策，並對赫爾利抱希望，歡迎赫爾利來延安。九月十五日，中共委托董必武代表中共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改組國民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這是中共第一次提出通盤解決國共關係問題的方案，雖是中共領導中國人民長期鬥爭的結果，但與赫爾利來華後美國實行壓蔣聯共政策也不無關係。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在去重慶途中，轉道莫斯科會見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同赫爾利一起的還有美國當時負責經濟援華事務的納爾遜。

美國人對莫洛托夫說：中國在戰爭中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爲達到此目的，美國政府必須支持蔣介石大元帥並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

莫洛托夫對美國客人追述了中蘇關係的歷史。他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蘇聯政府沒有理會張學良。由於蘇聯的政治和道義支持，蔣介石得以返回南京，而張學良被捕。蘇聯本指望這個行動能改善中蘇關係，但中國對此事興趣不大。兩國關係在近年來反而惡化了。雖然蘇聯政府被不公正地指責爲要對近年來中國的一些事件負責，但蘇聯對中國的內政和發展是沒有責任的。

下面，莫洛托夫談到了中國共產黨。據《白皮書》記載：

莫洛托夫於是談到中國的某些地區人民十分貧困的狀況，其中有些人自稱爲共產黨人，但和共產主義毫不相干，那不過是對他們的經濟條件不滿的一種表示。一旦他們的經濟條件改善了，他們就會忘掉這種政治傾向。不應當把蘇聯政府和這些共產黨分子聯繫起來，也不應當以任何方式爲此責備蘇聯政府。（*China White Paper, Aug. 1949*，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第二卷，一九六七年出版，三七頁；中譯本《白皮書》，一四〇頁）

大約在這個時候，斯大林通過蘇聯駐延安情報組轉來一個電報，說：蔣介石已經再三邀請你（毛）去重慶協商國是，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和國際就不能理解了。你到重慶去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等等。*

在美蘇雙方的壓力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毛澤東到重慶談判，與國民黨政府達成七點協議。

當時美國的態度是，支持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統一中國的武裝力量，以利於對日作戰，但是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改革，吸收中共參加政府。美國的態度既然得到了蘇聯的支持，國共雙方都不好拒絕。

儘管國共之間展開了冗長的討價還價的談判，但天真的赫爾利相信，事實上共產黨不是共產主義者，國民黨也不是法西斯主義者，兩者都在為民主主義而努力。（《白皮書》，中譯本，一五二頁）赫爾利到達重慶後，在十二月做了一個報告，其中不無得意地講到他對蔣介石的說服工作已取得的效果：

我到這裏的時候，蔣介石相信中國共產黨是俄國蘇維埃政府的工具。現在他則確信俄國政府毫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主義者。此外還有：（一）俄國並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二）俄國並不要中國有紛爭或內戰；（三）俄國亟望和中國有更和睦的關係。

*根據《峰與谷》（師哲著，紅旗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二年，二〇頁）記載，在此之前斯大林還有一個電報，大意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再要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等等。師哲沒有明確說明兩份電報的時間，但上文說在一九四五年，下文又說到重慶談判。顯然，前一個電報應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後一個電報應在一九四四年重慶談判前。師哲的記憶有誤。

然而蔣介石並不想同中國共產黨和解，但他倒是想同蘇聯和解，以防止蘇聯援助中共。蔣對赫爾利說：共產黨寄希望於俄國加入亞洲戰爭，這樣俄國就會支持中國共產黨以對付國民黨政府。（《白皮書》，中譯本，一四九頁）

另一方面，中共放出空氣，要尋求蘇聯的援助。這使美國覺得，與其這樣，還不如讓美國來給中共援助；他們也擔心，一旦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就會使中共投入蘇聯的懷抱。（《白皮書》，中譯本，一五四、一五六、一五七頁）

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指責美國沒有給對方施加壓力。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赫爾利到延安。八日，毛、周與赫爾利會談。九日，中共擬出《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即《延安協定草案》，主要內容為：改組國民政府，成立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等。赫爾利對此草案完全贊同。十一月十日，他主動表示願與毛澤東一起在協定上簽字。簽字當天，毛澤東寫信給羅斯福，說「我們一向願意和蔣主席取得用以促進中國人民福利的協定。今一旦得赫爾利將軍之助，使我們有實現此目的之希望，我們非常高興地感謝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對於中國人民的同情。」（《毛澤東外交文選》，三九頁）

赫爾利滿懷希望回到重慶。他確信，這個協定不僅是公平的，蔣介石也有接受它的理由，至少接受一部分。但是他的一廂情願，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當頭一棒。宋子文說赫爾

利被騙了，說國民政府永遠不會答應共產黨的要求。蔣介石則表示，在他沒有承認被共產黨徹底擊敗時，不會同意組成聯合政府。赫爾利在給羅斯福的信上說，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根本不接受這個提案，他們認為這個建議案最終會導致共產黨控制政府。赫爾利評論說，我認為，他不能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赫爾利還對張治中和王世杰等人大加申斥，說你們談了五年了，爲什麼不能解決問題？你們不要欺騙共產黨，你們說軍隊好，貪污腐化是敵人造謠。毛告訴我，貪污腐化的事孫夫人、孫科都說過，新聞記者也報道過。我看你們就是這樣的人。你們說共產黨不願團結，我到延安看他們都是愛國分子，提出的要求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共產的，而是民主的。他們是願團結的，我看是你們不願團結。（《兩個偉人和兩個大國》，二一〇頁）其實，只要成立聯合政府，就必然導致共產黨控制政權，國民黨清楚這一點，毛澤東也清楚這一點，只有赫爾利不懂得。但美國扶蔣已是既定方針，赫爾利也不得不讓步，改爲站在蔣介石一邊，勸共產黨接受國民黨的方案。由於蔣介石拒絕在《延安協定草案》上簽字和赫爾利的出爾反爾，周恩來決定中止同國民黨的談判，返回延安。

儘管如此，毛澤東仍繼續爭取與美國合作。十二月八日，毛澤東會見美軍觀察組包瑞德上校，告訴他說：如果美國放棄我們，我們將萬分地遺憾。但這不會損害我們對你們的友好情誼。任何時候，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將懷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幫

助。我們將不附帶任何條件，在美國將軍指揮下，盡心履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對你們的友好情誼。如果你們在中國海岸登陸，我們將在那裏同你們會合，並且將聽從你們的指揮。（同上書，二一二頁）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相信在美國陸軍和戰略情報局中存在着同情共產黨的派別，所以準備冒一場大的風險。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交給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克羅姆利少校一封信，請他通過軍事渠道直接轉給華盛頓。信中說，中共希望派一個非官方小組向美國平民和官員陳述和解釋中國的錯綜複雜的問題，如果羅斯福總統把他們看作中國一個主要黨的領袖而願意接待他們，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決定訪問華盛頓。這反映了毛澤東想同美國領導人建立直接的合作關係的迫切願望。但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此後，赫爾利回國述職，國共談判破裂。此期間，美國駐華官員為使美國政府採取靈活政策，爭取同中共合作，作了最後的努力。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等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議，批評對蔣介石採取無保留的公開支持政策，說這樣使美國脫離了千百萬有用的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二月二十八日，美國駐華使館全體官員起草了一份對美國政府的報告，其中說到把共產黨拉到我們一邊而不是把他們投入俄國人的懷抱（否則是不可能的，假如俄國參加對日作戰的話）。（同上書，二一五頁）剛回到美國的赫爾利對此暴跳如雷，破口大罵，堅決反對。赫爾利的態度得到了羅斯

福的支持。羅斯福擔心給中共部隊以全面軍事援助會不利於中國統一。他還擔心美國對中共的軍事援助會招致蘇聯對中共以同樣的援助，從而使共產黨不願同蔣介石和解。總之，這一措施可能引起他所不希望的中國的內戰，破壞他在戰後安全體系中利用和控制中國的計劃，並使他遭到國內的攻擊，說他幫助中國建立共產主義的政權。看來還是雅爾塔協定最爲理想：依靠蘇聯的力量在滿洲同日本作戰，並脅迫蔣介石從事國內政治妥協；依靠蘇聯同蔣介石訂立一個同盟條約而迫使中共同意一個聯合政府（大概不是平等的，否則本沒有問題）。

但中共仍在爭取機會。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給王若飛的指示信中，對將來美英等大國干涉中國內政，迫使蔣介石做出民主讓步抱有希望。（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一九四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八頁）

斯大林：寧要軟弱的國民黨政府，不要不聽話的共產黨

一九四五年二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在雅爾塔舉行會議。會議期間，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討論了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協議規定，德國投降後兩三個月內，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爲：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予以維持。

二、由日本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破壞之俄國權益應予恢復，即：

A 庫頁島南部交還蘇聯；

B 蘇聯在大連之權益及蘇聯租用旅順港爲海軍基地；

C 中蘇共同經營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

三、千島群島應交予蘇聯。

其實庫頁島本是中國領土，在黑龍江外。十八世紀後日俄相繼侵入，俄佔北部，日佔南部。一八九〇年沙俄與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庫頁島屬於被割讓範圍。此後日俄屢次爭議島上劃界。俄以千島十八島與日交換，佔領南部，全島於是歸俄。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俄戰敗，又以南部與日。這次蘇聯不僅要回庫頁島，連千島也索回，這成爲戰後日俄之間的爭端。

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曾發表宣言，廢除一切對外的不平等條約，當時此舉感動了許多中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但這個宣言後來並沒有兌現。現在，斯大林又要繼承帝俄的遺產，把本來是中國割讓的領土從日本帝國主義那裏奪回來了。

蒙古也本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稱外蒙古。一九一二年，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獨立。一九一七年沙皇倒台後重歸中國。一九二二年獨立，一九二四年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

國。但當時中國政府並未承認。現在，蘇聯希望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當時美英背着中國同蘇聯達成的一筆交易。

毛後來回憶說：「斯大林和羅斯福、邱吉爾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給蔣介石。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斯大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二五三—二五四頁）決定是在雅爾塔會議上作出的。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羅斯福在同赫爾利的最後談話中指示赫爾利在返回重慶時，途經倫敦和莫斯科，爭取英國、主要是蘇聯再次肯定支持蔣介石控制下的一個統一的中國。正是基於羅斯福的這一指示，赫爾利才於四月二日離美赴莫斯科之際，在國務院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公開扶蔣反共的講話，攻擊中共及其領導下的軍隊是中國統一和民主的障礙，聲稱中共的力量被高估了，國民黨軍隊才是中國最大的力量。宣稱不與中共合作，不向中共提供援助。美國的支持只在國民黨方面，還極力為蔣介石的國民大會捧場。這個講話標誌着美國的對華政策由原來的扶蔣聯共變為扶蔣反共。四月二十八日，赫爾利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着重說明美英蘇三大國在對華政策上的一致意見。（《兩個偉人和兩個大國》，二一七頁）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赫爾利同斯大林的談話，在場的有莫洛托夫。赫爾利把莫洛托夫上次的話又複述了一遍，包括中國共產黨事實上並非共產黨，蘇聯並不支持中國共產

黨。莫洛托夫當着斯大林的面說，他是這樣講的。

赫爾利向斯大林說：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都自稱遵循孫中山的主義，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又說：中國政府和中共都是極端抗日的，他們的目的都是把日本趕出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政府。當然它們之間也有分歧和爭端，在具體問題上有許多不同意見。赫爾利表明：美國堅持中國產生自己的領導，自行做出決策，對自己的政策負責；在這個前提下，美國支持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政府，並且支持統一中國的武裝力量的努力。

斯大林說，蘇聯支持這個政策，並且他將樂意為統一中國的武裝力量而與英美合作。斯大林稱頌蔣介石，說儘管在某些國民政府的官員中產生了腐敗，但他知道蔣介石是無私的，是一個愛國者，蘇聯在過去把他當做朋友。他要美國知道他完全承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美國在立即採取的統一中國武裝力量的行動中會得到他的完全支持。（《白皮書》，中譯本，一六〇頁）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斯大林又通過哈利·霍普金斯（美國駐莫斯科特使）告訴杜魯門說：蘇聯將忙於本國之復興工作，因之中國的復興大部分要依靠美國；蔣委員長是中國唯一有資格能負起統一中國責任的領袖；中共的領袖不如他或不够資格負此責任。斯大林並且聲明歡迎中國官吏參加滿洲行政的接收。他還說他完全支持採取行動來統一中國軍隊。

（《白皮書》，中譯本，一六一頁）

斯大林的這些話，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是，這些話有掩蓋蘇聯和中共關係的成分，不過是給國民黨和美國吃定心丸。據師哲說：共產國際存在時期，蘇共一般不直接同中共發生關係，有事都通過共產國際聯繫。（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二〇八頁）特別是從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後，直至共產國際解散前，蘇聯與中共的往來主要通過共產國際來進行，一般不直接發生聯繫。但共產國際是受蘇共控制的，同共產國際的聯繫實際上就是同蘇共的聯繫。既然直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共產國際解散前，中共都是它的一個支部，那就不能說蘇共不承認中共。一九四二年五月，蘇聯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以共產國際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份到延安，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回國。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還派了一個軍事情報組駐在延安。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斯大林和毛澤東有多次電報往來，商量八路軍能否抽調一部分兵力到長城附近，以牽制日軍的問題，因為斯大林十分擔心日本會進攻蘇聯。但另一方面，這些話也確實表明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不滿。他寧要一個軟弱的國民黨政府，不要一個不聽話的共產黨政府。

在國民黨方面，也覺得可以同蘇聯妥協，但不能同共產黨妥協，只要蘇聯肯支持國民黨，同蘇聯妥協也是割斷蘇聯對中共的支持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斯大林對蔣介石似乎情有獨鍾。這早在二十年代中國大革命時期就表現出來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在蔣發動反共政變前一周，斯大林還說：沒有必要試圖去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共產黨人需要國民黨右派，在國民黨右派中有能幹的軍事領袖。（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一三五頁）五月十三日，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講話，仍然說國民黨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政黨，並且說，蔣介石雖然是右派，但他在同時進行一場不管是好是壞反對奴役中國，從而削弱帝國主義的戰爭。（同上書，一一七頁；參見《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六月十四日杜魯門在華盛頓把斯大林關於不支持共產黨而支持蔣介石的話轉告宋子文（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表示滿意，又指出：關於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俄國所喪失的權利，由於和當年滿洲軍閥張作霖所簽訂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蘇條約及其附屬協定，以及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協定，俄國業已放棄在華租界，包括治外法權在內，這點是必須指明的。

美國人覺得，從蔣的反應看來，俄國人顯然已經把雅爾塔協定的內容讓他知道了。（《白皮書》，中譯本，一七八頁）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七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警告說：我們要求各同盟國

政府，首先是英美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〇八五頁）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七大的結論中說：世界上有兩種力量在鬥爭：蘇聯和各國人民的勢力是一方，反動勢力是另一方。（《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一八二頁）「資本主義是向下的。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下降了，日本的資本主義下降了，英國的資本主義也下降了。只有美國的資本主義是向上的，它的生產在戰爭中是它歷史上未曾見過的大發展，超過它戰前生產的一倍半到兩倍。……但是，美國現在的繁榮，帶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榮，美國的經濟危機很快地就要到來了。從經濟上說，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喜馬拉雅山，但這個山是要倒的。」（同上書，一八七—一八八頁）世界上這幾個大國誰是領袖？是蘇聯還是美國？有人說美國是領袖。這種說法不對。從經濟上可以這樣說，但經濟之外還有政治，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才是更強大的，那就是蘇聯。中國也要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性質？前邊說過，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反動的法西斯資本主義，一部分是民主的資本主義。反動的法西斯資本主義主要的已經打垮了。民主的資本主義比法西斯資本主義進步些，但它仍然是

壓迫殖民地，壓迫本國人民，仍然是帝國主義。……我們提倡的是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仍然有生命力，還有革命性。（同上書，一八九頁）

毛還說：現在美國政府不承認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將來也會承認的。……美國幫助蔣介石是想控制中國，中國將來可能變成以美國為主統治國民黨的半殖民地。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麻煩，我們要好好準備，準備發生這一變化。毛還談到外國無產階級和蘇聯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援助我們，我們困難來時，遠水不解近火。（《毛澤東集》補卷，日本蒼蒼社，一九五八年，二三四七頁）

六月十一日七大閉幕詞：昨天有兩個美國人要回美國去，我對他們講了，美國政府要破壞我們這是不允許的。……我對這兩個美國人說：告訴你們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我們解放區禁止你們到那裏去，因為你們的政策是扶蔣反共，我們不放心。（《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一〇二頁）

可能由於霍普金斯訪問莫斯科，中共擔心一場美蘇交易或許會使斯大林在一旦參加對日作戰時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中共還擔心美軍即將在中國沿海登陸，這樣美軍就可能突入他們控制的地區，讓國民黨部隊尾隨而來。總之，到了六月，中共已經開始感覺到，美國在他們控制地區的軍事行動是為國民黨打先鋒的。（《兩個偉人和兩個大國》，二二五頁）

毛和中共在此時間（五月底六月初）有此認識，從國際上說，主要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法西斯德國被打敗以後，美國和蘇聯的矛盾開始出現。這種矛盾集中表現在四月下旬開始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上的爭端（波蘭問題、阿根廷問題、聯合國組織的權力行使問題）。

從國內來說，主要是赫爾利貫徹執行的扶蔣反共政策大大助長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內戰氣焰。五月五日到二十一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堅持一黨專政，拒絕成立聯合政府。蔣介石在大會期間聲稱：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國外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同上書，二二五頁）六月六日，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陳誠公開聲明將向盟國租借武器進行內戰。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在七大閉幕詞中說：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一〇三頁）

七月十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評論《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其中批評國民黨宣稱的還政於民，準備召開所謂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為欺騙，說：中國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實行民主改革，例如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給人民以自由，給各黨派以合法

地位等項。沒有認真的民主改革，任何什麼大會小會也只能被拋到毛屎坑裏去。（《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一一二頁）七月十二日，又發表《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其中說：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明顯地造成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同上書，一一一四頁）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利以羅斯福私人代表的資格來延安的時候，他曾經贊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計劃。但是他後來變卦了，赫爾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說的話。這樣一種變卦，露骨地表現於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所發表的聲明。（同上書，一一一四—一一一五頁）但是毛澤東避免批評羅斯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毛在談話中說蘇聯的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但他不承認美國原子彈的作用，說：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假如原子彈能解決戰爭，為什麼還要請蘇聯出兵？為什麼投了兩顆原子彈日本還不投降，而蘇聯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們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彈了不起，這是很錯誤的。毛還批評說，相信原子彈威力是受資產階級影響：這些同志把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經常拿在手裏；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卻經常丟在腦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一三三—一一三四頁）

事實是，在波茨坦會議時，美國還沒有對原子彈進行實驗，對原子彈的威力沒有把握，所以要請蘇聯出兵。對這一點，毛澤東當時或許不知道；但他不會不知道，蘇聯宣布

參戰的時間是在八月八日，而第二顆原子彈是在九日投下的，日本宣布投降則在八月十四日晚。在這裏，毛連起碼的事實也不顧了。

斯大林本來在波茨坦會議上聲言將在八月下旬參戰，但在獲悉原子彈爆炸，日本可能要投降後，提早了參戰時間。蘇聯參戰是對中美的巨大支持，但也爲了自己的利益。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答應參戰是有條件的，主要是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俄國失去的權益，包括在中國大連、旅順、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權益。涉及日本方面的，蘇聯除了要日本交還庫頁島外，還要求得到千島群島。如果蘇聯不參戰，這些好處都沒有了。蘇聯軍隊在滿洲還移走了大批工業設備，借口說這是戰利品。美國曾多次抗議。（《兩個偉人和兩個大國》，一八四頁）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八月，宋子文、斯大林和外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開始中蘇談判。談判開始時，蘇聯要求（一）對中東路及南滿鐵路有支配權；（二）大連和旅順口租借的界限應以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以前關東半島的租借界限爲準；及（三）承認外蒙古獨立。中國和美國都覺得這些提議超過了雅爾塔協定的範圍。美國認爲，雅爾塔協定必須遵守，不多也不少，而蘇聯的要求超過了協定。美國勸中國政府於雅爾塔協定以外，不作更多的讓步。（同上書，一七九頁）

八月十四日，中華民國與蘇聯簽訂一個友好同盟條約。條約保證兩國互相尊重其主權

及不干涉彼此內政。在換文時，蘇聯允諾把在精神上和軍事上的全部援助給予國民政府。中國將承認外蒙古獨立。（宋子文曾企圖獲得蘇聯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雖則此宗主權在多年前即實際上不存在。縱令有一九二四年的中蘇條約，蘇聯在事實上自一九二〇年中期起，即已有控制該處的力量。）（同上書，一八七頁）

此條約簽訂後，蔣介石感到滿意。據赫爾利對美國國務院報告，蔣介石經常懷疑蘇聯及其與共產黨的關係。現在他承認中蘇條約指明：（一）蘇聯方面有意幫助促成中國軍隊的統一；（二）有意支持中國創造一個統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國國民政府。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有疑慮，認為斯大林在玩弄外交手腕。懷疑蘇聯仍會暗中支持中共。

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時候，斯大林給毛澤東打電報，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危險的滅亡。（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三五—頁）毛拒絕聽從這個意見。

《卡德爾回憶錄》和《蘇南衝突經歷》都記載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斯大林回憶和中共領導人的談話（應該是打電報）的情況。斯大林勸中國同志同蔣介石達成維持正常關係的條款並解散自己的軍隊，因為他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能取勝。我那時認為美國人將全力

以赴地撲滅中國起義。我曾勸說毛澤東，最好是與蔣介石和解，與蔣介石建立某種聯合政府……但以後毛澤東開始發動了一場大攻勢，最後取得了勝利。你們看，我也會犯錯誤。（《蘇南衝突經歷》，二六〇頁）

一九四五年英美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開會，發表公報說：他們一致同意，必須在國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個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國民政府的各部門必須廣泛地由民主分子參加，並且內戰必須停止。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洛托夫說，蘇聯已從南滿撤兵完畢，若非中國政府要求延遲一月，北滿撤兵亦應早已完成（延期到二月一日）。（《兩個偉人和兩個大國》，一八五頁）莫洛托夫堅持討論美軍駐華北問題。

美蘇兩方同意在履行其責任和任務後，兩國軍隊盡快從中國撤退。（同上書，一八六頁）

一個 2 + 2 的政治遊戲

英美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充勢力，對中國進行經濟剝削是事實，但這不意味着日本打進中國就是對的，就是把中國從英美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因為日本本身也是帝國主義。日本這個後起的帝國主義，不滿於中國這塊肥肉被英美霸佔，而想自己獨佔，所以發動了

侵略。德國也是後起的帝國主義，也要重新瓜分歐洲。這樣，日德兩家就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說這個戰爭在起初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直到德國打進蘇聯才改變性質。但蘇聯進兵波蘭也表明它雖然在口頭上標榜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實際上和帝國主義並無二致。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件以後，蘇聯先後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中蘇貿易協定》，向中國抗戰提供援助。毛也曾對斯諾表示，希望美國幫助中國人民打倒日本。但抗日戰爭開始後，美英等國奉行不干涉政策，而且在一九三九年一度策劃遠東慕尼黑陰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提出戰後成立一個由美、英、蘇、中四國參加的執行委員會，來維持世界秩序。開羅會議文件規定：中國應取得作為四強之一的地位，並以平等的地位參加四強小組機構並參與制定該機構的一切決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簽字國和反軸心國的國際會議，制定聯合國憲章。中國與美、英、蘇、法作為五個邀請國參加，也是經過羅斯福很大努力的。

羅斯福為什麼要這樣做？

一、美在二戰中的基本戰略為先歐後亞，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最重要的威脅來自德國，德國應是重點；美不能同時在兩洋作戰。因此，對日應取守勢。特別是一九四

○年德軍席捲歐洲後。但也要防日，支持亞洲的抗日力量，以拖住日本。這樣，中國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就有特殊價值。基於這個緣故，要援助中國，因此決定向中國提供各種援助，派遣軍事、政治顧問團，並通過廢除不平等條約，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給中國以大國待遇，使中美結成牢固同盟。

二、從戰後考慮，需要中國成爲戰後亞洲的穩定力量。日本戰敗後，中國無疑將崛起，而蘇聯在亞洲的影響也將擴大。美從維護其在亞洲及全球的利益出發，需要一個聽命於它的強大的中國。（後來中國一邊倒，美國就改爲扶植日本了。日本坐收漁利。）羅斯福注意到一個有成爲大國條件的中國對美國利益所具有的戰略價值。

三個目的：

一、抗衡蘇聯，防止蘇從東北亞向外擴張。美需要中國出現一個自由主義的、親美的政府，以抵禦蘇聯勢力。要使中國作爲俄國和美國之間的緩衝國家（羅斯福在第一次魁北克會議上語）。

二、削弱英法等歐洲老殖民主義在亞太地區的影響。

三、防止日本東山再起。

蘇對東北政策：

一、確保東部邊境安全。（西邊有東歐國家）因此力爭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的承認。

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建立親蘇政權無可能，唯一可能只是使東北成爲防禦美國滲透的緩衝地帶和屏障。

二、維護遠東地區和平。美國派出大批飛機軍艦幫助國民黨軍搶佔東北要地，根本目的是扶持蔣介石以控制全中國。

三、謀求恢復和擴大蘇聯在東北的傳統特權和利益。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失敗後，沙俄在東北的特權大部分轉讓給日本；九一八後，日本獨吞東北，斯大林對此耿耿於懷。

二戰甫結束，美蘇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對蔣介石用軍事方法統一中國的能力表示懷疑。鑒於赫爾利的偏袒政策招致中共不滿，美國派馬歇爾作爲總統特使來華，更加強調不偏不倚。但同時又在物質上大量援蔣，這在客觀上堅定了蔣發動內戰的信心。調停的本意是防止內戰，而援助又進一步觸發了內戰危機。處於夾縫中的馬歇爾，多次與蔣交涉停火，並不惜以停止美援來施加壓力，終無效果。內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派魏德邁中將來華考查。九月十九日，魏德邁返國後向杜魯門交了份長達十餘萬字的報告，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經濟上的困境擔憂，要求美國施加影響，敦促國民黨實行改革，並建議制定對蔣介石的軍事經濟援助計劃，以挽回頹勢。但要這樣做，至少要花幾十億美元，但美國已經力不從心。

一九四九年初，眼看形勢不妙，蔣介石請求美、英、法、蘇出面調停國共內戰。蘇聯

雖然拒絕了，但不久又由蘇聯大使羅申同剛上任的代總統李宗仁達成了蘇聯出面調停的三項條件，實際是支持李宗仁的以長江爲界，搞南北朝的計劃。

斯大林這樣做的原因，當然是懷疑中共能取得勝利，但不僅此而已。斯大林還害怕毛澤東會成爲另一個鐵托。如果毛的中共掌握了政權，和鐵托的南共一東一西，把蘇聯夾在當中，事情就更不好辦了；更何況中國是個大國，能造成的麻煩會比南斯拉夫大得多。比較起來，蔣介石還好對付一點。蔣介石接受了雅爾塔協定，給了蘇聯不少好處。所以，說來會使人驚訝，斯大林一度是寧要蔣介石，不要毛澤東。這是純粹從蘇聯本身的利益來考慮的，所謂國際主義原則不過是在口頭上說說罷了。

然而戰局發展如此之快，斯大林也不能不考慮國民黨徹底失敗的可能性。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斯大林派米高揚來到中國解放區，在西柏坡與中共中央會談。在此之前的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急於到蘇聯找斯大林商談。斯大林答覆說，他認爲現在毛離開指揮崗位是不合適的，但他可以派一個有威望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來聽取中共方面意見。米高揚就是這樣到來的。他申明，他只是帶耳朵來的，不發表意見。

毛在向米高揚介紹黨內情況時，特別說到王明、李立三這些人雖然犯了錯誤，給黨造成巨大損失，但仍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米高揚很注意這一點，後來向斯大林作了匯報，據說斯大林沒有表態。（《在歷史巨人身邊》，三八四頁）

毛還告訴米高揚：我們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執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我們充滿信心，不達勝利，誓不罷休。這是黨和人民的決心和信心，是絕對不可動搖的（這當然是針對斯大林的意見說的）。毛還談了一通假朋友和真朋友的問題。任翻譯的師哲說：當時米高揚在注意地聽，好似忐忑不安。（同上書，三八五頁）在延安整風期間，毛在批評王明時小心地避開了斯大林問題。毛顯然還想爭取得到斯大林對他的支持，然而斯大林不會不明白，對王明的批評就是對他的批評。

在中共黨內，斯大林支持過王明；在中國國內，斯大林又支持蔣介石。斯大林支持的都是毛澤東的對手，而不支持毛，這當然使毛惱火。

一九四九年二月，毛對到西柏坡來的米高揚談到中共掌權後說：這個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說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爲人民民主專政更爲合適、更爲合情合理。

（關於它的組成問題）我們認爲，它必須是個聯合政府。名義上不這樣叫，而實際上必須是聯合政府。……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在中國共產黨手裏的。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三三頁）

國民黨和中共都在玩把戲。國民黨答應實行民主改革，以便向美國要錢，但卻用這錢來打內戰；

這是一個2+2的政治遊戲。中共竭力向美國表示，它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同時它奉行獨立的政策，也不是唯蘇聯之命是從的，以便取得美國的支持。

而蔣介石則竭力說服美國：中共不可信，中共是蘇聯的工具。

美國擔心蔣介石無力統一中國，而蘇聯既不願意也不相信毛澤東能戰勝國民黨。

在蘇聯這一方，對毛澤東並不信任。它寧肯支持蔣介石。因為蔣介石可能比毛澤東好對付一些，可能更聽話一些。而毛澤東如果當權，可能成爲第二個鐵托。他可能造成的麻煩，會比蔣介石要大。另外蘇聯也希望美國放心，蘇聯願意用支持蔣介石爲條件，換取在東北的特權。而美國也樂得跟蘇聯做這一筆交易。蔣介石當然也同意。

所以在這個遊戲中，中共一度是被美蘇雙方冷落的。

美蘇希望中共以一個黨派的資格參加政府，當然是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這又是毛澤東不能接受的。這和毛澤東的聯合政府的主張是不同的，與聯合政府中要建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思想是不相容的。

美國扶植國民黨是希望中國成爲美蘇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抗衡蘇聯的勢力擴張。但蔣介石一敗塗地，中共取得政權，宣布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建國不久，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決定參戰，其因素亦有證明自己並非鐵托之意。但另一方面，美國轉而扶植日本，作爲防共的勢力，日本坐收漁利。

當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政治協商會議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他掩蓋了兩件事實：第一，在抗戰結束後，英美已經宣布廢除和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收回了租界；同時在羅斯福的倡導之下，中國作為五強之一，作為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當然，這個強國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名義上的。第二，與此同時，中國和蘇聯還簽訂了不平等的中蘇條約。蘇聯還在中國東北享有特權。中國並沒有完全站起來。

（一九九六年九月）

第五章

斯大林和毛澤東

劉少奇訪蘇

自從毛澤東成爲中共的領袖，斯大林覺得失去了對這個大黨的控制權。既然這個農民的兒子敢於不接受他的指示，那麼他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據赫魯曉夫回憶，「他（斯大林）總是翻來覆去地問：『這個毛澤東究竟是什麼人？我對他一無所知，他從未來過蘇聯。』」斯大林常稱毛澤東是「麥淇淋（人造黃油）」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懷疑毛澤東所持的立場是狹隘的農民立場，懷疑他害怕工人，忽視工人階級而孤立地建立紅軍。

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夕，毛急於見斯大林。顯然，他考慮到建國以後要依靠這位老大

哥的支持和援助。

一九四九年五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蘇。

「斯大林顯然是在竭力彌補什麼，他對劉少奇的熱情接待，從一開始就是不尋常的。」七月十日，劉少奇應邀到斯大林別墅赴宴。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等一班中央政治局委員依次站在大門前迎接。宴會持續近四小時，邊吃邊談。「斯大林說話很慢，吐字清晰，態度謙和，時帶微笑，沉穩莊重。」「以後，代表團同斯大林的直接會談有五六次之多，每次會談都有使人興奮的內容。斯大林說了許多動情的話。他對中國的革命給予高度評價，讚賞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說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應用到實際中去，中國有許多經驗值得蘇聯學習。……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將逐漸東移，中國在世界上要承擔更多更重要的義務。他說，後來者居上是合乎發展規律的，願中國人民奮力前進，趕上和超過蘇聯！在整個會談的過程中，自始至終熱情洋溢，充滿真摯友好的氣氛。斯大林對劉少奇表現了極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會神地聽劉少奇的談話。對劉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見，多次表示同意和讚賞。」斯大林還說，「我們干擾過、妨礙過你們，我爲此感到內疚。」「斯大林的這種自我批評的態度，反而使劉少奇爲之不安，盡量把它避開。」（參見《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三」，轉引自《中共黨史資料》第四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五七頁；朱元石《劉少奇一九四九年秘密訪蘇》，轉引自《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二四三—二四四頁）

在會談中，斯大林承認了他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犯的錯誤。一次宴會上，斯大林講到中國共產黨是成熟的黨。斯大林心頭這時可能浮上了鐵托的陰影，他似乎對將來有了某種預感，說：

「我們兩兄弟之間的友好團結是最重要的，對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在世，我們兩國人民應該是團結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應該是團結的。團結就是力量！」

斯大林還講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蘇聯，現在又轉移到中國。他舉杯祝酒說，希望小弟弟超過老大哥。翻譯師哲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劉少奇聽了非常緊張，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釋說：「世界革命的中心東移，你們身上的責任加重了，這是我們衷心的願望。」劉少奇還是不肯接受，說：「老大哥還是老大哥，小弟弟還是小弟弟。」蘇聯同志都勸說：「弟弟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是規律。斯大林的祝酒應該接受。」推讓了半個小時，劉少奇還是沒有喝這杯酒。蘇聯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師哲《峰與谷》，紅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五二頁）

對這件事，王光美有一個解釋。她回憶說，劉少奇當時之所以不喝這杯酒，是因為聽說蘇聯黨內傳達，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已很難辦，中共勝利可能更難辦。劉少奇回國後向毛彙報；毛說不接受那杯酒是對的，並讚揚劉此行的成功。（《黨的文獻》，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斯大林祝願中共超過蘇共的誠意是要打折扣的，但毛澤東不贊成接受那杯酒也並不表示他不想當老大哥，只是不願意承認罷了。劉備依附曹營時，竭力韜晦，唯恐曹操識破他的雄圖。有一次曹操和他「青梅煮酒論英雄」。曹操把劉備提出的當今英雄一一否定了，最後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恭維話把劉備嚇了一大跳，筷子都掉在地上了。這就是「說破英雄驚殺人」。

毛澤東訪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從北京出發，訪問蘇聯，為斯大林祝壽，並就兩黨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到達莫斯科，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回到北京，歷時三月。為什麼在蘇聯逗留了這樣長的時間呢？

毛澤東宣揚說是他受了冷遇。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說：「一九五

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九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去蘇聯談判中蘇友好條約，斯大林死不簽字。後來我拍桌子大罵，才簽了字。簽字也是假的。」

根據伍修權、師哲這樣的權威的記述，我們可以相信劉少奇訪蘇時受到的待遇是熱情的；爲什麼幾個月以後，對毛澤東的待遇會截然不同呢？還有，斯大林真的是「死不簽字」嗎？

這個問題上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伍修權的說法是：

去後，斯大林很客氣，但僅僅是一般禮節上的客氣，並沒有打算簽訂條約。斯大林爲什麼開始不願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呢？這是斯大林考慮不周，他開始只考慮毛主席去莫斯科是爲了給他祝壽。這是個事實，但不能太簡單了。當然蘇聯也考慮到它曾與國民黨簽訂了一個條約，有一定的約束力。從抗日戰爭勝利到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到東北時，蘇聯有一個指導思想，就是怎麼讓國民黨接收東北，保證一九四五年條約的實施。同時，蘇聯也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把蘇聯打得太苦了。毛主席對斯大林的態度很不高興，說斯大林太簡單了，「我毛澤東來莫斯科就是爲你斯大林祝壽嗎？」所以後來發了脾氣。（伍修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經過》，引自外交部外交

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北京，一〇一一頁）

伍修權是後來隨周恩來去莫斯科的。

讓我們看看當時任翻譯的師哲的回憶；他的記載應該是最具權威性的，因為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所有談話他都在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到達莫斯科時，蘇聯的接待還是相當熱情隆重的。到火車站迎接的有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帥布爾加寧、外貿部長孟希科夫、副外長葛羅米科等等，只是沒有斯大林。

毛似乎是一個不拘禮節的人，他第一次去莫斯科就提出不要什麼歡迎儀式。幸好蘇聯官方沒有照辦，隆重地接待了毛，規格很高。所有最高級官員都到機場去歡迎毛，只是沒有斯大林。斯大林從沒有出來迎接或歡送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蘇日訂立中立條約的時候。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簽約後離開莫斯科，斯大林親自到火車站爲他送行，還同他擁抱和親吻。可以出來送日本外相，就不能出來接中國領袖嗎？毛澤東對斯大林沒有出來是很在乎的，爲此很有氣。後來斯大林逝世時，毛澤東是唯一沒有去莫斯科參加葬禮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領袖。

當天下午六時，斯大林和毛澤東見面。蘇方陪同會見的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維辛斯基。當時在場的中方首席翻譯師哲記載這次初次見面

的情況如下：

斯大林雙手緊握毛主席的手，注視端詳了一陣，說：「你還很年輕嘛！很健康嘛！紅光滿面，容光煥發，真了不起！」接着回過頭來，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紹給毛主席。大家在大廳裏站成一圈，相互問好、祝願。斯大林非常激動，對毛主席讚不絕口，說：「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有話無處說……」毛主席言猶未盡，斯大林卻把話接了過去：「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這句話堵塞了毛主席的言路，但他並不自知，毛主席的心裏話，始終未能說出來。（《峰與谷》，五五頁）

初次見面，對方擯棄前嫌，大加讚揚，自己卻忍不住滿腹牢騷，可見毛澤東的積怨很深。但這種場合，講這種話，的確叫人難堪。師哲說斯大林的話堵住了毛澤東的嘴，斯大林還不自知；其實，恐怕斯大林也是有意的。

斯大林並非沒有對中共表示過歉意。就在幾個月前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向他說，「在你們進行的鬥爭中，我們是不是擾亂過或妨害了你們呢？」劉少奇說沒有。斯大林說，「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過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們講的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瞭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講錯話。」

不過，如果我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到的。」（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四一四頁）

斯大林可能覺得，他主動提出這個問題，把話講到這裏，就可以了。但這個話在毛看來，還差得遠呢！劉少奇沒有把意見說出來，因為他究竟不是第一把手，比較拘謹；毛則不然，他是有一大堆話要傾吐的。斯大林說勝利者不受譴責，似乎表示主人的寬宏大量，但是毛不需要他的寬宏大量，而是需要他的道歉。現在不是勝利者該不該受譴責的問題，而是犯錯誤者該不該受批評的問題。

在以後的幾次會談中，斯大林沒有主動提他的錯誤，也沒有給毛一個傾吐積怨的機會。他沒有意識到這種迴避的態度觸惱了毛澤東。

第一次會談，雙方海闊天空，談得很多，歷時兩個多小時。據當時蘇方翻譯費德林的回憶，「從第一次會見起，斯大林一直是很有分寸的，對客人很客氣，全神貫注地聽對方說話，從不分心。」（費德林《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三四頁）師哲說，談話從一開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圖。他再三問：「毛澤東先生，你來一趟不容易，那麼我們這次應該做些什麼？你有什麼想法或願望？」

初次見面，斯大林竟然不稱毛澤東為「同志」而稱「先生」。在這裏他無意中流露出

他仍然沒有把毛看做是真正的共產黨人，這肯定又使毛不高興。

本來，在此前幾個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就對他表示過：一九四五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那時是與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這個理由其實是不能成立的；不管一個國家由誰執政，都不應該用不平等條約來對待它）。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即可來莫斯科。待毛澤東來莫斯科後再解決這個問題。（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四〇五頁）所以毛澤東和斯大林都是心中有數的，但斯大林沒有先提出，而是問客人有什麼想法，這是等待毛澤東明確答覆。據師哲的分析，斯大林可能是不願日後有人說他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因為他過去在中國問題上犯了錯誤，所以表現得十分謹慎。本來這時毛澤東完全可以明說的，偏偏他不正面答覆，而說：這次來，一是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二是為看看蘇聯，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想看一看。這樣說，好像除了祝壽，就是來旅遊了。

顯然斯大林覺得毛的答覆很空洞，於是再問：「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這表示的相當明確了：蘇方願意和中國簽訂一個條約。

毛澤東仍然繞圈子：「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既好看，又好吃。」

這一下，蘇聯人糊塗了，全都目瞪口呆；貝利亞還笑出聲來。

師哲說，毛的話是「中國很有魅力的語言，富有哲理和幽默」。但在我看來，這種繞圈子的話沒有什麼意思。

斯大林仍然繼續婉轉地詢問。毛繼續迴避，只是說：「我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斯大林感到驚訝，尋根究底地問：「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麼事情，爲什麼還叫他來？他來幹什麼？」但毛不再回答了。

斯大林顯然沒有弄懂毛的用意。關於簽約的問題，毛認爲要蘇方主動開口，而不是他向蘇方提出。毛的心態似乎是，如果他先提出，就顯得他有求於蘇方。雖然這本是無足輕重的小事，毛也不願意這樣做，於是就讓斯大林猜謎。斯大林以爲，中蘇之間如果要簽訂什麼條約，理所當然地要由他和毛澤東這兩個領袖來簽字。但毛澤東卻不願意這樣做，而要把總理兼外長的周恩來請到莫斯科來完成這項任務，自己站在比較超脫的地位。

會見後不久，斯大林又給毛澤東打電話，詢問毛的打算要求。毛還是諱莫如深，只說：「這些嘛，等周恩來同志來了再談吧！」

斯大林憂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羅申等人來拜訪、交談，想摸清毛的願望；他還親自給毛打電話，問是否有新的考慮等等，甚至還給翻譯師哲打電話，了解毛的想法。然而師哲也不了解毛在想些什麼。

但當陪同代表團到莫斯科的科瓦廖夫和費德林有一次到別墅來看毛時，毛卻對科說：

「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什麼事也不辦，我是幹什麼來的？難道我來這裏就是爲天天吃飯、拉屎、睡覺嗎？」

要說發脾氣，就是這一次。毛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同尤金談話，也說到「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費德林當翻譯。我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我說：我在這兒有三個任務，一吃飯；二睡覺；三拉屎。」（《毛澤東外交文選》，三二六頁）

有沒有拍桌子，師哲沒有說。但師哲在書中別的地方說，他在毛身邊十八年，「從未看到他發脾氣以至到了拍桌子打板凳的程度。」（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二三九頁）那麼，毛爲什麼要誇大其詞，說自己「拍桌子大罵」呢？我想，不過是顯示一下，他敢頂斯大林而已。他雖然實際上沒有這樣做，但他確實是想這樣做的。

事後，毛情緒很好，高興地對師哲說：他這樣教訓科瓦廖夫，是想要他向斯大林反映毛的不滿。師哲分析：科不會這樣做。第一，他不大可能見到斯大林；第二，他也不敢。中國人的傳統想法是對僕人的態度，就意味着對主人的態度；對下級的態度，就意味着對主管上級的態度。但蘇聯人的下級在外面受了氣，只說明他不會辦事，上級知道了，更會對他訓斥。

果然，科瓦廖夫回去後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沒有講毛發脾氣，卻誣衊了一大通中國。

隨後，莫洛托夫又來看望毛，再一次試圖摸清毛的意圖，仍無所獲。

師哲的另一篇回憶略有不同。他說到在毛發脾氣以後有一天，毛主席對斯大林說，我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斯大林表示驚訝，問爲什麼叫他來，他來幹什麼？斯大林很願意他自己同毛主席簽個條約，而毛主席是想讓周恩來同維辛斯基兩位外長簽，斯大林對此不理解。當時還有一件事，英國通訊社造謠說，斯大林把毛主席軟禁起來了。消息傳出後，蘇聯有些着慌，斯大林問毛主席要不要到外地走一走？毛主席理解這是他們爲發表一條消息，要通過報道他的活動來闢謠。毛主席當即表示同意。在去外地參觀之前，蘇聯外交部發表了一個公告，說毛澤東去列寧格勒參觀訪問。周恩來從北京出發來莫斯科。英國通訊社的這條謠言就不攻自破了。（《毛澤東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經過》，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北京，第五頁）

據赫魯曉夫的回憶，斯大林對毛還是表現得很熱情的，但是在毛逗留期間，曾經一連幾天沒有去看毛，也沒有叫別人去款待他。「有些風言風語就開始傳進我們的耳朵，說毛一點都不愉快，他被緊緊地關在屋子裏，沒有一個人理睬他，等等。毛傳出話來說，他就要離開了。斯大林聽到毛的埋怨之後，我想他又給毛舉行了一次宴會。斯大林很想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我們同毛相處得非常好，我們是堅決站在中國人民一邊的。」（《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

根據這裏的敘述，毛的牢騷還是透露出來了一些的。所謂一連幾天沒有去看毛，大概不是一種故意怠慢，而是對毛摸不透。毛說他受冷遇，未免誇大。至於說斯大林不肯簽訂條約，更是不符事實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祝壽大會，毛澤東的祝詞高度評價斯大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反響很大。斯大林一再側過臉來和毛說話。會後舉行文藝演出。結束時觀眾一再歡呼「斯大林！毛澤東！」「毛澤東！斯大林！」

但是，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宮參加祝壽大宴時，毛卻沉默寡言；斯大林等人再怎樣引逗，他也無絲毫笑意。

然後是參觀、看幾十部電影……

斯大林爲了避免可能和中方產生嫌隙，又作了一次努力：他把科瓦廖夫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給他的秘密報告交給了毛。斯大林說：「這是科瓦廖夫自己寫的，不是我們授意的。」

*我問過曾經陪同江青到蘇聯治病的林利，毛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的時間那樣長，是蘇聯方面有意怠慢他嗎？林利認爲不是，是雙方都等待對方先說話。毛主席是等待斯大林認錯。後來五十年代那次去，毛就自以爲是斯大林以後的最權威的人物了。十月革命紀念節，毛主席不同主人打招呼，自己把宋慶齡、郭沫若拉上主席台。那時這兩個人連共產黨員都不是。蘇聯人有些意見，因爲誰上主席台是事先鄭重研究過的。中國黨方面有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已經是特殊照顧了。

在這個報告中，科瓦廖夫議論中共的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反蘇親美的，但中央領導還支持他們；還說到高崗如何受劉少奇打擊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四〇一—四一頁）高崗通過科瓦廖夫反映這些材料，是想投靠蘇方；斯大林這樣做，當然把高崗犧牲了。這表明斯大林不願意利用中共內部的分歧，唯恐這樣做會損害兩黨的關係。

然而，蘇方仍然摸不清毛的意圖。

這樣過了十幾天，什麼進展也沒有。其他國家紛紛猜測。英國通訊社甚至說，斯大林把毛澤東軟禁起來了。

爲了闢謠，駐蘇大使王稼祥建議，毛澤東以向塔斯社記者答問的方式，向外界發表談話。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塔斯社發出了一則電訊，其主要部分是：

問：毛澤東先生，您在蘇聯將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幾個星期。我逗留蘇聯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要的時間。

問：你所考慮的是哪些問題，可否見告？

答：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此外，我還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蘇維埃國家的經

濟和文化建設。（《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

毛終於點到了條約問題，蘇方明白了。當晚八時，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的住處，詢問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等事的意見。這時，毛提出了三種選擇：一，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二，兩國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公報，說明雙方對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交換了意見；三，發表一個聲明，講兩國關係要點。蘇方當然贊成第一個辦法。

毛明明知道蘇方的意圖，又何必繞那麼大的彎子呢？

莫洛托夫和米高揚走後，夜十一時，毛給中共中央發了電報，說蘇聯方面已同意周恩來來莫斯科。這樣，周恩來奉命到莫斯科。

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並開始談判後，有一次毛還向斯大林談起自己在十年內戰期間如何受錯誤路線的排擠和打擊的事。師哲描述當時的情況說：斯大林認真地聽着。毛突然指着王稼祥說：「就是他們打擊我，他就是在蘇區犯錯誤的一個。」斯大林說了一句：「啊，王大使！你還這麼厲害，你也是犯錯誤的一員。」可是話剛開頭，就被別的話岔開了。毛還是沒有機會一傾衷腸。

會談期間，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又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美國造謠說，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的四個地區合併到它的版圖之中。蘇方建議：中、蒙、蘇三方各發表一項官方聲明，

駁斥這個謠言。一月二十一日，三國聲明都發表了，蒙蘇兩方都是以外交部長名義發表的。中方的文件是毛澤東親自寫的，但是以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對新華社記者談話的方式發表。蘇方十分注意這件事，認為中方沒有按照事先商定的協議去做，因為新聞總署不是權威機關，不能代表政府。斯大林對毛說：「我認為，我們都應該信守諾言，緊密配合，步調一致。」來日方長，今後需要相互配合的事還很多，希望從這次事件吸取教訓。「這次事件雖然沒有什麼大了不起，但我們沒有按照原定計劃去做，亂了步伐，給敵人留下了可鑽的空子。」

也許毛在潛意識中對外蒙問題不大舒服，但外蒙獨立已經是事實，這次聲明規格太低只能說是不妥，被蘇方抓住了，沒有什麼可辯護的。但毛顯然覺得，他還沒有批評斯大林，現在倒反過來受到斯大林的責怪，尊嚴受損了，一言不發。

後來，毛澤東向尤金追述這件事時說，「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時，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們進攻。」（《毛澤東外交文選》，三二六頁）

這次談話結束後，大家坐在一個車上，前往斯大林別墅。在車上，空氣很僵。

師哲想打破沉悶，同斯大林閒聊，談到斯大林要不要到中國代表團住處去做客的事。

毛問師哲：「你和他談的什麼？不要請他到我們那裏做客。」

師哲承認所談的正是這件事。

毛說：「把話收回來，不請他了。」

這個話是很任性的。怎麼能這樣做呢？連起碼的禮貌都不顧了。

斯大林似乎猜到毛和師哲談的事涉及他，就問師哲：「他說什麼？」師哲把話岔開了。

在那天斯大林為客人舉行的晚宴上，毛不說不笑，氣氛特別冷清。

這種情況會使斯大林有什麼感覺呢？顯然，他會覺得毛澤東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在這種場合，周恩來做什麼？

恩來雖然也說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個舉動，每一步驟總是緊跟着毛澤東的步伐和情調。然而卻並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趨」。他表現出自己的意志、立場，他的舉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禮節，他沒有喪失尊嚴和原則，也沒有損傷自己的形象，更沒有表現出遲滯、呆板或失措。他總是想方設法地自然地調節、緩和緊張氣氛，以便造成一種較活潑的環境、融洽和諧的氣氛。（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四五八頁）

我援引這一段，是爲了讓讀者看出，這就是周恩來扮演的角色。直到「文化大革命」，周始終扮演這樣的角色。

這一次中蘇談判，問題不在蘇方的怠慢，而在所訂的條約是有些不平等的。儘管和蘇

聯同國民黨政府訂的條約比起來要好一些，但並沒有完全的平等。這也是蘇聯對待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貫態度。^{*}蘇聯取得了特權，斯大林怎麼會「死不肯簽字」呢？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很快就談好了。同時還商談了《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貸款給中國等兩個協定。根據貸款協定，蘇聯決定貸款三億美元給中國，作為購買蘇聯機器之用。蘇聯缺乏稀有金屬，特別是鎢、銻等，在條約附件中講清楚了，我們每年要向蘇聯提供多少鎢等稀有金屬。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簽字。（伍修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經過》，引自《新中國外交風雲》，一二頁）

之後毛周都回國了，李富春和伍修權留下來同米高揚談經濟問題。其中關於盧布與人民幣的比值問題，蘇聯恃強壓人，不按一般國際慣例，根據主要產品價格綜合平衡，得出指數，找出差距，確定比值，而是採取抬高盧布比值，壓低人民幣比值的辦法，要我方同意。我們很不高興，發生爭執。經請示中央，中央說照顧大局吧，最後作了讓步。（伍修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經過》，引自《新中國外交風雲》，一三頁）

^{*}國際上普遍認為蘇聯給中國的貸款很少，說明兩國關係並不是那麼好。有的說，中國想得到二十億至三十億美元的貸款，可是實際上只得到三億美元，還不如不久前蘇聯給波蘭的貸款多（引自《蘇聯的外交政策》一三五—一三六頁；費伊托《中國與蘇聯》，七三頁）。這個話說得不對。三億美元是中方提出來的。毛澤東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給中央的電報說：「我們提出的要求是三萬萬美元，分幾年付支，我們所以不提較多的要求是因為在目前數年多借不如少借有利。」（《毛澤東外交文選》，一二二頁）

伍修權還回憶道：按照協定，蘇聯應將中長鐵路的經營管理權、旅大的蘇軍根據地及其設備，全部移交中國政府。而蘇方堅持要在對日和約簽訂以後交還，最後協議至遲不超過一九五二年底。後因朝鮮戰爭未結束，我方主動建議蘇軍繼續駐守旅大。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鮮停戰，一九五五年蘇軍從旅大撤離。蘇軍撤走後的武器還算了錢。是否要錢多了？但當時我未主動還價，所以我們也有責任。（引自《新中國外交風雲》，一四頁）

毛之所以在蘇聯滯留三個月之久，除了他有意和斯大林捉迷藏外，也由於他想利用這時間多作一些觀光。這一點在他答塔斯社記者中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這畢竟是他第一次出國，而且是到蘇聯。從毛澤東和斯大林的接觸看，斯大林的表現是熱情的，有禮的，謹慎的；如果有什麼差錯的話，就是沒有親自出來迎接和開始時稱「先生」。毛澤東卻顯得不坦率，不落落大方，有些小氣，有時甚至任性。如果說毛心裏有芥蒂，這可以理解；然而那樣的表現，卻是一種不健康心理的流露。他內心深處有沒有一種對斯大林的顯赫地位的嫉妒呢？

毛後來回憶說：

我在見到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麼樣。我不太喜歡看他的著作，只看過《論列寧主義基礎》、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長文章、《勝利衝昏頭腦》等。他寫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我更不愛看。他和列寧不同，列寧是把心給

別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則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這種氣氛。我見到他以後就更不高興了，在莫斯科的時候和他吵得很厲害。斯大林有脾氣，有時衝動起來，講一些不大適當的話。（《毛澤東外交文選》，二五九頁）

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搞了東北和新疆兩處勢力範圍、四個合營企業*。後來，赫魯曉夫同志提議取消了，我們感謝他。（同上書，六三五頁）

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做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後的民族。你們說歐洲人看不起俄國人，我看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

（同上書，三二三—三二四）

另外，我們對米高揚不滿意。他擺老資格，把我們看做兒子。他擺架子，可神氣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來西柏坡的時候，架子就很大。後來又來了幾次，架子都很大。（同上書，三二四頁）

為什麼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幹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中國是

*指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屬公司、造船公司這四個合營企業的建立，對當時中國的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蘇方企圖把合營企業變為獨立於中國主權之外的經濟實體，在一些做法上損害了中國的權益。

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同上書，三二六頁）

有三件事：第一、二次王明路線。王明是斯大林的後代。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並沒有滅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時，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們進攻。

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八六頁）

毛還在這個報告中批評王明等人「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准革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八三頁）「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八四頁）說斯大林和王明等人「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甚至把他們殺

了，這其實是說得不對的。斯大林和王明殺的人大部分並不是犯錯誤的人。

一九五六年九月，毛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時指出：「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報告中也談到了這一點。爲什麼不公開說明這就是斯大林的路線呢？這也有原因。蘇聯可以批評斯大林，我們批評就不那麼好。我們應該和蘇聯搞好關係。」（《毛澤東外交文選》，二五二頁）

毛說中共有四次吃斯大林的虧，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時期，斯大林派王明回國，搞右傾路線，一切服從國民黨。第三次是日本投降後，斯大林和羅斯福、邱吉爾簽訂《雅爾塔協定》。「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斯大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第四次，「就是說我是半個鐵托或准鐵托。不僅蘇聯，就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有相當一些人曾經懷疑中國是否真正的革命。」（同上書，二五二—二五四頁）

斯大林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的地位，就像毛的父親在家中的地位一樣。毛小時反抗過父親的權威，他勝利了。這件事對毛的性格影響很大。過去，王明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做後台，毛抵制過他，得到了勝利；現在，毛直接面對輸了牌的斯大林，爲什麼就不可以對這個龐然大物頂一頂呢？

（一九九七年六月）

第六章

怎樣總結蘇共教訓？

中國人習慣於說「文革」是「史無前例」，但這不應當了解為它在歷史上是沒有淵源的。無論是蘇共的歷史還是中共的歷史，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都是屢見不鮮的。問題在於儘管它多次發生，卻從來沒有當做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把真相公布於世，引起公眾的注意和齊聲譴責，直到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做他的有名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國際上的大事是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報告。在國內有好幾件重要的事情：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提出了「雙百方針」；中共八大召開；《人民日報》發表兩篇論無產階級政專政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回憶錄》附錄二，七四九—八〇八頁）這個報告像一顆原子彈，引起了全世界共產黨人和普通人民的強烈震動。

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進行了大規模鎮壓和恐怖行動。他透露了許多驚人的內幕，包括斯大林把一九三四年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中的一千一百零八名（一半以上）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逮捕，把這次大會選出的一百三十四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九十八名（百分之七十）打成「人民公敵」而槍斃。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第一屆政治局成立到一九五三年底，擔任過政治局委員的共產黨領導人中有十九位先後逝世，其中只有六人是自然死亡（斯維爾得洛夫、列寧、古比雪夫、加里寧、日丹諾夫、斯大林），其餘十三人中，九人被判死刑（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魯祖塔克、布哈林、季可夫、柯秀爾、丘巴爾、沃茲涅辛斯基、貝利亞），二人自殺（托姆斯基、奧爾忠尼啓則），二人被暗殺（基洛夫、托洛茨基）。

報告譴責斯大林在國內的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以後，沒有正當理由，就去實行異常的大規模恐怖活動。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從一九三六年後發展到可怕的程度，這是在清除托洛茨

基分子的名義下進行的。赫魯曉夫問：「當時的托洛茨基分子對於我黨和蘇維埃國家是不是真的那樣危險呢？」他用事實說明不是這樣。「這種恐怖行動並非專對已經失敗了的剝削階級的餘孽，而是施加在黨和蘇維埃國家的真正活動家身上。」爲了使這種迫害合法化，斯大林發明了這個理論：社會主義越是勝利，敵人就越是增多。

斯大林要抓什麼人，就說這個人是「人民公敵」。內務部根據斯大林的意圖擬定名單，事先就判好刑，然後送斯大林批准。「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共有數千名黨、蘇維埃、共青團、軍隊以及經濟部門的活動家三千八百三十一份名單交到斯大林手裏，斯大林批准了這些名單。」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斯大林出於自己的猜疑心以及別人的挑撥中傷，對許多軍隊幹部也實行了鎮壓，「他們包括從營長、團長，到高級軍官。在這個時期，那些在西班牙及遠東戰爭中獲得豐富作戰經驗的軍官，差不多全被消滅了。」

三十年代的大逮捕起因於一九三四年底列寧格勒第一書記基洛夫的被暗殺。斯大林說這是季諾維也夫集團的陰謀。一九三六年八月，季諾維也夫、加米諾夫等十六名老布爾什維克被控在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秘密恐怖中心，策劃殺害了基洛夫，並準備下一步暗殺斯大林。這十六個人全部處死。從此開始全國性大迫害。接着，一九三七年一月，進行第二次大審訊，指控皮達科夫、圖哈切夫斯基等十七人是托洛茨基反蘇中心的領導

人，勾結德國和日本法西斯，進行破壞蘇聯國民經濟的活動，陰謀推翻蘇維埃政權。這十三個人同樣被槍決。

當時斯大林號召，全國人民和共產黨員，開展「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大膽懷疑」，提供「人民敵人」的材料。「即使批評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這樣的批評也是我們需要的。」於是掀起了一個全國性的誣陷和告密的狂熱。

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說：時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隱藏着許多無法說明的地方。刺殺基洛夫的尼古拉也夫可能得到警衛工作的某個人的協助。刺殺發生後的一個半月，這個刺客被捕，但很快就被釋放。負責保衛基洛夫的契卡工作人員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被傳訊，但途中死於車禍，而同車的其他人卻無一傷亡。內務部列寧格勒分部幹部被判很輕的刑罰，卻在一九三九年全部被處決。這使人懷疑是消滅罪證。

後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補充說：刺客在行凶前曾受到契卡的注意並加以拘留，發現他帶有槍枝，但因某人的指示兩次釋放。車禍是提審人員故意製造的。「就這樣，保衛基洛夫的人被打死了。然後，那些殺害這些人的人也被槍決了。這事絕非偶然，這乃是預謀的罪行。誰可能幹這件事？」赫魯曉夫沒有下結論，但他的所指是很清楚的。現在蘇聯歷史學家的看法是：一九三四年，因為黨內有人不滿意斯大林，想抬出基洛夫來接替斯大林的位置。基洛夫威信很高，獲得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的一致擁護。在當年

二月的蘇共十七大上，受到全體代表的熱烈鼓掌的是基洛夫，而不是斯大林。在選舉中央委員時，基洛夫只差三票就是全票，而斯大林有約二百七十人沒有投他的票。這樣，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基洛夫的威脅。

斯大林獨斷專行，自居於黨和人民之上，根本不把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放在眼裏，許多決議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許多決定沒有通知其他政治局委員。他不按黨章規定召開黨代表大會；八大到十九大之間相隔了十五年。

他踐踏法制，指示採取殘酷的肉刑手段來逼迫口供。他說：「任何資產階級諜報機構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代表都是採用極其殘酷的肉體壓迫的，既然如此，難道社會主義的諜報機關卻允許對資產階級的凶惡敵人採取人道主義的態度嗎？」於是，一件又一件的假案就這這樣製造了出來：「列寧格勒陰謀總部案件」、「格魯吉亞的明格列爾民族運動組織事件」、「醫生謀殺案」……一批又一批的優秀的共產黨人，如曾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沃茲涅辛斯基，曾當選黨中央書記和擔任國家保安機關的監察工作的庫茲涅佐夫，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魯祖塔克，還有柯秀爾、丘巴爾、波斯蒂謝夫、科薩列夫等黨和國家的優秀活動家被謀害。

赫魯曉夫報告說，兩年來已經為七千六百七十九人恢復了名譽；當然，其中許多人已經死了。

斯大林的迫害不僅針對個人，他還強迫一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卡拉恰伊人、車臣—印古什人、巴爾卡爾人）全部遷移到其他地方。赫魯曉夫沒有說到的是，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把遠東的海參威、伯力等地的中國僑民全部遷移到高加索一帶，還把其中一部分驅逐到新疆。（李正文《蘇聯肅反擴大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赫魯曉夫還揭露了斯大林如何喜歡自吹自擂，如何鼓勵個人崇拜，如何陶醉於文學藝術中的歌功頌德。

人們可能會詰難：在那時，你們中央委員會這幫人在什麼地方？你們為什麼不及時反對個人崇拜？赫魯曉夫解釋說，在列寧去世後，斯大林為捍衛列寧主義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威望很高，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後來斯大林開始濫用權力；誰要試圖起來反對斯大林的錯誤，這個人必然成爲鎮壓行動的犧牲品。何況，在斯大林晚年，中央委員會沒有召開過全會，政治局也只是偶爾開過幾次會。

赫魯曉夫還認爲斯大林有一個消滅政治局內老同志的計劃，因爲這些老同志了解他的底細。

在報告的結尾部分，赫魯曉夫稍稍緩和了對斯大林的譴責，他說：「斯大林認爲這些措施都是捍衛工人階級利益，他是從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利

益來處理這些事的。我們不能把這些說成是錯誤的暴君的行為。他認為，爲了黨和勞動群衆的利益，爲了捍衛革命的成果，必須這樣做，這就是一切悲劇之所在。」

有意思的是，赫魯曉夫在他晚年寫的回憶錄裏改變了這個說法。他說，「有人爭辯道斯大林的動機是爲了人民的幸福，不是出於利己主義的目的。真是瘋狂透頂！爲了人民的幸福，他竟把人民的最優秀的兒女置於死地！」大概這才是他的真話。（《赫魯曉夫回憶錄》，二九頁）

對於蘇聯清黨時期的恐怖氣氛，美國著名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說：「那些年，特別是在一九三七年，在全體蘇聯公民的記憶中是一個精神上非常苦惱的時期，這種苦惱是由於許多不加說明的逮捕和這些逮捕引起的猜疑所造成的。人們在夜間被抓走了，從此不知下落。」斯特朗還談到，被抓的常常是那些不該抓的人。她所在的《莫斯科新聞》編輯部就被抓了三個，而這三個恰恰是最有能力、最積極的工作人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七四—七五頁）

當時也在蘇聯的師哲這樣說：「那時的氣氛使人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壓力，人人顧慮重重，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口。清黨、肅反運動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大喊大叫，造成了不由分說的局面。其做法也是這樣，只要有人控告，寫匿名信揭發，甚至僅僅是提出懷疑，不管你的資格有多老，即使是列寧時代的黨員；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即使是中央委員、

蘇維埃代表、黨委書記、部長，還是黨外著名人士、有貢獻的知識分子；——都可能隨時被逮捕、關押、審問、判刑，甚至可能被槍決。」（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八〇頁）

師哲舉了一個親身的例子：有一天一個年輕人約他去打網球，馬上就有人告發，說這個年輕人是同日本領事館的一個官員打球。這個人一時想不開，就拔出手槍自殺了。

當時不僅大抓國內的無辜者，而且共產國際的外國共產黨人也不例外。蘇聯人民內務部把共產國際看做是外國間諜打入蘇聯的主要渠道，不僅抓在共產國際工作的蘇聯人（本書曾經說到的米夫，就是在這一次被捕的），而且抓外國同志，給許多外國黨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匈牙利共產黨的創建人、曾任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實際領導人的庫恩·貝拉被捕並被槍決；遭到同樣命運的還有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十二名委員。在蘇聯的波蘭共產黨領導人是全軍覆滅，連波共也被解散了。南斯拉夫在蘇聯的全部領導人都被捕；鐵托正好回國去了，所以幸免於難。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兩個國家的共產黨中央領導人也全部被捕，多數被槍決。德國共產黨人因為逃避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大批地逃到蘇聯。結果逃脫了法西斯的魔掌，卻沒有能逃脫斯大林的鐵腕。一九三二年四月底在共產國際德國代表處登記的成員中，至少有八四二人被捕，其中有三名德共政治局委員犧牲。犧牲者還有德共中央書記等重要成員。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第十九期的《莫斯科雜誌》說：

如果我們說，每一個住在國外的日本人都是間諜和每一個住在國外的德國公民都是蓋世太保的特務的話，這無論如何不是什麼誇張。

當時在蘇聯的中共黨員還有一個李正文，他是在十一月被捕的。他因為懂一點日文，就被當做日本特務嫌疑而判刑，送到勞改營，在冰天雪地的蘇聯最北部勞動，每天勞動十至十二小時，還吃不飽。他說：

一九三五年夏天，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號召反對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所以，從這個時候起，蘇聯人被捕的凡是到過外國的，例如參加過中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據我所知，加侖、鮑羅廷、阿基莫夫夫婦等，都被抓起來判為日本間諜，多數處以極刑了。凡是到過歐洲的外交人員，都被判為德國希特勒的間諜了。在蘇聯的外國人，包括共產國際的各國代表團，除了少數像王明、康生之流每天給蘇聯寫誣告信的人之外幾乎全部被捕。我住在蔡特金住過的那個招待所裏，共四男三女，只有一個女的每周定期向上面寫誣告信而受到優待沒有被捕外，其他四男二女先後被捕。據我在監獄和勞動改造營所見，凡是東方人都是日本間諜嫌疑，凡是西方人都是德國間諜的嫌疑，因找不到任何證據，所以「特別會議」只好用「嫌疑」的罪名來判罪了。當時被抓的人當中，蘇聯人沒有出過國的，則按地區分，住在亞洲的都是日本間諜嫌疑，住

在歐洲的都是德國間諜嫌疑。（李正文《蘇聯肅反擴大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單單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的大逮捕就高達五百萬人之多。有人估計，在勞改營裏，服苦役的政治犯，至少一百萬人以上，很可能達到三百萬人。

沃爾科岡諾夫寫道，整個衛國戰爭期間，我們損失了近六百名將軍，而斯大林在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期間消滅的高級將領是這個數字三倍。軍隊中共鎮壓了四萬三千名指揮人員，多數在四十歲左右，授過勳，是軍隊的精華。（參看費德林《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六三一—六四頁）

斯大林並非全然沒有意識到，這樣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可能使人們覺得太過份了。一九三九年，他在達到目的之後在聯共第十八次代表上講了一大通鎮壓「人民公敵」和清洗「蛻化變質分子」的必要和偉大成績後，但又不得不承認：「決不能說，在進行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遺憾的是，所犯的錯誤竟比原來預料的還多。」（《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五七頁）死了那麼多人，斯大林卻僅僅表示了一下「遺憾」。

那麼斯大林爲什麼要這樣大規模清黨呢？僅僅是由於他疑心重嗎？僅僅是爲了保衛人民的利益嗎？

許多人願意從好的方面來解釋這一點。但是這是解釋不通的。讓我們從斯大林的女兒敘述的一件事來看。斯維特拉娜和一個戲劇作家卡布勒爾談戀愛，斯大林知道後大怒。他下令把這個作家抓起來，並且對女兒說，卡布勒爾是個「英國間諜」。那麼證據呢？沒有。卡布勒爾多次出過國，並且認識在莫斯科的幾乎每一個外國記者。這就夠了。從斯維特拉娜的書中看，她的父親並沒有向她說明，她的心上人何以是間諜。但不管怎樣，卡布勒爾整整十年失去了自由。自然，這對戀人被拆散了。很明顯的是，斯大林並不是因為卡布勒爾是什麼間諜而不許女兒同他戀愛，而是因為反對女兒的戀愛而隨意給卡布勒爾安了一個間諜罪名。（參看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十六章）

師哲說了一句他看到的情況，肅反除了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緒以外，也「助長了個人迷信的發展。那時，人們心目中最正確、最英明、最神聖的人物只有一個，就是斯大林，大家只需要鸚鵡學舌般地重複他的話就夠了……」（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八三頁）

斯特朗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隨着年齡和權力的增加，他變得更加多疑、更加專斷、更加確信對他的最輕微的一個字的違背就是反革命。有人會診斷說這是自大狂；我認為這個名字不恰當。我寧願說：「權力是會腐蝕人的；……沒有任何人像斯大林一樣在這樣長的

時間內享有這樣大的權力。」（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一四一頁）

政治警察的專橫權力是斯大林時代的最大禍害。這不僅是斯大林發明的，它是從沙皇時代的「黑百團」中產生，並在列寧時代的「恐怖」中培育起來的。……這樣的恐怖曾經伴隨其它革命而發生，其中包括美國的和法國的革命。但是設立政治警察比廢除它要容易。統治者發覺它有用，能夠用來鉗制持異議的人。因此，在一九二二年準備把政治警察下交給地方政府領導時，斯大林卻決定把它集中起來，作為一種控制的工具。（同上書，七八頁）

斯大林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他成功地使人民相信了這樣做的必要。斯特朗記述了她的兩個朋友的說法。一個說，如果政治警察抓到一百個嫌疑犯，但不能確定誰是叛徒，那麼就該把所有的人都殺掉，而那九十九個無辜人應當寧願死去也不能讓一個叛徒活着。另一個人對斯特朗講了一大通世界革命的道理，強調蘇聯對於拯救世界文明的責任，結論是「那些懷疑的人或從中阻撓的人，不但是蘇維埃國家的叛徒，而且也是全人類的叛徒」。（同上書，七九頁）這番話竟使斯特朗啞口無言。

後面這個人是中國人熟悉的，他就是曾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幫助中共建黨的鮑羅廷。他在一九四九年大約和斯特朗同時被捕，後來死在集中營中。

李正文證實，這種觀點是普遍的。「這是即將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預防措施。因為隱藏起來的危險敵人是容易分辨出來的，只有把所有可疑的人都抓起來，以免漏掉一個敵人給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造成無窮的損害。因此，我們這些人就應當為保衛蘇聯這個無產階級祖國，犧牲自己、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逮捕。」李正文還敘述，他在獄中碰到陳郁。這個參加過廣州起義的老共產黨員勸李正文不要去給斯大林寫什麼申訴書，說：

我們不要寫申訴書。我們這些共產黨人就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一切的。在全世界帝國主義即將向蘇聯進攻的時候，他們派來大批潛伏特務，使得我們的陣營裏面，敵我難於分清；我們寧願犧牲自己，不要因為釋放我們而讓真正的敵人混出去。我們這一輩子的冤枉，認了！（李正文《蘇聯肅反擴大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對革命忠心到這種程度，也近於痴呆了。難道自己不是革命的一分力量？難道因為難於分清就不要分清？難道殺害革命者不正是敵人要做的事情？即使在戰爭中，目的也不是僅僅消滅敵人，而且要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正是為了保存自己。如果用犧牲兩個或更多的人為代價來換取消滅一個敵人，此外毫無所得，這難道能說是打了勝仗？

陳郁這樣的共產黨員把革命和斯大林看得高於一切，革命就是斯大林，而個人是微不

足道的。他們忘掉了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必要的時候爲大眾的利益犧牲是值得的；毫無必要的犧牲則是不值得的。既然他們自己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如草芥，那麼領袖對他們就更可以生殺予奪了。陳郁這種思想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盲目地相信斯大林在當時是普遍的。許多忠誠的共產黨人在臨刑時還高呼「斯大林萬歲」！他們對敵人是充分的警惕性的，對共產黨的領袖則從不懷疑。他們不知道，正是這種愚忠的態度培養了「革命的」暴君。正是因爲有這樣一大批愚忠的追隨者，斯大林的神話才有市場，斯大林才能爲所欲爲。

斯大林爲了給大規模的清洗製造理論根據，用他的「階級鬥爭激化論」來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斯大林發展了列寧的這個觀點：在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三六頁）斯大林說：「正因爲他們愈來愈弱，他們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於是不得不用盡一切力量，採取一切手段來進行反抗。」（《斯大林選集》下卷，一四〇頁）又說：「階級的消滅不是經過階級鬥爭熄滅的道路，而是經過階級鬥爭加強的道路達到的。」（《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北京，四七三頁）

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斯大林作蘇聯憲法草案報告時，他宣布：蘇聯社會的階

級結構發生了變化，「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只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而他們之間的界限正在消除。（《斯大林選集》下卷，三九四—三九六頁）

僅僅幾個月以後，一九三七年三月初，斯大林在聯共中央全會講話，題為《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的辦法》。斯大林斷言：「在我們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組織中，……都在某種程度上碰到了外國代理人的暗害、破壞和間諜活動，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他們「不僅打入我們的基層組織，而且竊取了某些重要職位」。（《斯大林文選》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一一二頁）

既然宣布了工農和知識分子的界限正在消除，他們之間當然不會有什麼矛盾和鬥爭；如果有什麼鬥爭，那就只能是存在人民和敵對的剝削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可是已經宣布了剝削階級的消滅，怎麼辦？於是就說還有「殘餘」。一點點殘餘怎麼能有那麼大的力量？那麼他們必定是受外國敵對勢力雇傭。按照這樣的邏輯，斯大林說，「托洛茨基主義不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了」，現在它已經變成「一伙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凶手組成的寡廉鮮耻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是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任務進行活動的」。（《斯大林文選》上卷，一一八頁）他再次批判了「階級鬥爭熄滅論」，再次強調：「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凶惡，他們愈加要採用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緊最絕望的鬥爭手段來作最後的掙

扎。」（《斯大林文選》上卷，一二九頁）

最初，斯大林只是就路線和政策問題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爭論，包括階級鬥爭是否激化的問題；到後來，斯大林的論敵都變成階級敵人。把黨內正常的爭論說成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又把自己的對手當做敵對階級的代表而加以消滅，這是斯大林發明的辦法。

毛澤東的反應

斯大林問題的揭露，是一個軒然大波，震驚了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和善良的普通人。

赫魯曉夫報告引起了巨大的衝擊波。世界輿論大嘩，各國共產黨人紛紛發表評論文章。

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爲什麼會出現斯大林問題？這樣的問題，爲什麼不在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出現，而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呢？建設社會主義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嗎？或者這僅僅是由於斯大林個人的殘暴性格嗎？這種現象可不可以避免？

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和左派知識分子都在思索這一問題。許多有名的作家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動搖了；另外一些人則認爲應該好好總結經驗教訓，找出防止的辦法。

然而在一片驚呼聲中，中國共產黨人顯得很冷靜。

如果中共抓住這個機會，很好地進行反思，總結經驗教訓，進行自我批評，那麼後來

的重犯斯大林的錯誤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共準備這樣做嗎？

對於批判斯大林，毛澤東應當感到滿意。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他比斯大林高明。

但是，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他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赫魯曉夫的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一五頁）後來，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會議上，他又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懼的是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

實際上，赫魯曉夫並沒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績，也沒有徹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卻妨害了毛澤東，因為毛正要搞對自己的崇拜。這才是毛的真正所「懼」。

斯大林這個偶像倒下去了，按照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統觀念，一定要有一個人來繼承他；這個人要有長期領導革命鬥爭的資歷和豐功偉績，要有卓越的領袖才能和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威望。那麼，誰有這個資格呢？

以毛這樣的性格，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雄心，這是極為自然的。

現在，斯大林已經不再是毛的對手，赫魯曉夫也沒有被毛看在眼裏，可是對個人迷信的批判，卻妨礙了毛澤東。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種萬人膜拜的威風。

中共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第一個公開的反應，是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一論》）。

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主要是毛澤東的意見寫成的。毛澤東指示：「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迷信的姿態，正面講一些道理，補救赫魯曉夫的失誤；對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嚴重錯誤，更要強調他的偉大功績；對我黨歷史上同斯大林有關的路線錯誤，只從我黨自己方面講，不涉及斯大林；對個人迷信作一些分析，並說明我黨一貫主張實行群眾路線，反對突出個人。」（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七頁）從毛的這個意見看，毛並不覺得在中國有個人迷信問題。從討論會上的發言看，並沒有什麼分歧。文章在發表前經過毛澤東多次修改。*

《一論》分析了個人迷信的社會根源，認為個人崇拜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種腐朽遺

*關於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起草情況，參看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一章。修改情況，參看李捷《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對斯大林問題的思考》，收入《毛澤東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一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產，是小生產的習慣勢力。「個人崇拜不只在剝削階級中間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中間有它的基礎。大家知道，家長制就是小生產經濟的產物。」

二十多年後，中共《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則說到「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

《一論》表示了對蘇共的支持，說：「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迷信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北京，一頁）「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展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正是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在前進的道路上掃清思想阻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鬥爭。」（同上書，七頁）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他們是有缺點有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犯錯誤的好人。必須把鐵托的觀點徹底駁倒……。斯大林主義非保持不可，糾正它的缺點和錯誤，就是好東西。這把刀子不能丟掉。」（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一八一—一九頁）。

56.04.25

有趣的是，二十多年後，中共中央在評價「毛澤東思想」時，卻不允許說毛澤東思想包含錯誤，而說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毛的錯誤區別開來。這樣以來，毛澤東思想就成了完全正確，沒有錯誤的東西。

一個值得注意的小地方是，蘇共用的是「個人崇拜」這個詞，中共後來則改用「個人迷信」。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但這為毛澤東為「個人崇拜」恢復名譽埋下了伏筆。

——「迷信」無論怎麼說都是不好的；「崇拜」就不一定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心思想是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其中有一節「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毛在這裏說：「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至於機關、學校、部隊裏清查反革命，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但是毛指示，「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既然是「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為什麼不捉、不起訴、不審判呢？法院不審判，誰來判定是「真憑實據的反革命」呢？毛澤東把清查和處理反革命的權限交給機關、學校和部隊的黨委了，這是違反憲法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剛通過兩年。這種做法看起來寬大，其實隱藏着危險：如果不抓不關不殺的人也可以是「反革命」的話，那麼給一個人定為「反革命」就不算回事了。

毛沒有提到他在一九五四年做出決定，把胡風一伙作家打成「反革命集團」的事。胡風是由法院判了刑的，這是一樁冤案。這裏毛想避免斯大林抓人殺人太多的錯誤，但是他和斯大林一樣凌駕在法律之上。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

劉少奇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大會在對這個報告做出的決議中說：「我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

鑒於蘇聯的教訓，八大對黨的建設提出了兩個新問題：一個是執政黨的考驗問題；一個是防止個人崇拜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新黨章的黨綱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因此特別應當注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並且用極大的努力在每一個黨組織中，在每一個國家機關和經濟組織中，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生活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鬥爭。」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新的考驗。」他指出，這種地位容易使黨員沾染上官僚主義習氣和滋長驕傲自滿情緒。因此需要實行黨內的監督和來自黨外的監督，需要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鄧還提出，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

關於第二個問題。八大的黨章總綱針對把個人神化的錯誤思想，提出：「任何政党和

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的。」鄧小平在報告中說：「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繫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

鄧接着說，在中共黨內，長時期內，集體決定重大問題已形成傳統。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現象一旦發現，就要受到黨中央的批判和糾正。接着，他把中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中的一大段話念了一遍，並高度評價了這個決定的意義和作用。

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在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同時，從來沒有否認領袖的作用。領袖的威信、影響和經驗乃是一黨、階級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對於這一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是感到特別親切的。」「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

這位總書記繼續說：在革命勝利前夕，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禁止給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名等。黨中央也歷來反對向領導人發致敬

電和報捷電，反對在文藝作品中誇大領導人的作用。

「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這個報告一方面不得不表示對個人崇拜的反對態度，一方面又沖淡了這個問題對中共的現實意義。它提醒人們：不要因此否認領袖的偉大作用；中國人民對領袖的愛護是正常的，並非把領袖神化；個人崇拜在中國只是有某些反映而已，而且中國共產黨早已注意這個問題了。總之，對個人崇拜問題雖然要講，但不必過份擔心。

56.09.15

但是有一件事肯定使毛很不高興，儘管他未便表示出來。那就是在蘇共譴責個人崇拜的影響下，八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提法，改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這是彭德懷的建議，他一提出就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彭德懷在「文革」中承認：「五六年八大時是我提出（從黨章中）劃掉毛澤東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劉少奇的同意，他說：『還是劃掉的好吧！』我是反對個人迷信的。」（《彭德懷案件專輯》，香港聯邦研究所，一九六八年，四四五頁。轉引自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求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一八一—一一九頁）

劉少奇的八大政治報告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這和在七大政治報告中他用很大篇幅盛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時劉說，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在長期奮鬥中最大的收穫與最大的光榮，它將造福於我國民族至遙遠的後代。」（《劉少奇選集》上卷，三三三頁）

毛澤東當時只能和大家一起表示同意。但他的內心是怎麼想的呢？彭德懷和劉少奇兩個人以後的厄運，難道和這件事沒有關係嗎？

斯大林踐踏人權，殺害了無數無辜的人們。人們都不能不深思，為什麼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會發生這樣的暴行？這是毛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毛不願由蘇聯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聯繫到自己。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多事之秋。

一九五六年的十一月十一日，鐵托在普拉市向伊斯特拉地區共產主義者積極分子發表講話。在談到斯大林問題時，鐵托說，這「不僅僅是個人迷信問題，而是一個使個人迷信得以產生的方法或實踐問題」。「這些根子在哪裏呢？在於官僚的機構，在於領導方法，在於忽視勞動群眾的作用和願望……」他譴責霍查、謝胡和東西方一些黨的領導人，「他們抗拒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且他們對斯大林制度的鞏固出了不少力，他

們今天正在努力恢復這個制度，並使它重新佔上風。根子就在這裏，這是需要糾正的。」（《鐵托選集》一九五二—一九六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北京，一一九—一二〇頁）

鐵托沒有譴責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相反，他認為不應該停留在這裏，不應該把整個問題歸結為單純的個人崇拜問題，而應該進一步從制度上追究錯誤的根源。卡德爾在談到匈牙利問題時也說，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

這時的毛澤東也在思考和總結國際共運的經驗教訓。他不同意赫魯曉夫的看法，認為赫魯曉夫犯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他也不同意鐵托的看法，認為不是制度的問題或路線問題，而是思想認識問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說：「我們不贊成蘇聯的一些事情，黨中央已經跟他們講過好幾次，有些問題沒有講，將來還要講。」「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二一—三二二頁）毛沒有提到斯大林這把刀子殺了多少無辜的人。

毛還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二三頁）在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擴大民主，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

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南斯拉夫的。文章提出要區別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應把內部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文章說：「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基本上是適合於經濟基礎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爲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對於經濟事業的管理來解釋斯大林的錯誤，認爲政府管理了經濟事業就必然成爲妨害社會主義力量發展的『官僚主義機構』，這也無法令人信服。」（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北京，二三頁）

文章指責斯大林「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列寧主義的政治制度，並不是這個制度不好；恰恰相反，是這個制度被破壞了。至於這個制度爲什麼會被破壞，文章說，這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即：缺乏經驗，新的制度還不鞏固，國內外的緊

張鬥爭對於某些民主發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僅僅這些客觀條件並不足以使犯錯誤的可能性變為現實。在比斯大林所處環境更加複雜得多和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列寧卻沒有犯斯大林這樣的錯誤。在這裏，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斯大林後期被一連串的勝利和歌頌沖昏了頭腦，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嚴重地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而陷入了主觀主義。」斯大林的錯誤，「有社會歷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認識的根源。」（同上書，二四頁）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鐵托同志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說和各國共產黨對於這篇演說的評論，在我國報紙發表後，再一次使人民提出了許多需要加以答覆的問題。」這篇文章就是來回答這些問題的。

文章首先提出了一個基本的立場問題。它說：「在觀察現代國際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首先從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出發，就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間的對立。」這包括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中，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說，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共產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屬於後一種。（同上書，一四頁）

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衝突，而是由於正確

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鬥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當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後，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互相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否認階級鬥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上書，一六一—一七頁）

這一段文字是經過毛澤東反覆修改過的，可以看做是毛的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最初表述。文章還說，當帝國主義者向各國共產主義隊伍進行瘋狂進攻的今天，我們的團結尤為重要。「大敵當前，那些妨害國際共產主義隊伍團結的言論和行動，無論用了什麼名義，都難於指望獲得各國共產主義者和各國勞動人民的同情。」

毛澤東含蓄地表述了這個意思：鐵托把人民內部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因此他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可是，對於把人民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來對待的斯大林，為什麼仍

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且是「偉大的」呢？

在敘述斯大林最大的錯誤——所謂「清黨」或「肅反」時，《再論》批評斯大林「在階級消滅以後仍然強調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因而妨害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又說，斯大林在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這條戰線上的任務；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同上書，二二頁）

56.12.29
這種措辭小心地把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功過保持了平衡：一方面，又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反革命，也冤枉了「許多」好人；「基本上」完成了任務，也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還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一論》還是《再論》，都沒有把斯大林鼓勵個人崇拜的問題放在應該有的重要地位。《一論》中還說了幾句反對個人崇拜的話；到了《再論》，卻幾乎沒有了。在談到斯大林的錯誤時，只是說「他開始迷信個人智慧和權威」，以及說蘇聯共產黨在「破除斯大林的迷信」等方面，表現了巨大的勇氣，此外關於反對個人迷信的話就一句也沒有了。

可以看出，在毛的潛意識裏，是不喜歡提反對個人崇拜的。

在分析這樣的問題時，把斯大林的罪行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予以原諒和開脫，把

對斯大林的罪行的批判當做妨礙團結和沒有正確對待「人民內部矛盾」來反對，這正是毛的這個學說所要起的作用。照毛的說法，在共產黨內部的肅反，無論主持其事者陷害或冤殺了多少人，也無論他的動機是什麼，只要他不是敵人的間諜或潛伏的暗害者，他仍是「同志」，應當按「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例如李韶九、夏曦、康生）；但如果農村的某一個小地主不守規矩，「亂說亂動」，哪怕沒有造成什麼損失，也要馬上制裁。

毛澤東說的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轉化為敵我矛盾，並不指這些人，而是指陳獨秀、張國燾這些人，雖然他們的具體情況有很大不同。毛的這個觀點為打擊不同政見的同志準備了理由。

這樣，兩個共產黨的領袖，鐵托和毛澤東，分別對斯大林問題做出了不同的總結，引出了不同的教訓。鐵托認為問題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毛澤東認為主要是斯大林的驕傲和思想方法問題。鐵托認為斯大林的錯誤是路線性的，是佔主導地位的；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不是路線問題，是第二位的。

我們來考查一下《再論》的這一句話吧：「斯大林後期的一些錯誤，之所以發展成爲全國性的、長期的、嚴重的錯誤，而不能得到及時的糾正，正是因爲他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

這一句話的邏輯是混亂的。「後期的一些錯誤」何所指？本來，脫離群眾和破壞民主

也是錯誤，可是從句子看，似乎沒有把這包括在內；那麼，「一些錯誤」大概僅僅是指個人崇拜和肅反擴大化了。就是說，脫離群眾和破壞民主是因，個人崇拜和肅反擴大的惡性發展是果。可是難道後者的發展過程不也是前者的發展過程？如果個人崇拜和肅反擴大化已發展成爲「全國性的、長期的、嚴重的」錯誤，爲什麼作爲其原因的脫離群眾和破壞民主卻只限於「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其實，個人崇拜和肅反擴大的事實本身就說明，斯大林的脫離群眾和破壞民主制，已經到了嚴重脫離和完全破壞的地步。爲了說明「一些錯誤」的發展，文章舉出了另一些錯誤，但另一些錯誤的發展過程同樣需要說明。人們還是要問：爲什麼會這樣？

要害問題在於：爲什麼斯大林一個人能夠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爲什麼黨和人民不能去糾正斯大林的錯誤，而任其發展下去？民主集中制爲什麼能蛻變成爲一種專制制度？這個問題被文章作者迴避了。

文章作者認爲單是客觀原因說明不了斯大林現象，強調斯大林本人是決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在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又面臨一個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這時他們卻強調經驗不足，錯誤難免等等，而不用毛澤東和中共評價斯大林的方法，強調個人因素了。

斯大林現象之所以產生，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斯大林的個人因素；個人因素不僅是思想方法問題，而且有性格問題和個人品質問題。爲什麼不指出斯大林的殘暴呢？因爲

這會使中共尷尬。提出「殘暴」，就不能歸因於認識根源，而要找階級根源了。按照黨的教條，「殘暴」只能是剝削階級的階級性；斯大林是無產階級領袖，怎麼好說他有剝削階級的階級性呢？

問題在於，爲什麼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在產生了驕傲和主觀主義，脫離了群眾和破壞了民主集中制以後，竟然沒有任何力量制止他，因而使他能夠繼續這樣做下去，一直發展成爲全國性的、長期的、嚴重的錯誤呢？

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中共的文件想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中共要從社會歷史找根源，但不從現實制度找根源；從個人的思想認識找根源，但不從個人的性格找根源。

從文章的某些話來看，中共似乎是想接受教訓的。《再論》說，這些錯誤既可以在他們身上發生，也可以在某些別的同志身上發生。因此在認識和糾正了他們的錯誤以後，就需要把這種錯誤看作嚴重的教訓，看作一種可以利用的財產，用來提高一切共產主義者的覺悟，從而防止重犯這種錯誤，並且推進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這個話說得很好。但是，如何防止重犯這種錯誤呢？只是提高共產主義覺悟就行了嗎？只是要求領導人不要驕傲，不要脫離群眾就行了嗎？

支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思想是：他們要保護斯大林，保護那個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和鐵托的一個重要分歧在於斯大林的錯誤是不是和蘇聯的制度有關。毛在《再論》中反駁南斯拉夫的觀點說：

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

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由於實行了國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實行了黨的領導，恰恰是由於他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壞了黨的領導。

一個黨的領導，一個民主集中制，在毛看來，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其實它們只屬於列寧主義），是社會主義制度中根本的東西，是萬萬動不得的。企圖改變這兩個東西，就是修正主義思潮。毛在《再論》中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任務：

一部分共產主義者由於對斯大林採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由於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口號，因而幫助了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思潮無疑是有利於帝國主義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的，而事實上，帝國主義也正在積極地利用這種思潮。

這種思潮包括「借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企圖削弱或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削弱或者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黨的領導作用。」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

56.03.00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蘇共「二十大」一來，有些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人，這時候也反得很積極。我看這些人不講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問題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包括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你從前那麼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

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幹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三

三—三三四頁）

當時，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只在中央範圍內進行了討論；隨後在省委書記以上的

幹部參加的中央擴大會議上，由劉少奇報告中央對斯大林問題的觀點。至於在廣大黨員中，只是對秘密報告作了口頭傳達，並沒有發下文字材料，也沒有進行認真的討論。給人的印象是，斯大林的罪行究竟是共產黨內的一件醜事，有損社會主義國家的威信，還是少談為好。

中共只是要黨員學習《一論》、《再論》，並在黨內造成一種看法：還是我們的黨水平高。世界上其他黨都只知道譴責斯大林，只有我們黨分析了斯大林的錯誤的認識上的原因，並且肯定了他的功勞是第一位的。

毛澤東自己也是這樣看的。在八大預備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他說：「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我們看到的批評斯大林錯誤的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或者很少提到這個問題。斯大林為什麼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九七頁）

毛澤東可能自以為，這才是提到了哲學的高度。其實，這種話等於沒有說，因為「錯誤」一詞的含義，就是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如果人們問：「什麼是錯誤？」這樣回答是可以的；如果問為什麼犯錯誤，這樣回答就不行了。人們還會問：「為什麼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符合？」國內多年流行的哲學課本和讀物，就是把犯錯誤的原因歸結於「主觀不符合於客觀」，以為一切錯誤之所以產生，都是由於沒有弄懂或違背了「存在第一性，思

維第二性」，「思維是存在的反映」這個原理。這其實是很幼稚的。

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回憶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九

三頁）

這是人們第一次得知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鄧小平之所以引用這句話，是因為他要論證制度的重要性，但他說出這樣的話，卻在無意中改變了中共過去的立場。鄧沒有告訴我們毛的這個話是什麼時候說的。從這句話來看，毛澤東是明白問題所在的。英、法、美都是憲政國家，有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如果有人像斯大林那樣濫用權力，早就被趕下台了。可見，要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轍，答案本來是現成的。但毛的這個話在以前從未見諸文字，而見諸文字的話是和這相反的。《再論》批評鐵托，恰恰是因為鐵托認為斯大林問題的根子在於制度。為什麼毛沒有沿着這個思路探索下去呢？為什麼毛公開說的話和他的沒有發表的話相反呢？原因是不難想到的：這是出於某種政治的考慮。如果毛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豈不是美化資本主義了嗎？對於毛來說，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哪怕是斯大林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何況，毛本人也像斯大林一樣是一個喜歡集權的人，他絕不能容忍中國實行英美式的民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第七章

一九五七年：從正確處理人民 內部矛盾到反右派

知識分子問題

一九五六年一月份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表明這個問題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知識分子問題是中共必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中共在成立初期，成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後來轉入農村，建立根據地，發展武裝力量，大批農民於是進入黨內。黨的領導骨幹逐漸變為以農民出身為多。從成分看，中共已成為一個農民黨。抗日戰爭時期，大批知識分子擁入延安。在一九四二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中，這一部分人成為批判和審查的主要對象。毛澤東告訴他們要恭恭敬敬為工農服務，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知識分子在黨內的地位是低於工農的。革命戰爭勝利後，共產

黨進了城，建立了全國性政權，吸收了一些黨外民主人士參政。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入城市，不能不大批使用知識分子。共產黨接管了許多工廠和文教單位，留用了其中的知識分子。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要來領導他們，和他們共事，於是，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突出起來。大多數農民出身的幹部，在知識分子面前，既有自卑感，又有不服氣的情緒。他們認為「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現在起用一些知識分子，他們不過是坐享現成罷了。他們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習慣、語言、作風，都看不慣，覺得知識分子是異己力量。有的幹部喜歡在講台上說，「我是大老粗」，表面上是自貶，實際上是自傲。

在知識分子方面，儘管革命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很多切身的利益，可是，他們普遍對共產黨有一種敬仰和感恩之情。由於中國長期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受盡了帝國主義的欺侮，多數知識分子有一種憂國憂民的意識。他們信仰過別的主義，嘗試過走別的道路，可是失敗了。現在他們不能不承認，是馬列主義和共產黨拯救了中國，使中國站起來了。他們也看到了共產黨政府的廉潔和共產黨員的獻身精神。在共產黨面前，他們有「自愧弗如」的情緒，一種自卑感。儘管他們有知識，可是不懂馬列主義；而且毛澤東對他們說，這種書本知識是沒有什麼用的。在共產黨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面前，他們有一種誠惶誠恐的感覺。他們不太了解共產黨；共產黨那一套，他們也往往覺得不能適應和不習慣。

五十年代，中共面臨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在客觀上迫切

需要採用科學技術，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因而需要依靠知識分子。五十年代開始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問題，實質上是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農業文明轉變為工業文明所面臨的農民地位和知識分子地位的變化問題。共產黨成功地領導了推翻國民黨的戰爭和土地改革。作為一個農民黨的中國共產黨，能領導這個向工業國的轉變嗎？如果要能夠，共產黨必須改變它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並使自身來一個大轉變。

在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中，周恩來是少數了解和關心知識分子的人之一。在知識分子問題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央作了一個全面的講話。這個講話的主要內容是：

一、爲了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周指出，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爲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爲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二、周恩來批評了對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以及使用和待遇上的不合理，提出要了解他們，給他們應得的信任和支持，給他們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

三、要繼續改造知識分子，進行必要的思想鬥爭。但是，不能採取粗暴的態度，必須通過本人的自覺。

四、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巨大而迅速的進步，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類面臨着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我們必須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爲此，要在三

個月內，定出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計劃。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周恩來以他實幹家的嚴謹和細緻，不僅提出方針和任務，還定出了具體措施（保證知識分子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於業務，派遣人員出國學習，聘請外國專家來華，加強圖書檔案技術資料的工作，擴大高校招生名額，成立中國專家局，政府各部迅速建立必要的研究機構，等等），以及中宣部、中組部、中聯部、總工會等部門的分工和責任。如果照這個方案執行，是完全可能實現的。

周恩來的這個報告的意義不在毛的雙百方針之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報告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科學技術革命問題。但這個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計劃後來由於毛澤東的干擾而未能實現。當世界先進國家在進行技術革命的時候，我國在進行的是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七〇年代末，才驚悟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而我們已經耽誤了幾十年的時間了。

當時，毛澤東是支持這個方案的。在這個會上，他一改延安時期輕視知識分子的態度，批評有人說的「不依靠知識分子也行」。他強調要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並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

五月，毛澤東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心思想是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

來，爲社會主義服務。同月，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九月，召開黨的八大。大會宣布，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確定了在經濟建設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平衡中穩步前進的建設方針。這一切，都是吸取了斯大林問題的經驗教訓，爲探索走我國自己的道路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毛澤東總結蘇聯經驗

毛澤東認爲蘇聯的經驗，蘇共沒有能力來總結；現在這個任務落在他頭上了。

其實，避免出現斯大林的錯誤，中國已經有一個現成的東西，就是憲法。

中國在一九五四年制定了第一部憲法。憲法的頒布，理應標誌着急風暴雨的群眾性革命鬥爭時期已經結束，進入正規化的和平建設時期。過去主要是按照共產黨的政策和指示辦事，今後應強調法治，強調一切遵守憲法和法律，共產黨也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憲法規定了公民享有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信仰自由、科學研究和文藝創作的自由。這種權利，政府是不得侵犯的。如果公民犯了罪，就要按有關法律去處理。但憲法和法律不是只要老百姓遵守，政府和共產黨也要遵守。任何人都不能凌駕在憲法和法律之上。只要這樣作了，就不會出現斯大林那樣的暴行。

然而毛並沒有循着實行憲政民主的思路前進。他不能也不想擺脫列寧主義的思維模

式：任何問題的解決，都要靠黨的領導。所謂黨的領導就是毛的領導，它高於憲法，高於法律。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這個方針曾經在知識界引起了熱烈的響應，甚至引起了國際上的重視，好像是一項毛澤東的新創造。其實，一九五四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早已明文規定了藝術創作和科學研究的自由了；不但如此，憲法還規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等等。毛澤東本應該重申共產黨遵守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但他卻把藝術和科學的自由挑出來，當做黨的一項政策，恩賜給群眾。這是一個倒退。人們對雙百方針的歡呼，只是表明憲法被遺忘了，只是表明毛澤東的權威高於憲法的權威。如果這種自由是建築在個人的權威和黨的恩賜之上，那它就成了靠不住的東西。領袖和黨既然可以制定這樣的政策，那也就可以收回這樣的政策。後來的事實果然如此。憲法之所以被遺忘，因為它沒有真正實行過。五四年憲法頒布不久，就發生了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胡風等一批無辜文化人身陷囹圄；這就是一次大規模的違憲事件，而決策者正是憲法起草主持人毛澤東。這裏的教訓何在？看來不是有了憲法就萬事大吉，還要解決一個監督執行的問題，如果發生違憲事件誰來追究和審判的問題。蘇聯也在一九三六年制定了憲法，並稱之為斯大林憲法。用個人名字來稱呼憲法，這本身就有問

題。這個斯大林憲法，就遭到了斯大林本人的破壞。問題在於沒有制約斯大林的力量——誰也管不了他。個人凌駕在憲法之上，領袖凌駕在人民之上，這就是恩格斯說的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這就是異化。要避免重蹈蘇聯覆轍，要真正實行憲政，正應該從這裏出發來考慮問題。

然而，毛澤東不是這樣考慮問題的；他認為應當靠黨自己來糾正錯誤，而不是對黨的領導加以限制或提出質疑。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一些地區發生罷工、請願事件，人數少則十多數十人，多則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有萬餘人捲入；幾十個城市相繼發生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願事件，也共有一萬多人；蘭州一個技校，外省籍學生要求發給寒假回家路費，學校不同意，三百多學生鬧了起來，學校領導採取強硬辦法，抓了六十多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有些地方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刻意求快，違背農民意願，結果連續發生鬧社的風潮。浙江省農村發生請願、毆打、哄鬧等事件一千一百多起；廣東省農村先後退社的有十一二萬戶，等等。地方黨委處理鬧事時，動不動就說是階級鬥爭，是反革命搗亂。廣東一個縣的縣政府不顧群眾的反對，硬在那裏蓋了一所麻瘋病院。結果，惱怒的群眾把麻瘋病院的房子拆掉。該縣公安局的負責人帶領警察開槍打死五個人、打傷九個人。

這種鬧事，雖然是在和東歐的波匈事件差不多的時間內發生，但是性質是不同的。波

蘭和匈牙利有民族問題，長期受蘇聯控制，人民不滿意。中國沒有這個問題，這些鬧事是非政治性的。

在這個期間，毛有一系列講話，其中人們最熟悉的是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在此以前，毛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都講到同樣的問題；因為是在黨內講話，有些話講得更坦率。現在我們把這幾次講話合在一起看毛的觀點。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的中心內容是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即批評自我批評）來解決。毛不指名地批評斯大林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

許多人承認社會主義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

然而毛澤東認為這種矛盾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矛盾，它可以經過社

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這就排除了改革現行制度的需要。其實，毛所說的社會主義制度，不過是蘇聯實行的那種模式，在經濟上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在政治上是一黨專政的民主集中制。毛並沒有想到，社會主義還可能有另外的模式。

毛澤東提出，在人民內部，政治上要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科學和文化工作中，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團結全國人民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文化。

毛分析鬧事的原因，說是由於少數人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另一個原因則是對群眾缺乏思想教育，這些群眾往往只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利益，忽視長遠的、國家的利益。

毛指出，在對敵鬥爭勝利後，人民內部的矛盾突出起來。許多幹部不善於處理這類矛盾，往往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就要犯錯誤。毛批評了地方幹部對鬧事的處理方式，說他們「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的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

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二五頁）「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二六頁）

關於鬧事問題，毛說，不要怕。他分析鬧事的原因有三條：一、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二、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三、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存在。對鬧事的態度，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麼名堂的。「除了大規模的真正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五三—三五四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爲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問題。（二）如果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爲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對於鬧事的帶頭人物，除

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裏，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九六頁）

這個思想是開明的。

這個報告的開放態度，當時極大地鼓舞了民主人士和知識界。

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傳達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講了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和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問題。

毛在講話中強調執行放的方針。

講話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部分，是整個報告的重點部分之一。毛說：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的承認，只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鬥爭。

毛說到這些話的時候，一定想到了他自己的中國革命理論如何受到第三國際和斯大林的壓制。不是嗎？他的觀點曾被那些來自莫斯科的留學生譏笑為狹隘經驗主義，他們不相

信山溝裏能出馬克思主義。

其實，毛的這種心態，在一九五四年批評《紅樓夢研究》時就表現出來了，當時他對文藝界的一些黨員幹部壓制小人物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的批評感到憤怒。

毛在這次講話中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擴大到政治領域去了，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一五頁）雖然如此，毛的思想並沒有超出放手讓大家講意見的範圍。他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一四頁）。

雖然毛的有些話講得比較精彩，但就其論證來說，遠比不上英國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思想家約翰·穆勒的《論自由》那樣透徹。

另一方面，這個講話有兩點後退了。一是毛把知識分子定性為資產階級；一是提出了反修正主義的任務。

儘管這樣，黨內許多工農出身的幹部對毛的意識形態的開放政策，卻不能理解甚至於有抵觸。許多黨員幹部覺得，毛太抬高黨外人士了，什麼非共產黨員可以批評共產黨員，非馬克思主義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這些在今天已成爲常識的東西對五十年代的許多中共黨員的心態來說，是格格不入的。

毛感到要對黨內做工作。他先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講話，繼而和文藝界人士談話，接着又和劉少奇分別到南方各地去對黨內幹部做說服工作。毛澤東到天津、山東、上海、南京等地，召開黨員幹部講話，解釋他提出的新課題——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毛明確提出，現在是從階級鬥爭到向自然鬥爭，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時期；批評許多人還不認識這種轉變，還企圖用過去的方法來解決新問題。三月二十日，毛在上海黨的幹部會議上說：這次整風的結果，估計會使我們黨得到相當大的進步。（《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一頁）

毛在外出期間讀了一些報紙。他發現非黨報紙，如北京的《光明日報》、上海的《文匯報》和《新民晚報》都熱鬧得很，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報卻冷冷清清。

對黨報的沉默，毛非常惱怒。偏偏這時《人民日報》又登了部隊作家陳其通等四人的最新文章，字裏行間流露出對百花齊放方針實施後文藝界現狀的憂慮。毛澤東大為惱火，回到北京，就召見《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和編委會。毛說：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沒有及時宣傳。我是黨的主席，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可是現在非黨報紙討論得很熱鬧，黨報冷冷清清，這面旗幟被黨外人士舉起了。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毛申斥鄧拓按兵不動，是死人辦報，同黨唱反調。他怒氣衝衝地問：《人民日報》有鬼！鬼在什麼

地方？

56.04.10

其實，這事不能怪鄧拓。《人民日報》曾寫了一份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宣傳計劃送上去，被胡喬木壓下了。實際情況是，當時黨內一些高級幹部對雙百方針有抵觸情緒，胡喬木就是一個。但胡喬木也有借口；文革結束後，他在一次會上說，毛在離京之前告訴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暫時不要宣傳。後來胡喬木一看形勢不對，才趕緊在四月十日（即毛批評的當天）發表了社論《大膽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那次，毛還談了許多別的問題。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評？他的意思是可以。他說，他本想在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評；後來覺得這樣說不妥，所以就籠統地說馬克思主義允許批評，這是包括基本原理在內的。

他說到，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現在很緊張。在這個時候，黨如果採取鬆一點的政策，知識分子就會靠近黨；如果緊一些，知識分子就離黨更遠了。這個觀點也很對。說明毛最初是誠心誠意實行雙百方針的，但他後來變了。

毛還說，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曹營指共產黨，漢指國民黨）；黨對知識分子也是採取贖買政策。這個觀點表明毛對知識分子的估計是和周恩來不同的。

從整風到反右

爲了克服黨內的阻力，爲了樹立一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榜樣，毛決定在黨內開展整風，同時也發動黨外人士對黨員提批評意見。這是三月的事。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一九頁）。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爲中心的整風運動。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毛說：現在已經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六二頁）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爲什麼要整風》，說要在全國採取擴大民主生活、擴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使領導者和群眾之間的矛盾變得容易發現和順利解決，使我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感覺到充分的自由、平等和有主人翁的感覺，這樣，他們就會更容易地脫離舊時代的影響，更積極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

五月十日，中央發出《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作爲整風初期爲改

進工作和作風的一項措施。（《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六四頁）

毛喜歡搞運動，發動黨外人士批評，也採取了運動方式。

當時統戰部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和黨外知識分子開會，號召他們提意見；有些人沒有意見，或不願意提，也千方百計讓他們說話。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統戰部開會十三次，七十多黨外人士發言。毛澤東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從文藝和學術範圍擴大到政治範圍，稱之為鳴放；一般鳴放不夠，還要大鳴大放。起初一些人並不想發表意見，但黨組織一再做工作，鼓勵動員黨員和積極分子帶頭發言，黨報每天發表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於是氣氛越來越熱，不想講話的人講話了，不敢多講的人多講了，膽小的人膽大了。毛原來是希望搞得溫和一些，所謂小民主，以保護各級黨員幹部，但形勢發展超出了他的預料，許多人已不滿足於老是那樣和風細雨了。

57.05.00
在群眾性的批評浪潮前，各級黨委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書記成了運動的主要靶子。過去強調黨的領導，下面的群眾很聽話、很馴服，現在卻一個一個貼大字報，指着鼻子批評起來了，各級黨委書記越來越對毛澤東的雙百方針產生了怨氣。毛澤東覺察到了這一點，顯然再這樣做下去，他會失去許多黨內工農幹部的支持。

毛澤東的新方針也沒有得到蘇聯的支持。《人民日報》一月七日發表的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真理報》轉載了。伏羅希洛夫四月率團來訪時，也向毛澤東表示過對百花齊

放、百家爭鳴口號的不理解和擔憂。（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二七頁）

這時，批評中共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的言論出來了，要黨委退出學校的議論出來了，建國後幾年的工作是缺點大於成績的說法也出來了。章伯鈞甚至提出輪流坐莊的主張。不如此，批評的鋒芒也指向了毛；如張奚若批評黨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過去、迷信將來。居然有人如此猖狂，反到毛澤東、共產黨頭上了！這是他始料不及的。毛被激怒了。當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言論出來後，毛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自己頭上。在聽到羅隆基等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時，毛澤東下定了反右的決心，在五月十五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八三四頁）

56.02.00

「毛澤東本來認為匈牙利事件對中國沒有什麼影響，只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現在匈牙利事件的陰影籠罩在他心頭了。他煽起了批評的浪潮；批評起來後，他卻受不了。他曾經講過葉公好龍的故事，批評別人；現在，他自己成爲葉公了，被自己呼喚出來的龍嚇壞了。毛決定對知識分子開刀了。」

毛不喜歡知識分子。他的內心深處有一個知識分子情結，這個根源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當時毛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一個小管理員。

我的職位低，大家都不理我，毛對斯諾說。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斯諾《西行漫記》，一二七頁）

毛澤東在湖南算得上一個人物，沒想到到了北京，那些名人都不理他。這深深地刺傷了自尊心很強的毛。

毛也不像他的許多同伴那樣，借勤工儉學的機會到國外去留學。在這些人面前，他總似乎夠不上知識分子。

毛可能得不到一些大知識分子的認同，但是他交了許多農民朋友。他敘述他的心理變化過程說：

我是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裏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最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

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毛決定來個急轉彎。

五月十五日，號召開展整風運動的兩個星期後，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認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指責右派所說的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都是假的。

在這之前，毛的批評矛頭是對着左的教條主義，現在他認為右的修正主義是更大的危險。他說：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這種片面性，他們就會大進一步」。還有些人有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這種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說：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以上引語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二二—四二四頁）從這些話看來，現在人們常常批評的左比右好，左是認識問題，右是

立場問題其源蓋出於毛澤東。

毛的這篇文章是個轉折點。他的這個思想和他二月份做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有明顯的不同。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爲什麼？》，說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現象、得出正確的結論。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反右派鬥爭正式在全國開始了。

六月十九日，反右派鬥爭開始後一個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人民日報》發表。這時的政治氣候，同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這篇講話時已是大不相同了。毛的講話本來是重點防左，強調民主，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卻要突出反右，強調階級鬥爭，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誰勝誰負還沒有真正解決。爲了適應這個政治需要，講話作了十幾次修改。胡喬木告訴過我們，他改得很吃力，我也看過一些改後的排印稿。（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施肇誠發表文章，強調是毛本人根據當時的記錄稿加以整理，作了修改和補充。）

這樣，發表出來的定稿不僅觀點有矛盾，文字風格也不同了。原來毛講得生動活潑，現在固然改得嚴密了、周到了，但帶着一種拘謹，失去了毛過去那種犀利和雄辯。

毛澤東既要把五月十五日以後的思想加入講話中，又不便於把講話做根本的修改，這就形成了發表的正式文稿中的矛盾。例如毛把原來講話中所說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改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這還不夠，他又加上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還是尖銳的、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以為，他在鬥爭之前加上了思想之間的這樣的限制詞，就可以和上一句不矛盾了。但思想鬥爭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且，反右派鬥爭不僅是尖銳激烈的思想鬥爭，也是尖銳激烈的政治鬥爭。既然如此，怎麼能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呢？

在六月以前，由於對雙百方針的廣泛宣傳，大家都已接受了。現在突然又來這麼一個大轉彎，許多人思想不通。社會上都覺得很驚訝，覺得共產黨說話不算數。

反右派運動中，原來那些受毛表揚的報紙，《文匯報》、《新民晚報》、《光明日報》，一下子都成了右派報紙。毛指示《人民日報》轉載《解放日報》姚文元的文章《錄以備考》，並親自加了按語，冠以《文匯報在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的題目。毛還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發表。這篇社論半句肯定過去的《文匯報》的話都沒有，相反是嚴厲指責它執行一條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指責它為反動派作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幾個月是多久呢？毛對《人民日報》編委會稱讚《文匯報》是在四月十日，反右派鬥

爭開始是在六月七日，相隔兩個月。毛的意思不可能是說《文匯報》的猖狂進攻是在四月十日以後開始的。就是說，當毛在欣賞《文匯報》時，它已經是反動報紙了。

毛也需要向黨內解釋，爲什麼要把那麼多的烏烟瘴氣的東西登在報上？毛澤東在七月一日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爲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三七頁）毛說：這是爲了讓人民見識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讓魍魎魍魎、牛鬼蛇神充分暴露自己，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二八、四三六頁）

57.07.01
毛的這種說法只是一種事後的自圓其說，企圖給人一種印象：他一開始就預料到會有右派進攻。可是，在提出這個方針時，這既非陰謀也非陽謀。毛澤東當時確實是想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道路。誠然，毛開始時預料會放出一些毒草，但並沒有想到有這種規模；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護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條主義者指責爲毒草；他現在要保護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誤認爲毒草而遭到踐踏。從整風以後，黨外人、知識分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黨的幹部的怨氣也超過了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彎。所以，五月十五日以後，才是有意放毒草出籠。不過，毛的解釋可

以使黨內那些對雙百方針有埋怨的幹部變得高興，並且感到慚愧——他們太不懂得階級鬥爭的策略了。如果按照他們原來的想法，不讓黨外人士鳴放，那麼這些右派怎麼會跳出來呢！他們覺得毛主席這一着是太高明了。毛澤東就用這種突如其來的大轉彎，犧牲幾十萬知識分子，換取黨內保守勢力對他的支持。

幾十萬知識分子，就是這樣被打成右派的。他們是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對黨組織提出批評意見，不料就被說成反對黨的領導，猖狂向黨進攻，從而被納入敵人的範疇了。共產黨不是聲稱歡迎批評的嗎？爲什麼要迫害批評者呢？毛解釋說，批評有善意的和惡意的之分，共產黨歡迎善意的批評，而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着敵對的情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二七頁）但惡意的就要作敵人來對待嗎？況且，誰是善意，誰是惡意，這種判斷往往是沒有客觀標準的。糟糕的是，這種判斷的權力掌握在那些受到批評的各級黨委書記的手裏。他們說誰是惡意的，那個人就有口難辯了。

毛開始說言者無罪；後來卻改口說，言者無罪對右派不適用，因爲「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三八頁）其實，大多數右派的所謂行，不過是在會上講了批評的話，這就變成向黨進攻的所謂行了。反正有罪無罪，都是毛澤東說了算；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毛還有一條對待右派的原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黨說你有罪，你就要承認自己有

罪；黨說你是右派，你就要承認自己是右派。不但要承認，還要加油添醋，把自己說成是十惡不赦。這就是坦白，這就是態度好。如果你為自己辯護，那麼，辯護得越多，越證明自己頑固，態度惡劣，抗拒改造，等待着你的更加嚴厲的懲罰。

右派有多少？毛說：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二四頁）上下幅度如此大，證明毛完全是心中無數，主觀猜測。後來打出了五十五萬右派，佔當時五百五十萬知識分子的百分之十。這個百分比是驚人的，超出了毛的最高估計。爲什麼會有這樣多？一是各級黨委要乘機對敢於批評自己的人進行打擊報復；二是打擊面大了不要緊，而打擊面小了就有被上級批評爲右傾麻痹，階級鬥爭觀念不強的危險。

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再評價

反右派的後果是嚴重的。本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後，接着進行黨內整風，是要樹立一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例；後來，毛澤東認爲，右派進攻，干擾了整風。整風轉爲反右。毛澤東說：「在猖狂進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後，整風就可以順利進行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三九頁）反右結束後，干擾排除，整風理應搞得更好，但實際上，群眾再也不敢說話了，整

風草率收場。黨內存在的嚴重問題和缺點，被沖淡了，掩蓋了，那些受過批評的黨委書記，都轉過來對批評者進行報復。此後，很少人敢於對黨組織提批評意見了。有話不敢說，或只說假話，好聽的話，成爲一種風氣。這對共產黨提倡的實事求是和批評自我批評的黨風，是一次極大的破壞。人們接受了教訓，不那麼相信共產黨了。運動開始時，說得好聽，後來說變就變，整到提意見的人頭上來了。

八月和九月，中共中央又先後發出指示，要求在農村和企業中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結果，大辯論的方式，帶來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結果。

從毛澤東做《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到反右派鬥爭中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落網，這中間只隔半年多一點時間。

57.06.19

「中共黨史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直受到很高的評價。林彪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爲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文革結束後，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這篇文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一九八五年修訂出版時說，毛澤東的這篇著作「豐富與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二七頁），它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

歷史經驗，研究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後的新問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了獨創性的貢獻。」（同上書，五三三頁）《注釋本》還說，林彪把這部著作和文革聯繫起來的說法完全歪曲了這部著作的本意。薄一波說：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建立系統的社會主義矛盾學說的，毛主席是第一人。特別是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定為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毛主席和我們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偉大創造。（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五九七—五九八頁）

林彪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當做文革的理論基礎的說法是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的，怎麼能說是歪曲呢？難道毛本人還不知道這部著作的本意嗎？如果這個理論的意義真是如此偉大，為什麼這個理論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呢？為什麼恰恰在這個講話後不久，就發生了反右派鬥爭，此後政治運動和迫害事件不斷，一直發展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呢？

當毛澤東在二月做報告的時候，他的本意是防左，他的重點是防止把人民內部矛盾誤認為敵我矛盾；到五月以後，毛澤東改變了他的本意，變為主要反右，要搞階級鬥爭，要打擊階級敵人。這構成了這篇著作正式發表的版本的矛盾。從此以後，毛的思想越來越向左的方向發展。但這不等於說毛起初的思想就是完全正確的。毛的二月講話本身就是有很大缺陷的。後來的變化，一方面是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正確思想的

違反，另一方面也是其中錯誤東西的進一步發展。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基本思想是兩類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在革命戰爭時期，劃分敵我是首要問題。對一個人，首先要知道他是敵人還是朋友，然後決定對他採取什麼態度。但是把這個方法搬到和平建設時期來，就不是根據人們的行為是否觸犯法律，而是根據他們的階級地位和政治態度來決定是否採用專政手段。這本身就使正確的處理成爲不可能。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區別的標準是什麼？毛澤東說：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這裏用的又是政治標準，不是法律標準。首先，這個標準是毛提出來的，並不是經過立法程序制訂出來的法律條文。其次，反抗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意思？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又是什麼意思？這裏有很大的隨意性，並沒有嚴格的界定。再次，這裏不說個人，只說階級社會集團，似乎判定某人是不是敵人不是根據他本人的表現，而是看他屬於哪一個階級，似乎敵對階級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敵人，而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每一個成員都不會變成反革命。這就是唯成份論。最後，誰來裁判某人是人民，某人是敵人？是法院嗎？不是。是共產黨，是各級黨委，是黨中央，是毛澤東。

毛的這個原則，斯大林也可以接受。因爲斯大林也說，他所消滅的是人民的敵人，而

誰是敵人是他來判定的。斯大林說誰是人民的敵人，誰就是人民的敵人，安全機關就要把他逮捕和處決。斯大林凌駕在法律之上，他可以制定法律，法律卻管不了斯大林。固然，斯大林不承認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承認了，這是毛比斯大林高明之處。但是，承認了又怎麼樣？毛說，專政的手段不適用於人民內部。這並沒有阻止他濫用專政的手段。如果要對一個人實行專政，只要先把他定為敵人就行了。這不是一樣嗎？

毛澤東認為專政只是對敵人的。他所說的專政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公安部門，那麼，在理論上，這些機構也應該只是對敵人的。實際上，這些機關所處理的絕大多數案犯都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而不是敵人——反革命犯。對這一點，毛澤東解釋說，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判死刑，但這只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做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論人民民主專政》）但人民犯法並不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在各類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只佔極少數部分。另一方面，那種屬於反動階級和政治態度不好的人，如果沒有觸犯刑法，是否也應該鎮壓？是否能有公民的權利？如果兩個人犯了同樣的法，情節相同，是否應該根據其階級出身加重或減輕其刑罰，還是應該一視同仁？在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

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那麼什麼是民主呢？毛不是把民主了解為多數人的統治，了解為一種政治制度，而是了解為一種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風。他反覆說，民主的

方法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說服教育。這是整風運動的經驗。毛澤東把處理黨內矛盾的這個方法，擴大到全國範圍了。他說，一九四二年，共產黨曾經採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即教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應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採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這裏的問題是：誰說服誰？誰教育誰？誰來做批評？誰來做自我批評？延平整風時一度是正確的領導說服了不正確的黨員幹部，但這不能保證黨的領導永遠是正確的。當黨的領導是不正確的而被領導是正確的時候，黨的領導也要去說服被領導嗎？以後的歷史證明，毛澤東正是用這種方法推行他的錯誤路線。

毛澤東的另一個錯誤是沒有區別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黨內矛盾一般來說，是正確和錯誤的矛盾，是思想認識問題，工作作風問題，這是可以利用批評教育方法來解決的。黨內也還有違反紀律的現象，還要進行組織處分，所以處理黨內矛盾的方法，也不能僅僅是批評教育。人民內部矛盾就不僅僅是思想問題，或者違反紀律的問題，而且還有經濟利益的問題，觸犯法律的問題。對於經濟利益的問題，要有適當的政策和法令來處理。對於觸犯刑律的問題，還要繩之以法。這兩種情況，都不能僅靠批評教育來解決。黨員也會犯法，那就不是單純的黨內矛盾了。另外，人民內部是允許比黨內有更大的思想自由的，並

不是各種觀點都要強求統一。比如有人信宗教，就不能硬去把他們教育成無神論者。毛澤東的這種方法是把管理黨的方法拿來治理國家。這勢必造成自由的喪失。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把自由和紀律作爲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着的側面，說不應該片面地強調其中之一而否定另外一個。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人民享受着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六八頁）在原則上，這並不錯。問題是：這個紀律是什麼樣的紀律？是誰定的？是怎樣定的？共產黨當然是有紀律的，在談黨內的問題時，講自由和紀律的統一當然可以；可是黨的紀律不能推廣到黨外。一個工廠也是有紀律的，可是那只是勞動紀律，只能管正在上班的工人；工人回家後就管不着了。那麼社會秩序靠什麼維持？一靠道德，二靠法律規章。按照憲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的權利。按照這個規定，可以制定一些法律規章。可是制定這種法律規章是有程序的，是要經過人民代表大會或其他程序的，不是任意的。黨內的紀律也不能違反憲法。毛澤東說自由要受紀律限制，這是把黨內的概念推廣到全社會了；而且，他只講自由要受紀律制約，卻沒有對紀律本身作什麼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是受憲法和法律保障的；如果黨的紀律違反了憲法和法律，那麼這種紀律是無效的。毛澤東不講自由受憲法和法律的保障和限制，卻去講自由和紀律的關係，這表明

他混淆了黨內和黨外的界限。

把處理黨內問題的方法搬到黨外，這是毛澤東兩類矛盾學說中的一個基本錯誤。這樣，在許多時候就行不通。理論上說，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只能用說服的辦法，不能用強迫的辦法，但是，如果發生了盜竊、殺人的案件，怎麼去說服？難道說服能代替坐牢嗎？正因為這樣，共產黨幾十年來常常把社會上的普通犯罪，說成是階級鬥爭的動向。同樣，如果對一個人人民內部的人，甚至黨內的人，要予以打擊，就需要先把他說成是敵人。這就給緊接而來的反右派鬥爭埋下了伏筆。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把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範疇，而在這一個多月前，周恩來還將知識分子算做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延安時期，毛澤東一般也是把知識分子算做小資產階級的。這裏，知識分子升級了，這也為以後歷次意識形態批判運動提供了理論根據。可是，毛在修改《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加上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個話隱含着這樣的意思，就是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就和三月份的講話矛盾了。毛澤東三月份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還說，知識分子中有一些人，實際上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我們應該允許他們不贊成，有一部分唯心

主義者，他們可以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但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就是說，有非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也是可以擁護社會主義的。而現在，世界觀的問題就變成一個政治問題了。毛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只佔少數。那麼，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就和社會主義是敵對的，就成爲革命的對象了。這樣一來，就是敵對階級的階級鬥爭了，怎麼還能進行百家爭鳴？

關於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種提法表明中共意識到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主義的制度不相稱。也就是說，中國在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時就提前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與其說中國的生產關係是先進的，不如說中共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行動是超前的、左的。這種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並不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不是提高落後的生產力以適應先進的生產關係，而是根據生產力的水平來重新建立合理的生產關係。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的講話提綱中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澤東在理論上從他二月份的報告後退了，也從黨的八大後退了，重新突出了階級鬥爭。他提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仍應回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即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

盾）。儘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在小組討論中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八大關於這個問題的提法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最後講話中，堅持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

八屆二中全會，改變了主要矛盾的提法，反映了戰略決策的改變。

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中，毛則進一步宣布：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我們對他們（資產階級）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

*這裏有了一個對形勢的估計的轉變。由於一九五六年萬隆會議和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影響日益增強，中央估計可能出現十到二十年的和平時期。毛澤東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澤東提出：中心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八大一次會議正處於這個國際休戰時期。八大前夕，美國人有邀請中國藝術團訪美的意圖。當時已組織了一個第一流的大型藝術團訪問南美。毛的意圖是突破中美關係的僵局，先在美國的後院發展反對美國控制的統一戰線。在南美破例地邀請美國駐各國大使出席開幕式。不料一九五六年十月到最後一站阿根廷時，爆發了匈牙利事件。世界性反蘇反共烏雲密佈。美國去不成了。藝術團到瑞士休整，等了近一個月，反共風潮愈演愈烈，才奉中央指示回國。（參見王力《現場歷史》）。

這種宣布一方面違反了毛自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專政的手段來解決的原則；另一方面，這個觀點又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的資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這一觀點的合乎邏輯的發展。毛在這裏不僅拋棄了他自己過去關於百家爭鳴的保證，而且悍然踐踏了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至於八大提出的兩個重要問題——執政黨的地位的考驗和防止個人崇拜問題，毛根本不提了；實際上這才是真正要注意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牽涉到異化的概念。如果毛能用異化的概念來分析社會主義的矛盾，那麼肯定會深刻得多。*

（一九九七年三月）

（參見王若水《重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怎樣放棄了一次政治改革的機會》，寫於一九九七年十月）

* 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學——經濟學手稿》的第一個中譯本出現在一九五六年；沒有迹象表明毛看過這篇著作。另外，當時翻譯過來的哲學論文大多是來自蘇聯，而蘇聯哲學界是回避異化問題的。

第八章

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冒進的由來

毛澤東總說，一九五六年有一個躍進，反冒進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那麼，一九五六年的「躍進」是怎麼回事呢？

建國後的經濟建設工作，主要是周恩來、陳雲等人承擔起來的。周是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持制定者和推動執行者。當時沒有經驗，但由於計劃的制定和執行都很謹慎，及時糾正偏差，所以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了。這為我國的工業化初步奠定了一個基礎。

毛澤東自己，則抓農業合作化。一九五五年十月，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農業合作

化問題的決議。他認為東歐農業集體化爲什麼慢，是因爲土改後沒有趁熱打鐵實行集體化，我們有些根據地也有農民滿足於土改不想再前進的現象。他的結論是工業化不是集體化的前提。（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毛澤東思想萬歲》，二二二頁）這樣，他就可以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推行集體化了，超過社會主義的老大哥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七屆六中全會上作的結論中提出：要講有些什麼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十一月，毛澤東主持制定《農業十七條》，要求到一九六七年糧產一萬億斤。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以農業發展的構想爲推動力量，強調在各項工作中繼續反右傾保守，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迅速建成社會主義，並要求八大的準備工作以此爲中心。（《黨的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九頁）會上，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要像他所推行的農業合作化那樣「又多又快又好」。

十二月六日作《反對右傾保守》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在《爲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社論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自己的事業」，從而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向全國發表了。

毛澤東認爲，一九五五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即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開展起來。大約再有三年時間，可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毛澤東

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七一七頁）這樣，由於農業生產大躍進，農業的躍進，壓迫工業，使工業趕上去，一齊躍進，推動了整個工作。（《毛澤東思想萬歲》，六一頁）（他先抓農業合作化，以此推動工業，再說工業不神秘，干預國務院）

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三月五日，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工作時，毛澤東說「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去年一月省市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手工業的總產值，你們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點九，似乎低一點。第一個五年計劃定低了，吃了點虧……」（《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六四頁）

毛認為他探索自己的路是從一九五五年起，但隨之而來的反冒進，等於否定了他的探索。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是個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麼原因，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小刊物都登了，發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文章反右傾。心血來潮，找了三四十個部長，談了十大關係，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條（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沒有人反對，我得彩了，又復辟了。我就有勇氣再找部長談話了。……」（同上書）

在毛澤東熱衷於「又多又快又好」、繼續反右傾保守時，周恩來是比較審慎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二十多萬人的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會後全國各大城市和許多中小城市也紛紛宣布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二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告誡各部門：「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現在有些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一五頁）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周恩來說：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六月四日，劉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的會上，第一次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並在十日由劉少奇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得到確認和正式批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聯合主辦《黨的文獻》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八八頁）

有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第二個五年計劃本來是可以搞得更好的。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上，周恩來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周總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三年「馬鞍型」的教訓，提出要合理地規定經濟發展的速度，把計劃放在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要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各部門按比例發展。他批評了有些部門和地方急於求成，企圖把十二年內的任務，在三五年甚至一二年完成。大會上採納的周的意見，在決議中指出，黨必須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兩種錯誤傾向，一是保守主義，一是冒險主義。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增長數字，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提出的。它要求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工業增長約一倍，農業增長約百分之三十五，鋼產量達到一千零五十一—一千二百萬噸，糧食產量五千億斤左右，國民收入增長約百分之五十左右。

雖然對冒進的批評起了一些作用，但在一九五六年出現的冒進勢頭並沒有完全抑制住。職工增加過多，基建投資增加過快，物資全面緊張，年終決算發現了財政赤字。在編制一九五七年計劃的時候，各地區各部門報來的指標仍有許多地方偏高，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在十月召開國務會議，為一九五七年計劃商討對策。會議一致同意壓縮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在十一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批評了一九五六年冒進傾向，周還認為八大建議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

系的目標過大，速度過快，「上不去，就不要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後還得退下來。」（《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一七頁）

劉少奇也在會上講話：慢一點、穩當一點。毛在插話中還表示同意。

毛澤東在最後一天講話。他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我們的經濟建設有退有進，主要還是進；各級黨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進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要保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毛還談到，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的反革命沒有搞掉。（《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一九九一年版，二二四頁）

在這次會議上可以看出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二、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評了一九五六年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毛當時沒有批評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當時後者的意見獲得多數人的贊同，毛也表示同意在一九五七年實行這個方針。但是，毛後來說，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作了妥協。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到十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開始指責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他說，一九五五年來了一個高漲，一九五六年吃了虧，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鬆勁。掃掉了一個「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給右派進攻以口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三四九頁）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只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這是毛第一次對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務實派的批評。

會後，《人民日報》在十一月十三日社論中要求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說有右傾保守毛病的人，「像蝸牛一樣爬得很慢」，「這是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社論還號召：「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

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赫魯曉夫在會上宣布了蘇聯的雄心：要在十五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

好大喜功的赫魯曉夫刺激了另一個好大喜功的毛澤東。他在會上建議赫魯曉夫再加把勁，用十年時間在主要經濟指標上超過美國。他用這種形式來暗示蘇聯的勁頭還不夠足。至於中國，毛說：「我們十五年超過英國。」（參見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六三頁）

其實毛澤東的真正目標不是英國，而是蘇聯。蘇共已在內部確定了一個沒有宣布的目

標：從一九五九年，在十二年內（即到一九七一年）達到共產主義。毛澤東正要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中國的經濟建設怎能落在蘇聯的後面！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三版）的筆記中承認：「全國解放初，我們還沒有管理全國經濟的經驗，所以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個改造的時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找了三十幾個幹部談話，結果提出了十大關係，提出了多快好省。當時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沙皇時代的俄國原生產鋼四百多萬噸，到一九四六年發展到鋼一千八百萬噸，如果從一九二二年算起，二十年只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當時就想，都是社會主義，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多一點，快一點。後來提出兩種方法的問題，同時還搞了一個四十條農業發展綱要，此外，當時還沒有提出其他具體措施。……同年九月黨的三中全會恢復多快好省、四十條、促進會等口號。十一月……《人民日報》上多快好省的社論。……」

然而，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和周恩來主張的反冒進方針，對雄心勃勃、急於求成的毛澤東無疑是一個障礙。

毛公開提出這樣的口號和許諾，這是一件大事。事先通過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討論嗎？（注意：一九四三年，中央有決議，毛有最後發言權、否決權，這個決定在解放後仍有

效）似乎沒有，這個時期中央沒有開會。看來毛既然提出了，中共中央只能採納。十二月十二日，劉少奇借向中國工會全國代表大會致祝詞的機會，宣布了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口號。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批評反冒進期間「颳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颳掉了」，「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作用。」這篇社論是經過毛修改和政治局討論通過的。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六三六頁）

年底，毛澤東到華東去了將近一個月，其間，還在杭州召開會議。會上，毛表揚了安徽的治淮工程，並用這個例子來批評右傾保守。他說：安徽人民一九五七年一個冬季就搞了十六億土方，超過過去七年，說明原來的計劃低了，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要愉快地批評右傾保守。毛還採取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辦法：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周恩來。（同上書，六三七頁）

本來，毛澤東曾經多次向中央提出，他不想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並且到適當的時候辭去黨的主席。他認為這樣退居二線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讓別的同志居於第一線，也是一個鍛煉，以免將來繼承出問題。中央本是不同意的，因毛多次提出請求，也考慮到這樣做確實也有好處，才準備接受。爲了這件事，八大通過的黨章特地增加了一個條

款，說「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就是準備將來毛不當主席的時候，可以擔任名譽主席。從一九五六年開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年初，他又多次表示。但是，話雖是這樣說，可是毛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退到第二線。恰恰相反，從八大以後，他管的事可是越來越多了。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進，這兩件大事都是他親自抓的；接着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第一個五年計劃，毛自己也知道沒有經驗，所以他開始時沒有多插手。後三年開始插手，「以農業的躍進促進工業的躍進」，結果弄得國民經濟失衡，在反冒進中窩了火。現在要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他要親自出馬了。爲了證明工業並非高不可攀，他當然要表現出，由於他的領導，中國經濟面貌立刻大變。從八大以後，毛發動了一個又一個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的攻勢，矛頭指向周恩來等人。他必須貶低別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績，以此顯示出自己的高明。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是這場緊鑼密鼓的攻勢的第一個高潮。

從南寧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反「反冒進」

南寧會議是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批評反冒進。會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

會上印發了一些參考文件。其中有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

的報告中關於反冒進的一段話、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一九五七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這幾個是反面材料，是代表「反冒進」的思想，供批評的。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會上氣氛緊張。一月十一日，南寧會議第一天。毛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但反冒進首先沒有把指頭弄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就只講一個長了瘡的指頭。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要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問題。（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指頭理論，它的流弊。）

毛禁止以後提反冒進這個詞，說這是政治問題。反冒進洩了六億人民的氣，犯了政治方向錯誤。毛提出要「不斷革命」。

毛忘了，他自己就提過「反冒進」。一九五三年八月，他說：「我們現在要反對主觀主義，既反對盲目冒進的主觀主義，也反對保守的主觀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九四頁）「急躁冒進或保守，都是不按實際情況辦事，都是主觀主義。」（同上書，

九五頁)

一月十二日。毛說：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人民洩了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又說：我對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着眾人批評。小範圍不行，就開中央全會，總要有點壓力。毛還尖銳批評了印發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說這篇社論講，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說沒弄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資產階級的方；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他在這篇社論上批注：「不看」，「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一月十四日，說：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

一月十五日，毛澤東搬出「用地方壓中央」的辦法，大大表揚柯慶施。說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上所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很好，要大家學習「柯老」。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許多同志不動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這是批評陳雲。十六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文，當眾問周恩來：

「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回答，我寫不出來。

毛接着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六三九頁）

如此尖銳的話語，如此逼人的氣勢，使許多與會者十分納悶。劉少奇解釋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主席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談話，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雲的。

周恩來在十九日晚上作了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並表示，他對錯誤負主要責任。

一月二十日，毛說：冒進是全國人民烈焰衝起來的。是好事，部分是壞事。反冒進把前進放在第二位了。

毛的策略，是「以地方壓中央」，「以群眾壓中央」。對反冒進的批評，是和對官僚主義的批評結合在一起的。毛再三強調要「打掉官風」，要走出機關，深入群眾作調查研究；「領導幹部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和人民打成一片」（《工作方法六十條》）。這樣一來，似乎群眾是要冒進的，反冒進就是脫離群眾，就是不做調查研究，

就是官僚主義，而毛是代表群眾來批評中央的「穩妥派」的。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到：「『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虧。」「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不平衡是普遍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個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南寧會議，確定了今後不再提反冒進，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毛後來也承認，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毛澤東思想萬歲》，二五一頁）

「宜將剩勇追窮寇」，毛不善罷甘休，於是，又有一連串的會議，繼續批反冒進。

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召開政治局的擴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當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

二月十八日，毛在會議上說：不要一講缺點，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中國六億人口，一千二百萬黨員，能沒有一點缺點？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洩下去了，

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霉。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麼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毛說，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又說：如果說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反馬克思主義，而反冒進是馬克思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變了樣子，把搞得少的叫馬克思主義，搞得多的不叫馬克思主義。我不贊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冒進好嘛，使農民多搞了水利嘛！毛還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還要厲害。

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紛紛在會上作檢討。毛又擺出寬大的姿態，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先念同志現在還睡不着覺，吃安眠藥。何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陳雲講到分散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作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

實上是一種封鎖。

一月十二日，毛曾說：「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不準備看。」「我說十個幹部，有一個擁護我就好了。地委書記以上一萬人，有一千人擁護我就好了。」「我最沒學問，什麼委員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談過，我是唱老夫人的，你們是唱紅娘的。」毛極盡挖苦之能事，說反冒進的人是宋玉，寫《登徒子好色賦》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毛還批評說：有人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毛主席重申要「大權獨攬」。

這是對周恩來和國務院的批評，說他們「想把大權攬過去」，所謂「讓黨委搞點小權」，就是縮小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權力。所以，周恩來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就此作了自我批評。周迴避了「想把大權攬過去」和「封鎖」這兩點，只是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匯報，即使請示報告了，也是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

對這件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說：

當時，總理的自我批評，也只能講到這個地步。儘管我們這些做經濟工作的同志或部門有這樣那樣不周到的地方，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是要進行「一種封鎖」，不讓中央「參與設計」。凡是重大方針政策性問題都是經過政治局或書記

處的。經濟工作的業務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請毛主席過問的。（六五一頁）

薄一波認為毛是言重了。那麼，毛爲什麼要做這樣重的批評呢？我認爲，毛是故意誇大的，這樣做的目的是給他的同事一個警告：毛對權力問題是十分敏感的，任何人也休想碰一碰毛的絕對權威的地位。

再接着是三月份的成都會議。毛在會上作了六次講話，多次批評反冒進。他說，一九五六年吹掉了三個東西——多快好省、促進派、四十條。（三月二十二日）

毛說：「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志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個同志不好混之意。」毛澤東把冒進稱之爲「馬克思主義的」，把反冒進稱之爲非馬克思主義的。他在三月九日說：

「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南寧會議批評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應該採取哪一種，我看應當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例如除四害，一種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種方法是讓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兩種路線，有快有慢，快一點能除掉，慢一點除不掉。執行計劃，一種方法是十年計劃，二十年搞完，一種是十年計劃，二三年搞完。……兩種方法要比較。苦戰三年，改變面貌。但『一天消滅四害』、『苦戰三天』，這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以後反冒進的

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爲什麼不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氣、暮氣、嬌氣、驕氣，一些人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毛認爲反冒進是不尊重唯物論，也不尊重辯證法。這裏毛又一次忘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在《實踐論》中從哲學高度闡述了反對「左翼空談主義」的必要性。當時他說：「他們的思想超過了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爲冒險主義。」

三月十九日，成都會議期間，毛爲重印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部分按語寫了說明，其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把反冒進與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波匈事件和右派進攻相提並論。而且，在三月二十五日的講話中和在王任重發言時的插話中，也反覆說這兩個「沒料到」。

三月二十日又說：「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好？」「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流好？」

三月二十五日的講話，把「反冒進」的錯誤提高到哲學上來分析：「會開得很好，重點歸結到方法問題，第一是唯物論，第二是辯證法。我們許多同志對此並不那麼尊重。反冒進不是什麼責任問題，不再說了，我也不要聽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評，作為方法論的一個例子來談，那是可以的。」毛接着說：反冒進的錯誤，在於「把個別的、特殊的東西，誤認為一般的、全面的東西，只聽少數人的意見，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沒有反映，把特殊當成一般來反冒進。」

四月上旬，毛到武漢主持了一次匯報會。會上他把反冒進說成是一個「挫折」，是壓在幹部和群眾身上的「蓋子」。他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來了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這個挫折很有益處，教育了幹部和群眾，是反面教育。過去說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實在些，這個話是不合乎事實的。一九五七年實際上工作差勁了，許多幹部抬不起頭來，上面罵冒進，下面也罵冒進，所以一九五七年勁頭不大。去年揭開了蓋子，用整風反掉了右傾保守思想。蓋子不解決，壓在勞動者、幹部身上，精神不振，生產力不解放。（毛還說有些人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會颳颳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

毛還說，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沒有着手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當時國內外情況緊張，斯

大林問題，波匈事件，顧不上開會；他當時是採取防禦的，以後才逐步恢復三個口號。

針對周恩來的「穩妥可靠」，毛澤東批評說：所謂穩妥可靠，結果是既不穩妥，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毛爲了使冒進變成可取的，就換用了「躍進」這個名詞，說：「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替「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

五月，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說，一九五五年冬季，有兩件事沒料到。就是實際上反斯大林，發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現了反蘇反共高潮，國內沒有料到來個反冒進。成都會議就說過，請大家注意，請各省委注意，要預先料到。前次大會講了，有戰爭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預料到就不要緊。……跟什麼人走的問題。（五月二十三日全體會議上）

這次會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報告，對反冒進問題作了結論。說，反冒進也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一九五七年的生產建設。不少人在小組會上發言時，響應毛澤東，也對反冒進提出了批評，認爲劉少奇的報告對反冒進批評得還不夠，語氣嫌輕，對立面講得不够，應徹底清算反冒進的「錯誤」。

毛在修改工作報告時加了一段話：「一個馬鞍型，兩頭高，中間低。一九五六—一九

五七——一九五八年，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躍進——保守——大躍進，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馬鞍型教訓了黨，教訓了群眾。」

周恩來在會議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匯報，更沒有經常地系統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即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需要作出決定的問題，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周恩來在開始準備這個發言稿時，他說一句，秘書記一句，有時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秘書建議自己走開，讓周恩來安靜地構思，秘書走開後，周獨自在辦公室坐到凌晨兩點多。後來，還是在鄧穎超的勸說下，周恩來口述，秘書整理成文。在秘書整理的稿子中，有一句「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周恩來刪掉了這句話，他嚴肅地對秘書說：在延安整風後，可以這樣說；整風前，他和毛主席的關係不能引用這句成語。「這說明你對黨史知道得太少！」他說這些話時，幾乎流下了眼淚。秘書發現，在起草這個檢討的十多天裏，周恩來的頭髮又白了不少。（彭程、王芳《廬山1959》，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三二頁）

毛原來準備的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寫道：《高潮》序言、促進委員會、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論十大關係、多快好省等都是中央會議上通過了的，「有些同志，當時同意（無一人反對），五個月、或者一個月以後，即表示反對，或者不同意，或

者懷疑，而不經過合法手續，即經同樣性的會議加以改變，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屆二中全會上突然爆發」。毛在講話時，這些話沒有講。薄一波又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對反冒進是有『氣』的，但最後處理這個問題時，基本上採取了克制的態度。」（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六四二—六四三頁）

一位知情人曾向筆者透露，毛澤東那時本想把周恩來的國務院總理職務撤下來，和劉少奇商量時，劉不同意，毛因此作罷。這大概是毛暫時採取克制態度的原因。可見，毛對周恩來如此大張撻伐，是有其目的的。後來，毛常說「大權旁落」，似乎他的權力受到過威脅，國外一些學者也信以為真，並用「權力鬥爭」來解釋「文革」的起源。其實並非如此。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致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其他同志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必須崇拜班長

反「反冒進」中，毛澤東多次談到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問題。成都會議上，三月十日，他在講話中把個人崇拜分爲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他說過，黨委書記是班長）。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他講，不要怕教授，「外行領導內行，外行解決問題來得快，內行跟外行跑，恐怕是個原則」；「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爲自己紅了，鑽到那裏邊去出不來」，是專而不紅。

他表示，不相信工業高不可攀，強調要破除迷信，說我們有些同志有幾怕，一怕資產階級教授，另一怕是怕無產階級教授，怕馬克思；教條主義者照抄外國，沒有自己的獨創風格，要模仿別人。

在他親自發動和主持的反「反冒進」中，毛澤東儼然是群眾的代言人，他說「躍進是

群眾的積極性」，反冒進是壓制群眾、「跟右派相距不遠了」，要「分清國共路線，國民黨是促退的，共產黨是促進的」，這是跟什麼人走的問題。甚至說，政治局不是設計院，老說沒搞好，實際上是封鎖，這是斯大林的辦法；政治局成了表決機器；「中央大權獨攬，只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他實際在國務院。（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一月十一日、十二日，〈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樣，他便把別人置於政治上的錯誤位置，而可以肆意批評了。他用尖銳潑辣的語言，把中央和國務院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一個一個批評得灰溜溜的，什麼「像蝸牛一樣爬行」，什麼「促退派」、「觀潮派」，什麼「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等等。可以說把他心裏的怒氣發泄得淋漓盡致。而作為批評對象的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人，不但沒有可能進行說明和申述，而且只能一個勁地作自我批評，爲了息事寧人，甚至還不得不發違心之論。從前是同志和戰友，這時卻是明顯的有上下級關係了。他曾經倡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法寶，批評變成了他的專利，而別人只有做自我批評的義務。

這是一個轉折點。薄一波說：「這次批評反冒進，歷時半年多之久，其影響所及，在黨內政治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一種標誌，它標誌着建國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或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有一位同志曾經說過，南寧會議前後，黨內氣氛逐漸緊張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經很難像以前那樣經常同政治局的

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黨內的生活開始不正常了。我同意這種看法。」（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六五三頁）

從一九五七年九月八屆三中全會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長達八個月的批評「反冒進」，改變了八大批准的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正確方針。誰要反冒進，就是右傾保守，壓制群眾的積極性，是非馬克思主義，是慢的建設方針。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人們接受了「教訓」。以後，毛澤東說什麼，大家就怎麼做。各部門和各地方在經濟指標越高越好、思想越「左」越好的空氣中，擬定躍進計劃、指標層層加碼。這反過來又影響毛澤東「大躍進」的發動。

大躍進的契機：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反右派鬥爭和批判反冒進掃清了毛澤東實現他的雄心的道路。現在，無論黨內還是黨外，都沒有人敢來批評他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討論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報告時，毛澤東就說：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實現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後來又在建設

問題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照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九十一—〇頁）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談到中蘇關係時說：

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

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我在電話裏跟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什麼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麼？這叫不算數。看見這麼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麼共產黨員，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麼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你把它當做那麼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麼革命原則

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也容易使頭腦發昏。昏得厲害的時候，就得用一種什麼辦法去臭罵他一頓。這會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四四—三四五頁）

毛說蘇聯的鋼、煤、石油都「不算數」，其實自己心裏是很嫉妒的。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算數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據翻譯李越然回憶，在十一月十八日的會上，毛澤東表示了對赫魯曉夫的支持：

「赫魯曉夫這朵花比我毛澤東好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荷花雖好，還須綠葉扶持。我看赫魯曉夫這朵花是需要綠葉扶持的。一個和尚兩個幫，一個籬笆兩個樁。」毛澤東的話激起了掌聲。毛澤東又把目光轉向南共代表卡德爾：「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起來嘛。有了什麼事，還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們遲早是會回來的。」（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一六二—一六三頁）

毛澤東的這次發言，後來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題目為《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但是，把對赫魯曉夫表示支持的話刪掉了。不知情的讀者不會知道，毛澤東這裏所說的「好漢」和「荷花」竟是指後來被中共斥為現代修正主義頭子的赫魯曉夫。

當時，赫魯曉夫正處於國際共運分崩離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澤東及時地給予了支持，這對赫魯曉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還提出，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爲首。

赫魯曉夫表示謙虛，說：「應該以中、蘇兩家爲首。」

這樣的人本來應當由蘇共的領袖來充任，因爲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毛澤東顯得很有自知之明：「我們沒有資格……」

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不贊成「以蘇聯爲首」的提法，說：「國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麼。」

毛澤東努力說服他：「要不要有人爲首，這不是我們單方面的事。帝國主義有個頭，我們也要有個頭。一旦有了事，總得有個人來召集一下，就拿這次開會來說吧，蘇聯不出來，我們怎麼辦？蘇聯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們誰能代替蘇聯這個角色？當然，爲首不是爲尊，不能一家說了算，討論問題必須是平等的。比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就不同意，沒有先例麼。」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與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講話時，重複了這個思想：「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必須要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

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蘇聯準備用十五年的時間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說：「你們再加把勁，能不能用十年的時間，在主要經濟指標上超過美國。」

赫魯曉夫只能說：「我們努力，還是可能的。」

毛澤東說：「你們用十年的時間超過美國，我們十五年超過英國。」

這個豪言壯語贏得了會場上的掌聲。（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一六三頁）

然而毛的雄心比他宣布的還要大。早在前一年（一九五六年）的八月，他就說要在五十年中超過美國：「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九六頁）

現在毛鼓勵蘇聯超過美國，難道他就不想？難道他只滿足於超過英國？不。

毛澤東在莫斯科談話的意思是兩點，第一，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第二，這個頭必須是蘇聯。如果，事實最終證明蘇聯當不了這個頭，怎麼辦呢？況且，赫魯曉夫既缺

乏傑出的領袖才能和理論修養，也不享有斯大林曾經享有的崇高威望。在斯大林死後，世界上活着的共產黨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和毛澤東相比，何況毛澤東還沒有犯斯大林那樣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萌生了超過蘇聯，作國際共運的領袖的念頭是很自然的。他深諳《老子》的策略：「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先與之。」現在還不是時候，毛澤東在等待這一天。

這次，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挑戰，只是意味深長的伏筆。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破例在這次會議上作了六次講話，反覆講後來居上，年輕人超過老年人（注意：蘇聯是老大哥）的思想。他從中外歷史上列舉了一大堆傑出人物的名字（賈誼、王弼、孔夫子、達爾文、馬克思、列寧、李政道、楊振寧等等），說明他們都是年輕時嶄露頭角，敢於創立新學派，向老古董開戰。他批評有些人精神不振，是奴隸狀態的表現；像《法門寺》裏的賈桂，站慣了，不敢坐。他講了一件事：中國畫家畫斯大林和毛澤東在一起的像，把毛澤東畫得比斯大林矮一些（實際情況相反，毛澤東高一些）。這件事顯然使毛澤東耿耿於懷。他評論說，這是盲目屈服於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好象塑菩薩，總是比人大好幾倍，爲了嚇人。

毛澤東回顧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違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的，假洋鬼子『不准革命』。」「與王明的爭論，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止，我們提出十大綱

領，王明提六大綱領。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革命勝利了，斯大林又說是假的，我們不辯護，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好像又不真了。」

在兩個月後（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把他講話的題目定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馬克思》，這個意思就更進一步了。毛澤東在講到學生超過先生、學生趕不上先生就不爭氣時，重提了斯大林祝酒的事，說連斯大林也看出了先進的東方。毛不滿足於僅僅超過斯大林。他說，馬克思也是人。馬克思革命沒有革成，我們革成了。馬克思沒有幹過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這種革命實踐反映到意識形態上，就成為理論。

毛澤東的潛台詞是很清楚的，不過對許多謹慎的（或許也是保守的）共產黨員來說，這卻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有一個人卻聽懂了，這個人就是當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不久後他就以「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為題寫了一篇文章；但在別的同志的勸說下，他在發表時還是把題目改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就這樣，文章還是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一九五九年，王任重徵求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贊同用「超過馬克思」，他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王任重《實事求是的典範——紀念毛主席誕辰八十五

周年》，轉引自郭思敏編《我眼中的毛澤東》，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石家莊，一三〇—一三一頁）

中國人應該有這樣的雄心壯志。後人要超過前人，爲什麼中國人不能超過馬克思呢？爲什麼中國不能超過蘇聯呢？毛澤東說的有道理，我們在實踐上已經超過了馬克思。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也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問題是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儘管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的經驗不能成爲典範，但中國共產黨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論準備和實際經驗也是很不夠的。

在理論上，毛澤東從斯大林問題吸收教訓，作了《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但這不能宣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已經完成了或成熟了。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但毛澤東仍然把經濟上趕上先進國家看得太容易了，以爲只要沿着過去搞群眾運動的辦法，憑着幾億人民的衝天幹勁，「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的氣魄，奇迹就會出現。

毛需要創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驚世界的事業，這樣才能確立中國的強國地位和他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

這成爲他發動「大躍進」的動機之一。

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講到學生超過先生、學生趕不上先生

就不爭氣時，重提了斯大林祝酒的事，說連斯大林也看出了先進的東方。當然這些話是在中共黨內講的。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運動就是在這種精神鼓舞下出現的。在這一年裏還出了人民公社。毛澤東以為，這就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實現了飛躍，中國可以提前實現共產主義了。而超過蘇聯，也不再是他的潛台詞，而是溢於言表的目標了。講到現實，還承認蘇聯的經濟底子比我們強，但是，不忘強調我們的政治底子比他們好。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講到要作「世界第一強國」，不過他還表示了一點謙虛：「蘇聯第一天進入共產主義，我們第二天再宣布嘛，要不然人家臉上不好看。」

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大躍進」的失敗已經明擺着時，毛澤東還在武昌會議上說：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可能要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法，這麼多人，什麼事情都可以搞。……我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面前，我設想一定要讓蘇聯先過渡（不是命令），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過渡，不管我們搞到多少鋼。」「總之，一定要讓蘇聯先進入，我們後進入。如果實際我們先進入，怎麼辦？還是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有實無名，可不可以？比方一個人學問很高，如孔夫

子、耶穌、釋迦牟尼，誰也沒有給他們按博士的頭銜，但並不妨礙他們的博士之實。」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的一段話：「一九四九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以後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這段話，陳毅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廣州市幹部大會上傳達。（馬齊彬、陳文彬等編寫《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五三一—一五四頁）

毛澤東的這個雄心，赫魯曉夫也感覺到了。赫魯曉夫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毛澤東「想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毛的目的很明顯：他想如果他能夠在五年內與英國並駕齊驅並且開始趕上美國，那他就能夠把列寧的黨遠遠拋在後面並且超過蘇聯人民自十月革命以來所取得的全部進展」。〈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第十一章〉赫魯曉夫並不欣賞毛澤東的理論和雄心，他不僅對毛澤東的「百花齊放」不同意，也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抱懷疑態度，這使毛澤東十分惱火。

又多又快又好，總路線的確立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的確立，是毛澤東發

動和主持的反冒進鬥爭的成果。

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毛要求五年內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每人達到二千斤，半個世紀內做到畝產二千斤。他認為，現在一人三畝地太多，將來只用幾分地種糧就夠吃。這個綱要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開發表時，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全民中開展一次大辯論，「以使掀起一個生產高潮」。隨後，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批判「右傾保守」。毛從反右派鬥爭中發現，對付不同意見的人，大字報是個很有用的武器。現在，他也用「大辯論開路」。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上，毛提出了提前實現《綱要》的問題。會後寫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強調「不斷革命」。其中，毛吸收了安徽提出的「三年改變面貌」的口號，在《六十條》中提出了「苦戰三年」和「十年取決於三年」。

「真正的左比右好」，這一次被響亮地提了出來，並流傳開來。

柯慶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

南寧會議後，河南省委部署，當年就要實現水利化，消滅「四害」（老鼠、麻雀（後來改爲臭蟲）、蒼蠅、蚊子），實現《綱要》規定的十二年達到的糧食畝產指標，消滅文

盲。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點時間，糧食生產達到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目標。遼寧省提出，當年實現糧食、豬肉、蔬菜三自給。毛澤東對河南的部署雖有懷疑，但認為危險不大，只要求不登報。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大運動。中央和省市如此之迫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山東某地合作社因為深翻土地增產百分之百，毛很重視，說「深翻換土，大有味道」，寧可一畝地花一百個工、幾百個工也幹；河南長葛縣介紹深翻地的經驗，說可以增產一倍至幾倍，毛很欣賞，號召學習長葛經驗，說：深翻一尺五，是一大發明。南方某地搞密植，毛也肯定。他提的是「合理密植」，到了下面變得越密越好，一畝地下種幾百斤的插紅旗，按老方法下種的插白旗。

八大二次會議，五月八日，毛講話說：「中國應當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大國，因爲人最多嘛！過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比蘇聯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們這麼多人，現在六億，再過十年八億。人多總要做事，總不能光睡覺嘛。」可見毛澤東的真正目標是要超過蘇聯，而他的資本則是中國人多勢衆。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他不懂科學技術，可是，他認為這個問題是容易解決的。他說：「我對工業也是一竅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業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幾個搞工業的談過，開始不懂，學過幾年也就懂了，有什麼了不起。」毛澤東也想到了要防

止驕傲，可那是在將來，而且是別人的問題。他說：「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到那個時候，會不會是大國沙文主義？」「我看十五年以後，尾巴肯定要翹起來，要出大國沙文主義。出了大國沙文主義也不怕。」毛說，他這次講話的題目就叫《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馬克思》。

五月十八日，毛又說：「明年（鋼產量）一千一百萬噸，後年一千七百萬噸，世界就會震動。」

五月五日，八大二次會議，劉少奇概括了總路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六六五頁）。

三天後，毛講話。談到總路線，不一樣。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三日的講話中都提到他的總路線，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雖然早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在七屆六中全會上作的結論中就提出，要講有些什麼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在《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社論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自己的事業」，從而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向全國發表了。八大時，周恩來在修改一個文件時曾勾掉了有多快好省的一句話。現在，毛澤東恢復了它。其實，其中前兩句話都屬於鼓勁，整個是純粹的空洞口號。實際上這是一條左傾機會主義的建設路線。執行過程中，實際上只

有多快，沒有好省。既要貪圖多快，又想兼顧好省，怎麼可能呢？就像他自己所批評的「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毛常說，某地可以做到，別的地方爲什麼不能做到。這種說法，就是不顧各地條件的不同。後來報上批「唯條件論」。毛還提出插紅旗，辦風向，拔白旗。

毛澤東認爲他的這個總路線，才是代表人民心聲的。他說：「多快好省是從哪裏來的？就是因爲群眾裏頭出現了多快好省，工廠、農村、商店、機關、學校、軍隊裏都出現了多快好省。既然這個合作社可以多快好省，爲什麼那個合作社不可以？既然這個工廠可以多快好省，爲什麼別的工廠不可以？這是積累了許多經驗形成的，有蘇聯的經驗，也有中國多少年的經驗。」毛主席又說：「這次大會，反映了人民的情緒，反映了人民的幹勁。人民要求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五月八日八大二次會議上，二百五十餘名各地代表紛紛發言，表示完全擁護這條總路線。他們列舉本地區的成績、經驗，說明總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提出了許多脫離實際的口號和指標。例如在農業方面，許多省都提出了「苦戰三年，徹底改變全省面貌」；廣西來賓縣提出「苦戰四個月，基本實現水利化」；河南長葛縣提出當年要把全縣一百一十二萬畝土地深翻一遍，爭取畝產八百斤；湖北谷城縣提出「爭取一兩年內小麥畝產一千斤」；安徽桐城縣提出當年畝產達到一千斤，爭取一千五百斤；廣東汕頭地區提出爭取當年畝產

達到千斤，三年左右達到一千五百斤。在工業方面，機械部門提出在「二五」計劃期間，機械工業的產品產量平均每年的遞增率要達到百分之五十；冶金部門提出，實現「五年超過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的任務，「二五」期間鋼產量平均每年的遞增率要達到百分之四十一點五；煤炭部門提出「二五」期間煤產量要達到七億噸；「兩年趕上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鐵道部門提出全民辦鐵路，「二五」期間修鐵路三萬公里，十五年內全國鐵路總長度要達到二十七萬公里；紡織部門提出五年內主要紡織品產量超過英國，趕上美國；輕工部門提出造紙工業的產品產量五年超過英國；水利電力部門提出五年內全國初步實現電氣化；第一汽車製造廠介紹了「苦戰半個月，三萬變七萬」，班產百輛車的經驗；包頭鋼鐵廠提出要實現「產量增加一番，速度快一倍，投資省一半」的目標。

六月，華東協作區主任柯慶施聲稱：華東五省市（不包括山東）今年比去年將增加五百零七億斤糧食，增長近百分之七十。譚震林肯定這是「飛躍」，說，根據華東的經驗，原來估計全國今年增產一千億斤，就小得不像樣子了。

經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以及幾個月來對「右傾保守」、「反冒進」、「觀潮派」、「穩妥派」、「秋後算帳派」的嚴厲批判，各級幹部發現說大話、吹牛皮、放空炮，不僅不挨批評，而且還得到鼓勵、表揚、升官。面對按指標高低分左右的局面，誰不寧左勿右呢？

於是各地紛紛提高指標，一時間，神州大地，到處是此起彼伏的「元帥」升帳、「衛星」上天的凱歌。

六月八日，報紙報道河南省遂平縣放出畝產小麥二千一百零五斤的「衛星」；六月二十六日，又報道了江西省貴溪縣水稻畝產二千三百四十斤的「衛星」。此後，一顆又一顆的「衛星」，越放越大。小麥畝產最高達八千多斤（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報道的青海間什刻農場），水稻畝產最高十三萬多斤（《人民日報》九月十八日廣西環江縣）。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出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來。」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宣稱：我國農業發展速度已經進入了一個「由漸進到躍進的階段」，「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來」。報紙還多次提出這樣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八月三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還特別解釋：「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以此強調「人是條件的主人」，批判「唯條件論」。

這一年（一九五八年）通過報紙、廣播放了那麼多「高產衛星」，可是，當時省以上領導機關卻沒有任何一位負責幹部對任何一顆「衛星」的真實性做過認真的調查。（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七二四頁）

一九五八年十月在西安召開的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的總結報告提出：一九五九年全

國糧食產量一萬五千億斤必須保證，並力爭達到二萬億斤。會上還出現一種奇異的說法：我國糧食產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也夠用」。十二月，八屆六中全會對西安會議的建議大大打了折扣。全會決定，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棉花指標一億擔，與鋼煤指標一起，合稱為一九五九年「四大指標」，並公開發表。

頭腦熱度達到最高點時的十一月，即第一次鄭州會議經過討論，曾寫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初稿）》，要求到一九七二年全國平均糧食畝產達五千到一萬斤，棉花畝產達到五百到一千斤。根據毛的設想，提出全國耕地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種農作物，三分之一休閒和種植綠肥，三分之一種樹種草）。（同上書，六九〇頁）

大躍進的浪費：華東地區水利建設，柯慶施一九六二年也承認：一九五八年以來，國家投資二十二億八千萬元，佔用耕地二萬六千畝，移民近二千四百萬人，已遷二百三十七萬人，但不少工程不配套，現在還不能發揮效益。有些工程打亂了原來的排水體系，加重了內澇和鹽碱化。……

從十年到兩年——鋼鐵超英

四月，毛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宣稱：「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

關於「大辦鋼鐵」。赫魯曉夫提出蘇聯用十五年時間超過美國。毛澤東接着提出，用同樣的時間，讓中國趕上和超過英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冶金工業部長王鶴壽一九五八年三月報告，鋼鐵工業可以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的時間趕上美國。毛對這個十分重視。在三月的成都會議上三次給予表揚，還號召其他部門向冶金部學習。

八屆二中全會上，五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李富春在發言中說到了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的目標的。王鶴壽由於受到了鼓勵，勁頭更足了，提出鋼產量五年可以趕上英國，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

柯慶施五月十三日的發言。他主要講的是文化革命問題。他說：以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我國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個專區、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人人知書識理，個個都有比較高的文化科學知識，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都懂得高等數學，什麼天文學、地質學、農業學、機械學、化學、物理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到那時，人們將過着極爲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孩子們讀到書上關於這些東西的記載，就像讀到希臘神話裏的怪物一樣神秘。人們在博物館裏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正如人們現在看恐龍化石一樣感興趣。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爲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不但有了更好地爲工農兵服務的文學藝術，而且工農兵自己也能更普

遍、更高明地動手創造文化藝術。每個生產隊、組都有自己的牆報、畫報，都有自己的李白、杜甫、聶耳，都有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共產主義的道德風尚，將成爲人們思想和行動的規範。那時「城市和鄉村的差別，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差別，將逐漸消失，而共產主義的最後建成，也就離我們不遠了。」他說，這樣設想到底符合實際呢？「只怕我們的眼界還是小了些，想得還不夠遠大」，現在已經不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我們怎樣盡最大的努力去實現的問題了。

毛在五日的大會發言，再次提出了速度超過蘇聯的問題。會上發了一個材料：《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毛在批語中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

王鶴壽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本來說鋼產量在一九六二年達到三千萬噸，六月初，他根據毛的指示，擬出新的規劃，要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將鋼的年生產能力提高到三千六百萬噸。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這個規劃。

六月中旬，李富春向中央提出新的《二五計劃要點》，認爲：現在看，以鋼鐵爲主的幾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有可能不用三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實現。毛很讚賞，批示說，「很好一個文件，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

六月十八日，毛談話，表示贊成提高鋼指標。薄一波同意，把一九五八年預計鋼產量由九百萬噸提高到一千萬噸，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指標由二千萬噸提高到二千五百萬噸。二十二日，毛對他的《匯報提要》作了批示：「……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並把《匯報提要》改為《兩年超過英國——國家經委黨組向政治局的報告》。

六月十九日晚，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毛澤東在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人談話，其中有王鶴壽。毛問王：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所以，後來公布的計劃是一千零七十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萬噸翻了一番。

毛澤東下「一千零七十」的決心，薄一波認為，柯慶施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六月中旬召開的協作區主任會議前，柯慶施（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也是新成立的華東協作區主任）主持了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定華東五省市鋼的生產能力在一九五九年達到八百萬噸。此外，王鶴壽多次提出的鋼鐵生產順利發展的材料，薄一波自己十七日的匯報、十八日的談話，也有影響。

六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稱：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

六月二十二日，毛在冶金部的一個報告上批示：「只要在一九六二年達到六千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

毛信心十足，覺得可以把這個報告對外宣布了，七月底到八月初，赫魯曉夫來華訪問。毛對他說，我們今年鋼產量一千零七十萬噸，明年是二千五百到三千萬噸。赫魯曉夫顯然不大相信。

牛皮是吹出去了，但實際進展不大。從一月到七月，才累計生產了約三百八十萬噸鋼，只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三十五點。六月十九日他提出翻一番以後鋼鐵生產也未見起色。毛急了，打電話給陳雲，作了八點指示，其中包括，加大保險系數，給冶金部直屬鋼鐵廠年產量增加五十萬噸的新任務；完不成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毛說，要有鐵的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

北戴河會議上，毛在多次講話中都說農業問題已經解決，要求第一書記從現在起，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工業上來，抓工業主要抓鋼鐵。

在八月十六日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又號召大搞群眾運動，書記掛帥，全黨全民大辦鋼鐵。

完不成任務的危險已經明擺着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公報還是宣布要為一千零七十萬

噸鋼而奮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緊急行動起來，土洋並舉。於是「全民大辦鋼鐵」的運動，就開展起來了。

九月四日，中央召開電話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譚震林說，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要求，明年糧食再翻一番，一千一百萬噸鋼，一噸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了。主席要求九月十五日前鋼鐵要有個大躍進，因為九月是要命的一個月。

十月，在河南召開了土法煉鋼的經驗交流會。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為他製造輿論的除了地方的柯慶施外，中央還有一個康生，他拼命迎合。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他在鄭州講話。說：「什麼是科學研究？敢於胡搞就是了，沒有什麼神秘！」二十七日，在安徽農學院說，河南「有一個互接運動。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積的。不要說書本上沒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同濟大學視察時，說河南灤縣出了許多許多小煉鐵家，「最小的八歲，用小竹竿穿孔，用嘴當鼓風機」，「每次出鐵三十五斤。」

這年底，《人民日報》宣布，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實際上，把不能用的土鋼剔除後，鋼的產量大約是八百萬噸。

這個勝利的代價是巨大的，為此許多地方的森林被砍光了，礦產資源被破壞了，群眾的鍋被砸光了。由於破壞了企業的管理制度，全國最大的第十號高爐，投產不到一個月，

就發生九起重重大事故。一九五九年五月底，冶金部向中央匯報，幾個月來，工業交通部門因事故死亡三萬多人。那一年，投入所謂「小、土、群」的農村勞動力最高時達六千萬以上。爲了這幾百萬噸基本無用或用處不大的生鐵，財政部一九五八年對小高爐補貼了四十億元（一九五八年財政總收入才二百八十七億六千萬元），光補貼小高爐虧損就超過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因提高調撥價格和土鐵質量差，而使煉鋼廠增加的支出和減少的收入。大煉鋼鐵的直接經濟損失幾百億元，使本來就不發達的國力又大傷元氣。

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七月上旬，《紅旗》第三、四期刊登陳伯達的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傳達了毛關於人民公社的構想。河南省遂平縣衛星社據此試辦全省第一個人民公社，這時，河南各縣也紛紛試辦。

同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闡明了人民公社的性質：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四年前，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做憲法草案說明時，認爲建成社會主義，需要十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即五十年；次年三月二十一日，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說，三個五年計劃，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要建成一個強大的高度工業

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幾十年，比如說，五十年。

這時，毛卻認爲：「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運用人民公社這一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會後，掀起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陳伯達收到《碓岬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第二次草稿）》後，即將《簡章》草稿的複製件和李友九的信轉報毛。毛當即對《簡章》作了修改，批示：「請各同志討論，似可發各省、縣參考。」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在廬山會議講話中回顧說：「我在河南調查之後，叫河南同志跟《紅旗》雜誌合作，搞一個衛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個東西，如獲至寶，你說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不然我爲什麼如獲至寶呢？」

八月四、五日，毛視察徐水、安國。在徐水，稱讚「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稱讚農民上山煉鐵，問糧食多了怎麼辦？可考慮讓農民一天幹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在安國提出：糧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實行輪作。

八月二十二日，徐水縣制定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制定一九五九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一九六三年邁進共產主義。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報道，宣稱：「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

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帶進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時光。」

八月六日，毛到達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在公社辦公室門口，看到公社牌子，點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有這樣一個社，就有好多這樣的社。」

九日，毛到達山東。當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啓龍、裴孟飛同志在匯報中提到歷城縣北園鄉準備大辦農場時，毛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毛視察三省，特別是八月十三日的報紙發表關於「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談話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辦人民公社的熱潮。

九月，《紅旗》推薦碓岬山人民公社後，大辦食堂。到年底，全國農村建立了三百四十多萬個公共食堂。

十月一日，《人民日報》宣布，我國農村基本實現公社化。

十一月，鄭州會議上，毛說：人民公社在大躍進中產生，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於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三國志·張魯傳》，並於十二月七日和十日分別寫了兩段批語。毛的這兩段批語，約一千五百字，是《張魯傳》的好幾倍。

一九五八年四月底，劉少奇等到廣州向毛澤東匯報籌備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情況時，曾討論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毛澤東在談到我國幾十年後的情形時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若干鄉村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爲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和超過。後來，決定由陸定一編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鄧力群編一本《空想社會主義者論未來社會》。後者只供高層參閱，前者廣爲宣傳。毛澤東在八月三十日的講話中說，《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這本書「要廣爲散發。看這本書，一曰很有啓發，二曰相當不足。有許多東西是模糊印象，因當時並無經驗。不要迷信老祖宗。我們有三十年的經驗，加上蘇聯四十年的經驗，具體多了。」（另據胡喬木回憶：一九五八年二、三月間，毛主席和陳伯達談過一次話，說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什麼都管，工農商學兵。——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七三四頁）

陸定一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底去廣州的火車上，接受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的任務後，回到北京立即組織中宣部的同志全力突擊，六月間初稿編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條語錄，就是恩格斯一八四五年二月八日《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狀況的幾段話。這條語錄就有兩個地方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這部書的編出，對毛主席最後決定把新合併起來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

看來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因此，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向與會同志一再推薦這本書。（同上書，七三六頁）

人民公社化和隨之而來的吃大鍋飯耗費了大量糧食，再加上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去辦鋼鐵，一九五八年是豐產而沒有豐收，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是四千億斤；又由於虛報產量，國家徵購是按照六千到七千億斤的產量來布置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全國共徵購糧食一千一百七十五億斤。這樣，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雲南已有人浮腫，毛還寫了《一個教訓》。到一九五八年冬，各地糧油緊張，有的城市的食油只能供應幾天了。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初，據不完全統計，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二千五百一十七萬。（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七一四頁）

在毛澤東大搞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時，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已於兩年前在中國翻譯出版。馬克思在書中嚴厲地批評了「粗陋的共產主義」，也就是「貧窮的共產主義」。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這本書中沒有收入馬克思的這一段論共產主義的話。是有意避諱呢，還是根本沒有讀過這本新出的馬克思的著作呢？恐怕後者的可能性更大。毛澤東從未提到過這本書，大概他也沒讀過。如果讀到了這一段，他會作何感想？那真像是批評他的人民公社的。公社的某些設想，如吃飯不

要錢，並非來自馬克思，而是來自《三國志·張魯傳》，那是封建時代起義農民的樸素共產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不相干。

毛澤東在十一月九日的鄭州會議上，還批評了資產階級法權。他說，資產階級的法權的一部分必須破壞。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柯慶施聽到這幾句話後，授意張春橋寫文章。張春橋的文章出來後，毛澤東加了編者按，讓《人民日報》發表，引起了一場大討論。直到一九八一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仍然沒有說清楚。其實，資產階級法權是封建主義特權的對立物，是在同封建主義鬥爭中產生的，在歷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而毛澤東上述的等級森嚴等等，都是由特權產生的，資產階級提出自由平等的口號，在形式上是打破了封建主義的等級制；商品實行等價交換，這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基本原則。共產黨由吃大鍋飯的供給制改為工資制，這是一個進步，毛卻在一九五八年說這是開倒車。

（一九九六年）

第九章

廬山會議與彭德懷

不難想像，「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多麼丟了中國的臉。國際上傳為笑柄。赫魯曉夫也在一九五九年初的蘇共二十大作了不點名的批評。毛澤東本來想顯示，從他抓經濟後，形勢頓然改觀，和別人完全不同，證明他的反對反冒進是對的。

不料，大躍進搞糟了。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上海會議上，他終於承認：「這不是大躍進，這是破壞大躍進，都躍不了了嘛！只有這麼多糧食，大家都吃不飽……」

在此以前，他可以自豪地說，他不像斯大林，他沒有犯過大錯誤，可是，現在不能這樣說了。自己犯了錯誤，但又非常忌諱別人的批評。他想自己糾正。

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起，毛一步步後退，糾正一些左的做法，如建議

這個綱要草案先放一放，不公布，也不提交八屆六中全會討論；批評了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提出壓縮空氣。但是，毛澤東做這些，並不是很痛快的，而且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指導思想沒有絲毫反思。

從此，毛有塊心病（obsession）。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要來算這一筆帳？斯大林在世時也是一個神，赫魯曉夫一個秘密報告，他就從神壇上跌落下來。那麼在中國黨內會不會有人學赫魯曉夫的榜樣？這樣的人可能是誰呢？

尋找海瑞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討論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毛澤東作了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要求多謀善斷，要與多方面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又說，安排工作計劃時，要留有餘地。

在這個會上，毛推薦大家看《海瑞傳》，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皇帝。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希望同志們敢於提出各種不同意見」，「有些同志報喜不報憂，不把真實情況反映上來。」「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麼不敢大膽批評，不想別人提意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說「嘉靖」是「家家皆

淨也」，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奏疏裏。以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是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毛說，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

毛在講話中說，他把《明史》送給彭德懷看了，並勸周總理也看一看。

在小組討論會上，張聞天說，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氣，使人敢於講話而不害怕。」彭德懷說，人家提意見，可沒有把皇帝拉下馬的意思哦。他們兩人的話都說到了點子上。毛只是要別人這不怕那不怕，並沒有說自己要整人。

在上海會議上，毛曾點名批評彭德懷，口氣嚴厲而且突如其來，使彭德懷一連幾天迷惑不解，鬱鬱不樂。會後，彭德懷回北京，一直到出國訪問，大約半個多月時間裏，案頭總放着一本《明史·海瑞傳》。（《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一三頁）

據五十年代後期曾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梅白回憶：會前，我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便問我：「你認不認識海瑞？」又說：「我希望中國能多出幾個海瑞。」我問：「是不是『釣魚』。」他說：「不是。」第二天，毛主席在會上講了海瑞。會後，他對我說：「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會後，毛澤東講了希望黨內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澤東又問我：「今天講海瑞，反應如何？」

我說：「有突如其來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會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時，請主席沉住氣。」（梅白《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裏》，轉引自郭思敏編《我眼中的毛澤東》，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石家莊，一三二—一三三頁）

上海會議後，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向全國各級幹部發出《黨內通信》，繼續提倡講真話：「老實敢講真話的人，歸跟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邊壓出來的。上面『一催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會後，胡喬木去找吳晗，請他給《人民日報》寫一篇有關海瑞的文章。吳晗很快寫出《海瑞罵皇帝》一文，發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上。接着又寫了《論海瑞》一文，發表前，交給胡喬木，胡喬木在廬山會議後才看這篇文章。除了提出一些意見外，還把毛在廬山會議上講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話同吳晗談了。於是吳晗作了修改，然後發表。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北京京劇團馬連良約吳晗寫有關海瑞的提綱準備編戲。一九六〇年初，馬連良等人又再三要求吳晗修改草稿，編寫劇本。三月，寫成五場《海瑞》劇本，經過多次修改，一九六〇年底定稿。這個劇本原名《海瑞》，後來，吳晗採納了蔡希陶等人的意見，在一九六〇年底彩排後，改名為《海瑞罷官》，於一九六一年初公演。

話說回來，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還讚揚了陳雲。毛本來是很不服氣陳雲的，一九五八年，某次譚震林和田家英在毛澤東處談話，談到了管理經濟問題，毛突然拍桌子說：「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八頁）現在，毛讚揚陳雲說，陳雲曾經不同意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糧食指標，主張降低鋼鐵指標，這都是對的。可見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手裏。武昌會議公布糧產七千五百億斤時，陳雲不同意公布，告訴胡喬木，胡喬木未向毛匯報。爲此上海會議上批評了胡喬木，但後來胡喬木私下說，當時不匯報，是爲了保護陳雲。武昌會議時，王稼祥也向劉少奇說過，不要公布關於公社的決定。劉少奇轉告了毛澤東，毛大發脾氣。

接着，準備開廬山會議。

上廬山前，毛一路視察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了解了許多情況。寫了十幾個問題，供會上討論。

廬山會議於七月二日開始。大家的精神準備都是：這次會議是一次糾左的會議。會議開始時，傳達了毛所擬定的十九個要討論的問題。其中提到：

編三本書：《好人好事》，表揚大躍進中堅持真理，不隨風倒，不謊報不浮誇的典型；《壞人壞事》，批評犯錯誤的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最後一本是中央和各省市的文

件；

去年一年的經驗主要是，綜合平衡，群眾路線，統一領導，注意質量。去年腦子發熱，但熱情寶貴。怪話不少，要讓人說；

任務：今年鋼是否一千三百萬噸（這是陳雲的建議，實際上仍然是完不成的），鋼明年只能增四百萬噸，以後幾年也如此；糧食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三成？十五年內主要產品趕超英國要堅持；

過去安排是重輕農，現在是否改農輕重？過去陳雲提過，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好基建。現在看來陳是對的；

食堂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百分之三十也是好的。吃飯基本要錢，一部分不要錢。供給制不要否定；

恢復三定（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增產部分，增四留六；恢復農村初級市場；

生產小隊改為半核算單位；

對去年的估計：成績偉大，問題不少，經驗豐富，前途光明，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雖然毛是在完全肯定三面紅旗在前提下提出這些問題的。但他畢竟承認了一些錯誤。

廬山會議上，許多人認為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八個月的糾「左」，雖有成績，但還不夠，要求進一步深入進行。有的還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也有不少人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護短，甚至認為糾「左」已經過了頭，使幹部群眾泄了氣，出現了右的傾向。

會上，發下了一些基層幹部和群眾的反映，說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謊報的結果；糧食副食品的緊張，就是沒有大躍進的證明，去年大躍進，還不如前幾年沒有躍進；有人說，現在除了水和空氣外，其他一切都緊張，「物資供應情況比日本統治時期還要嚴重」；關於大煉鋼鐵，認為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關於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指標，是領導上主觀主義的規定，要算政治帳，但也應算經濟帳。經濟效果不好，也會使政治影響不好；煉鋼損失了二十三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大煉鋼鐵有四大害處，一，影響秋收；二，影響整個工業生產；三，煉出來的鋼不能用，四，國家賠了二十三億」。

關於人民公社，認為搞公社化，根本沒有條件。中央關於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是左傾思想；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對農民的覺悟估計過高，忽視農村現實條件。有的說，「公社的優越性是宣傳出來的」；關於公共食堂，認為有三大壞處：排隊搶食浪費，現在不要，將來也不要；還有許多意見，是直對中央領導的，說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有的說，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

們一天天好起來（毛澤東語），我看是社會主義一年不如一年。

在這期間，彭德懷在小組會上作了七次發言或插話，有些是對着毛的。

七月三日：「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經濟一連串勝利，黨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說得意忘形可能重了點，總之是腦子熱了點……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去了解，實際只增產百分之十六。我又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只有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會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過這件事……」

七月四日：「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在內。」

六日：「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主席讓搞的。」

八日：「毛主席與黨中央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毛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

九日：「什麼算帳派，觀潮派……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十日：「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的決定、第一書記的決定算。」

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正常的，是很危險的。」

此外，彭德懷還有私下議論。和張聞天議論到，張說，廬山會議壓力很大，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毛澤東）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歷史學了不少好思想，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彭則認為，毛同斯大林晚年不同，說歷代開國之君都英明而厲害，無產階級領導也要厲害才行，同皇帝有本質的不同。還對張表示，他不滿意毛對他在上海會議上的批評，說主席自己犯了錯誤，不認帳不檢討，反而責備別人。

毛澤東自己承認錯誤可以，別人的批評則讓他坐不住了。

七月十日晚，毛召集各小組組長，講了一些話，提到黨內黨外的一些批評，顯得並不高興，說去年的一些缺點錯誤要承認，但從全局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的問題。「多快好省不會錯。」成績還是主要的。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年實踐，抓了工業，取得了這麼多經驗，同過去只聽『訓話』，走過場，讓簽字畫押，總算是不同了。一年來有好的經驗，有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說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毛在這裏說的聽訓話和簽字畫押，矛頭是對着國務院的。重提當年反冒進時對國務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他沒有實權的舊怨。毛還把造成的損失說成是付學費，說「許多事，要取得經驗，總得出學費」。這個學費是高得驚人的，可是毛

學到了多少東西呢？

毛澤東七月十日講話後，柯慶施活躍起來。

七月十一日，毛同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談話，似乎有點虛懷若谷的樣子。周小舟說，颯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裏有什麼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話是暗指毛了，但毛似乎也不以為忤。李銳說：去年是唯心主義、小資產階級急性病大發展的一年，敢想敢說敢幹起了許多副作用；「以綱為綱」、「三大元帥」等口號不科學。毛當即表示：以後可不提這些口號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七八—八二頁）李銳趁機建議說：財經工作還是由陳雲同志掛帥為好。毛澤東表示同意，還講到《三國志·郭嘉傳》中的話：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毛同時作了點自我批評：「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許多事我都要負責任，有些也真負不了。」他舉例說，農業可以高產，是看了錢學森的文章；講人民公社好，沒料到第二天就登了報；誰知道搞鋼鐵這麼複雜？毛澤東忘記了他對王明的批評。王明犯錯誤是因為聽了斯大林的指示，當時毛說，我們不怪別人，只怪自己。這裏，他上半句剛說自己要負責，下半句就推卸掉了。

「海瑞上疏」

七月十二日上午周小舟向彭德懷介紹了十一日毛談話的情況，說到他還對毛說過「上

有好者，下必甚焉」。主席都聽進去了。因此他建議彭德懷找毛談談。彭德懷說怕談不好，自己言語生硬，容易頂撞。當然頂多撤職，也不要緊（彭德懷大概想到了毛所說的五不怕和海瑞精神），想寫封信，周很贊成。可到了下午，彭德懷又猶豫起來了，覺得還是當面談算了；他去找毛，毛在睡覺，沒有見成，於是彭決心寫信。

十四日下午，彭德懷的這封信送給毛澤東。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的小標題是：一九五八年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首先說了一通成就和總路線的正確，然後談到缺點說，看來有些基本建設的項目是過多過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建議明年（一九六〇年）的計劃，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至於五八年和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實在無法完成的基本建設項目，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於決斷。」

關於農村工作，彭德懷也是在肯定公社化的偉大意義之後說，全民煉鋼，浪費了一些資源和人力，付出了一筆學費，但也是有失有得的。

第二部分，談如何總結經驗教訓。彭德懷說，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又說：「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轟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接着又說道，大躍進有國際國

內的客觀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盡快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彭德懷認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暴露出來的主要問題，一是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一切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見之於報刊，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另一個問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佔了上風。」彭德懷指出，「政治掛帥不能代替政治法則，更不可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所證明了的。」

信的結尾提出，總結成績和教訓，「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

整個看來，這封信是寫得很溫和很謹慎的，彭德懷小心地照顧了毛的自尊心，首先把成績講夠，然後談缺點。口氣遠不如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那樣尖銳。當然，他的助手在整理這封信時也幫他磨掉了一些棱角。和海瑞罵皇帝那樣痛快淋漓的諫書相比，是客氣多了。

毛提倡學海瑞，他會對眼前這個海瑞如何反應呢？

十五日，原定會議結束的日子。中央辦公廳通知，會議延長，日期不定。

十六日，毛澤東找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說要討論彭德懷的信，要林彪、黃克誠等人上山。

同日，彭德懷的信被印發給與會者。

十七日，開始小組討論，這時毛還沒有表態，發言的人多數基本同意這封信，只是認為個別字句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值得斟酌，表示完全同意的只有一個人（張聞天），完全反對的也只有一個人（陶鑄）。許多人都認為彭德懷有膽量，但深知毛澤東的胡喬木在閒談中對田家英等人說，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

十七日下午，毛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談話。

這次談話，毛的調子變了，但又有些不可捉摸。他說，現在的情況，實質是反冒進，我是反冒進的頭子（原文如此），要有幾個右派朋友，我是機會主義的頭子，我要找唱反調的通訊（所謂右派朋友，後來證明包括在座的一些人在內，但當時他們都沒有悟到）。毛說權力集中很不容易，過去在井岡山時期，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權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敵委員會。這幾句話李銳注解說，這是證明為何自己要親自抓經濟的道理。毛接着反覆講，一千三百萬噸鋼的指標來之不易，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喪考妣。毛接着說，現象與本質，有時不容易看清楚。真正高產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五，因此年增產百分之三十是不

大可能的。隨後，毛又講到，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因此比例失調也是無可責備的）。幾個人又提出由陳雲主管經濟爲好，胡喬木還轉達了劉少奇的意見，即由陳雲主管計委工作。這次談話，毛似乎是順便提到了洛川會議，說華北軍委分委不同意中央所定的游擊戰爲主的戰略方針。這是暗示彭德懷在歷史上就和他有分歧？十八日，彭德懷在西北小組會議上要求將信收回。

轉折

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開場白是：「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他說，會上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只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毛說，「無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我勸在座的諸公，你們都用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無非是罵祖宗三代。」毛這樣說，並不是勸這些人虛心接受意見。他說，爲什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因爲我們作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毛說，要硬着頭皮頂住。顯然，他的思想感情，是站在「一觸即跳」這些人一邊的。

毛說的另外一種傾向是，在緊急關頭動搖，「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

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之下。」「他們重複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只差三十公里了。」毛說到自己時說，你們抓住就整我嘛。「不贊成你們就駁，說毛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被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

「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其次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但有推廣之權。」

「馬克思列寧也有錯誤。但這種錯誤，比那淒淒慘慘戚戚要好。」

實際上，毛沒有真正認錯。他也在「硬着頭皮頂住」，而且把抗戰時期對付國民黨的原則搬出來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是有威脅意味的。

毛講話後，整個會議主題變了。大家一面倒，批判彭德懷。

從參加開會的人來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見大局已定，一個個都慷慨陳詞……

這個會議本來是要繼續糾正左的錯誤，但毛澤東既要糾正自己的錯誤（這種糾正是很有限的），又十分討厭別人出來說三道四。偏偏性情耿直的彭德懷在這時多嘴上萬言書，形勢陡然改觀。儘管彭德懷字斟句酌，措辭溫和，表明自己完全出於善意，但還是觸痛了

毛澤東的敏感神經。他能夠猜想到，黨內外對「大躍進」都會有意見，只是有敢說不敢說的區別；知識分子經過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已經噤若寒蟬了，但黨內的高級幹部會不會有人出來批評他呢？現在果然跳出來一個彭德懷。毛澤東從彭德懷的身上看到了赫魯曉夫的影子。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死後才作秘密報告的，彭德懷卻在毛澤東健在時就「發難」了，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上書的反應是迅速而堅決的：他馬上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從「糾左」轉為「反右傾」。「糾左」是和風細雨的，因為那實際上牽涉到自己；「反右傾」卻是暴風驟雨，因為他認為彭德懷是對自己「下戰書」。「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裏通外國」、「分裂黨」……這一頂頂大帽子往彭德懷頭上扣了下來。

二十六日，毛指示：對事也要對人。（其實，毛後來是對人而不是對事）

同日，印發了李雲仲的意見書及長篇批示。李當時任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沒有參加廬山會議。他上萬言書給毛澤東，對經濟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和一些思想作風問題提出了意見。信是六月九日寄出的。毛的批示說：信的作者只對搜集屬於缺點方面的材料有興趣，而對成績方面的材料根本不發生興趣。因此得出結論說，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犯了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但是毛說，「這個同志的好處，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不像我們看到的另一些同志，他們對黨和人民的主

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興，而是不滿，……但是不願意講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講一點留一點。」（這是針對彭德懷的克制）

「他不隱蔽自己的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採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評，佔了很大的篇幅。我認爲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願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的有分析的系統的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見到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也難越衙上告。」毛澤東全部否定了李雲仲對公社化和大煉鋼鐵的批評，但是，肯定了他對計劃工作的批評（因爲這是別人的責任），甚至說，十年來還沒有人批評過；他鼓勵越衙上告，就是告到他那裏。

「必須做到改錯與鼓勁兩個方面。」「但是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不講於團結不利，於黨於個人都不利。現在這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爲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常委會。對彭德懷算歷史舊帳。

林彪是二十九日才來廬山的。他是毛搬來的救兵，當然意識到自己的使命，這也是自己立功邀寵的機會。他在發言時猛攻彭德懷，聲色俱厲。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馮玉祥式

的人物，說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當英雄。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發表。第一句話就是：「現在右傾思想，已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

接着在中共中央關於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決定中，用極重的詞，算歷史帳。

廬山會議後馬上召開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撤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並在全國展開「反右傾」運動。

許多人弄不清，為什麼毛要對彭德懷如此心狠手辣。是歷史上的宿怨（毛是記仇的）？還是彭德懷的「犯上」（毛對自己的權威是很敏感的）？黃克誠認為，說他桀驁不馴，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認為不對的時候。他耿直，討厭捧場，建國後對歌功頌德看不慣。看不慣就要說。而且說得很難聽。從不怕得罪人。這樣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二六二頁）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毛從彭德懷身上看到了赫魯曉夫的影子。廬山會議批彭之後，毛把赫魯曉夫對人民公社的批評印發給大家。毛說赫魯曉夫很不喜歡公社，總有一天，給張樓梯讓他下來。

在小組會上，很多人都說彭德懷是魏延，有反骨。七月三十一日，常委會上，毛還對彭德懷說：「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二三八頁）「從打擊斯大林後，佩服赫魯曉夫，彭德懷不喜歡個人迷信，不喜歡主席這個稱呼，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也是批判的重點。林彪厲聲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同上書，二五二頁）這個話是說到了毛心裏。

本來在開會之前，很多與會者都認為會議應該繼續以糾左為主，彭德懷的信不過是講出了許多人的心裏話，毛把這封信印發討論並延長會期，雖然他當時沒有立即表明態度，但不難猜測出他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從十七日到二十二日的一周間，各小組的討論，多數是同意彭德懷的信的。李銳說：「神仙會階段，……包括大區負責人，……佔多數的，不僅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都表了態。」（同上書，三七三頁）

彭德懷的信印發後：

彭德懷在七月二十三日給毛的信中說：「各小組經過六天討論，同意的只有一個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個同志，其餘在發言中的大多數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基本上同意的人，他們有所保留的也只是「小資產階級狂熱」這個用語。

那麼，毛又何以能夠取得勝利呢？

他如此反駁對手：

一、說批評者是給群眾潑冷水，泄了六億人民的氣。其實，彭德懷是給毛澤東個人寫

信供參考，他的發言也是在中央的會議上，群眾根本聽不見，怎麼說是給群眾潑冷水呢？其次，吹牛、頭腦發熱，主要不是群眾，而是各級幹部，特別是中央的一些人，首先是毛澤東本人。群眾對吹牛是不滿意的。給這些幹部潑冷水，讓他們頭腦清醒一點，有好處。如果受了一點批評就泄氣，那就不是革命者了。使群眾泄氣的，不是彭德懷的批評，而是大躍進失敗的事實。

二、錯誤難免，取得經驗。毛說馬克思列寧都犯過錯誤，那麼自己犯錯誤，也不稀奇了？他甚至說：「九千萬人上陣煉鋼，比六千萬人要好。有一點損失，我也一點不痛心。橫直沒有經驗。從根本上說，是得多於失。沒有失哪來的得？」（同上書，二一六頁）所有這些都當學費付了。問題是，付出那麼昂貴的學費之後，他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三、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又是一個公式。毛的意思是說，只有路線正確，成績總是最主要的。如果誰多說了幾句缺點，就是分不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批評者不過「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做旗幟」，把缺點說成主要的，這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沒有人敢說這是路線錯誤，因此只能承認成績是主要的。這就把大家的嘴封住了。其實彭德懷等批評者並不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倒是毛澤東對他們才是抓住一點，全盤否定。

四、算歷史帳。把幾十年的恩恩怨怨全抖出來。批判彭德懷的很大一部分內容是說，彭德懷在歷史上怎樣犯錯誤，和毛澤東的關係「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七開。

五、上升到階級鬥爭。毛澤東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說彭德懷等人是右傾，代表資產階級。把黨內的思想分歧，說成是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反映。說彭德懷等人是革命的同路人；現在革命深入了，就不能繼續前進了，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這完全是大帽子，就是毛澤東自己批評過的黨八股，裝腔作勢，借以嚇人。

六、拿理論嚇人，大談哲學。說什麼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還說「大放假衛星有幾大好處，無假哪裏來真？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同上書，二四一頁）把辯證法變成了詭辯。對彭德懷大談哲學，大談世界觀人生觀宇宙觀社會觀，又扯到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彭德懷承認自己也是經驗主義，毛就批評他不懂得經驗主義是指馬赫唯心主義經驗論；又搬出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本書，其實這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七、誣蔑。說彭德懷有野心，裏通外國，分裂黨，偽君子，說「你們要瓦解黨，這回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同上書，一七一頁）。毛給張聞天的信，劈頭一句就是「你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一

語定案，讓人欲辯不能。毛說有一個軍事俱樂部，那當然就有。於是，從八屆十中全會，一直追到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逼得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只能「屈打成招」。彭德懷沒辦法，拍了桌子：「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為彭德懷辯誣：「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已經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鍾偉是這個軍事俱樂部的成員、也拿我去槍斃吧！」結果當場被捕。

毛澤東的策略也很高明。

一是引蛇出洞，上海會議上提倡海瑞精神，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本不想參加，已經請假，毛親自打電話要彭德懷參加。在廬山上，毛和幾個秀才談話，裝出一個虛懷若谷的樣子，以至周小舟勸彭德懷寫信，終於釣出了一條大魚。事後毛又說：「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是右派海瑞。」他說彭德懷「到處散布別人都行，只有他自己已是海瑞。」（同上書，三四七、三四九頁）

二是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強加於常委。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據李銳說，其他常委和大家一樣，也是臨時得到通知去聽毛講話的。七月二十七日，毛澤東講話後第四天，政治局討論。周恩來說要對彭德懷三七開，劉、朱等人同意。毛說：「看來我只好再上井岡山了。」（彭程、王芳《廬山1959》，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三四頁）

第三，毛一再講要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要說服不要壓服，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加分析，還是有希望的，無非兩種可能，能改不能該，要幫助他改。對人要有情，留有餘地。（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二六六頁）可是實際上卻是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一套。批評從嚴就是亂扣帽子，處理從寬就是讓人家對沒有殺頭感恩戴德。

第四是逐步升級。毛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說：犯錯誤的人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究竟中間偏左還是偏右，還要分析。到了把與會者發動起來批判彭德懷時，七月二十六日，毛又說，是右派猖狂進攻。七月三十一日，常委會上，毛又說，彭德懷有野心、偽君子、瓦解黨、有計劃，這些話都來了。還說上次說跑到右派旁邊，只差五十米，說得不準確。（同上書，二四四頁）

廬山會議的教訓是什麼呢？有些人說，還是黨內民主重要。但是，共產黨本來是有民主傳統的，為何丟了呢？把民主限定為一種作風，那麼領袖有這種作風，黨內就有民主，否則，就沒有民主，還是以領袖個人為轉移的。這裏面還有黨文化的熏陶。

從常委們來說，毛既然對彭德懷定了性，而且對他們的態度表示了不滿（「隔靴搔癢」、「再上井岡山」等等），他們就相繼放棄了堅持己見：

劉少奇立刻對毛表示了支持：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黨內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時，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

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把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

周恩來在山上忙於安排第二個五年計劃，他自己說沒有想到會出這件事，加上他曾經受到毛對他「右傾」的批評，這時當然不好為彭德懷講話。

朱德內心同情彭德懷，迫不得已，只好敷衍幾句。毛嫌他講得不够尖銳，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腳，表示他在隔靴搔癢。弄得他漲紅了臉。後來，朱德還勸彭德懷把事情想開些，無論如何不要產生對立情緒。

在軍委擴大會上批鬥彭德懷時，是有很多阻力的。主持會議的萬毅（候補中央委員，總參裝備計劃部部長，見沒有人發言，就說，應該學習彭德懷的意見書，實事求是，有什麼說什麼。他這一誘導，大家就打破了沉默，紛紛為彭德懷的意見書辯護。萬毅事後就被作為彭德懷的狗腿子被看管起來了。那個義憤填膺的鍾偉在被押出會場時還高聲喊叫：「毛主席，你可不要上了他們的當，他們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你要警惕呀！」

此外，「五不怕」，對人們來說仍然是「五怕」。有的人在戰場上不怕死，因為死了是英雄、是烈士，可是他們怕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帽子。正如張聞天在會上發言所說：「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張聞天廬山會議發

言》，北京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二〇頁）那樣一來，就會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就像祥林嫂所恐懼的那樣，一旦有了罪，死後靈魂都不得解脫。這種精神上的強大壓力，如果沒有另外一種文化的精神支柱，是承受不了的。

首當其衝的彭德懷，他的心態又如何呢？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屆八中全會開始的那天，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已經夠臭的了，這次還要把我搞臭。不過這樣也好，這樣才能在全軍中消除我的影響。」他還說過：「廬山會議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彭德懷是抱着一種犧牲的態度，認為自己受些冤屈，但有利於解放軍的鞏固，所以是值得的。

彭德懷爲什麼做檢討呢？他覺得他還應該顧全大局。

許多人自己認錯和勸彭德懷認錯，也是從這一點出發的，都要維護領袖威信，維護黨的團結。

其他老帥勸彭德懷做檢討，也是這樣說：主席在時，你就這樣，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了你？聶榮臻和葉劍英奉毛之命去勸說彭德懷：「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只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細節。」「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嗎？今天當着自己做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最後，他們都談得熱淚盈眶。（《廬山會議實錄》，二〇五頁）

陶鑄找了黃克誠三次，對他曉以大義：你總得爲黨爲國家大局着想才是，現在中央領導，各部門各地區的主要領導都在此，七月開了一個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八月開中央全會也半個月了，再拖下去，對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認大家通不過，最後還是得承認，何必再拖下去呢？」我反覆思考。現在處境確實困難，主席性格之強，我所深知，而且中央全體，除我們幾個人外，都站在主席一邊，個人受委屈，背冤枉，畢竟是小事。聽說彭德懷表示，他想通了，要什麼就給什麼，我也只好照陶鑄說的顧大局吧。」（《黃克誠自述》，二六一頁）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認右傾，我可以心甘情願，因爲我心裏從沒有贊成過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但要承認反黨，而且是有組織有目的的有計劃的反黨，可太難了。時逼處此，硬着頭皮違心地認帳後，心中耿耿，無日得安……我們這樣違心認罪，除了聽從一些與我們關係好的同志勸告，要我們顧大局，暗示應犧牲自我外，還有一個因素，這因素不僅影響我們，而且還影響許多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同志和與會成員。許多年來，在內戰長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確已爲全黨所公認。……所以我們已習慣於認爲：主席比我們都高明。習慣於服從主席的決定，習慣於接受主席的批評。儘管心裏有不同意見，也接受了。雖然這一次實在不能接受，也不應該接受，也強迫自己接受了。（同上書）

陶鑄給黃克誠寫了封信，說：

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於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絕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二九九頁）

總之，沒有人把原則的是非擺在第一位，沒有人說彭德懷是對的，毛澤東是錯的；也沒有人說，這樣的問題應該通過民主討論的辦法來解決。

他們仍然相信毛澤東的善意，認為反對了毛澤東就是破壞了黨的團結，要以大局為重等等，總之，都跳不出忠誠這個範疇。即使思想不通，也不敢公開反抗。幾千年封建文化的積澱，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的熏陶，形成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文化心理。

毛說，「犯錯誤的同志幫了大忙」。（同上書，三四四頁）的確，他利用反彭德懷擺脫了自己的被動地位，讓國內的群眾幹部都不敢講話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公報中說：「經過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實，過去發表的一九五八年農業產品產量

的統計偏高」。公報宣布的糧食實際收穫量是五千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但這個數字依然是虛誇的，以後再次核實，實際只有四千億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點五。在反右傾運動中承認過去的產量統計偏高，誰還敢議論和笑話呢？

這時，毛澤東是鬥志昂揚，他有決心也有信心打敗那些敢於向他挑戰的人。——不止是彭德懷，還有赫魯曉夫。在八月一日的一封信中，毛澤東說，「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外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二十三日，毛澤東又說，「現在是黨內外夾攻我們。」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開始，中直機關反右傾整風開始，重點批判對象一千九百人，其中司局長以上（中直機關是十二級以上）二百八十七人，佔同級黨員幹部的百分之九點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七九頁）全國三百多萬幹部、黨員被重點批評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反右傾給左的勢頭火上澆油。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認為：現在我國工業化速度也是一個尖銳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許可高速度。」（《毛澤東思想萬歲》，二二四頁）。一九六〇年，繼續「大躍進」中，大辦鋼鐵、大辦糧食、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等等又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一擁而上，結果使國民經濟

比例進一步失調，農業所受的破壞尤其慘重，連續減產。

在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之時，中蘇爭論加劇和升級了。一九六〇年四月，以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為名，《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批判「現代修正主義」，蘇共也由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名義發表文章進行反擊。六月，在布加勒斯特會談中，蘇共代表團向各國共產黨代表散發了給中共中央的通知書，批評中共的政策。中共代表團也散發聲明，點名批評赫魯曉夫。七月，蘇聯政府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中止幾百個協定與合同。……

主要是政策上的錯誤，加上氣候條件和蘇聯的停止援助，出現了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難。在這期間，餓死的災民以千萬計（據一份最近的非官方調查，這個數字高達五千萬至五千五百萬），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饑荒死亡的人數。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